

上海《晨报》上的刘呐鸥、穆时英集外文

杨新宇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的《晨曦》和《每日电影》副刊,是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和电影副刊,但学界对它们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上刊载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是颇为重要的文献,其中就有为《刘呐鸥全集》《刘呐鸥全集·增补集》《穆时英全集》所失收的集外文,如刘呐鸥的小说《你夫人是中国人吗?》,穆时英在软性硬性电影论争中的《血腥》等。

关键词:上海《晨报》;《刘呐鸥全集》;《穆时英全集》;集外文;软性电影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01-06

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十多年前笔者因研究袁牧之,为还原袁牧之的交游情况,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顺带关注到穆时英,曾搜集到不少《穆时英全集》失收的文字,其时尚无“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可用,遂整理出来,于2009年投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该刊尚有网上稿件查询系统,显示拙文通过初审,谁知后来竟未刊出。三年后这些集外文始由其他学者掲載出来,当然这些辑佚考证文章,最有价值的当属佚文的重新出土,由谁整理,区别亦不甚大。

但笔者并未气馁,之后又陆续将新发现的穆时英集外文整理发表,计有《从穆时英佚文看他的情感生活和都市文学观》(与李欣合作,刊香港《文学评论》2012年第20期),《穆时英集外文〈浮雕〉及其他》(刊《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2期),与其他学者的考证文字一起,为穆时英资料的进一步完整,作出了零星贡献。这或许就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笔者起初关注的焦点是袁牧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很自然将视野拓展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海派文艺的创作上。由一点进入,而能得到较全面的收获,不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都能为学者带来不能自己的愉悦。笔者注意到,海派文艺的研究尚有一些空白之处,以穆时英为例,他所领导的“晨

曦文艺社”就少有学者关注。30年代的京海之争是文坛颇为轰动的大事,但一说起京派作家,就让人觉得人才济济,每一个都是如雷贯耳;而海派不外乎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最多再加上叶灵凤、黑婴等等,似乎不能与京派势均力敌。而京派更有后起之秀,如严文井、刘祖春、黄照、田涛、胡昭衡(李欣)等年轻作家,有“小京派”之称。相比“小京派”作家在沈从文、萧乾等前辈提携之下大量在《大公报》《武汉日报》等文艺副刊发表作品的情形,“晨曦文艺社”作家也同样在上海报纸文艺副刊上发表有大量作品,或可仿“小京派”之名,名之曰“小海派”。穆时英主编的上海《晨报》《晨曦》副刊,就是“晨曦文艺社”的主要阵地。

青年学者王贺曾说:“为补文集、全集之失,学者们做了许多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因近现代报刊数据库的建置、各类网络资源的开放获取,使这一工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1]的确如此,比如笔者当年仅在重庆图书馆查阅到的穆时英的《浮雕》,目前已能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方便地检索到。但民国时期大量的报纸文艺副刊,尚无检索可用,有些有影响的还需翻看。为此,笔者为了梳理“晨曦文艺社”的创作情况,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整理了《晨曦》副刊的目录,“晨曦文艺社”资料的整理,对于丰

收稿日期:2022-10-20

基金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JZD037)

作者简介:杨新宇(1976—),男,江苏洪泽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富学界对海派文学的理解,不无裨益。但对“晨曦文艺社”创作的研究,以及穆时英与“晨曦文艺社”关系的研究,尚待另文梳理。笔者在查阅《晨报》时,又发现了《晨报》上的刘呐鸥、穆时英若干集外文,特此整理出来,供学界参考。

一、《晨报》上的刘呐鸥集外文

既是学者,又是小说家的阎真在谈及新感觉派作家时曾说:“这个作家群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刘呐鸥,但刘呐鸥的小说不论从创作质量还是从创作特色上来说,都还不具备作为这个群体的领袖人物的风范。其中最特色的人物,或者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穆时英。”^[2] 阎真对刘呐鸥的评价应该是颇为中肯的。刘呐鸥的创作成就的确不如穆时英,但刘呐鸥作为较早的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者,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毕竟是不可抹杀的。可惜因为他后来政治上的堕落,他的较完整的文集在大陆一直无人整理,只有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刘呐鸥小说全编》及陈子善先生编纂的作为他创作全集的《都市风景线》(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好在他的故乡台湾台南县,已于2001年编纂出版了《刘呐鸥全集》,并于2010年又出版了《刘呐鸥全集·增补集》。

《晨报·晨曦》副刊上有他连载十二日的小说《你夫人是中国人吗?》,既未收入《刘呐鸥小说全编》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都市风景线》,也未收入《刘呐鸥全集》及《增补集》。这篇小说尽管水准有限,也并不具有典型的新感觉派特征,但刘呐鸥的小说为数不多,而且这篇小说的题材又非常独特,因此,还是弥足珍贵的。《你夫人是中国人吗?》既是一篇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小说,又是一篇涉及外国人的婚外情小说。小说讲述的是李博士因埋头实验,怕妻子淑珍受到冷落,故而恳请同事外籍教师哈特陪妻子游玩。新感觉派作家一向大胆地表现情热,小说中也对外国人猎艳的心理描摹得淋漓尽致,但像这样主动给妻子制造婚外情机会的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事实上,淑珍与哈特两人也的确很快燃起爱火。两人爱情关系的终结,是因为某次淑珍带孩子逛公园,误以为孩子失踪,惊慌失措,扔下哈特去寻找小孩,使哈特发现自己“以一个预备拿一切来奉献给她的大男子,结果还比不上她的小孩子万分之一”,因而心灰意冷。小说标题《你夫人是中国人吗?》的逻辑性不知何在?鲁迅在《小杂感》中不是曾说过中国“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吗?淑珍的反应正是典型中国母亲的反应,

而《你夫人是中国人吗?》言下之意,中国女人并不疼爱子女,为了情欲可以抛弃一切,这一认知是表现了小说中的西方男性对中国女性的东方异国情调的想象呢,抑或是说明了刘呐鸥本人对国情的隔膜?

1935年10月5日《晨报·每日电影》的《每电谈座》栏目,有署名“呐鸥”的三小段文字:

电影界此刻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赶快把影业造成为正式企业之一。投下资本非得有保障不可,要不然,信用失去,经济来路断绝,这样,即使你去努力,有什么下场?其实,出品用不着Hit,但当然不能够亏本,只要每一部的成绩都有百分之十的纯益,大业成矣。

要提高国产片的水准,办法有许多,其中:(一)编剧部如能提出正式的摄影剧本;(二)摄影部如能添购背景放映机,开麦拉起重机,Horizont, Astro级F1/2. ∞镜头等;(三)冲片部如能装置自动冲片机;那也很不错啦。人才要,机械更要,电影到底还是机械的产物。

有人叹息着影坛的门户封锁主义,也许是真的。但正在这时候,明星公司居然登广告征求剧本,而且“报酬从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机会。每电读者诸君子,有把握者不妨大着胆子,一试!在这里我做一义务广告。

《每电谈座》篇幅短小,多由《每日电影》的编辑姚苏凤撰写,刘呐鸥所写的这一篇,体现了刘呐鸥对电影的一贯看法,重视电影的商品性和技术性。另外,刘呐鸥还翻译了日本作家伊藤整的《会话与话术》,刊载在1935年10月15日和18日的《晨报·晨曦》上。这篇文章颇有价值,论述了会话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指出了会话与叙述的不同,“无论用多么巧妙的话术,到底还不能够微细地表现精神内的现实”。但译文读起来不是很顺,看来刘呐鸥运用汉语的水平,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精神内的现实”或许就是指心理活动。

二、《晨报》上的穆时英集外文

1935年8月8日的《晨报·每日电影》上,刊有穆时英的《血腥》,这是一篇比较重要的集外文,是软性硬性电影之争中被遗忘的一篇文献。软性硬性电影之争是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一次重要论争,如今看来,软性电影论者所谓“给眼睛吃的冰激凌”“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强调电影的娱乐性,有其合

理之处,而其代表人物刘呐鸥、穆时英等对电影技术与艺术的研究,也颇为内行;部分左翼电影在艺术上的确生硬,很难吸引观众。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况且软性论者以意识形态为借口,贬斥进步的左翼电影,实际上也是有其政治标准的。

剑拔弩张的《血腥》是讨伐鲁思的,文章开头说:“我在《妇人画报·电影专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暴露敌人的阴谋的文章,《当今中国影评检讨》后,鲁思先生(陶丽琳)便像狐狸显出了尾巴似的慌张起来了。他说,我用他们的血写了血腥满纸的文章。”穆时英把自己文章的题目记错了,他发表在《妇人画报》上的文章实际上叫《当今电影批评检讨》,文章发表后,陶丽琳(鲁思笔名)在1935年8月6日《民报·影谭》的《银色茶话集》中说:“穆家时英的《当今电影批评检讨》,血腥气充满了全篇,据说这文他是把凌鹤、尘无、鲁思、唐纳四人的血写成的!”还说:“穆家时英又在大唱‘电影批评必须走向艺术批评的大路’的,不成其为理论的妖调。”于是穆时英就直接以《血腥》为名进行反击,鲁思当年否认“陶丽琳”就是自己,陶丽琳在8月9日《民报·影谭》的《银色茶话集》中说:“若说我陶丽琳就是鲁思先生,准定是你穆家时英嗅错了人。据鲁思先生谈,这一次他是决不挺身而出的,因为他不屑跟一些造谣之徒再争辩一言。”或许这是一种斗争策略,在20世纪5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鲁思终于承认,陶丽玲(当为“琳”)就是自己的笔名。穆时英在《血腥》中预告“等着吧,鲁思先生,在最近,我将在《每日电影》给你们以理论以总清算”,三天后,从8月11日到9月10日,穆时英在《晨报·每日电影》上连载了一篇长文《电影艺术防御战》,对左翼影评人进行“总清算”,但在《穆时英全集》中,这篇文章被排在了《当今电影批评检讨》前面,按时间顺序应排在之后。

1935年9月30日的《晨报·晨曦》上,刊有穆时英的《战斗的英雄主义》,已收入《穆时英全集》,另还有一篇署名“编者”的《我们的一个要求》:

刊物是为了读者而存在的,所以本刊从改为纯文艺日刊后,就无时无刻不竭力求其与读者接近,求其成为读者自己的园地,求其成为新进作家、未来的文坛的支持者的培养室。在编辑方针上,我们也在可能范围内采用接近一般水准的来稿,同时,在退稿时,对于修养和才能上稍嫌不足的作者,总在作品上不嫌唐突地指出了缺陷

所在,而希望作者在下次写作时能更进一步。这几点,凡寄过稿子给我们的,和曾经有作品在我们刊物上面发表过的,读者们都会知道是事实吧。

最近,在改革后的第十八天的最近,我们每天所收到的来稿已经从每天四五封而增加至十余封,增加至二十余封了,而且其中也有着在文坛上已经有一点成绩的作家的稿子。这一方面固然证明着社会对我们的注意,读者和一般文学志愿者对我们的爱护,另一方面也是使我们惭愧并且欣喜的事。但我们不敢以此自满,为了使本刊能更贯彻它的使命,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公开地征求读者的意见和批评。

这里,暂就我们所想得到的几点写在这里,希望读者根据这几点,把对于本刊的批评热烈地寄下,以作我们改进草案的基础。

(一)在本刊内容方面,论文、小说、诗、散文、木刻等中间数量的比例是否适宜?就发表过的作品而言,其中有没有读者所认为没有需要的作品?

(二)本刊目前的编排方式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本刊绝少刊载翻译,这种方针是否有当?

如这几点以外,读者觉得还有要改革的地方,也希望读者指导。批评请寄上海山东路二〇五号晨曦编辑部收。

1935年10月5日的《晨报·晨曦》上,有一则未署名的《社中告白》:

读者是刊物的暖房:它将在读者的爱护下开放得更灿烂,同样,也会在读者的冷漠下而寂寞地死去。所以我们竭力企图使本刊与读者间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而且进一步还要使本刊与读者打成一片。实现这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征求读者对于本刊的意见,作我们改进的基础,以谋使本刊永远成为有朝气的,前进的,泼刺的,但又是读者自己的刊物。这就是发表《我们的要求》的原意。可是自《我们的要求》刊出后到现在四天内,还只收二十七封信。这数目虽然不算少,和来稿的数目比起来,却可以说是太少了。在这里,我们再向读者要求:为了使本刊更合于你们的理想,请踊跃寄

下你们对于本刊的批评。

《穆时英全集》中收入了一篇《关于〈我们的要求〉》，原刊于《晨报》1935年10月26日和27日，署名“本社同人”，《关于〈我们的要求〉》就是上述两篇文章的后续，既然《〈关于我们的要求〉》被收入《穆时英全集》，上述两篇属于“编务”的文章也应收入《全集》，这几篇文章对于研究穆时英的编辑活动乃至上海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1935年10月15日的《晨报·晨曦》上，还有一则《社中告白》，因过于琐碎，就不录了。

1935年11月6日《晨报》《域外文学》副刊上，还刊有穆时英翻译的《吉辛散文二章》，《域外文学》副刊，作为《晨曦》附刊，每星期三出版，11月6日正是第一期。译文后的“译者附志”说：“这里译的两篇是从他晚年写成的代表作《越氏私记》里边选出来的。”《越氏私记》，一译《草堂杂记》，今译作《四季随笔》，是吉辛的散文代表作，郁达夫、叶灵凤都很爱此书，穆时英的散文《下午》里，也提到自己在读这本书，可见穆时英对这本散文集也很推崇。穆时英在“译者附志”里赞叹吉辛的“文笔非常洗练，单纯，而优雅，充满着秋天的黄昏时的天空那样的静谧澄澈的气氛”，他自己的不多的散文，也包括《公墓》等小说，就很接近这一风格，与他的都市新感觉有颇大的距离，或许其中就有吉辛的影响。

三、穆时英的其他集外文

1936年4月1日《时代日报》的《艺坛动态》栏目，有一则消息：

穆时英和黑婴声明：并无所谓“误会”，更无所谓“冰释”；至于“哲人”也用不到声明是他不是他，造谣，离间朋友，这毒辣的战术，据说是尘无所玩的把戏，因为他记得穆时英去年所给他的一个“廖化”的尊号。

虽为共同声明，但穆时英作为《时代日报》副刊的主编，很大可能是由他撰写。这一声明应该是由前一天《社会日报》上的《借用朋友笔名纠葛 骂人自己可不负责》这一文章引起的，穆时英和黑婴认为是左翼影评人在造他们的谣。

当日《艺坛动态》栏目，另外还有一则消息，也提到了上面的“哲人”：“为本报撰《文化战线》之哲人先生，近应《新人周刊》编者周寒梅之约，为《新人》撰《一得集》语颇中肯，精彩无比。”

康裔在回忆穆时英的《邻笛山阳》一文中说：“左翼方面发动的攻击，可以说无中生有……这使

穆时英更加对左翼方面的气愤，因此在《晨曦》副刊上，辟了一块小小的专栏，名曰《文化战线》，针对左翼的弱点，以牙还牙，用的笔名‘周人’，但日子一久，他又无心执笔，把这责任推在我身上，因此，‘周人’这笔名，也成了我们两人共同的笔名。”《晨报》停刊以后，穆时英又担任了《时代日报·二十世纪》副刊的编辑，“这一块副刊，可以说完全是崭新的格调，内容全部是新感觉派作风，《文化战线》也继续移在《二十世纪》发刊，仍由我们二人共同执笔……”^[3]因时隔多年，康裔的回忆并不准确，《晨报》上并没有《文化战线》这个专栏，而《时代日报》上也没有署名“周人”的文章，只有不少署名“哲人”的文章。应该是多年后，康裔将“哲人”误记为“周人”了。

实际上《时代日报》副刊《二十世纪》刚创刊的时候，署名“哲人”的是一些配图短文，计有：1936年2月18日的《窗的幻想》、2月20日的《新的角度》、2月21日的《当你花坛上的花重又开起来的时候》、2月22日的《典型的消费对象》、2月23日的《甜蜜的家》、2月24日的《一百米突：放！》、2月25日的《总退却》（此篇未署名）、2月26日的《〈怒吼吧，中国！〉》、2月27日的《山额夫人和狄翁乃夫人的对话》、2月28日的《贫穷是罪恶吗？》、2月29日的《鸽子·探戈·与卡门》、3月3日的《严肃地注视着人生》、3月4日的《舞在青空》和3月15日的《好莱坞的 Panorama》，有些是相当漂亮的散文，穆时英所写的可能性较大。而撰写专栏《文化战线》的“哲人”则出现的稍晚，分别是1936年3月8日、9日、11日、12日、14日、21日和4月3日这些天。《新人周刊》上的《一得集》，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也可以方便地检索到，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去查阅，当然，如康裔所说，“哲人”很可能是共用的笔名，如“匿名子”“伐扬”“江兼霞”一样。

1936年10月19日《南京日报》《特写》副刊的《文化风景线》栏目上，刊载了记者樱子的一篇文章《〈香港文艺协会宣言〉——穆时英的奇文》：

“（本报文化特写）被称为堂吉河德先生的或者是黄帝的子孙的穆时英，及第三种人的杜衡，去港后，一时里竟成为香港文艺界的红人了。

杜衡因前月妹嫁回沪，彼对友辈云：“我并没有加入什么‘香港文艺协会’。”那么，该会由穆郎策动成立于香岛是无疑的了。

昨天由香港友人刘君处寄来一篇该会洋洋千余言的宣言及简章，并云他已加入该会为会友，叫我亦去加入，我接到这篇宣言后细细地读了一遍，觉得里

面的新名词应有尽有,但回味一下,却是不知所云。现在有此奇文,不该藏之私有,录之如下,以共同赏。”

“香港文艺协会”宣言

近年中国局面开展得非常恶劣,贫穷,灾荒,死亡,这一切可怕的现象接踵着到来,使每一个民族成员觉到万分惶恐,尤其是民族地位的低下,国土的沦亡,更使人觉到极度不安。大家都很明白:这一切的原因所在是由于外来势力的侵入,而更明白地知道这样子发展下去是危险的事,因此都非常踊跃地决定了自己的任务,进行排除一切苦难。这是异常重大的神圣的,我们应该如何慎重地从事这个工作,更如何骄傲地对于这工作的获得!文艺作者因为在社会有了特殊的地位和本身的事业修养,对于这伟大的现实决不能存着熟视无睹的态度有意或无意的规避。他应该马上投进现实的怀抱直接参加保卫民族的各种运动,固不待言;即使消极一点,凭借着文艺的优越条件,对现实的诸般离奇怪诞的事态,加以铁面无私的解剖,加强大众的认识,集中他们的目标,也是起码的本分。

不幸这起码的本分,中国文艺者一向都没有较好的表现,他们不把全力集中这方面,反而自成帮派,各立门户,作无谓的意气之争,这是非常愚蠢而有害的,不独终竟会贻笑于敌人,抑且自身的力量因而分散而单薄,也必然地迟早会给敌人一个良好的机会而遂行各个画□□^①破的策略,其实文艺作者间,由于意趣相同,事业相同,而且在这样的民族境况底下,早就应该化除成见,携起手来,这无论为民族,为社会,为个人的事业都非常有益,过去外来势力的侵入,因对各个阶层的作用不同,使各个阶层的人对于现实的认识步调很不一致,因此,引起了意见的分歧而种下不少纠纷,然而,这只是先后问题,到今天因现实已走到突变关头,大家都或先或后地觉悟起来了,而步调也渐趋一致,目标也大抵相同了,唯其集拢起来,力量才显得雄厚,这一个简浅的道理,也不谋而合地在大家的心中生长起来,都觉得有一个新的广大的组合的必要了。

我们这个组合是这样产生下来的,我们觉得为了自身事业的成就,为了民族的

安全,都必须从联络友谊做起的,明白一点说,彼此友谊有了联络,才可以丰富了自身的事业,确立自己的权益,和保卫民族的安全,而且我们更坚信民族地位不提高,彼此友谊事业,和权益的发展,也有很多的障碍,但是彼此友谊和自身事业权益等不好,对于民族保卫的力量也显得贫弱,这四者是分离的,然而却有绵密的联系,唯其把它统一起来,列为我们最大的目标,才是有效的办法,我们这一次组合就打算从这一方面努力。

末了仅赖文艺同志们都热诚地伸出双手,让我们紧紧地握着,更愿社会各界人士给以无量的指教!

读者读完此奇文,真是“妙哉!妙哉!”

这篇记者所写的文章,以“穆时英的奇文”为副标题,显然是认定文中所录的《香港文艺协会宣言》出于穆时英的手笔,穆时英确实参加过“香港文艺协会”,但目前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宣言确是穆时英所写。《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记载:“1936年,国内文艺界人士到香港去的逐渐增多。香港文艺界鉴于以往联络涣散,而国内上海等地已成立文艺家协会,为求与国内文艺团体互通声气,就在1936年8月,召开第1次筹备会议,决定建立香港文艺协会,选杜格灵、杜衡、穆时英、刘火子、李育中5人为筹备委员,负责起草会章。”^[4]当然这篇宣言,仍有它的价值,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香港的文艺环境,仍有帮助,而“香港文艺协会”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值得学界作进一步的考察。

另外,1936年4月17日的《时代日报》,称《大沪晚报》已于前日开始试版。其副刊为黄敬斋所编。始创号有叶灵凤、穆时英、周寒梅、嵇希宗等之作品,内容丰富异常”。虽然《大沪晚报》是一张很不地道的报纸,该报曾多次盗用“袁牧之”“蓝苹”“胡风”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名字发表文章,更有甚者,该报还曾在1936年9月15日冒名“鲁迅”发表《非常参观》一文,但《大沪晚报》还刊登过黑婴等海派作家的作品,如黑婴的《都会双曲线》等,因此,《大沪晚报》在刊登海派作家作品方面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其试刊号上应该确实刊载过穆时英作品,但岁月变迁,这么一份试刊号恐怕很难存留于世。

余话

赵国忠先生曾发表有《〈每日文艺〉及穆时英的

一篇佚文》一文,发掘过穆时英发表在《华北日报》副刊《每日文艺》上的佚文《下午》,赵国忠进而指出,“《每日文艺》的作者,几乎都是当时居于平津两地的作家,南方作家只见刊登过戴望舒译的阿佐林的小品和穆时英的《下午》”,“穆时英的作品很少在北方的刊物上发表”,“《下午》是初次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北平刊物上出现,由于报纸的受众面大,从这个意义看,这篇作品具有特殊的价值”^[5]。但《下午》很可能是抄袭者所投。

1934年12月11日《华北日报·每日文艺》第11期刊有获囚《五月里的丽娃栗姐邨》,实系穆时英的《丽娃栗姐邨》,《华北日报》上尚有署名“获囚”的其他文章,但12月18日《每日文艺》第18期上,黑丁“来函”揭发获囚抄袭彭雪珍发表在《申报》上的文章《苦孩子》。这个“获囚”颇为无耻,穆时英的《丽娃栗姐邨》与彭雪珍的《苦孩子》,是1933年2月27日同一天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除此之外,《华北日报》上还出现过多起抄袭事件,因此,发表在1935年9月29日《华北日报》上的《下午》,虽署名“穆时英”,但该文首次发表是在1935年9月25日的上海《小晨报》上,也就不能排除是抄袭者直接冒名“穆时英”投寄《华北日报》,以骗取稿费,未必表示穆时英和北方文坛发生了关系。

《穆时英全集》出版后,已有不少集外文被学界发掘出来,以穆时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增订

再版已显得颇为必要,但《全集》中有一篇与陈宗濂合译的剧本《那种人是危险的》却比较特殊。1933年7月4日南京《新民报·最后版面》《文坛消息》栏目称:“文艺月刊因穆时英在沪声明该三卷十二期所载陈宗濂之《那种人是危险的》是盗用其名为合译事,大所不满,且预备向陈严重交涉。”虽没见到后续报道,但既然穆时英有此声明,《穆时英全集》再版时,《那种人是危险的》似应删去。

注释:

①原文缺两字。

参考文献:

- [1] 王贺.“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J].探索与争鸣,2018(3).
- [2] 阎真.现代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59.
- [3] 康喬.邻笛山阳[M]//穆时英.穆时英全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 [4] 范泉.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Z].上海:上海书店,1993:401.
- [5] 赵国忠.《每日文艺》及穆时英的一篇佚文[J].博览群书,2011(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Uncollected Writings of Liu Na'ou and Mu Shiying in *Shanghai Morning News*

YANG Xin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the *Dawn* and *Daily Film* supplements of the *Shanghai Morning News* were literary and film supplements that had generated certain impact, but hadn't been systematically collated and studi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y have published many valuable articles, which are quite important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writings that were uncollected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u Na'ou*,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u Na'ou · Supplement*, and *The Complete Works of Mu Shiying*. Those writings include Liu Na'ou's novel *Is Your Lady a Chinese*, Mu Shiying's *Bloody* which is a debate on the soft and hard films.

Key words: *Shanghai Morning News*;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u Na'ou*; *The Complete Works of Mu Shiying*; the uncollected writings; the soft film

《光荣院》的文本、版本与文学传播

李勇军

(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以作家墨白的代表性中篇小说《光荣院》为例,可以看出: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同一文本往往是通过数种甚至数十种不同的载体抵达不同的读者。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经由不同的读者进行不同的解读,将能够“常读常新”。循着版本形态的变迁,对作品文本进行解析或深读,将是一个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文学研究路径。

关键词:墨白;《光荣院》;文本;版本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07-04

对于作家墨白而言,世纪之交的1999—2000年是其中篇小说创作的“收获期”,其标志有两个:一是后来给他带来“荣光”和盛誉的中篇小说《光荣院》的发表,二是中篇小说集《重访锦城》出版一个月后很快得以重印(“橄榄树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同年11月第2次印刷)。本文循着《光荣院》的版本轨迹,重新梳理其传播路径和文学价值的不断被发掘,还有它被反复传播后所产生的多层次的影响力。

一、《光荣院》初刊本

中篇小说《光荣院》首发在《花城》1999年第2期。作为文学期刊“四大名旦”的《花城》杂志,虽然不具备《当代》《十月》《收获》三家刊物立足京沪的先天优势,但它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其开放包容的办刊思想、毫不逊色的“经济基础”,使得该刊无论在广大读者中还是在当代作家的心目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作为大型刊物,《花城》一直对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予以高度关注,1986年第6期该刊独具慧眼首发路遥《平凡的世界》(后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更是传为文坛佳话。

如果从中篇小说《黑房间》(《收获》1989年第5期)算起,作家墨白历时十年后其中篇创作已日臻成熟。这期间,他仅在《花城》杂志上就已发表《红房间》(1991年第2期)、《白色病室》(1993年第2期)、《俄式

别墅》(1994年第5期)、《讨债者》(1997年第3期)、《局部麻醉》(1998年第1期)等多部有影响的中篇小说。

刊有《光荣院》的该期《花城》有一条题为《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震动文坛》的消息颇引人注目。该消息称,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的这部长篇新作在该刊1998年第6期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获得了广泛好评;该刊随后专门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作家王蒙说,这不仅是一部好小说,而且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小说”^{[1]105},作家李国文认为,“这部小说是本世纪中国文学能留给下个世纪的为数不多的小说之一”^{[1]105}。不仅刊登出来,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就是经济改革前沿城市的文学刊物办刊理念明显优于内陆省份之处。当年《平凡的世界》刊出后,该刊也是专门在北京组织了作品研讨会。事实上,文学作品的传播或者说“被接受”的过程,是由作家、评论家、责编及出版机构共同来完成的。

该期《花城》头题也是一部长篇小说:陈家桥的《别动》;中篇小说则有三部,《光荣院》之外,另有作家行者(也是河南籍作家)的《大化之书》、残雪的《变通》。该期设有“编辑立场”之类的点评文字,我所看到的相关评论文章均在作品发表数年之后,但它们却也道出了初次阅读的第一印象和对作品价值的直观评判。评论家夏敏称:“初读墨白的中篇《光荣院》,感到在他那看似直白的叙事背后隐含着对

收稿日期:2022-10-25

作者简介:李勇军(1970—),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及编辑学。

生命意义的相当严峻而深刻的思索……我们并不难看出，小说推出的人物群像面对生死的各种反应，的确隐含有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的反讽，叙述沿着并不张扬的冷幽默路子，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文义指向每一个自我。这样的小说必然给蒙昧的心灵带来震荡。”^[2]²⁹评论家张延文认为：“《光荣院》里的权力体系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普遍存在，这是一部具备了广泛象征性的经典文本，就其形而上的艺术特质和后现代的思想元素来说，《光荣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3]³⁵

二、《光荣院》连载本与选刊本

1999年5月3日至6月9日，《光荣院》由《世界日报》《小说世界》版连载。此次连载保持了作品的完整性，包括原来的小标题也均予以保留。这一点，不像我们内地报纸的习惯做法：要么大幅删减（尤其是长篇连载）；要么根据报纸风格、版面大小等进行大幅修改，包括给每天的连载重新加小标题、删去“闲笔”、把对话改成叙述性语言等。作为一份有着悠久历史、在海外华人世界广有影响的中文报纸，因其读者分布、使用繁体字出版等因素，它正可以与内地报纸或期刊形成“互补”关系。

十五年后，《光荣院》又被《长江文艺·好小说》2014年第1期转载。

《长江文艺·好小说》是《长江文艺》杂志自2013年起正式创办的“选刊”版（也是该杂志的“下半月刊”），它不仅每期同步选载小说新作，而且还总是“回头看”、选登些“旧作”，比如这一时期选载的蒋韵《鲜艳的季节》（原载《中国作家》2000年第10期）、吕新的《石灰窑》（原载《作家》2000年第3期），其主打栏目《再发现》本身就有类似于“经典回放”的性质。基于读者的代际更替，这样的选载，对于新读者是第一次阅读；对年“老”读者（不是年龄意义上的“老”），则是“重读”或“重新解读”。

该刊有一个栏目叫《翠柳街》，每期由责任编辑就当期某一篇作品予以点评。同期刊发的是小说责编曹军庆的评论《进入〈光荣院〉的三条路径》，这无疑也是引领读者进入阅读的路径。作者写道：《光荣院》最初刊于1999年《花城》杂志，距今已有些年头了，“可是读来仍觉新鲜”，它“故事繁复”，“阅读效果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该文进一步指出，进入文本有“三条明显的路径”：其一是人物关系。小说一开始就推出了虾米和老金的矛盾，老金是负过伤的老军人，在他看来，虾米没有资格住在光荣院；老钱牙疼，请光荣院的医生治疗，医生却故意将他的好牙拔掉，老钱于是终日敲打白铁皮以发泄愤怒和仇

恨；厨师月红屡屡辱骂欺负虾米，但她刀子嘴豆腐心，又屡屡在暗处塞些牛肉给他吃，来福对此嫉恨在心……作者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相互折磨，相互摧残。“细节的精雕细琢，使得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愤恨几乎到了变态的程度。”^[4]¹⁵⁹其二是符号意义。在叙事过程中，作者精心挑选穿插了棺材、勋章和大瓷缸等物品，其用意意味深长。其三是环形叙事。《光荣院》的叙事结构是一个回环的圆形。作品从声音进入，然后依次进入棺材、库房、瓷缸和院长等章节，讲述到了哪个人物，或讲述到了哪个物件，便会停下来叙述新的章节，在新的叙事中依然会重新叙述之前没有叙述过的内容。重述，补充，让故事和人物逐步丰满。

三、《光荣院》初版本

2004年7月，墨白中篇小说集《霍乱》被列入“独行客丛书”（野莽主编），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入《霍乱》《雨中的墓园》《光荣院》《告密者》《母亲的信仰》《同胞》《父亲的黄昏》《黑房间》八部中篇。这也是《光荣院》发表后第一次结集出版，即从“初刊本”进入“初版本”。作为一部小说集，它首先被关注的是其中的同名中篇，这从封面文字就可看出：“加缪笔下的鼠疫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霍乱，为世界文坛留下了不朽的经典。本书作者却另辟蹊径，将传播于淮河流域的灾星进行历史与文化的拷问，让美与丑的东方人性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中对比昭彰。”^[5]关于该小说集，还有一条重要的信息是：“本书荟萃了作者近年来最有影响的中篇精品。”

笔者同时注意到了该集另一个醒目的“标签”——“淮河流韵系列”。当然，该“丛书”其他几种也各有其“标签”：贾平凹《梅花》“秦地风情系列”、孙友友《贪兽》“陈州笔记系列”、野莽《独乳》“乌山传奇系列”、林希《家贼》“津门绝活系列”、聂鑫森《情局》“古城旧事系列”等。

作为全书的“副文本”，在题为《一个人，一座小镇和一条河流》的“后记”中，作者说“在这本小说集里出现的人物，大多生活在颍河岸边的小镇里”，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或者从镇里出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或者再从外地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与内部或外部的世界沟通着。在颍河镇人的头脑里，世界的存在，是以他们为中心的”^[5]³¹⁴。颍河镇是一只“麻雀”，但同样五脏俱全。

在这部集子里，《光荣院》的人物，虾米、老钱、老金们，也都是颍河镇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或几个，但他们同样有别人无可替代的人生——

一个生活在颍河镇上的人，他的一生

可能只到过远在四十里开外的县城,但那个巴黎人同样不能代替他去感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代替另外一个人去感受世界的存在。^{[5]313}

四、《光荣院》选集本

2007年10月,中短篇小说集《墨白作品精选》作为“跨世纪文丛精华本”之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它收录了包括中篇小说《光荣院》在内的14篇作品。另外,还作为附录收入了张晓雪的访谈文章《我们应该怎样叙事——和墨白对话》以及《墨白出版著作目录》《墨白简介》。

对于“跨世纪文丛”,想必读者大多不陌生。1992年8月,由王蒙、洁泯、谢冕等名家担任顾问,评论家陈骏涛担任主编的该“文丛”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开始推出。“‘跨世纪文丛’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6]2}作品体裁方面:以小说为主,兼及其他——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通俗地讲,“不分作家的名字,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6]2}。

“跨世纪文丛”第一辑(当时叫“首期”)推出当时活跃在文坛的12位作家的12部作品(集):《红粉》(苏童)、《唢呐》(格非)、《去影》(叶兆言)、《坚硬的稀粥》(王蒙)、《行云流水》(方方)、《嘴唇里的阳光》(陈染)、《屋顶上的脚步》(陈村)、《官人》(刘震云)、《河边的错误》(余华)、《人极》(贾平凹)、《太阳出世》(池莉)、《白涡》(刘恒)。到2001年9月刘庆邦《梅妞放羊》出版发行为止,“跨世纪文丛”共推出7辑67种;其中,有的作品还反复重印,像孙甘露的《访问梦境》1993年9月出版后,至1996年2月已印刷3次,该作品集又于2001年5月再版,也就是说至少累计印了4次。品种多,历时长,加之不少入选作品反复重印,可以想见这套“文丛”在当代文坛和广大读者中产生的巨大影响。该社也认为,入选这套丛书的“66位作家堪称当今文坛最具实力的创作者”。(备注:苏童有两部作品即第一辑的《红粉》和第二辑的《刺青时代》入选,其余作家均为每人一部,这样67部作品共有66位作者。)

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拟从上述作家中选出10位(通过发动读者投票的形式确定人选),编辑出版其“作品精选”,并最终汇成“跨世纪文丛精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5年4月该社才推出《周国平作品精选》,是为“跨世纪文丛精华本”之第一种。从以后陆续推出的十几种“精选”来看,体裁仍以“小说为主”,如《莫言作品精选》《毕淑敏作品精选》《方方作品精选》等;《林白作品精选》《张承志作品精选》则是兼收小说、散文;《海子作品精选》收录诗歌和散文;《王小波作品精选》收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杂文……

《墨白作品精选》所收的14篇作品,既有中篇小说,又有短篇小说。从发表在《钟山》1989年第4期的《寒秋》起,到发表于《花城》1999年第2期的《光荣院》为止,时间跨度逾十年。对于作者而言,它是“精选”,也是“自选集”,入选篇目既代表作家对本人作品的认可度,同时也有“个人创作史”的意义,即尽可能收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仅限中篇、短篇两种题材,长篇小说、散文随笔等除外);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则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全书容量)内“窥一斑而知全豹”,同时对入选的单篇作品放在所有“代表性作品”的背景下予以阅读、理解。

在“附录”《我们应该怎样叙事——和墨白对话》中,作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小说本质上不是写什么,而且如何写的问题。即强调小说写什么,是把小说放在社会学的范畴里;而怎样叙事,则是把小说放在文学的范畴里进行关照。小说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社会学——小说的重要特征是虚构,是艺术真实,是用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来反映社会,“是文学意义上的社会学”。

我们如果把上述《墨白作品精选》视为《光荣院》的第一个“选集本”的话,那么,2013年12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梦境、幻想与记忆》,则是它的第二个“选集本”。

事实上,《梦境、幻想与记忆》与前述《墨白作品精选》可以看作两个“互补”的版本:前者只收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后者除收录《光荣院》等7部中篇小说之外,还收录了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和《洛丽塔》的灵与肉》等14篇随笔类作品(全书分为“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序言、后记与随笔”三辑);前者是相对单纯的作家“精选”集,后者以“新人文”为丛书名,更强调这套“自选集”入选作家的“学人”身份,如小说家、文学理论家刘恪(《耳镜》),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批评家程巍(《隐匿的整体》),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翻译家陈众议(《游心集》)等。

五、《光荣院》单行本

2016年8月,小说集《光荣院》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严格意义的单行本,应该像“百花中篇小说丛书”那样,一本书就是一部中篇。但我仍愿意将这部合集视为《光荣院》的“单行本”——四部中篇,以《光荣院》为旗帜和“号召”,这就截然不同于此前的“初版本”和“选集本”。也许是巧合,四部中有三部(《光荣院》《局部麻醉》《讨债者》)是在《花城》杂志上刊发的;另外一篇《雨中的墓园》原载《小说林》1993年第5期(原题:《青台》),后经作者重写,再发表于《山花》2001年第11期,由此也可以看出该作品在作者心目中的分量。

这部小说集以《光荣院》用作书名并排在第一篇,体现了丛书主编和作家本人对该作品的认可和自我评判。作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之一,我们有必要了解该文库的编选初衷: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7]2}该文库阵容强大,前两辑共收入阿成、鲍十、陈应松、贾平凹、刘醒龙、刘庆邦、刘益善、林希、梁晓声、聂鑫森、邱华栋、石钟山、孙方友、汪曾祺、王祥夫、野莽、林斤澜、谈歌、陈世旭、墨白二十位作家的文集。

2016年9月,《光荣院》(精装本)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出版专业的眼光来看,它与前述平装本是不同书号、不同装帧设计、不同定价的两个版本。其中,还特别定制了编号的毛边本,虽然仅有三百册,但这个小众化的版本,读者指向非常明确。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光荣院》最后一个版本,也是给人印象最深、也最能彰显其自身文学价值的版本。

结语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同一文本通过不同的载体被接受是“无差别”的——当然,前言、后记、评论、

编者按等“副文本”或曰“辅文”将会对阅读本身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循着版本形态的变迁,对文本进行解析或深读,将是一个新颖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学者止庵有一个观点:如果研读一位作家,就要尽量回到历史的现场去认识,比如周作人,他的某篇文章发表在哪份报纸的副刊或哪家刊物,都要尽可能亲自找来看看,其刊于同一版的作家有何人,文章刊发在什么位置,也都是大有意味的。^{[8]230}正如我们通过《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中篇小说卷》(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来阅读《光荣院》,便是将它放在“周口作家群”、周口60年来中篇小说创作成果的背景下,予以解读与审视。

在当代文学史上,同一文本往往是通过数种甚至数十种不同的载体抵达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空间的传播中,经过时间的无情淘洗,有的作品将被湮没或者消失,有的作品则愈益显示出自身的属于文学意义的价值。“文章合为时而著”,但真正优秀的作品是能够超越时空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经由不同的受众进行不同的解读,仍能够“常读常新”。

参考文献:

- [1] 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震动文坛[J]. 花城,1999(2):105.
- [2] 夏敏. 光荣的隐退与生命的责任:墨白小说的个案分析[J]. 山花,2005(5):29-33.
- [3] 张延文. 墨白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国家声音”(评论)[J]. 山花,2010(9):30-36.
- [4] 曹军庆. 进入《光荣院》的三条路径[J].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4(1):159-160.
- [5] 墨白. 霍乱[M].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
- [6] 陈骏涛. “跨世纪文丛”缘起[M]//孙甘露. 访问梦境.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1-2.
- [7] 野莽. 不仅是为了纪念:“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M]//墨白. 光荣院.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
- [8] 朱航满. 关于止庵[M]//朱航满. 木桃集.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8:229-23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Text, Version and Literary Communication of the *Glory House*

LI Yongjun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Zhengzhou, Henan 450052,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 *Glory House* by writer Mobai as an example, 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same text often reaches different readers through several or even dozens of different carriers. In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they are interpreted by different readers, so that they can be read often and renewed often. It will be a very important literary research path to analyze the text deeply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version form.

Key words: Mobai; *Glory House*; text; version

陌生化认知·乡愁乌托邦·审美现代性

——论科幻小说的美学意蕴

吴亮银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我国科幻小说面临的困境,在于其价值未能被全面发掘。就审美向度而言,科幻小说依托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折射想象,以其陌生化认知结构的特点来暴露异化关系。它的结构以“零度世界”为认知基础,其精神最终指向“乡愁乌托邦”。而科幻小说的审美现代性表征,其反思精神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其美学意蕴的现实意义所在。

关键词:科幻小说;陌生化认知;零度世界;乡愁乌托邦;审美现代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03

中图分类号:I01;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11-06

从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系列荣获“科幻诺奖”的雨果奖开始,科幻似乎在中国迎来了一股热潮。然而,刘慈欣却认为,“中国科幻目前的繁荣,是一种缺乏基础的繁荣”^[1]。他认为当下叙述文本都处于衰落状态,科幻小说面临着受众庞大而作者群体式微、经典作品匮乏的局面。

本文从审美向度出发,重新发掘科幻小说的美学意蕴。科幻小说从陌生化认知的结构框架出发,暴露隐秘的异化关系,利用“零度世界”开展故事想象,“乡愁乌托邦”是其精神归属。作为审美现代性表征的科幻小说,在对于矛盾的反思中实现了文本同社会的联结,对于构建美好生活具有召唤性意义。

一、科幻小说:一种陌生化认知结构

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英文直译应为科学虚构小说,而“幻”字译得尤为精绝,点明其虚构性质的同时,包孕着对梦想的渴望。从词语结构可看出,其涵括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而这既是其文类潜力的生长点,也是对其进行界定的矛盾之处。

亚当·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中罗列出科幻小说的诸多定义,但他自己只“希望对这一文类的

演化进行历史性的叙述,而不是提供‘科幻小说是如何如何’判定的另外版本”^[2]。而在布赖恩·奥尔迪斯的《亿万人大狂欢》中,虽然他给科幻小说下了定义,但也欢迎提出相关质疑。不同定义反映的是定义者对其寄予的态度,而我们又可以从中找到如何解读科幻小说的模式。

在罗伯茨看来,科幻小说最早应当起源于古希腊小说中的幻想旅行作品。奥尔迪斯则认为,科幻小说沿袭自哥特式小说,其开山之作为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种看法已成为现在的主流观点。无论哪种起源,都显示出科幻小说与认知的紧密结合。古希腊人对于自然科学的天界,而非奥林匹斯神界的想象性认知,构成了文学文本中的科幻元素。而在工业革命中,机械技术的发明与更新刺激着人们征服自然的欲望,诞生于其中的科幻小说宛如现实之梦,反映出流动的社会认知与意识形态。因此,达科·苏恩文认为,科幻小说的构成是这样的,“它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就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出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一种拟换作者的经验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结构”^[3]。这也就是说,互为条件的陌生化与认

收稿日期:2022-10-26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2021年度推免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21T118);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晚清科幻小说与审美治理研究”(KC-22221069)

作者简介:吴亮银(1998—),男,江苏南京人,云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人类学。

知形成了科幻小说的文本动因,同时也指向了文本的目的,贯穿其中的行之有效的文本策略则是形式上的想象框架。

“陌生化”最早由苏联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其意在通过形式的艰深化来延长文艺感受,从而恢复读者对于生活的认知体验。有别于什克洛夫斯基达到纯粹文学本体的愿望,苏恩文期望与此同时也关注孕育文本的社会土壤,基于这种理念,苏恩文将布莱恩特的“间离效果”引入陌生化的纯文学批评,旨在强调扩大文本叙述与读者感知经验的差异性,从而达到一种真实。

当然,詹姆逊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幻小说的最本质特点是“认识论”功能。从认知论出发,可以管窥科幻小说的经纬。“陌生化使科幻小说有别于从18世纪至20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流,而认知又使科幻小说不仅有别于神话,而且有别于民间(童话)故事和奇幻故事。”^{[3]8}在这种意义下,科幻小说不再以形式/内容的二分法被强制限定,而是作为一种“陌生化的认知结构”出现:“陌生化”由文字描写与叙述心理的间离所展现出来,作为构成条件的同时,也规定了文学形态的参与手法;而“认知”既是形成科幻世界的条件与互动因子,又是文本希望到达的意义价值的旨归。两者由表及里、自上而下地规范出了科幻小说的界限,从而宣告了该文类的独立地位。

科幻小说的间离性旨在创造出这样的世界:它无关日常经验世界,而是以可认识的世界为原型,创造出来的想象场域。这也就是“零度世界”的概念,“要考虑每一种类型所表现的世界的关系,以及作者周围可用经验证实其特性的‘零度世界’——这里“零度”的意思是指在一个并列系统中的中心参照点,或者在一个试验中的对照组”^{[3]12}。“零度世界”是科幻小说展开的认知基础,由于它并非由完全真实的世界属性决定,其在伦理学与物理学之间不存在必然牵涉。作为人类模拟的意识生存场域,这个世界既反映出了作者个人认知的加工成果,又渗入了社会历史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科幻小说要营造出这样的“零度世界”呢?换言之,它的出现有助于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奥尔迪斯敏锐地给予我们提示:“在这个遥远的距离之中,出现了科幻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异化。”^{[4]8}异化理论来源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经过了马克思的发展与阐释,其理论视野被精准导向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关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指出,私有制背景下现实的劳动总表现

为异化劳动,“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5]56}。由于科幻小说中“零度世界”作为陌生化认知结构的存在,这种框架可以将关系运行的法则,抛进一个虚构却科学的意识逻辑世界去演绎,从而使得我们得以窥视“生产出的关系”。2008年经典科幻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的所有人物的关系,全部由那一小株绿色植物生产出来:它是证明地球垃圾场环境转好的例证,是机器人瓦力与伊娃相遇相知的契机,是执行命令远离地球的飞船程序与决心返程承担责任的人类船长的冲突。全部人物的命运都关系于渴望拥有人类情感的瓦力照料(异化劳动)的一株绿植,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种异化的表征又符合认知逻辑,自然而然地启发我们思考——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因此,苏恩文对于科幻小说寄予揭示异化关系甚至扬弃的希望,“科幻小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使得‘人生产人’成为可能,并且是以一种强有力的、不可仿效的方式”^{[6]32}。他认为,科幻小说可以提供这样的虚构意识场域:在那里,人有可能通过劳动,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这种场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现实中的异化。这应当是我们解读科幻小说的模式与态度。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科幻小说是西方‘舶来品’。作为一种引进的艺术,它的出现是中国人谋求改变社会现实在文学上的表现。”^[7]科幻小说引入中国的功利性与目的性限制了它可能的效用。在鲁迅的影响下,中国科幻小说采取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纲本的创作理念,科幻小说被生硬地割裂为“科学/幻想”或者“科学/文学”。科幻小说与科普文学被混为一谈,它的独立文类价值被“工具化”特征所消解了。到了当代,科幻小说应拥有它本该有的审美属性。

二、乡愁乌托邦:科幻小说的精神指向

科幻小说将背景及故事设定在遥远的想象场域当中,按照陌生化的认知逻辑进行演绎,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会把他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考融入其中。对于这种想象世界的建构热情,詹姆逊称之为“充溢于日常生活及其文本的乌托邦冲动”。

“乌托邦”(utopia)这个由古希腊语词根创造的名词作为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中,其精神呈现为对理想

社会的渴求与建构的热情。在科幻小说中,“零度世界”正是作为乌托邦精神的最佳载体。在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中,瑰丽奇险的海底自然界与“复仇天使”尼莫船长建立作为反殖民者基地的鹦鹉螺号,形成了双螺旋式的“人与自然”世界架构。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中,旨在保留人类希望灯塔而修建在银河系边缘荒星的“基地”;在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中,与跨国公司掌控下的高度集约化、全球化的世界不同,可以接入神经系统从而漫游冒险的网络数据赛博空间,无不以“零度世界”的姿态展现出乌托邦冲动的建构蓝图。然而,这种建构热情最终还是要指向对认知乃至意识形态的批判。“乌托邦”作为社会规划已经在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那里以“空想社会主义”的面孔宣告了失败。基于此,科幻小说的乌托邦热情应在乌托邦形式层面,也就是基于“零度世界”的文学演绎。詹姆逊认为,“乌托邦最多达到了一个消极的目的,即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禁锢”^[8]。科幻小说所能做到的,不是去揭露意识形态如何支配文本,而是去证明意识形态能指的无处不在。

在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中,“零度世界”体现在其创造的一颗围绕着一蓝一红两颗恒星运动的行星“索拉里斯星”,上面存在着对于人类而言不可理解的海洋:对它的界定从“前生物形态”“原生质机器”“地质结构体”一直到“17 万吨重的原生质海洋大脑”,都无法确证其形态。而人类对于索拉里斯星的探索恰恰是其无能的表现:面对不可认知的事物,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关系,人类试图对抗他者“海洋”,完全是可笑的徒劳。索拉里斯星的“海洋”,作为不可认知却具备熟悉形态(海洋)的表征,显而易见地暴露出在日常经验中被遮蔽的“我们必将征服什么”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随着认知的不断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自身的极限,从而引发对于困境的思考,而这最终指向的正是人的异化。

“如果说,乌托邦的尴尬性在于它对于现实的间离和远出,那么,如何将乌托邦的想象性与现实重新连接,则是寻找乌托邦‘物质基础’的首要前提。”^[9]这种连接的困难在于,如何使得虚构世界同现实世界发生联系。如果联系,那连接处又在何处。在“敌托邦”“异托邦”“逆托邦”“女托邦”“后乌托邦”之后,王杰提出的“乡愁乌托邦”,从情感结构上为科幻小说营造的“零度世界”提供了同现实社会的情感联结,这也是科幻小说的美学意蕴的生命源

泉: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乡愁”(Nostalgia)最初作为疾病被创造出来,采取了希腊文词根“家乡”(nostos)和“痛苦”(algos),其临床表现有胸闷、喉痛、绝望。随着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以“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来描述哲学欲求,“乡愁”中的“乡”便由地理上的空间概念,引申为精神层面的生命终极存在之所了。可以肯定的是,“乡愁”作为情感表达,引发内心的一系列情绪。虽然王杰提出的“乡愁乌托邦”概念,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乡愁”的形式出现的乌托邦冲动,但其却凭借“身土不二”的文化理念,用以探讨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向丽更加明晰地讲出,“乡愁乌托邦”所蕴含的巨大情感张力:“一方面,怀旧指向过去,是对于不再存在甚至不曾存在的家园的向往,乡愁是对于这种诗意存在的酝酿与重构;另一方面,乌托邦是对于尚未存在而即将存在的构想,乡愁则是对于这种即将存在的在场性实验。”^[10]科幻小说中“零度世界”的建构,恰恰是承载“乡愁乌托邦”这种情感表征的最佳载体。

“零度世界”何以成为承载“乡愁乌托邦”的最佳载体?这是由于它提供给参与者(作者与读者)以主体情感介入的特点决定的。“零度世界”是一种存在世界而非实在世界,其旨在提供一种模拟场域。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提出了“零度写作”的概念,他强调一种中性的陈述式写作,不带有任何价值抑或道德判断,要求作者的不在场。实际上,任何写作都难以完全避免作者的主观介入,这是巴特的悖论。但他的出发点在于,希望文学写作回归语言本质,而不成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点同“零度世界”的出发点不谋而合。科幻小说仍要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也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想象的局限性”。然而“零度世界”作为参照点,连接着文本与现实社会,它经由作者加工后,在叙事过程中成功掩饰了其意识形态本质,从而表达其乌托邦冲动。而“乡愁”作为一种情感结构,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对对这样的“零度世界”的建构中获得一种“此在”的情感体验。它既是“零度世界”映射现实世界的镜子,也是科幻小说的精神指向。

在科幻小说中,“乡愁”借“零度世界”的桥梁通向未来,同日常经验中的现代性带来的痛苦与焦虑分开。“概言之,乡愁是对于怀旧焦灼的抚慰以及乌托邦狂想的冷却,它将使怀旧变得有未来,同时赋予乌托邦以当代承载”^[10]。在《索拉里斯星》中,“乡愁”是心理学家凯尔文对在地球上已经逝去的

爱人哈丽的强烈怀念。而在作为“零度世界”的索拉里斯海洋上,面对“海洋”创造出的高级复制体哈丽,凯尔文的“乡愁”始终处于“流动”的状态。从凯尔文开始对于自我认知世界崩塌的恐惧,慢慢发展到接受复制体哈丽时的疑虑与欢喜交加,再发展到爱上复制体哈丽时的深情眷恋,直到复制体瞒着他,自愿毁灭后的愤怒痛苦,凯尔文的“乡愁”呈现出其作为情感内核的“流动性”特征:对于逝去之物的感怀,与在伤逝中被动走向未来。

在中国科幻小说中,这种乡愁则更加贴近其原本的含义,即“对家园的怀念与拯救”。在刘慈欣的《三体》中,“零度世界”体现为奉行“黑暗森林法则”的宇宙,而地球则由于人类的天真,面临灭顶之灾。女主角程心因同情心泛滥而遭诟病,进而导致人类文明毁灭,其游移不定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乡愁”所致。面对是否要向宇宙“广播”地球和三体这两个文明的坐标,以抵御三体文明的进攻时,她选择放弃;面对维德建造曲率飞船逃离银河系的计划遭到联邦政府的抵制时,她又选择了终止计划。这正是由于以农耕文化为基底的“乡愁”所具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方面不忍旧有的世界如此毁灭,另一方面又想拯救家园于水火之中。只是当“乡愁”被刘慈欣无情抛入黑暗森林法则当中,“零度世界”的认知逻辑势必导致其毁灭。这种冲突映射在现实中,反映出某些认知问题:在现代社会,人类的情感到底是追求工作效率的累赘还是安抚焦虑的良方?在虚拟世界中呈现出的不利于文明进步的乡愁羁绊,在现实社会中将以何种形式运行?庆幸的是,面对“零度世界”,我们既可以书写想象中的“乡愁乌托邦”,又无需担心其必然的真实命运拷问。科幻小说处于“被”凝视的状态,这唤醒了参与者的反省意识,激发我们思考如何才能让现实社会变得更好。实际上,与其认为科幻小说回答了我们“何为美好生活”的疑问,不如认为科幻小说在试图回答“美好生活如何得以呈现”的愿景。这正是科幻小说作为文本,与社会的联结处所爆发出的力量所在。

三、审美现代性表征:关于科幻小说的矛盾与反思

科幻小说的生命形态是流动的,它不是一个被悬置的静止空间,而是叠合流动的意识形态想象场域,作者和读者共同塑造的“审美乌托邦”,作为情感结构的“乡愁”在这里也是流动的。

社会学家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认为,现代性的最重要表征就在于它的流动性,在通往现代性的过程中要永远保持变化,避免完成,这是“对变化

就是恒久、不确定性就是确定性的更大确信”^{[11]5}。随着科技与理性的发展,现代性常常被划分成相对立的两种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12]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将前者称之为“启蒙的现代性”,后者则称之为“浪漫的现代性”。从对立的意义上说,浪漫的现代性,即当下的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之为对前者的文化批判与祛魅。

如果我们认同奥尔迪斯的说法,将哥特式小说《弗兰肯斯坦》看作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也承认作为浪漫主义先驱的卢梭以及后来的审美现代性的倡导者,那么势必面临这样的现实,“哥特式小说只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4]21},也不得不承认科幻小说应当被视作审美现代性的表征。面对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的启蒙理性的洪流,科幻小说给予了我们一个虚拟的“零度”空间,以乌托邦冲动去想象被理性支配的社会,“乡愁”则为乌托邦中的情感结构。在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生物学家弗兰肯斯坦利用科学的力量(电化学),赋予无生命的拼凑尸体以生命,成为窃取上帝神力的现代普罗米修斯。然而他创造的却是人人害怕的丑陋怪物,不为社会所容;这也逐渐扭曲了怪物心理,开始报复人类。面对怪物的和解,他因担忧而毁掉了即将复活的怪物伴侣,这时的科学家也就变成了旧“上帝”,怪物的悲剧则是注定无法成为新的“普罗米修斯”。诞生于科学家之手的怪物遭到科学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抛弃后开始反抗,这可以看作是审美现代性对于启蒙现代性发出的挑衅与叛逆。不同于科幻小说的是,现实中的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应对启蒙现代性带来的困扰,又将如何解决它。

更为复杂的是,科幻小说本身也具有矛盾冲突,而这来自审美现代性的内部张力。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以降,后来的科幻小说家大概可以分为:以儒勒·凡尔纳为代表的技术发展派和以乔治·威尔斯为代表的社会影响派。两派在关注问题上的差异也就决定了所谓“硬科幻”与“软科幻”之间的不同。儒勒·凡尔纳在他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中,为我们展现出了颇不寻常的世界景观,而其故事的推动力量大多取决于科技进步,如能够深入大洋深处的潜艇“鹦鹉螺号”和全球通航的铁路轮渡。威尔斯则不关心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他把目光放在了“理性”发展对于人类社

会的影响,这在他的《时间机器》中主人公与两个派系(爱好和平的和好战的)的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类科幻小说对待“科技发展”的迥异态度,无疑显露出科幻小说内部存在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如果从社会文化角度解释这种审美现代性表征出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意识形态不同话语实践相互冲突的结果”^[12]。

表征审美现代性的科幻小说本身还面临着一种矛盾,那就是其商业化发展与作为批判性文本自身的矛盾。奥尔迪斯对于科幻小说的商业化发展十分鄙夷,他在《亿万年大狂欢》中使用“科幻小说的缩写形式……都像过去一样只用‘SF’,特意回避了那种迎合低俗市场的叫法——‘sci-fi’。后者有时出现在媒体或其他自嘲时尚的人士口中”^{[4]13}。而据他考察,“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这个术语才成为一种通用的标志。这被看作是那个更可笑的术语‘科学性小说’(scientific fiction)的改进……首先用于称呼那些登载在美国各种各样通俗杂志上的比较粗糙的故事”^{[4]7}。他认为那种被市场赋予的称谓,拉低了作为文学作品的科幻小说的品格。这种对于商业运作的不屑,也是科幻小说试图获得独立文学地位的艺术自律的体现。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商业传播在科幻小说的发展当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苏恩文所感慨的那样,科幻小说“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它的一边是社会学上占主流地位的读者趣味,而另一边则是其自身追求真正和根本的新的强烈倾向”^{[6]30}。如何在迎合大众和保持品性间抉择,也是科幻小说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根源最终还是指向了社会认知与意识形态。“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的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3]鲍德里亚认为,西方社会形态以消费社会的面貌出现,随着物质生产的过剩,人们已经不再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消费,取而代之的是符号消费。^[14]

科幻小说作为商品被大众消费时,人们消费的是它的什么呢?鲍曼为我们指出了科幻小说拥有的这种审美现代性需求,“‘现在’是现代性历史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领会和把握它在许多方面体现出的‘新奇’特征”^{[11]25}。“新奇”是人们试图通过科幻小说获得的消费。从经济社会的角度看,科幻小说的特征与商品生产同属于社会关系的形式,但又

存在着悖论式的差异。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其使用价值由内在功能所决定,而价值则要通过数量上的交换得以实现。本雅明认为,新奇性并不依赖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通过永无休止的交换过程,塑造着人们的体验,“因此,在一种与交换价值和市场相适应的文学中,新奇性就其本身的两层词义而言,都是反复发生的:它必然是频繁性的,这是文学生产的一个有意识的目标,并且,必然是与一种根本性的——即始终如一的——新(novum)相分离的”^{[6]9-10}。这也说明科幻小说中消费的新奇性,是一种审美幻象,即一种无限反复的掩盖在陌生化叙述之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控制。因此,我们需要对现代社会生活进行反思。

尽管科幻小说的背景疏离于我们日常经验生活的场景,然而在其中运行的社会意识形态却一定是当下存在的。通过将其放置在陌生化认知结构中进行观察,读者观察到隐藏在乌托邦潜流下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社会中的改进提供批判路径。科幻小说是审美现代性的表征,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幻小说具有乌托邦冲动的形式面向,而非真正社会实践意义上的面向之原因。这种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不是要重建现有社会秩序,或者建立用以逃避的“桃花源”,而是作为“他者”的存在,去发现晦暗不明的隐疾,从而试着去解决它。科幻小说的批判性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它虽然不直接对社会进行批判,但是在“向前看”的乌托邦冲动中,蕴藏着怀旧的乡愁情感体验,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找寻到那个不曾存在或者终将存在的我们渴望的家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当中,科幻小说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表征,不仅暴露出可能存在的现实社会问题,也呈现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才是科幻小说美学意蕴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四、结语

虽然刘慈欣认为中国科幻的繁荣值得警惕,但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从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到如今脍炙人口的刘慈欣《三体》系列,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更是见证了一代人情感结构的嬗变。科幻小说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表征,最大限度上发挥了陌生化认知带来的感知新奇,依托文本作者对于现象及本质的折射想象,通过作为想象场域的“零度世界”进行演绎,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建构“乡愁乌托邦”的同时反观当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扬弃异化关系的过程中重塑我们的情感结构。因此,对

于科幻小说的美学意蕴的研究,不仅仅在于帮助科幻小说挖掘其独立的文艺美学价值,更在于通过对科幻小说“乡愁乌托邦”的冲动感知中所经历的审美体验,帮助我们在暴露的异化世界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科幻小说,这个日复一日往返于过去与未来的冥河摆渡人卡戎(Charon)^①,尽管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的影响,但其将虚构的未来赠与我们,又将此在的乡愁渡向未来,在生与死的缠绵中显现出无尽的希望。

注释:

①卡戎是古希腊神话中为冥王哈迪斯(Hades)工作的神灵,负责将亡灵从此岸渡向彼岸,但需要向他支付一个奥波勒斯(obolos)才能让亡灵上船。

参考文献:

- [1] 邱晨辉. 中国科幻热潮之下“暗流涌动”[EB/OL]. http://zqb.cyol.com/html/2019-11/18/nw.D110000zgqnb_20191118_1-08.htm, 2019-11-18/2022-4-28.
- [2] 亚当·罗伯茨. 科幻小说史[M]. 马小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
- [3] 达科·苏恩文. 科幻小说变形记[M]. 丁素萍,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 [4] 布赖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 亿万年大狂欢[M]. 舒伟,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6] 达科·苏恩文. 科幻小说面面观[M]. 郝琳,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 [7] 王卫英. 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价值与审美批评[J]. 中州学刊,2008(1):229.
- [8] 向丽. 审美的革命与乌托邦的重构[J].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6,19(2):38.
- [9]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未来考古学[M]. 吴静,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6.
- [10] 向丽. 怀旧·乡愁·乌托邦:中国艺术乡建的三重面向[J]. 民族艺术,2021(3):139.
- [11]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化[M]. 欧阳景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12]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顾爱彬,李瑞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84.
- [13] 王杰. 审美幻象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1.
- [14]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Defamiliarization Cognition · Nostalgia Utopia · Aesthetic Modernity

——On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Science Fiction

WU Liang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cience fiction's dilemma lies in its unexamined value. In terms of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science fiction relies on the author's refractive imagination of the real world as a cognitive structure of defamiliarization to emphasize and expose the relationship of alienation. Based on the cognition of “zero world”, its spirit ultimately points to the “nostalgia utopia”. As a symbol of aesthetic modernity, science fiction reflects the spirit of reflection and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which is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its aesthetic implication.

Key words: Science fiction; defamiliarization cognition; zero world; nostalgia utopia; aesthetic modernity

诗歌绘本隐喻空间的构建及语言特点

胡若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媒体艺术学院,北京 100094)

摘要:与故事绘本相比,诗歌绘本倾向构建不同于直观空间的隐喻空间和不同于剧情节奏的文字节奏;诗歌绘本的文字节奏也就是声音的节奏、音乐性节奏;在诗歌绘本中,图像与色彩对隐喻空间的构建,图像与图文版式编排对文字节奏的构建等,都增强着诗歌语言的表现效果。

关键词:诗歌绘本;故事绘本;隐喻空间;文字节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0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17-06

故事绘本与诗歌绘本由于文本体裁的不同,其表现语言也因功能的相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比研究故事绘本与诗歌绘本在表现语言特点上的不同,可为从故事绘本到诗歌绘本的创作转型提供表现技法和效果目标等方面的启示。

一、诗歌绘本的表现语言对隐喻空间的构建

诗歌绘本中的图画与故事绘本相比,呈现出更浓烈的隐喻效果。如果说故事绘本中的画面所展现的是一个倾向于叙事的、直观表现的空间,那么诗歌绘本中的画面所展现的则是一个倾向于象征的、影射表现的隐喻空间。

1. 隐喻空间的产生原因

(1) 诗歌中隐喻修辞的使用

诗歌中大量使用的隐喻修辞,即以特定的形象喻射特定的感受——这种并非直接叙述而是用一物象征隐喻另一物(或多物)的表达方式,造就了诗歌在表达情感上细腻且多义的效果,同时其暗喻的手法也带来表达上的含蓄与隐晦的效果。诗歌中隐喻的语言、象征的意象、含蓄隐晦的文本,呈现在绘本画面上,便不再是故事绘本那样直白叙事的空间,而是同诗歌一样内含喻射象征的隐喻空间。

(2) 基于创作者视角下对潜意识感受的“翻译”流程

图像对诗歌文本抽象潜意识感受的转化与表

达,需要绘本创作者找到诗人潜意识感受的源头,即作为潜意识本源的“对某种事物的情感印象”,并将这些情感印象以具体可视的图像呈现出来,完成对抽象潜意识感受的翻译与转化。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抽象感受被以具体可视的形象代替,也就是说,绘本所呈现的一切图像都是对某种感受的象征和喻射——这些具有喻射和象征性质的图像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隐喻空间。

(3) 基于诗歌语言特征下的效果要求

诗歌有着“以简洁凝练的语言表达复杂和多层次感受”的特点,与故事“用大量的语言来叙述一件事从而间接表达思想”的特征不同,这也决定了诗歌绘本在画面表达上要与故事绘本有所区分,即需要以精简的篇幅呈现尽可能丰富的感受——而隐喻式的呈现相较叙述式的解读更符合诗歌在表达上“凝练多层”的效果要求。

我们以诗的隐喻式的表达和叙述直白的表达做对比:

诗人艾略特这样写“绝望”：“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1]104}而用直白叙述可能会是：如果说绝望就像世界毁灭，那么它一定不是激烈地毁灭，不是任何仍存强烈活力的行为。真正的绝望，更像是面对毁灭时的木然无奈，是被告知所有行为都是徒劳的之后的叹息。对比两者，后

收稿日期:2022-10-15

作者简介:胡若牧(1997—),女,山东菏泽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者用大量的文字解读“绝望”给人的感觉,其中每个词语所代表的都是其表层的意思。而前者只用了很少的文字,以“嘭的一响”隐喻了那些诸如“爆炸”“海啸”等仍存强烈活力的事件;用“嘘的一声”隐喻了那些“无计可施”“无力挽回”的失去所有希望时的木然状态。诗歌以隐喻的用语使一个词拥有多层涵义,即一个词能代表很多东西,故能做到“用精简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感受”。

诗歌绘本需要体现诗歌语言的特点,也就是要把大量的信息凝到较小的篇幅里,精炼地表达。此时,绘本画面中的每个图像都被赋予了多层喻义,所以用这些具备隐喻和象征性质的图像所构建的画面,最能符合诗歌“形式简练而表意丰富”的特质。因此,在诗歌绘本中,画面呈现出的“隐喻空间”也是对应了诗歌语言“以少表多”的效果要求。

2. 图像与色彩对隐喻空间的构建

诗歌绘本中所呈现的隐喻空间,是由各个具备隐喻性质的图像与色彩共同构筑的。它们在本质上是诗歌中抽象感受的视觉意象呈现,是汲取了文字内涵精华的被作者“再创造”的图像(与色彩)。由于这些图像(与色彩)存在“不完全贴合诗歌文字”的情况,其表意不是单纯的表面意义,而是含蓄地藏在文字背后。因此,这些“含蓄”的图像与色彩,共同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能进行自主解读的隐喻空间。

(1) 现实图像与非现实图像对隐喻效果的构建(拟人,多物组合,反常态塑造)

本文将具备构建隐喻空间功能的图像分为两类:现实图像和非现实图像。

现实图像指的是外在形象为现实中存在的事物的图像,如桌子、月亮、气球等。这类图像所构建的画面空间偏真实,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然而,即便是再真实不过的图像,也是经由创作者编排过的、具备隐喻性质的图像,以特定的形态构置于特定的位置上,隐喻或象征一种或多种情绪、感觉、理念。

以诗歌绘本《呼唤大海》^{[2]7-8}(图1)为例,画面中的图像如男孩,用课本内页折的纸船,航海地图,灯塔,墙壁上的鱼挂画……都是真实存在的,然而这些真实图像并非只代表了真实物体本身,它们以特定的形态与位置,隐喻着诗歌中丰富的感受与情思。此页前半部分的诗歌文本为:“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在学校里/那是大海/在平铺的地图上/慢慢展开。/我是个孩子/在学校里/那是大海/我画着经线/子午线/纬线。/我是个孩子/那并不是大海。”后半部分为:“我还是个孩子/那才是大海/灯塔和

港口/咸咸的海水/烛火通明的船……”

诗歌前半部分写了“我”过去在学校课本上认识的海,并认为那些“地图”“经线”“纬线”“子午线”都不能代表真正的海,即“我是个孩子,那并不是大海”。而后半部分,“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眼前的“灯塔和港口”“咸咸的海水”“灯火通明的船”……这些才是真的大海,一切都回归了本真。本段所要表达的是“我”对真实大海的向往之情,对真实自然的追求等。

画面中文本中并没出现的事物,如男孩手中用课本内页折的纸船,墙壁上的鱼挂画——纸船隐喻了“我”不满于课本文字中的海,而渴望真实的大海;墙上挂画中的鱼,其头部朝向与“我”的头部朝向一致,都看向右边真实而广阔的海洋,显示出前往的动势,喻示“我”像鱼一样迫切投入大海的怀抱;右下角的地图甚至被蓝色的水浸染,蔓延至右侧变成了一片海洋,象征着“我”欲将地图上的海变为真正大海的心境。屋内的一切事物,都呈现出朝向大海的趋势,都隐喻着作者渴望见到真实之海的心情。



图1 《呼唤大海》绘本内页

非现实图像,指的是其外在形象于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图像,也可以说是梦幻或想象的图像,比如软趴趴的电视,长着鸟头的人,有着翅膀的仙人掌等。这类图像所构建的画面空间较为梦幻,给读者营造感官上的陌生感,使其产生似梦非梦的视觉感受。这类图像给读者的视觉刺激往往大于真实图像,给予读者的联想空间也更为深远。

本文将非现实图像分为两类:多物征类图像和反常态塑造类图像。

多物征类图像,指的是图像本身具备多种事物的特征,或者说是由多种物件组合而成的图像,比如鱼头人,长翅膀的树,有腿的萨克斯等。这类图像通过对各种事物视觉元素的组合,将事物所象征的意象联系起来,使读者在阅读图像的过程中自发建立意象间的联系,在联系中形成对诗歌内涵的自我诠释与解读。

以诗歌绘本《小不点与舞翩翩》^{[3]5-6}(图2)为例,本段诗句写了音乐家“小不点”对自己的音乐感

到平淡无奇,渴望寻找让他耳目一新的天籁之音,而某夜他听到街对面传来萨克斯的声音,“声音宛如天籁一样/就像瓶中美丽的花朵/争奇斗艳纷纷绽放”,迫不及待地奔向声音的源头,欲找到他梦寐以求的音乐。画面中,音乐的来源被画成长着人腿的萨克斯管,它先是喻示了声音的音色,不是其他乐器,而是萨克斯;长着人腿,喻示一个行走的人在吹奏;而萨克斯却是人的身体主干,喻示此刻“小不点”眼中仅有萨克斯发出的“天籁之音”,甚至完全忽视了吹奏者本人,对音乐的关注已然大于人,隐喻一种对音乐痴狂追求的状态。



图2 《小不点与舞翩翩》绘本内页

反常态塑造类图像,是指画中的物体被从质感、大小、味道、重量、软硬等特质方面“反常态”地塑造后的图像,比如扭曲柔软的树,凌空漂浮的石头,比人大的老鼠、被咬了一口的星星……这些被反常态塑造的图像,往往为达到情感上夸张或强调的表现效果。

以诗歌绘本《地下铁》^{[4]43-44}(图3)为例,本段诗歌文本为:“有时候,我觉得已走到世界的尽头。”图中,月亮被缩小到可以装进笼子,作为笼底的地下铁出入口是失重而悬浮在半空的状态,地下铁的空间与地面断裂——图像被从大小、空间、重力反常态地塑造了:缩小的月亮强调了月亮的“可得感”,强调月亮在“我”心中的形象应是可爱的、可触碰的,然而却被关在笼子里,笼子里的“我”也无法触到它。这一形象是对“我”怀着希望追寻心中的美好之物,却因感知到这个世界的约束与局限而无法前去触及的失落感之隐喻;半浮于空中的地下铁出入口是对“虚空”的强调和夸张,隐喻女孩在感受到“走到世界的尽头”时的空虚无力感。

再如《沉默的老虎写诗歌》^{[5]15-16}(图4)中,画面对应诗歌文本:“写诗的小孩比别人,要挨更多拳头。写诗的小孩,写诗的小孩——他们在我后面追着喊。/雨点一般的拳头。写诗的小孩,我捶你的额头,把你打倒在路边,打碎你的眼镜,看你还敢再写什么情书。”呈现比人还大且如树一般粗长拉伸的手臂。这种被反常态塑造的手臂,强调了暴力对“会写诗的小孩”的威慑之大,像追踪导弹般延伸追



图3 《地下铁》绘本内页

踪的轨迹也暗示了“追着喊”的动作,图像忽略施暴者本人的全貌,而将人的行为跟动向全部由夸张的手臂与拳头代替,与“写诗的小孩”所拥有的完整形体形成对比,隐喻施暴者虽强大,却最终不过是个“打人的拳头”而不是有着诗心、有着善美内涵的“人”。变形的手臂将对施暴者的讽刺与对“写诗的小孩”的认同做了视觉表现上的隐喻,以夸张的形象强调了诗中的情绪与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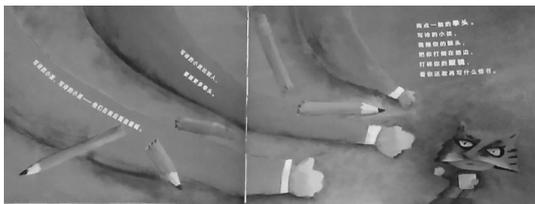


图4 《沉默的老虎写诗歌》绘本内页

(2) 色彩对隐喻效果的构建

在诗歌绘本中,能构建画面隐喻空间的不仅有具备一定形态的图像,无具体形态的色彩也能够隐喻诗歌中的感受与情思。

以诗歌绘本《地下铁》(图5^{[4]79-92})为例,画面以色彩隐喻诗中的某些情绪,随着色彩在页面上的变化,可以感受到诗歌中感受的变化与走向。图5上图,“我们总是来不及相识就匆匆别离,一次又一次在地下铁分手。/我疲惫不堪,下一站是哪里?会不会有一列永不停止的地下铁?”画面左半部分的颜色是鲜亮偏暖的,而右半部分的画面一下子变暗变冷,前者喻示了“我”对人与人间相识的美好向往,后者喻示“我”因一次次的匆匆别离而感到疲惫不堪的心境。下图整个跨页被清淡的蓝与白占据,喻示着一种单纯无瑕的思绪,也就是最原本的状态,这与“其实,我哪里都不想去。/然而,会有人在地下铁的出口等我吗?”的感觉相契合,“我”在经历了那么多颜色各异的“站台”后,最终回到最单纯的心境——清雅的蓝和白,喻示着“我”此刻单纯而平静的状态。

色彩通过刺激读者视觉来喻示诗歌中的情绪感受,是构建诗歌绘本中隐喻空间的重要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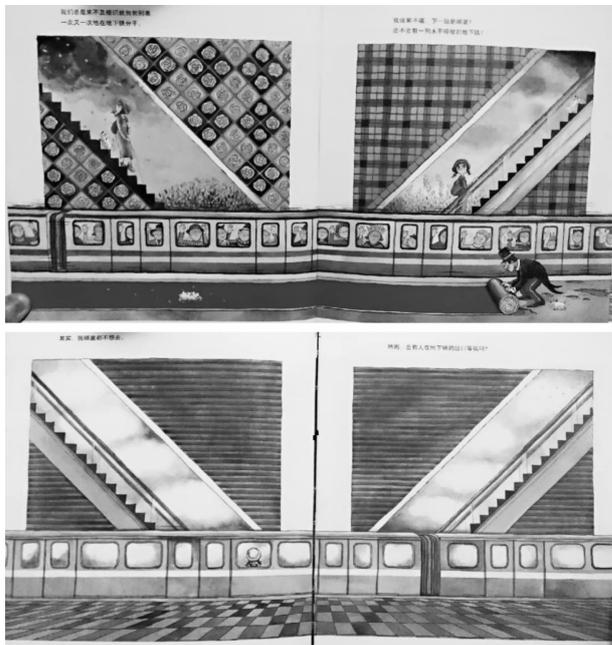


图5 《地下铁》绘本内页

二、诗歌绘本的表现语言对文字节奏的表达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不仅体现在其对词义的锤炼玩味、对语法的巧妙构思,还体现在其音乐般的韵律,即文字的节奏上。朱光潜先生曾讲:“情感的最直接的表现是声音节奏,而文字意义反在其次。文字意义所不能表现的情调常可以用声音节奏表现出来。”^[6]很多童诗在语言上也呈现出明显的音律节奏,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些音乐般“好玩”的句子,易于模仿,孩子们在念读中会形成深刻的记忆。

1. 故事绘本的节奏和诗歌绘本的节奏

故事绘本的表现主体是故事,诗歌绘本的表现主体是诗歌——故事绘本的“节奏”主要表现在故事情节的节奏上,也就是戏剧性节奏;诗歌绘本的“节奏”主要表现在语言本身的节奏上,也就是声音的节奏、音乐性节奏。

音乐中的节奏就是“音响节拍的轻重缓急变化和重复,是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现象”^{[7]106}。这种“节奏”若能体现在绘本的图文版式设计中,则会形成一种视觉秩序,使读者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感受到律动美、趣味感;同时,被赋予节奏的版式设计也能加强艺术的表现力。

故事绘本通过图文版式设计,制造视觉上的节奏,主要服务于故事情节的节奏(戏剧性节奏)。美国绘本大师莫里斯·桑达克的绘本《野兽国》^[8]便是一个范例:绘本讲述了一个男孩夜晚在家调皮乱闹,母亲以不许吃饭来惩罚他,并叫他“野兽”,男孩回嘴“我要吃了你”。小男孩回屋后,开始想象自己开船来到全是野兽的国度,和野兽们一起狂欢并征

服它们,最后他玩累了,要求野兽们回去睡觉,但不给他们晚饭。野兽们喊着要吃了他,因为它们太爱他了,然而男孩依旧选择与它们告别。等他坐船回到家,发现妈妈给她留了晚饭在桌上,还是热气腾腾的。以图6为例,这本书的第一页,画面只占据了半个页面的一小部分,随着读者的翻页,会发现画面越来越大,到了男孩彻底征服野兽并与之狂欢的部分,画面占满了整个跨页,在这之后,每页画面越来越小——故事情节从男孩进入房间的开头,到进入幻想中坐船去野兽国,再到与野兽狂欢的高潮,接着到男孩离去的转折,最后到男孩回家的结尾,情节呈现出由平稳到高涨再回归平稳的节奏。绘本的版式设计中,画面于页面的占比自小变大,再自大变小,正好对应了故事情节的起伏节奏。所以,故事绘本中,图文版式设计所构建的视觉节奏,主要服务于故事的情节节奏,是对情节节奏的视觉表现与强调。



图6 《野兽国》绘本内页

诗歌绘本通过图文版式设计,制造视觉上的节奏,主要服务于诗歌语言(文字)的节奏(音乐性节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诗歌绘本都必须在图文版式上体现出语言本身的节奏,因为有的诗歌本身不受限于整齐固定的格式或韵脚,语言相当自由,更注重内容而非形式,这里只针对以整齐格式或韵脚的诗歌为文本的诗歌绘本来谈(如大部分童诗)。

以图7为例,诗歌绘本《在茫茫的风中》^{[9]1-14},文本“一个人要走多少路,你才会认他是个人?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她才能躺在沙滩?答案啊,吾友,在茫茫的风中,答案在茫茫的风中……”诗歌文本有着整齐的格式,就是前面连续出现几个问句“xxx要xxx,才xxx?”最后用一个陈述句做总结,“答案啊,吾友,在茫茫的风中,答案在茫茫的风中”。以此为一个循环开始重复。在画面中,连续出现几个远景,最后出现一个近景,以此为一小节,循环重复——绘本中,图文版式设计对近远景画面的安排对应了诗句的格

式秩序,画面“远,远,近”的节奏对应了诗歌“问,问,答”的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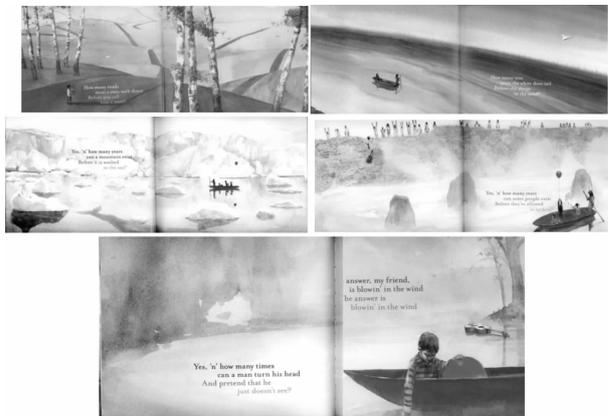


图7 《在茫茫的风中》绘本内页

所以,诗歌绘本中,图文版式设计所构建的视觉节奏,主要服务于诗歌的语言节奏,是对语言节奏的视觉表现与强调。诗歌绘本中所呈现的节奏,比起情节上的戏剧性节奏更倾向于语言的音乐性节奏。

2. 文字节奏在诗歌绘本中的体现

诗歌中文字的节奏,呈现在绘本中便是画面节奏,是读者在翻页过程中感受到的视觉节奏。画面体现文字节奏分两个方面:一是体现文字形式上的节奏,二是体现文字内容上的节奏——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并相互渗透。

(1) 文字形式上的节奏

文字形式上的节奏指句式的节奏,在一首格律或韵脚较整齐的诗歌中,往往存在一个或若干个固定句式,这些句式有规律、有秩序地循环重复,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在这类诗歌的绘本中,往往会根据句式的节奏构建画面间的节奏,比如一种句式对应一个系列的图式,另外一种句式对应另一个系列的图式。

以诗歌绘本《人为百兽命名》^{[10]3-10}(图8)为例,这里截取诗歌文本段落:“人初见一兽,惯于吼叫,多毛的巨爪,惯于怒号,乱毛满头,背宽毛茸茸。/‘啊,我要叫它熊。’/在太初,在太初,人已为百兽命名……”

整首诗歌包含三种句式:第一种是描述某个动物的细节特征,第二种是“我要叫它 xx”,第三种是“在太初,在太初,人已为百兽命名”。其中,以第三种句式作为一个“总结主题”式的划分,由它总结上一段,并展开下一段。在图8中,绘本将画面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放大的动物特写,第二种是镜头远离这个动物,给它一个全貌,右边边是各种动物向前方奔去,以此开启下一张。绘本将文本中的三种句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描写动物各处特征的,嵌入第一种图式;另一部分“我要叫它 xx”和“在太初,在太



图8 《人为百兽命名》绘本内页

初……”分别嵌入第二种图式中的左半边和右半边。这使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受到一种视觉节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动物的近距离特写,能看到动物身上各处的细节,对应文字里对这些细节的描述,猜想“它是什么”;翻到第二页,视角被放远,看见这个动物的全貌,对应“我要叫它 xx”的总结,接着视线从左到右,跟随向前奔跑的动物们,带着“在太初,在太初,人已为百兽命名”的大主题,翻开下一页,遇到下一个动物……以此循环,形成细看猜想、远观命名、点明主题并开启下页的回环节奏。绘本根据文本的句式进行图式分类,并有规律地排版,从文字形式出发,制造图像节奏,以此再现并强调诗歌语言的节奏。

(2) 文字内容上的节奏

这个部分很容易被忽视,或是被“理所当然”地归入文字的形式节奏中,因为它是抽象的,是隐藏于文字外在形式节奏下的“概念”上的节奏。

当某个诗歌文本句式单一时,绘本创作者不再考虑以不同句式来划分画面,这种时候,创作者往往会自行建立一套图式,通过对其规律地分配排布,营造视觉节奏,从而展现诗歌节奏。而图式及其排布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此时,文字的内容往往影响创作者在构建画面节奏上的方案选择——用什么样的图式,如何排版布局,才能更贴近诗歌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感觉?图像呈现出的动势,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或是从远到近,从小到大?是从简到繁,还是从淡到浓?是从暗到亮,还是从暖到冷……这些都要根据文字内容考虑。

以诗歌绘本《之后》^[11](图9)为例,这里节选诗歌文本中的一部分:“冬天之后,春天染上色彩/生

气之后,是沉默;沉默久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春天之后夏天脱下我们的外套/花朵之后,是果实/最后一个沙丘之后,大海壮观地延伸/夏天之后,秋天来了,日暮的光在地上溜走……”文本以“xxx 之后,xxx”为主要句式,写了生活中各种事物随时间的发展变化、随因果的发展变化,通过这些变化,得到情感、时间、万物交替的人生哲理。其中,“xxx 之后,xxx”突出“之后”一词,即突出一种事物随时间“从这里出发变到那里”的节奏——它不是形式上的节奏,而是内容上的节奏。图9中,绘本作者为充分体现内容上“事物随时间从这里变到那里”的节奏,选择了这样一种图式:事物被放在一张跨页里,左半边是开始的样子,右半边是经过一段时间(或作用)后的样子;全书中间穿插四个大跨页,分别表现四个季节的更替变化,以此做时间上的大划分——读者在阅读时便会感受到这种视觉节奏。画中事物从左到右变化的节奏,体现了文本内容“事物从这里变到那里”的节奏;绘本中对事物短时间段变化(事物在左右单页上的变化)与长时间段变化(四季于整张跨页间的变化)的划分,体现了文本“大变化中包含小变化”的概念节奏。

绘本根据文字内容(概念)的节奏,选择图式方案,按规律排版,从文字内容出发,制造图像节奏,以此再现并强调诗歌内容的节奏。

笔者通过对比故事绘本与诗歌绘本,发现诗歌绘本倾向构建不同于直观空间的隐喻空间、不同于剧情节奏的文字节奏,并在研究诗歌绘本的表现语言及其效果中获得许多启示,包括图像与色彩对隐喻空间的构建机制,图像与图文版式编排对文字的形式节奏与概念节奏的构建机制等。以上研究为笔者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法和效果上的启示,也期待能为其他艺术同行创作诗歌绘本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



图9 《之后》绘本内页

参考文献:

- [1] 艾略特. 四个四重奏[M]. 裘小龙,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104.
- [2] 佩德罗·比亚尔·桑切斯. 呼唤大海[M]. 范童心,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18.
- [3] 安东尼奥·格拉纳多斯. 小不点与舞翩翩[M]. 塞西莉亚·瓦雷拉,绘. 范童心,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16-20.
- [4] 几米. 地下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62.
- [5] 莫妮珂·赛佩达. 沉默的老虎写诗歌[M]. 胡里安·塞西罗,绘. 范童心,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
- [6] 朱光潜. 诗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84.
- [7] 夏平. 儿童故事性绘本的版面节奏深探[J]. 编辑之友, 2012(5).
- [8] 莫里斯·桑达克. 野兽国[M]. 宋珮,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
- [9] 鲍勃·迪伦. 在茫茫的风中[M]. 余光中,译. 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8:15-16.
- [10] 鲍勃·迪伦,吉姆. 人为百兽命名[M]. 阿诺斯基,绘. 余光中,译. 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
- [11] 瞿澜. 现代哲理诗歌绘本:之后[EB/OL].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771398?columnSlug=illustration>,2016-05-0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Construction of Metaphorical Space in Poetry Picture Books and its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HU Ruomu

(School of New Media Art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story picture books, poetry picture books tend to construct metaphorical spac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intuitive space, and text rhyth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tory rhythm. The rhythm of a poem picture book is the rhythm of sound, which is musical; In poetry picture books, the construction of metaphorical space by images and colo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hythm by images and graphic layout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poetry language.

Key words: poetry picture book; story picture book; metaphorical space; rhythm of words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石,李媛

(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00)

摘要: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采用熵值法综合比较;基于调节效应模型认识其调节路径,并利用2013—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GMM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9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正面促进作用。具体来看,人力资本提升,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创新能力提高都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关系产生显著积极影响。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造业升级;黄河流域;GMM模型;调节效应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05

中图分类号:F49;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23-05

一、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对数字经济概念、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影响进行文献查阅梳理,总结其研究意义。

有关数字经济的概念术语最早是由美国IT领域专家唐·塔普斯科特个人专著《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所提出的。2016年发布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一种以信息为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借通信技术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经济行为。”胡士华等^[1]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指出数字经济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余姗等^[2]从产业角度辨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产业概念的区别;学者史宇鹏^[3]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社会在数据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活动。

关于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研究,Martinez-Caro等^[4]认为物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和提升的主要力量。廖信林、杨正源^[5]基于熵值法测度并运用动态面板GMM模型测算其

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应和路径显著。郑琼洁、姜卫民^[6]基于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处于初级阶段,推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是主要方向。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如影响因素、路径、作用机理等方面对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多为定性研究,而对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量化研究较少,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依托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经济带战略背景下,实证分析黄河流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的影响,对于我国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南北经济平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影响分析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发展,必然伴随着传统制造业观念的转变,这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实现制造服务更精准和提高制造过程数字化程度的目标路径,主要在于数字化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健康融合以及数字创新、数据要素、精准需求和稳定供应等。

收稿日期:2022-09-11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与协同推进研究”(21ZDA066);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新发展格局下陕西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运行模式与政策机制研究”(2022KRM127)

作者简介:王石(1998—),男,安徽合肥人,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化。

(一)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发展

现如今,数字经济主要从三方面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第一,数字化制造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数字化制造是以生产要素资料为基础,借助工业互联网技术,帮助企业在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二,制造业与数字化结合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数字生产的实质,是通过提高生产体系中的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促进区域内的分工和贸易效率进步,从而使各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数字制造可以加速传统工业的工艺技术改造,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第三,发展数字化制造是推动制造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环节。全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工业转型不断加快,以“云计算”技术并结合海量数据的互联和应用为底层逻辑,产生了新的制造业发展新动能。在实际应用中,数字化制造可以促进制造业产业链诸多环节的深度融合,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的数据流通模式出现,从而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1。

H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

(二) 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

人才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人才的质量决定了产业的发展基础,数字经济正在大力淘汰“可被替代性”强的劳动者,带来的效果是行业整体人力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改变巨大,需求一侧,数字经济提升了制造业就业群体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数量,数字经济的特点使得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都有了相当的提高,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对高端人才需求越来越高。供给一侧,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劳动者进行数字化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的综合素质有了较大的提升。互联网招聘与就业平台改变了以往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信息资源不对等的局面,人才与企业真正实现了平等双向选择,从而推动劳动力就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资发展型资本,不同于传统生产资本,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的良性结合,助推制造业产业升级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2。

H2:在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 数字经济与企业生产成本

成本节约效应是指数字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信息收集和传递功能,减少了以往制造业在上下游产业链生产过程中因信息差而产生的信息搜索成本、额外生产交易成本,使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的资源得到高效利用。数字经济通过其强大的信息传递功

能,大大缓解以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信息不对等问题,改变以往仅依靠既往经验来进行粗略生产,依据数据的强大分析能力,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和消费者需求;同时数字经济给传统制造业带来新技术的同时,信息获取成本、学习成本和新技术传播成本大幅降低,使得制造业能够直接对接下游供应商与上游客户,更能凭借数字技术,将以往处于生产链较低附加值环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附加值的高技术含量产业,制造业智能制造逐步实现,从而提高制造业经济生产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H3:在企业生产成本的调节作用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升级具有反向促进作用。

(四) 数字经济与企业自主创新

数字经济在与制造业产业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创造性的商业模式与商业业态,“共享经济”由最开始的自行车这类出行工具到充电宝等许多日常使用的物品;“平台经济”改变了以往传统就业市场雇员与雇主的劳动关系,数字经济凭借其网络强大的信息共享沟通功能,催生了一批“平台企业”,下一位雇员可能供职于多家企业,这有利于转变传统制造业商业形态,更可以延长制造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数字经济沟通海外资源,大大拓宽制造业企业的市场边界^[7];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凭借其技术特点创造了全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热点,比如“私人定制”,给消费者人群进行细分,打造不同消费者的产品,快速了解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响应消费者诉求。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产业在制度与管理上发生创新性变革。同时,数字经济将制造业产业与消费者结合起来,让消费者参与企业生产的产品创新。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4。

H4:在企业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 熵值法评价方法

本文参考吴传清、张诗凝^[7]的研究,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确定权重(指标体系权重见表1)。过程如下:

标准化处理:

$$X'_{ij} = (X_{ij} - \min X_{ij}) / (\max X_{ij} - \min X_{ij}) \quad (1)$$

X_{ij} 为第 i 省第 j 指标原始数据, $\max X_{ij}$ 和 $\min X_{ij}$ 分别为不同省份 j 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 $i = 1, 2, 3 \dots, 9$; $j = 1, 2, 3 \dots, 10$ 。

之后,算出各个指标的信息熵。

第一步,由公式(2) 计算指标对地区所占比重

和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

$$P_{ij} = X'_{ij} / \sum_{i=1}^{30} X'_{ij}$$

$$e_j = - \frac{1}{\ln m} \sum_{i=1}^{10} P_{ij} \ln P_{ij} \quad (2)$$

m 表示指标数量。

第二步,由公式(3) 计算第 j 个指标的差异系数

和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q_j = 1 - e_j \quad W_j = q_j / \sum_{i=1}^m q_j \quad (3)$$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采用权重和指标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s_j = \sum_{i=1}^m w_j \times X'_{ij} \quad (4)$$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权重(%)	单位	指标属性
数字基础设施	光缆长度	4.666	公里	正向
	移动电话基站数	4.823	万个	正向
	移动电话普及率	2.509	每百人部数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5.909	万个	正向
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	2.431	万元	正向
	网上移动支付水平	35.587	年人均支付笔	正向
	软件业收入	18.333	万元	正向
数字经济创新	专利申请数	8.217	件	正向
	发明专利申请数	8.786	件	正向
	专利申请授权数	8.733	件	正向

(二) 面板回归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参考廖信林、杨正源^[5] 的研究,考虑到制造业产业结构对后期存在长期持续影响,加入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并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 SYS - GMM 估计动态面板模型。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MH_{it} = \alpha + \beta_0 MH_{it-1} + \beta_1 DE_{it} + \lambda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

$$MH_{it} = \alpha + \beta_0 MH_{it-1} + \beta_1 DE_{it} + \beta_2 RGDP + \beta_3 WSTZ + \beta_4 ZFCY + \beta_5 HYGM + \lambda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样本期内的省份和年份; MH_{it} 是测算的制造业升级水平; DE_{it} 是测算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λ_i 和 η_t 表示地区和时间非观察效应,其余为控制变量; ε_{it} 是随机误差项。本文选择了 2013—2020 年黄河流域的 9 个省份作为样本,所有样本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调节效应是研究 X 对 Y 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调节变量 Z 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检验调节效应是否显著最重要的是看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是否显著。模型中分别加入了人力资本 $RLZB$ 、企业生产成本 $SCCB$ 、企业创新能力 $CXNL$ 和数字经济水平 DE 的交乘项,如果交乘项的系数 α_3 显著,则说明人力资本、企业生产成本、企业创新能力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升级具有调节作用;若 α_3 系数为正

数,说明上述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升级有积极作用,若为负数,则说明产生消极作用。参考朱于珂等^[8] 的研究,设计如下模型:

$$MH_{it} = \alpha_0 + \alpha_1 DE + \alpha_2 RLZB + \alpha_3 DE * RLZB + \varepsilon_{it} \quad (7)$$

$$MH_{it} = \alpha_0 + \alpha_1 DE + \alpha_2 SCCB + \alpha_3 DE * SCCB + \varepsilon_{it} \quad (8)$$

$$MH_{it} = \alpha_0 + \alpha_1 DE + \alpha_2 CCNL + \alpha_3 DE * CCNL + \varepsilon_{it} \quad (9)$$

(四)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国家产业的升级是指产业从低端产品加工销售到高附加值产品的发展过程,其目标是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在工业领域,OECD 将其按照技术密度划分为低、中、高三大类。本文在此基础上,参考朱玮玮^[9] 提出的中国中高端科技产业的分类,将制造业分为低端、中端、高端三个层次(参见表 2)。从全国三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来看,中、低端制造业所占的比例很大,而要实现产业升级,就必须要提高高端制造业的比率,本文用中端制造业的产值与高端制造业产值之间比率(用 MH 表示)来衡量。本研究采用国研网、中宏网、各年份《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各区域统计年鉴等资料。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采取熵值法测算的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来衡量。

3. 控制变量

选取外商投资力度($WSTZ$)、政府参与程度

表2 制造业分类

产品类型	包含的制造业行业
低端制造业	农产品加工、酒、茶、烟草制造,纺织服饰制造,木材家具制造,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中端制造业	金属、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石油化工、煤炭、化学纤维、医药制造,橡胶、塑料、有色金属加工等
高端制造业	化学原料与制品制造,计算机、仪器仪表制造,机床、专用设备、电子通信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

(ZFCY)、行业规模(HYGM)、经济发展水平(RGDP)。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表示,外商投资力度以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表示,政府参与程度以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值表示,行业规模以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

4. 调节变量

选用人力资本(RLZY)、企业生产成本(SCCB)、企业创新能力(CXNL)。其中,人力资本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企业生产成本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表示,2017—2018年数据个别缺失,运用线性插值法补全;企业创新能力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授权数量来表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制造业升级水平	72	0.676	0.343	0.155	1.38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72	0.151	0.143	0.010	0.601
外商投资	72	60.568	65.137	0.045	205.164
政府参与	72	0.322	0.155	0.141	0.753
行业规模	72	0.359	0.063	0.236	0.496
经济发展水平	72	46400.431	12233.380	23647	71825
人力资本	72	8.976	0.598	7.474	10.450
企业生产成本	72	17027.980	15951.719	1919.39	60338.867
企业创新能力	72	36680.861	43790.823	502	238778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影响机制。表4第(1)列展示了黄河流域9省数据基于方程(5)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力度、政府参与程度、行业规模变量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691,在1%水平下显著,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黄河流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提升0.691%,说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在样本数据期内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表4第(1)列和第(2)列中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会受到后期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推动。表4第(3)列至第(5)列分别列示了山东省、四川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基于方程(6)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的系数方向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即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区域差异来看,山东省、四川省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效率上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这可能是由于两省经济基础良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原有制造业产业更为发达,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表4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

变量	系统GMM估计结果				
	(1)	(2)	(3)	(4)	(5)
L.MH	0.861*** (10.15)	1.755*** (3.81)	0.998*** (5.43)	0.961*** (12.74)	1.087*** (3.68)
DE	0.691*** (4.35)	0.621* (1.66)	1.553** (2.72)	1.681** (2.51)	1.065*** (3.931)
WSTZ		-0.006* (-1.68)	-0.046** (-2.65)	-0.013* (-1.98)	0.117*** (-3.91)
ZZCY		2.988* (1.73)	4.659* (1.79)	3.988** (3.21)	2.973* (1.67)
HYGM		2.338** (2.06)	1.558*** (4.47)	1.566*** (5.01)	1.785** (2.71)
RGDP		0.043** (1.79)	0.111 (1.59)	0.067** (2.37)	0.154* (1.70)
Hansen 检验	4.88 [0.431]	7.76 [0.558]	5.87 [0.354]	5.12 [0.224]	7.76 [0.312]
AR(1)	0.026	0.034	0.023	0.035	0.012
AR(2)	0.335	0.301	0.255	0.543	0.25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内为t统计量,[]内为P值。

(二)调节效应结果分析

文章论证了人力资本、企业生产成本、企业创新能力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升级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参见表5),分别基于方程(7)(8)(9)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交互项的系数为0.777,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人力资本不断提高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的升级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这也就验证了假设H2,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科技的运用,不但为制造业经济的发展与运作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将会影响到相关行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其中包括教育资本、劳动技术等,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可以促进各相关主体的创造力,从而提高其生产力。数字经济与企业生产成本交互项的系数为-0.000,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3,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数据已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而传统的制造业则是通过增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来扩大自己的企业,这也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从而大大超出了其经营规模的收益。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红利的出现及释放,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速度明显加快,效率低、利润低、成本高的行业逐渐萎缩,从而推动了制造业的升级;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能力交互项的系数为0.000,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企

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关键攻坚期。我国高精尖产业制造例如半导体正被西方“卡脖子”,要继续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让制造业真正进入世界一流,上述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设 H4。

表5 调节变量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升级关系的调节结果

变量	(7) MH	(8) MH	(9) MH
DE	7.868*** (1.566)	1.339*** (0.194)	0.479** (0.207)
RLZB	0.152** (0.065)		
SCCB		0.000** (0.000)	
CXNL			0.000*** (0.000)
DE * RLZB	0.777*** (0.171)		
DE * SCCB		-0.000*** (0.000)	
DE * CXNL			0.000*** (0.000)
N	72	72	72
R ²	0.5056	0.4574	0.6626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内为 *t* 统计量,[] 内为 *P* 值。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选取 2013—2020 的省级面板数据,将研究尺度聚焦在黄河流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与机制,采用了熵值法来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并运用系统 GMM 模型、调节效应模型来验证影响效应与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黄河流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显著正面影响。在样本数据期内,人力资本、企业生产成本、创新能力都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继续推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深入融合制造业产业升级。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明确路径,我们要合理运用如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制造业发展赋能,科学规划智能制造产业格局,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由低劣模仿向高品质“智造”转变。大力发展航空航天高科技装备、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由过去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向高质量、高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稳步迈进。

第二,国家政府统筹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格局。

黄河流域各级地方政府在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方面应高度重视,要抓住信息化发展的数字红利。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自东向西、自南向北逐级减弱的特征,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等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同时,黄河流域地区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数字经济是黄河流域增强自身数字经济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关键途径。国家在巩固东部、南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基础上,要适度推进数字生产要素资源和相关支持政策向黄河流域地区倾斜,同时各级政府当以数字化推动制造业升级为优先,不断改善企业转型发展的营商环境。

第三,加强企业自主创新,将高素质人才与高水平数字化技术相结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球新冠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美竞争达到白热化阶段的大背景下,制造业数字化快速增长对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所需的技术人才大大增加,要鼓励职业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开设数字化制造复合专业,扩大培养规模,加大数字化技术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力度。与海外一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合作,设置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实践课程,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重视企业技术研发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营造有利于制造业数字化创新的良好环境,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参考文献:

- [1] 胡士华, 黄天鉴, 王楷.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 时空分异、动态演进与收敛特征[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2(9): 3-19.
- [2] 余姝, 樊秀峰, 蒋皓文.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的影响: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视角[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1, 36(2): 16-27.
- [3] 史宇鹏.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路径与建议[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6): 34-39.
- [4] Martinez - Caro E J, Cegarra - Navarro J G, Alfonso - Ruiz F J.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Digital Organisational Cultur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0, 154(5): 1-10.
- [5] 廖信林, 杨正源. 数字经济赋能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效应测度与实现路径[J]. 华东经济管理, 2021, 35(6): 22-30.
- [6] 郑琼洁, 姜卫民. 数字经济视域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基于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1): 137-149, 244.
- [7] 吴传清, 张诗凝.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2): 75-82.

(下转第 39 页)

论我国城市养老服务的发展趋势与路径选择

祁雪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 郑州 451464)

摘要: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相比于农村,城市对于需求不能满足的痛感更为强烈,也更加显性化。养老服务提供是社会福利的一个种类。国家选择不同的福利理论就会构建不同的国民福利类型,养老服务体系受到福利类型差异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我国养老服务福利性还比较低,是一个需要不断扩展的概念,这与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福利收缩的政策方向相反。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需要转变政府意识,强化政府的福利责任观。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整合资源和融合服务是关键。

关键词:城市养老服务;发展趋势;路径选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06

中图分类号:C913.6;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28-06

受1962年至1975年“婴儿潮”的影响,2022年前后我国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研究显示,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老人人口抚养比”^①将逼近50%,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四化叠加”日趋明显,养老服务需求激增。而我国总体上养老要素还没有充分准备,体系构建和各项保障尚未完成,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相比于农村,城市对于需求不能满足的痛感更为强烈,也更加显性化。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自此发展养老服务成为国家战略,政府支持力度在逐年加大。但是在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澄清,把握趋势,优化路径。

一、先期老龄化国家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历史进程

养老服务提供是社会福利的一个种类。国家选择不同的福利理论就会构建不同的国民福利类型,养老服务体系受到福利类型差异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先期老龄化国家福利体制经历了福利提供以家庭为主到以国家为主,再到多方共担的

发展历程,养老服务提供也相应地随之发生了阶段性变迁,与国民福利呈现正相关关系。另外,也可以根据历史进程,把养老服务提供的发展变化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分别对应家庭为主、国家为主和各方共担。

(一)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理论的发展变化

先期老龄化国家在福利理论变迁方面不约而同地经历了福利家庭主义到福利国家主义再到福利多元主义的变迁,相应的,养老服务提供也经历了家庭化、去家庭化(机构化)到再家庭化(社区化)的变迁,再家庭化与之前阶段的家庭化有了明显区别。福利家庭主义是前工业时代历史的惯性传承,无需多言。福利国家主义奠基于工业化带来的国家富裕和妇女进入工厂劳动导致的家庭养老照料难以为继。国家福利具体的类型,根据要素结构和要素占比,或者说福利来源模式,还可以分为保守主义型、社会主义型、自由主义型,以及不同的混合类型。^[1]保守主义模式福利程度最低,强调通过自然社会契约解决养老问题,将特殊家庭作为主要帮扶对象,属于补缺型。社会主义模式福利程度最高,保障养老

收稿日期:2022-08-10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法治保障研究”(2022BFX014);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城市养老服务居家社区机构融合发展研究”(22A27)

作者简介:祁雪瑞(1963—),女,河南安阳人,哲学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老龄化,养老服务。

家庭整体福利,属于普惠型。自由主义模式福利程度中等,以贫困线为基准提供养老福利,兼具补缺和普惠特征。

(二)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变迁历程

福利国家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过渡时间少则40多年,多则160多年,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上遵循着“家庭化—机构化—去机构化—社区化”的变迁路径发展。与此相对应,可以将先期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服务体系变迁历程划分为基本保障阶段、发展探索阶段和多元整合阶段。^[2]基本保障阶段的目标是“大覆盖,保基本”,发展探索阶段的目标是“调结构,扩内容”,多元整合阶段的目标则是“精服务,重质量”。

在基本保障阶段,养老压力较小,各国均采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并制定了养老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发展探索阶段,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老年人家庭照料资源不足。女权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促使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老年照料需求和照料责任分担问题,养老功能逐渐从家庭转向社会,养老服务开始呈现明显的机构化特征。在多元整合阶段,因为“福利国家主义”捉襟见肘,加之机构化模式非人格化的照顾弊端显现,一些国家开始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养老服务逐渐从“权威型资源依赖”向“市场型资源调配”转变,去机构化和社区化逐渐成为政策追求。

二、先期老龄化国家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经验启示

先期老龄化国家殊途同归,以法制和文化为引领,以“家庭友好”为原则,注重性别平等与代际均衡,构建了多系统、多渠道和多主体的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其家庭养老公共政策以经济支持、就业支持、信息支持与喘息服务等多元内容平衡家庭整体福利。这些国家基本形成了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兼有政府兜底、市场主力、社会补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供给模式。2002年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申明,促进发展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制度完备立法养老服务规范化

先期老龄化国家都走过了养老服务法治化的道路。通过强化立法,建立各种制度形成制度体系,使养老服务体系呈现出高度规范化与职业化的特点。比如,日本系统出台了《老人福祉法》《国民年金法》《老人保健法》《介护保险法》等法律规范,养老服务供给整体架构合理,服务标准完善。尤其是

在养老服务职业教育制度中规定从人类哲学的高度进行伦理教育,是最宝贵的经验所在。

(二)强调家庭友好平衡家庭整体福利

先期老龄化国家面对家庭养老困境均表现出了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亦主动承担家庭养老中的国家责任。“家庭友好”原则是许多先期老龄化国家制度建设遵循的首要原则,把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为其增权赋能,强调性别平等与工作家庭平衡,为整个家庭增加福利。一方面对家庭养老进行直接的支持,另一方面构建支持家庭养老的多元行动体系,进行间接帮扶。在国际条约方面,《维也纳国际老龄行动计划》《老龄问题宣言》《马德里国际老龄行动计划》均强调公共政策支持家庭养老的重要性。

(三)养老金替代率倒挂消除贫富差距

公共养老金是由国家担保的养老保险。1889年德国《劳工老年残疾保险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养老金制度。各国公共养老金给付的政策,逐步趋向于缩小群体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比如,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成立之初即为全国统筹管理,对低收入者的工资替代率大约为60%,对中等收入者的替代率大约为45%,对高收入者的替代率才不到30%。^[3]瑞典的养老待遇给付由工资最高的15年参考改为整个工作期间的平均工资参考,制度中增加了缩小养老金差距的导向。贫富差距大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的社会,所以公共政策都要着力缩小差距。

(四)行业发展向竞争性市场化转变

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从主要向非营利组织外包服务的社群主义倾向逐渐向竞争性招标转变。比如,瑞典政府购买中约87%的老年照料服务是地方政府向营利企业购买而来,仅有13%的老年照料服务是地方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而来。在所有私营养老机构中,营利企业所有的养老院占86%。^[4]英国和美国也是这种市场化导向,只是程度有所差别。

三、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现状及瓶颈

城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遵循经济和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同时受政治和文化的影 响。我国的城市养老服务也经历了家庭化到机构化的过程,目前正在做实社区养老、支持居家养老,向对象精准化、服务体系化和机构层次化方向发展。纯粹机构养老的地位由“支撑”转变为“补充”,主要服务失能的老年群体。做实社区养老困难很多,存在财政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信息平台缺少、主体各自为战等问题。

(一)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历史进程

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国家统揽型向单位主导

型再向国家主导型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强调国家对社会福利承担基本责任的同时,也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及社会组织、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力量。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由国家全面保障到单位集体保障再到社会保障的三个发展阶段,同时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过程经历了基本保障期,正在向全面服务期和快速发展期过渡。

2000年民政部等颁发的《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提出:要建设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首次用“养老服务体系”替换了“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表明养老服务的属性已经超越单一的福利性范畴而开始具有多元属性。之后又把“机构为支撑”变更为“机构为补充”,开始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

(二)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现状水平

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约5000万,占老年人口19%左右,是养老服务消费的主要群体。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多,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比例也在逐步加大,按照国际公认的失能老人1:3看护比标准,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巨大。我国城市老年人群体以居家养老为主,占比90%以上,当下居家养老群体接受家庭以外的服务占三成左右。家庭养老是在家庭内部解决养老需求,居家养老是在社会服务支持下的家庭养老,是局部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所需的服务并不局限于社区,而是依赖建立在个人、家庭、社区、政府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全面服务体系。

2019年到2020年,是我国人口由正增长(+0.84‰)转变为负增长(-0.78‰)的转折年,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超过14%的节点^②,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5]到2019年12月底,我国共有各种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20.4万个,养老床位775.0万张,老年人养老床位比例达到3.05%。

总体来说,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还不尽人意,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难以满足多元化、大数量的养老需求,养老服务业的基本面仍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养老产业化市场化机制远未建立健全,高端养老项目被迫调整目标人群,有些成为问题项目,有些项目规划迟迟无法落地。故我国在养老业方面的探索与改革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中部地区的调研来看,城

市社区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低,满意的占30.8%,不满意的占69.2%。^[6]

(三)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主要瓶颈

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有很多,择其要者,一是作为主导者的一些政府领导对养老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工作排序落后,二是财政投入不足造成养老设施规划目标一改再改,三是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能力不足难以促进产业发展。

地方领导重视不够。地方领导的考核压力主要是经济建设压力,养老服务供给并非是关键指标,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的不重视,严重制约了养老服务供给的发展程度。曾经有某省主管领导把地方规划的年度养老设施建设目标给忘记了,快到年底了经人提醒才突击布置相关工作。领导的重视度和考核的内容设置投射到职能部门,表现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滞后,民政部门、卫生健康部门、人社部门之间缺乏横向信息沟通,联合发文量和联合行动数仍然不足,服务合作存在较多障碍。^[7]

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充足的公共资金供应是养老服务福利性的根本保证。即便是在慈善氛围较为发达的国家,养老服务的资金也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比如,英国养老服务的资金基本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日本养老服务资金中的70%来自财政支出。我国养老相关财政资金来源主要是预算外的彩票收入,除了总量不足还具有不稳定性的弱点。尽管民政部规定福利彩票收入“用于养老服务方面不低于80%”,但是由于收入不稳定导致支出不稳定,难以做规划。

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能力不足。我国8000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月平均2200多元,一般县城公务员的退休金也是3000元左右,以养老券、高龄津贴为主的政策工具补助力度较小,尚不足以支持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2022年某省会城市社区大食堂,在政府停止发放免费的餐券以后,即使仍然对老年人八折优惠,却是应者寥寥,老年人消费能力可见一斑。

四、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未来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养老服务需求的种类、数量和层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养老者的需求结构,已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对养老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供给主体渐趋多元

随着政府把支持养老服务的力量从机构转移到社区,必然出现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来满足多层次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提升居家养老服务的

社会化程度。为此,需要在多方供给主体的背景下进行各方主体的紧密协作,从而达到机制运行有效并实现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的最大满足。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整合资源和融合服务是关键。

(二)福利含量逐步增加

我国育幼曾经有过普惠性的单位福利,养老却几乎没有过任何普惠性的举措,国家和集体都是只针对特殊困难群体进行保障。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福利性需要不断扩展,这恰与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福利收缩的方向相反。特别是独生子女国策导致的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少子女老人,更需要养老福利的支撑和补偿。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需要强化政府的福利责任观,提高财政赡养比,使养老服务福利含量越来越多一些。

五、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原则

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需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动员,需要制度、设施、队伍等各要素相互支持构成协作融合的服务体系,需要以法治化促进专业化。

(一)政府主导其他主体协同的系统化发展原则

政府在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制度建设、规划布局、财政投入、监督协调等。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的构建是各要素的有机融合,政府主导的目的是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引导和监督体系的良性运转,保护老年群体权益。政府可将引导目标分为三个层次:初级目标是配置,根据需求配置资源;中级目标是合作,引导各服务机构实现需方的信息资源共享;高级目标是协作,引导供方发挥各自专长共同提供综合化养老服务。

(二)由供给主体多元化达至供给内容扩展原则

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国内外实践证明,供给主体的单一化会成为供给内容扩展的桎梏。所以,要想扩展供给内容,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必须走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道路,引入竞争和创新的机制。比如,英国和日本的老年福利设施政府直接提供的只占20%,由社会和市场组织提供的占80%。美国政府只直接保证低收入者住房和基本医疗,并着重于信息平台建设,老年人的住房、社交、养老费用等详细信息都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询,其余的都交给市场。

(三)完善法律制度促进养老服务专业化原则

法律制度是硬约束,是型塑行为习惯的准绳。

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法律太少,主要靠政策和文件推动,无后果责任承担,硬约束不足。观察世界,国外普遍重视养老方面的法制建设,制度约束力强执行到位。为此,我国需要制定《老年人服务公共投入法》《老年人服务监督法》等涉及老年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门法律,还应制定《老年人照料者支持法》等法律法规,为老年人照料者建立照料津贴制度和带薪休假、喘息服务等其他支持制度,弥补因照料而产生的收入损失,协助其从身心疲惫中恢复。

六、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途径选择

我国当下城市养老服务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政府财力能承受、社会力量愿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养老服务机制,是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此,需要围绕“保基本、优体系、通堵点、强管理”的目标,整合资源,凝聚力量,融合服务。

(一)支持家庭提升养老照护能力

家庭所承载的物质和精神养老功能比其他任何社会机制都不可替代的,是人性和血缘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应该承担全部养老照护劳务和资金。支持家庭提升养老能力中的经济支持政策,也是提升家庭的养老服务购买能力。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养老服务的购买者仍然是家庭,家庭养老照护应该社会化、薪资化和货币化。

提升支持家庭养老制度的法治化水平。目前居家养老面临很多困难,所以政府对居家养老的支持需要法治化的硬约束来保障。2013年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次把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法律化,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但是该法不是养老服务的专门法律,更难以细化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少数地方出台了《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以地方性法规规定了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与保障、监管与法律责任等,还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来促进相关工作的法治化。需要研究制定《家庭照料法》并强调地方立法配套的及时性,强调养老家庭的权利义务、政府保障责任和社会支持挖潜,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规范家庭养老,化解不同政策间的相互制约与冲突,全方位覆盖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器具支持等。应将家庭养老照护者类比于个体护理人员,进行法律定位,承认其家务劳动的社会性,提升其照护老人的专业性。

以发展型家庭理念促进家庭养老能力提升。目前,我国家庭向上赡养功能弱化与向下抚育功能增

强的现实,呈现出家庭内部代际资源分配失衡现象,尽管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对人类整体有利,但是从代际公平的角度来说对老年人不公,也有悖于老年友好的社会趋势。发展型家庭理念以预防为主,投资家庭,帮助家庭提升行使责任的能力,避免家庭捉襟见肘出现养老和育幼的矛盾,能增进家庭和谐。应从促进家庭成员全面发展的角度构建政策体系,既突出“老年人视角”,又增加“照料者视角”和“性别视角”,以整个家庭为服务对象,平衡家庭整体福利。比如,每年每个家庭可申请若干天远程工作,强制带薪家事假等,社会法要以恢复家庭功能为要旨,要与家庭法相协调。

(二)挖掘社区养老服务多元潜力

社区是家庭之外老年人生活的第二空间,社区养老服务具有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两类功能。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重要的是便利性和多样性追求。学者童星认为,政策实践偏向“社区办机构”是错误的,社区应该是一个链接各种养老资源的平台。^[8]

建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辅助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由正规服务、社区志愿者及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支撑。有学者提出“三社联动”的构想,即社区、社会组织 and 社工三方主体联合形成资源共享和多元协同的工作机制,通过三者间的协调配合,促使社区养老渠道更加多元。根据联动的机理,“三社联动”可划分为“主体联动”和“要素联动”两个层面。^[9]重庆的社区养老服务建设经验,是形成“中心带站”联合体,“机构建中心带站点进家庭”的“链网式”服务供给模式,促进了养老服务业专业化、规范化、连锁化和品牌化发展。郑州市的特点是一区一品牌,政府支持资深养老企业带动一个行政区的养老服务。

鼓励发展社区居民互助式养老。在我国专业性正式性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互助型养老通过挖潜可以满足一部分养老服务需求。应充分发挥非正式资源在居家老年人生活中的作用。通过成立老年互助社、设立“时间银行”、颁发“关爱老人荣誉证书”等形式,鼓励社区居民邻里互助,鼓励健康老年人服务高龄需要陪伴和其他半自理的老年人,倡导年轻人结对帮助老年人,支持老年人结伴互助养老,帮助社区内空巢老人结对子,采取多帮一、一帮一或一帮多等互助模式。鉴于社会成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社会信用度不足,“养老时间储蓄”制度应着力于全国统筹,给予储蓄者确凿的储蓄证明,便捷的支取程序。考虑到财政匮乏、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缓慢造成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有必要制定《社会服务时间储蓄法》,大力推动该项特殊的互助制度。

(三)完善养老服务层级分工合作

城市养老服务应该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多层级服务体系。中央政府把握方向、指引立法和建设制度,省级政府负责医疗健康与住房服务,市级政府负责规划分配辖区养老服务。养老服务费用支出比例,理想状态可以是40%来源于地方税收,30%来源于国家税收,30%个人支付。^[4]层级养老服务,设施和组织都要齐全,给介护老人设置家庭养老床位,居民小区单独或者联合建设养老服务站,社区建设养老服务中心,街道建设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解决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难以解决的问题,每个行政区建设养老服务培训指导中心负责组织培训、统筹指导全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四)面向市场购买服务注重效益

目前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方式,有面向供方和面向需方两种。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可分为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即市场主体。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养老服务是通行做法,这是养老服务产业化、市场化之前的历史传承,现在已经到了改革的历史节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应逐步转向市场主体。在目前养老服务业仍然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阶段,应逐步弱化非企业的事业功能承担,寓事业于产业,根据养老服务内容分类购买,逐步把补贴供方转向补贴需方,给予老年人更多的服务选择权,同时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引导养老服务业更程度的市场化,丰富供给。

(五)养老服务职业培训伦理优先

养老服务职业伦理养成,是养老服务供给的第一要务,也是业界长期的痛点,需要树立爱心比技术更重要的职业理念。2022年6月份发生百岁老人在养老院被床上约束带反复约束多日至死事件,视频显示,无论老人如何挣扎反抗,想尽办法逃脱,工作人员始终机械冷漠,理由是为了防止老人掉床摔伤,可见这是他们的常规操作,看护规定是如此。安全措施不当,无视老人感受,观者无不悲叹,对机构的诟病和恐惧油然而生。笔者缘于此事特意与资深养老服务企业家探讨,她认为问题出在员工培训上,培训内容普遍偏颇,重技能轻伦理,重业务轻道德。养老服务技术不高深,关键是爱心。应形成以尊重人权、尊严养老为核心的职业伦理观。尊重老人意愿,制度以老人为本位,是养老服务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那么,应在培训内容中强调伦理,在日常管理中考核伦理。鉴于我国的养老服务护理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特点,在进行职业伦理教育时需要贴近她们的生活样态和理解力水平。

日本养老学科创始人之一的井上千津子教授认为:即使到了老年痴呆的程度,也应该保障作为人的尊严直到生命的终结。受此理论影响,日本福祉士培养强调以尊重人权为核心的职业伦理观,在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同时注重维护其尊严。日本厚生劳动省规定的福祉士教育包括对人类及社会的理解、专业知识与技能、演习与实习三个方面,其中“对人类与社会的理解”是必修内容,通过哲学熏陶,培养学生的职业伦理观念,超脱繁杂劳务滋生的厌烦,从内心生发对老人的爱意。

(六)科学探索智能养老

通过搭建虚拟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和各种终端 App,构建高效便捷的养老产品与服务输送体系。主要包括远程虚拟养老、远程医疗诊断、智能公共服务等,以“常规服务+定制服务”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和差异化服务需求。我国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在关注家用机器人的项目,计划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购买家用机器人服务生活。家务劳动、康养护理机器人,已经纳入不少老年人的养老规划。

帮助老年人提高参与智能生活的能力。2021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互联网网民占网民总数的11.2%,只有约6.9%的高龄老人社交信息的获得是通过智能手机,其余途径都是传统的口耳相传。是否会正常使用智能机成为老年人参与智能生活能力的体现,老年人参与智能生活从手机使用逐步扩展,这需要专门的培训和他人的帮助。

注释:

- ①指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 ②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标准,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7%,即被视为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参考文献:

- [1]谷甜甜,张建坤,李灵芝,等.典型福利国家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历程对比及启示[J].经济体制改革,2017(3):158-163.
- [2]张京唐,陆宇.多元化供给:国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历程变迁、经验模式及实践启示[J].行政科学论坛,2022(4):27-33.
- [3]杨良初,孟艳.对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安排和变迁的思考[J].财政科学,2018(7):123-129.
- [4]钟慧澜,章晓懿.从国家福利到混合福利:瑞典、英国、澳大利亚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道路选择及启示[J].经济体制改革,2016(5):160-165.
- [5]翁曼萍,何世鼎,翁东东.老龄社会背景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借鉴日本“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及其运行机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2,39(3):28-38.
- [6]龚志文,李丹.从模式到服务:城市社区养老认知的重构:超越养老模式,从养老服务的角度深化养老服务体系[J].河南社会科学,2020,28(11):115-124.
- [7]孙佳慧.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趋势分析[J].人力资源开发,2021(10):65-66.
- [8]童星.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应对老龄化[J].探索与争鸣,2015(8):69-72.
- [9]孟宪红,张晨明.“三社联动”视域下社区养老服务经验探索:基于北京M社区的研究[J].社会福利(理论版),2021(3):50-5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Path Selection of Chinese City Service for the Aged

QI Xuerui

(Institute of Law,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1464,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service for the aged is quite prominent. Compared with rural areas, the pain of unsatisfied demand in cities is more intense and more obvious. The provision of old-age service is a kind of social welfare. Countries choose different welfare theories to construct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al welfare. The service system for the aged is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ce of welfare types and presents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tes. The service for the aged welfare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is a concept that needs to be expanded constantly, in contrast to the policy direction of the previous aging national pension welfare contraction. To develop urban endowment service,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government consciousness and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welfare responsibility view. In the specific path selec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vices is the key.

Key words: city service for the aged; development trend; path selection

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路径研究

杨 健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教务处,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对已有产业融合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择了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作为测度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度的基本模型。从产业规模、经济贡献、市场规模3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对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评。通过对相关统计数据的搜集、整理,测算出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度在考察期内一直处于失调的状态。在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外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路径及保障措施。

关键词:河南省;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融合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07

中图分类号:F592.7;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34-06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平稳放缓的新常态时期,旅游产业的发展瓶颈和市场饱和情况日益凸显。作为一个关联性极强的产业,旅游产业如何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满足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就成了一个现实命题。

2004年开始出现公开发表的文旅融合的文章,直到2010年只能说仅有零散学术成果公开发表。自2011年起,学术成果出现倍数增长,2019年为文献成果最丰硕的一年,公开发表文献达284篇。在文献来源上,核心期刊125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44篇。有关河南省文旅融合研究的文献中5篇是关于河南省文化资源和乡村旅游融合的研究,现有的16篇文献均为从理论层面、定性角度对河南省文旅产业融合进行对策探讨,缺乏对河南省文旅产业发展历史数据的梳理以及定量测评。

二、河南省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及模型

(一)河南省文旅资源赋存

河南省一直有“地下文物资源全国第一、地上

文物资源全国第二”的美誉。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南省的文化旅游资源不仅在量上位居全国前列,在质的方面亦引人瞩目。河南旅游资源赋存好、品质高,但在贡献旅游经济发展方面则各不相同。

在世界级旅游产品方面,河南省拥有5处世界文化遗产、4处世界地质公园、1处国际生物圈保护网和1处世界体育活动基地;国家级旅游产品包括13处5A级旅游景区、8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个世界级旅游节庆活动、1个世界级赛事和9个国家级的节庆活动。

根据河南省文物局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底,河南省共有各类博物馆348座。其中河南省地质博物馆于2021年更名为河南自然博物馆,并荣列河南省首家国家自然博物馆,同时拥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等26个科普基地称号。

张春香对河南省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梳理,总结出河南文化旅游资源有3主类、10亚类,并把河南文化旅游产品进行了定性评价,她指出河南省“静态产品底蕴雄厚、动态产品百花齐放”,具备“资

收稿日期:2022-09-26

基金项目:2021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三新’视域下河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222400410270);2022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河南省特色小镇发展效率研究”(22B790015);2021年度郑州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南省旅游扶贫效率研究”(zks202102)

作者简介:杨健(1982—),男,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务处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市场营销。

源数量多、单体种类全、游憩价值高、时间跨度长、天地人合一”等优势。^[1]

(二) 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及模型

1. 评价模型选用

梳理有关产业融合研究成果, 选用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作为测度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度的基本模型。

$$C = \sqrt{(u_1 \times u_2) / [\prod (u_1 + u_2)]} \quad (1)$$

$$u_i = \sum_{j=1}^n w_j u_{ij}, \sum_{j=1}^n w_j = 1 \quad (2)$$

$$u_{ij} = \frac{x_{ij} - \min x_j}{\max x_j - \min x_j} + 0.01 \quad (3)$$

其中, C 为融合度指数; u_1 为河南省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价值; u_2 为河南省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价值。 w_j 为第 j 项评价指标所占权重; x_{ij} 为第 j 项评价指标在 i 年的原始值; u_{ij} 为 x_{ij} 无量纲化后的标准值并利用加 0.01 而进行非负化处理, 从而消除各指标原始值不同单位的影响。

对于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有效性利用协调度进行评测, 其计算公式为:

$$D = \sqrt{C \times T} \quad (4)$$

$$T = \alpha u_1 + \beta u_2 \quad (\alpha + \beta = 1) \quad (5)$$

其中, D 代表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的协调度指数。 T 代表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综合评价价值, 反应二者之间的发展中的整体协同效应。 α 和 β 为相关参数。根据张琰飞和朱海英^[2] 以及王永明和马耀峰^[3] 的研究成果, 将 α 和 β 值分别设定为 0.5, 并把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耦合程度划分为 10 个等级(表 1)。

表 1 产业耦合发展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度 D	等级	协调度 D	等级
0.00 - 0.09	极度失调	0.50 - 0.59	勉强协调
0.10 - 0.19	严重失调	0.60 - 0.69	初级协调
0.20 - 0.29	中度失调	0.70 - 0.79	中级协调
0.30 - 0.39	轻度失调	0.80 - 0.89	良好协调
0.40 - 0.49	濒临失调	0.90 - 1.00	优质协调

2. 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 本项目从产业规模、经济贡献、市场规模 3 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对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评。根据全面科学、合理可比的原则进行二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并依据评价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原则构建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2)。

表 2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度评价指标

产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旅游产业	产业规模	旅行社数	家
		4A 级以上景区数	家
		星级酒店数	家
		旅游业从业人员数	人
	经济贡献	旅游总收入	亿元
		国内旅游总收入	亿元
		旅游创汇	百万美元
市场规模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	%	
	接待国内游客数量	万人次	
文化产业	产业规模	接待入境游客数量	万人次
		艺术表演团体	个
		文化馆数	个
		博物馆数	个
	经济贡献	图书馆数	个
		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	人
		文化产业经营收入	亿元
	市场规模	文化产业增加值	亿元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数	万人	万人次
		文化馆参观人数	万人次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		万人次	
图书馆总流通人次		万人次	

查阅历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 结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等相关部门公布的公开信息, 整理评价指标历年数据, 鉴于统计口径发生变化、统计指标调整、数据可得性等因素, 本项目选取 2014—2019 年度指标对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度进行测评, 并对表 2 中“旅游业从业人员数”“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文化馆参观人数”三项指标进行删除。可得河南省相关指标原始数据(表 3)。

(三) 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度计算

依据公式(3)对表 3 中河南省相关指标原始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表 4)。

由此, 根据表 4 数据, 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可得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各年份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表 5)。

(四) 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评价

1. 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表 3 计算结果及图 1 可知, 河南省旅游产业在考察期内基本保持逐步平稳上涨的发展势头, 在 2014—2019 年间, 其综合评价水平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39.72%。河南省文化产业在考察期内发展上下波动很大, 整体出现两谷值(2014 年 0.1542, 2016 年 0.2097) 和两峰值(2015 年 0.3856, 2018 年

0.7945),对比考察期末和起初值,河南省文化产业总体是呈现上涨趋势,总之,河南省文化产业在考察期内是在波折中前进。这与2016年河南省艺术表演团体、图书馆、博物馆数量都有所下降而2018年艺术表演团体在国内演出参观的群众人数有关。考

察期内的文化产业综合发展年均增长率为29.09%,相较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年均增长率方面低了10.63%。2014—2019年间,在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9年均表现出文化滞后的发展格局。

表3 河南省2014—2019年各评价指标原始数值

二级指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旅行社数/家	1167	1156	1178	1199	1137	1156
4A级以上景区数/家	126	137	146	159	178	185
星级酒店数/家	557	545	520	532	432	406
旅游总收入/亿元	4366.2	5035.29	5764.06	6751	8120.21	9605.67
国内旅游总收入/亿元	4322	4982	5703	6685	8052	9517
旅游创汇/百万美元	725.3	849.48	895.42	981.82	1033.62	1304.01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12.50	13.61	14.35	15.01	16.90	17.70
接待国内游客数量/万人次	45642	51621	58013	66204	78261	89803
接待入境游客数量/万人次	227.2	268.29	293.95	307.32	321.73	351.47
艺术表演团体/个	173	173	171	171	174	171
文化馆数/个	205	206	205	206	206	205
博物馆数/个	246	268	283	335	335	346
图书馆数/个	157	159	158	158	160	164
文化产业经营收入/亿元	2741.79	3179.69	3580.89	3617.17	2277.06	2357.47
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	984.66	1111.87	1212.8	1349.23	2142.51	2309.63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2.85	3	3.01	3.01	4.29	4.5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数/万人次	11110.21	19415.69	11994.32	15047.97	17405	20174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万人次	4531.5	4727.55	4964.14	5542.75	6040.11	6429.16
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万人次	1968.08	2233.16	2538.7	2950.86	3360.15	4295.2

表4 2014—2019年河南省各指标权重及标准化值

二级指标	权重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旅行社数/家	0.0986	0.4939	0.3165	0.6713	1.0100	0.0100	0.3165
4A级以上景区数/家	0.1133	0.01	0.1964	0.3490	0.5693	0.8914	1.01
星级酒店数/家	0.0996	1.01	0.9305	0.7650	0.8444	0.1822	0.01
旅游总收入/亿元	0.1294	0.01	0.1377	0.2768	0.4652	0.7265	1.01
国内旅游总收入/亿元	0.1297	0.01	0.1370	0.2758	0.4649	0.7280	1.01
旅游创汇/百万美元	0.1105	0.01	0.2246	0.3040	0.4533	0.5428	1.01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0.1092	0.01	0.2229	0.3665	0.4920	0.8552	1.01
接待国内游客数量/万人次	0.1265	0.01	0.1454	0.2901	0.4756	0.7486	1.01
接待入境游客数量/万人次	0.0832	0.01	0.3407	0.5471	0.6547	0.7707	1.01
艺术表演团体/个	0.1377	0.6767	0.6767	0.0100	0.0100	1.0100	0.01
文化馆数/个	0.1362	0.01	1.0100	0.0100	1.0100	1.0100	0.01
博物馆数/个	0.0614	0.01	0.2300	0.3800	0.9000	0.9000	1.01
图书馆数/个	0.0902	0.01	0.2957	0.1529	0.1529	0.4386	1.01
文化产业经营收入/亿元	0.0806	0.3568	0.6835	0.9829	1.0100	0.0100	0.0700
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	0.0983	0.01	0.1060	0.1822	0.2852	0.8839	1.01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0.1301	0.01	0.1009	0.1070	0.1070	0.8827	1.01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数/万人次	0.1076	0.2374	0.1552	0.1844	0.1612	1.0100	0.01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万人次	0.0802	0.01	0.1133	0.2380	0.5429	0.8050	1.01
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万人次	0.0777	0.01	0.1239	0.2552	0.4323	0.6082	1.01

表5 2014—2019年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耦合度评价

年份	u_1	u_2	发展类型	耦合度 C	协调度 D	等级
2014	0.1573	0.1542	文化滞后型	0.1574	0.1566	严重失调
2015	0.2770	0.3856	旅游滞后型	0.2265	0.2739	中度失调
2016	0.4081	0.2097	文化滞后型	0.2100	0.2547	中度失调
2017	0.5850	0.4258	文化滞后型	0.2801	0.3762	轻度失调
2018	0.6175	0.7945	旅游滞后型	0.3326	0.4845	濒临失调
2019	0.8375	0.5527	文化滞后型	0.3256	0.4757	濒临失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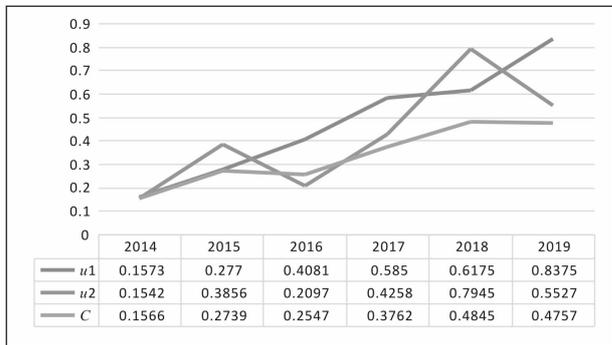


图1 2014—2019年河南省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

2. 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由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耦合度计算结果及绘制的图1可知,河南省文旅产业耦合度虽然在考察期内在逐渐加强,但整体协调度不理想,基本表现在失调程度,从严重失调逐渐优化至濒临失调的阶段。说明随着文化和旅游在行政管理上在2018年完成合并,在产业发展及行业实践上,河南省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也在2018年得到了较高的提升,但最终在考察期末也仅是达到0.4757,说明,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良性协调与互动发展存在较大不足,在未来的发展中,需下大功夫深挖二者在融合模式、产品形态和产业形态的创新,从而达成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在发展上的水乳交融,形成真正的文旅产业,而不是简单的打着文化口号的旅游业或者冠以文化名义的旅游演艺娱乐。

三、影响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因素

纵观河南省从宏观政策到实践运营,结合对产业融合评价因素的各项指标,可以总结归纳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不良的相关因素。

(一) 行政管理层面上的融合不到位

随着2018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合并,河南省对文化和旅游行政体系上的合并也逐步推进并在省、市、县三个层级完成了改革。但目前仍存在诸多事项尚未捋顺的缺陷,如,文化和旅游两大部门虽然在牌子上合在了一起,办公空间合并在一起,但在业务管辖、信息沟通等方面仍属于割裂状态,仍是各管原来的“一摊事”。旅游资源牵涉政府部门多、文化资源多为横跨多个行政辖区,在发展中在行政管理上会出现因“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等观念带来的诸多掣肘。因此,必须从行政上引导文化和旅游协同融合、破除文化和旅游资源的人为“割裂”,带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 市场供给主体文旅融合意识稍欠

本项目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旅游业供给主体——旅行社、旅游饭店对文化内涵的嵌入或者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表现较为迷茫。而文化元素在旅游景区或旅游目的地运营中的应用,更多的是为了给所供给的产品披上一层漂亮的外衣。就目前来讲,依托不同文化内涵而开发的旅游演艺,也仅仅演化为一台灯光影的舞台剧,娱乐性较强,而缺乏对游客能够感受的文化价值的系统化设计与展示。

河南省作为文化大省,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及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则显得薄弱,其市场供给主体在官方统计资料主要是“艺术表演场馆与团体、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四类。文化能够洗涤人的灵魂,作为精神层面的消费品,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只有艺术表演团体下基层的一些演出,而该类演出更多的是由政府买单,并且受影响的观众不能纳入游客进行统计。博物馆则旅游化较多,但河南省300多座博物馆,真正能够发挥旅游吸引功能的为数不多,该类场馆如何活化馆藏物、开发延伸产品、通过文化创意提升其在旅游市场上的分量是河南省博物馆类文化产业主体未来的思考方向。

(三) 市场供给产品缺乏文旅融合的深度挖掘

目前河南省旅游业产品体系中,文化内涵体现较为浅层次,对其深度挖掘仍欠火候,更多的是追求旅游的经济效益。尤其是随着游客对沉浸式体验的呼声越来越强,河南省的地下文化资源丰富,利用高科技将该类文化进行展示,带动游客身临其境式的融入,将河南省优秀文化进行充分展示,丰富河南省旅游产品体系,推动文化与旅游的自然融合,是河南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需要突破的方向。另外,河南省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资源数量众多,如河南各地的地方戏曲资源等作为河南区域传统文化的载体,在整个旅游产品供给体系中毫无踪影。

(四) 文化旅游产品缺乏强有力代表性符号产品

河南省作为文化大省、旅游资源大省是得到众人公认的,但具体说到河南的文化符号或者河南省的文化形象则显得模糊不清。而河南旅游产业所总结的“古河拳根花”也仅是显示了河南文化旅游资源的丰沛,正是因为总结出来的太多了,反而缺乏了拳头型、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梳理河南省文化资源,整合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加强与旅游产业的协同融合,夯实旅游发展的文化底蕴,借旅游的翅膀,塑造清晰、明确、与众不同的河南省文化形象符号。

四、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路径及保障措施

(一)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模式

辛欣总结了旅游文化产业与产业融合的模式,共有产业一体化融合模式、产业重组融合模式、产业延伸融合模式、产业渗透融合模式四种。^[4]

产业一体化融合模式是以文化旅游产业园区为代表,通过培育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发挥其集聚和孵化功能,从而为当地旅游企业供给注入活力。如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等。

产业重组融合模式表现为通过节庆或者会展把文化和旅游融合,主要是借助节庆或者会展上的客流与信息流、物流,从而拉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如每年一度的祭祖大典的寻根活动等。

产业延伸融合模式把文创产业的价值链延长,丰富旅游产业活动,如郑州奥巴拉拉水上乐园等。通过对影视业中相关元素在现实世界进行展示,为游客开展系列体验活动项目,增强旅游的参与性。

产业渗透融合模式包括文化向旅游主动渗透和旅游向文化主动渗透两种方式。前者主要是以“禅宗音乐大典”“东京梦华”等为代表的旅游演艺项目;后者主要是焦作影视城类影视基地、文创创作基地、动漫基地等文化产业,通过组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带动该区域人气,提振市场知名度,拉升经济效果。

四种产业融合模式各有利弊,在实践中,只要是合适的、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模式就是恰当的模式,切忌墨守成规,不可陷入习惯的怪圈。

(二)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保障措施

结合对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度的定量评价,剖析各指标体系的影响,扬长避短,寻求更具针对性的保障措施,以求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融合发展上的协同效应。

1. 理顺行政管理,出台指导政策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合二为一,不能仅停留在形式上,要转变固有的思考模式与办事套路,应落在行动上,不能文化、旅游“两张皮”。从政府层面,引导文化供给主体及旅游企业之间互动,从了解到合作,逐步加深市场主体产品供给上的相互结合。同时,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对市场主体提供二者融合的方式与方法进行指导,并把主动权更多的交付给市场,消除旅游及文化行业发展中的人为“条块”障碍。

2. 提供支持,提振市场主体的融合意识

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人才建设等多方面,对大力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企业进行支持,尤其是对那些受市场欢迎、模式创新并具有市场领袖效应的企业给予奖励,通过正向激励,提振文化旅游市场上的各类企业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主观能动性,发动民间力量,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产品供给的繁荣发展。

3. 引导顶层设计,战略层面促融合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不仅仅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一个部门的事,更需要各地相关部门鼎力相助。政府不仅仅需要在政策制定、市场引导方面发力,更需要及时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为促进河南省旅游产业的长久兴旺发达,文化内涵的挖掘绝不可忽略,只有富含文化的旅游才是有生命力的旅游,文化业需要依托旅游更快实现其产业化发展。在河南省“十四五”规划、各地区域规划、旅游业发展规划和文化产业规划等内容中,应明确提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融合,从而从战略层面上促进二者的融合,再从战略到战术及具体行业实践上进行层层监管。

4. 营造市场环境,以需求助推文旅融合

市场需求是推动文旅融合的原动力。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2020年我国的扶贫事业完美收官。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国民基本摆脱基本生活物质的束缚,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旺盛并在不断提升。为促使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旅游产业市场上,也应着力培养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渴求,提升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鉴赏力,反之,助推文化旅游产品的市场供给。最终促使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供求双方的良性互动。

五、结束语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高关联性,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先天上的优势,也是河南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利用融合模型,从产业规模、经济贡献和市场规模3个角度,构建了包含22个评价指标的测度体系,对河南省2014—2019年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情况进行评估。为改善考察期内的文旅产业融合不佳的现状,河南省需要更具针对性地选择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模式,并从宏观政策、政府支持、顶层设计和市场环境改善4个方面提供相应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春香.河南文化旅游资源分类及其优势分析[J].中州

[2]张琰飞,朱海英.西南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2):16-20.

[4]辛欣.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机理、路径与模式[D].开封:河南大学,2013.

[3]王永明,马耀峰.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西安市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Henan Province

YANG Jian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in Henan from 2014 to 2019 are evaluated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industrial scale, economic contribution and market size. The result shows it is uncoordinated. Summarizing the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path and safeguard measur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Henan Province.

Key words:Henan province; cultural industry;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上接第 27 页)

[8]朱于珂,高红贵,丁奇男,等.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5):106-119.

[9]朱玮玮.双向 FDI 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33(1):110-11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WANG Shi, LI Yuan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Shaanxi 710000,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for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Recognize its regulation path based on the regulation effect model, and use the panel data of nine provin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3 to 2020 to measure the specific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nine provin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using the GMM mode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positively promot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pecifically,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the reduction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cos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capacity have all play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Yellow River Basin; GMM model; regulatory effect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公益诉讼路径研究

顾秀文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02)

摘要: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给国家、社会、个人带来科技福利的同时,也滋生出了一系列潜在应用风险。本质为“深度伪造”的“吗咿呀嘿”魔性换脸视频技术应用,给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与规制敲响了警钟。专门立法模式和综合立法模式均是随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对新的权利义务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重新思考。由于两种立法模式的政治基础、立法背景不同,立法模式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利弊。综合考量我国立法现状、技术应用等各方面因素,可以探索构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公益诉讼路径,确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引入公益诉讼制度规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风险,拓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启动主体范围,建立健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保障机制。

关键词:深度伪造;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立法模式;风险规制;公益诉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08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40-05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3月初,Avatarify应用的以“吗咿呀嘿”为背景音乐的魔性换脸视频席卷各大视频社交软件,并引起舆论热议。这一软件引发全民娱乐狂欢,许多用户纷纷感叹该技术换脸“毫无违和感”,虽然Avatarify表示,该软件主要用于大众娱乐,而非销售盈利,但是仍然有许多媒体、用户表示,“换脸视频”的制作可能存在丑化、污损他人形象,贬低他人人格,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的风险。Avatarify应用的本质,是对他人人物形象深度学习基础上的深度伪造。“吗咿呀嘿”动态视频的制作,操作简单,用户使用门槛较低,因此,软件一上架,迅速坐拥众多粉丝。用户使用这一软件,上传自己的照片用于娱乐,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用户上传他人照片,用以制作短视频,则可能存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风险,又或者,用户上传的照片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并结合3D打印技术以破解用户金融支付的生物识别密码等。“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最初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是在2017年的美国,当时,该技术被不法分子加

以变异利用,用换脸软件将色情视频中人物换成明星的脸庞,发布在“红迪网”上,一时间,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由于‘深度伪造’的技术起源与色情密切相关,因此许多深度伪造者会关注一个比较阴暗的方面便是制作名人的色情视频。”^[1] Avatarify等应用,使普通用户在没有相关技术背景的前提下,可以参与到“换脸视频”的制作当中,加速了软件的传播,但对于技术的发展,风险规制机制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是将公众的生物识别信息暴露于风险之中。

“深度伪造”,“实质上是一种声音、图像与视频的智能处理技术,能够以极度逼真的方式模仿特定人物或者让特定人物看起来在做特定的事件,以至于未经过训练的观看者通常无法辨别其真伪”^[2]。“‘深度伪造’技术最为核心的特征就在于高度真实性,以至于极其难以被发觉。”^[3]“深度伪造”的过程,是给深度学习算法,大量“投喂”目标人物的各种表情、姿态的照片,算法通过不断更新、完善数据,并经不断训练,最终生成覆盖视频人物的伪造的照片。甚至说,倘若深度学习算法在足够的生物识别

收稿日期:2022-10-03

基金项目: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数据安全的刑罚区分性保护”(22LKT0081)

作者简介:顾秀文(1995—),女,江苏东台人,东南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数据法学。

信息数据的“投喂”下,并经过训练,以“深度伪造”为原理的“换脸软件”将可以制作任何人的任何视频。“‘换脸视频’不仅将用于自我满足,而且也可能被用来敲诈、羞辱、骚扰和勒索受害者。”^[4]“随着这种‘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它潜在地可能造成一种信息无序的状态,会对原有的要求我们信任外部信息来源的个人决策或集体自治构成严重的,甚至是无法克服的挑战。”^[5]

二、比较法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规制模式及本土立法

(一)域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立法模式比较

当前,基于各国的文化背景和立法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关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典型的专门立法模式,另一种是欧盟为代表的综合立法模式。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专门立法模式,指通过专项立法的形式,系统规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相关法律属性及保护规则。这一立法模式,以美国各州的隐私法案为代表。在美国,隐私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进入21世纪以来,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最初在美国被应用于刑事侦查、国家安全等领域。自2006年开始,生物识别信息技术进一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得以民用化,并于2008年逐渐探索商业化应用模式,同年,美国通过首部《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案》。继此之后,随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应用方式不断增加,其显露于大众面前的风险形式也越来越多。2019年,美国萨默维尔、奥克兰、波士顿等地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隐私法案,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概念、权利义务关系、救济途径以及在公共场所的应用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综合立法模式,就是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作为一般个人信息的一部分,从民事、刑事以及行政法的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作统一规定。亚洲等国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规制,起步较晚,大多借鉴这一模式。欧盟于2018年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在人格权的基础上,以专门条款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予以规定,明确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属性、禁止性规定、信息主体的权利义务等,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公权力机关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方面的行政职责。

专门立法模式和综合立法模式均是随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立法者对新的权利义务主体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综合比较而言,由于两种立法模式的政治基础、立法背景不同,立法

模式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利弊。专门立法模式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群,做了详细的区分与阐述,为进一步明确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奠定了基础。综合立法模式则更加侧重对侵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后续救济,全面规定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民事诉讼、行政保护、罪行刑罚等。总而言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模式的确定,应综合考量多重复杂因素,以确立符合本国基本法律原则与立法理念的保护模式。

(二)我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立法情势介评

当前,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规制,主要散见于《民法典》《出入境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其中,涉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条款较少,立法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位阶较低,且规定的多是抽象的法律原则,并无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

就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权利义务而言,《民法典》第1034条将其纳入一般个人信息的保护范畴,适用一般个人信息的相关保护规定。而这并未凸显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独特属性,缺乏针对性。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之于一般个人信息,具有独一无二性、不可替代性、人格尊严性和泄露后的不可逆性,这些决定了仅仅适用一般个人信息的相关保护规定,只作程序性的明示告知、知情同意等规定,并不足以满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保护需求。

除此之外,法律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应用风险的规制也受制于技术本身。面部识别、指纹验证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的应用,因此法律也更侧重于对二者的保护,而有关声音信息、基因信息、虹膜信息的规定则较少,使得当前为数不多的有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规定的适用对象较为狭窄。与此同时,现行制度如《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网络安全法》等,多是针对信息应用平台、公权力机关在收集、公开披露等阶段义务的概括性规定,对于私人主体滥用他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规定则较少。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的安全性,尚未在我国得以充分论证,其应用风险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被大规模应用的情况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制度体系,明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属性、厘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国家义务、制定公权力引导下的行业运营标准、建立健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私人诉讼机制,将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应用风险规制的抽象概念具体化,让风险规制措施更具可操作性。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制度探索中,信息主体对其生物识别信息权利的享有是其关键,也是后续深度保护的核心。

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公益诉讼路径建构

(一) 确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法律体系构建,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命题。按照法律制定中“公民权利—国家义务”的基础理论框架,公民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享有受保护权,而国家则负有相应的义务。考虑到国家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中的客观功能和规制方式的不同,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可以将其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受保护权,是公民对抗他人或者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侵害其信息权益而请求保护的權利。具言之,国家机关在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中,也有可能成为信息风险源的一种。如果国家在社会治理中,侵害了个人对其生物识别信息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则个人可以请求国家停止侵害。与这一权利相对应的国家一方,则负有不得侵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消极义务。即便国家机关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不得对公民的个人生活过度干预,以避免引发公民对信息泄露的恐惧感。

随着信息电子化的推进,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采集、处理、整合方式的更新换代,以及应用场域的不断増加,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已经无法从数据网络中抽身退出。国家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消极义务,已经无法满足层出不穷的各种风险。个人需要面对的是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不确定风险,以及处于强势地位、具有系统组织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机构。鉴于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不仅是立法机关在进一步的制度供给中的前进方向,也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执行、适用相关法律制度的指导原则。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具化为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权力分支,是因为规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国家义务并非是各自独立、相互区分的,而是需要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二) 引入公益诉讼制度规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风险

随着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

非法收集、违规处理、泄露行为也日益滋生,部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正以某种隐性侵权方式,将其获取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形成规模效应,以谋求巨額的经济效益。就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技术及使用流程而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制度漏洞的可预见程度都远超个人用户,而个人用户在其生物识别信息被违规处理、失窃泄露后往往难以察觉,进而导致侵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普遍存在,个人用户维权率极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规制。

在这一背景下,个人用户的私力救济以及生物识别技术的行业自律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信息保护的诉求,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介入成为众望所归。目前,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明确列举了其所保护的各个领域,主要涉及生态环境、国有财产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药品等,但无论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还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实质上采取的都是不完全列举的形式,《民事诉讼法》第55条,以“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兜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以“等领域”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概括补充,由此可以推知,公益诉讼制度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不局限于当前所列举的领域,这也为拓展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留下了空间。这就要求无论是法理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要严格遵循立法精神,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对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进行适度的、稳妥的解释,对于能够纳入其中的案件类型予以具体分析,而不是恣意扩大理解。

数字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觉醒,提高了人们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的关注度,加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与广泛性,不仅涉及个人财产权益、人格权益,甚至国家安全利益也囊括其中,因此,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的法律救济路径的探索迫在眉睫。为避免出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领域的公地悲剧,也为了纠正政府部门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领域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促使相关部门积极作为,保障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安全,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中引入公益诉讼制度,将使这一制度的优势得以充分展现,也是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路径的有益探索。

大数据时代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理应予以重视,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纳入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也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我国立法目前尚未明确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列为公益诉讼的保护对象,对此,可以借助于具体个案的司法解释,将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拓展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领域,与此同时,对启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的程序条件予以明确。其次,发挥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的重要指示作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相关案例,推动公益诉讼制度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广泛适用,并将类似个案探索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常态化、规范化,回应科技发展中人民利益的新诉求。

引入公益诉讼制度救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逻辑起点在于其所体现的公共利益。数字时代,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往往反映在大规模的采集、储存、处理过程中,因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并不是针对特定个体用户运营的,而是在海量信息的储存、处理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公共利益。此外,大规模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数据分析还能在各个方面服务于社会公众,例如,公安部门利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追索犯罪嫌疑人、验证交通肇事者。由此可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使用已日渐突破其原本的私权属性,并更多地体现出公共属性,因此,当务之急是探索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新的法律路径,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不仅符合其制度的设立初衷,也符合诉讼的理论要求,这一救济方式的引入将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彰显出极大的现实有效性。相较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私力救济,公益诉讼制度将更符合数字时代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的现实需要。

(三) 拓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启动主体范围

关于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人民检察院可以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则规定检察机关是其唯一起诉主体。之所以设立公益诉讼制度,其基本理念是保护公共利益、保障人权以及公共参与。限定仅特定组织、检察机关为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虽有其组织机构、专业能力等方面的主体优势,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无法满足公共参与的愿望。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一旦泄露具有无法索回的永久性,民众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的关注度也持续走高,自行向法院提起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维护信息权益、规制信息风险的意愿十分强烈。推动个人用户参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推动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公益诉讼启动主体的多元化,“符合我国国家性质以及宪法基本原则的要求,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主权原则,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监督权”^[6],在国家根本法的层面上,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中个人用户的参与,提供了依据。虽然我国现行法也规定了公民可以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参与到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中去,但这一参与路径与公民直接提起诉讼相比,显然鲜少为公众所知晓,多数民众被公益诉讼拒之门外。

当前,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公益诉讼的主要起诉主体,其只有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侵害公共利益的线索时,才将履行其职责,提起公益诉讼,这一履职方式难以全方位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实际上,个人用户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日常应用中,更容易发现侵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事实,将个人用户排除在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之外,将会造成信息权利维护的遗漏。对此,我国应重视“信息主体在保障其自身信息安全的作用,发挥司法机关个案审查的功能”^[7],建立起检察机关与个人用户共同参与的个人信息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为公益诉讼的主要起诉主体,并将个人主体排除在外,虽有其制度设置的考虑,但就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现实需要而言,逐步拓宽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将更能够适应科技发展的节奏。随着公民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敏感度认知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提升,个人用户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期待能够参与直接诉讼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吸收个人用户作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不仅有助于对信息保护的事后救济,也有助于主体的行动自觉,进而不断改进其与企业或信息处理者的行为关系模式”^[8]。除此之外,还将激发公民维护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权益的热情,以免挫伤其积极性。鉴于此,允许适格的个人用户提起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逐步扩大其启动主体的范围,并根据实际情况,由检察机关支持个人用户提起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将更能体现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监督、主导地位。

(四) 建立健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保障机制

一是强化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的资金支持。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在现代电子科技产品中的应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已日渐普及。伴随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便捷性,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被滥用、泄

露、过度收集等案件也频频发生。基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自身特性,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被侵害案件的证据获取成为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的关键性难题。在传统的侵权案件中,其证据大多呈现为有形的状态,而侵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案件则跨越数据空间与物理世界,侵权人是在虚拟空间中实施侵权行为,这使得证据收集成为一大棘手的问题。由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数据获取、侵权行为监测、风险评估等证据,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中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受技术所限,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读取、处理等取证往往需要专业的计算机专家出具,由专家进行可视化的提取、呈现,而专家的聘请费用高昂,给案件的处理增添了难度。按照当前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办案模式,其经费支出多为办公费用所保障,相当有限,而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高昂的专家意见费用,将使得检察机关面临无力承担的问题。对此,地方政府可以针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建立专项的“调查取证基金”,由地方财政予以拨付。倘若最终检察机关胜诉,相关费用由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行政机关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负担,反之,则有专项基金承担,以此增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的实效性,对违法的行政机关及处理者起到警示作用。

二是优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咨询专家库。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虽熟悉法律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的相关规定,却缺乏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应用的专业知识。信息处理者针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所实施的侵权行为,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很难予以“捕捉”,因此,为补全这一短板,除需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加强信息技术知识的培训,增强其对专业技术的了解和把握外,还需借助“外脑”,由专业人员提供信息技术咨询和支持,以消除技术壁垒,缓解取证负担。实际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也受益于这一模式,譬如,2018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为进一步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的办案能力,更好地解读科学证据,率先在全国聘请8位专业人才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以组成“法律专家+技术专家”的办案团队,为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提供专业支持,但这一模式也因其聘请的专家人员绝大多数来自行政机关内部而饱受诟病。聘请“特邀检察官助理”的目的本在于弥补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对科学技术的认知不足,若仍聘请行政机关内部人士,而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似乎与制度设置的初衷相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咨询专家库的建立,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避免类似问题的产生。

我国目前公益诉讼的管辖,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特别法院管辖为例外,如若建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鉴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涉及的利益面广、数额巨大,仍应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应当由省一级的人民检察院统筹全省范围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政机关的专家学者,建立统一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咨询专家库”,保证专家来源的多样性,限定内部专家在专家库的比例,为中级人民法院在办案时,提供专家选择的广阔空间。

三是明确拒不配合调查取证的法律责任,赋予检察机关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案件中充分的调查取证权。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维权的成功与否,有赖于检察机关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之间的证据博弈,想要检察机关能够有效调取支撑证据,需要在侵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案件中赋予检察机关以充分的调查取证权。明晰违法采集、处理、传播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运营商、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拒不配合调查取证的法律责任,建立检察机关与负责规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的行政机关的联动机制。明确规定对于在诉前,检察机关进入信息处理者平台进行证据调取时,不配合、不协助,甚至给检察机关的调查设置技术障碍的运营者、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向其发出检察建议,或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只有逐步建立起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责任体系,才能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提供刚性保障。

参考文献:

- [1] 蔡士林. “深度伪造”的技术逻辑与法律变革[J]. 政法论丛, 2020(3): 131-140.
- [2] 王禄生. 论“深度伪造”智能技术的一体化规制[J]. 东方法学, 2019(6): 58-68.
- [3] Chesney R, Citron D. Deepfakes and the New Disinformation War: The Coming Age of Post-Truth Geopolitics[J]. Foreign Aff., 2019, 98(1): 147-148.
- [4] Harris D. Deepfakes: False Pornography is Here and the Law cannot Protect You[J]. Duke L. & Tech. Rev, 2019, 17: 99-102.
- [5] Blitz M J. Lies, Line Drawing, and Deep Fake News[J]. Okla. L. Rev., 2018, 71: 59-101.
- [6] 朱文韬.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机制[D].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
- [7] 孙南翔. 论网络个人信息的商业化利用及其治理机制[J]. 河北法学, 2020(7): 96-113.
- [8] 蔡培如, 王锡铤.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J]. 比较法研究, 2020(1): 106-11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下转第 52 页)

我国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之法定刑问题

——基于犯罪经济学的反思

张诗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38)

摘要:以罪责评价指数、弹性理论、博弈论等为逻辑起点,尝试分析当前刑罚结构下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罪责评价尺度、刑罚效率以及犯罪黑数大量存在的原因,并基于犯罪经济学的解释范畴对提高收买罪法定刑的两种主要争议加以诠释,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的刑事治理提供参考。在最高3年有期徒刑的范围内,当前刑罚结构对收买犯罪数量的控制缺乏弹性,收买犯罪较低的刑罚价格和惩罚概率与较高的犯罪预期收益的不匹配是导致收买犯罪高发以及不法程度评价失衡的根本原因。有限度地提高收买罪法定刑,使收买犯罪摆脱轻罪标签并促进刑罚边际威慑效果优化,同时增加惩罚概率,通过提高犯罪预期成本减少潜在的收买犯罪人,将是消解拐卖犯罪与收买犯罪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犯罪经济学;罪责评价指数;弹性理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09

中图分类号:D92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45-08

2022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再次引爆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买卖人口问题的广泛讨论,也引起了刑法学界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刑罚轻重问题的争议,形成了“维持现状论”“买卖同刑论”“有限提高法定刑”三种鲜明的学理主张^[1-3],其中最激烈的争论莫过于是否应在立法上实现买卖同刑,以及收买罪是否应与通常关联的强奸、非法拘禁与虐待等后续罪行综合评价为重罪。

一、现状审视:犯罪经济学的解释范畴

(一)罪责评价指数:提高收买罪法定刑的应然性

对犯罪的惩罚统一于犯罪预期损失的尺度,而“返还法则”是人类最基础、最原始的道德直觉。桑本谦教授将犯罪可能性、作案成功率等新的环境变量引入返还法则加以推演,提出了“罪责评价指数”算法,用以描述演化后的道德直觉,即罪行评价的依据。具体到某个危险单位,犯罪的预期损失 ELc 相当于犯罪可能性 Fc 、作案成功率 Pc 和犯罪实际损失 Lc 的乘积,即 $ELc = Pc \times Lc \times Fc$ 。然而,并非所有

犯罪都能够被破获并受到惩罚,惩罚概率 Pp 会影响惩罚的预期损失 ELp ,后者相当于惩罚的实际损失 Lp 与惩罚概率 Pp 的乘积,即 $ELp = Pp \times Lp$,且 $Lp = ELp \div Pp$ 。惩罚的预期损失 ELp 应根据犯罪的预期损失 ELc 来确定,是罪刑相适应的应有之义。在惩罚概率 Pp 小于1的条件下,惩罚实际损失 Lp 相当于 $ELp \div Pp$,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公式:

$$Lp = Fc \times Pc \times Lc \div Pp$$

$Fc \times Pc \times Lc \div Pp$ 就称为“罪责评价指数”,基于此我们可以对收买罪的罪责评价指数变量进行逐一分析,从而阐释提高收买罪法定刑的“罪刑相适应”逻辑。

首先,收买行为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大多数为蓄谋犯罪或者与拐卖行为合谋的犯罪,在达成买卖合谋的条件下,收买犯罪可能性 Fc 极高。但是,不同于拐卖犯罪是一种利润驱动的持续性伤害,大多数收买行为作为“一锤子买卖”,犯罪目的达成后,犯罪人未来继续犯罪的可能性 Fc' 就会降低。这也就

收稿日期:2022-10-06

作者简介:张诗怡(1999—),女,辽宁阜新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院犯罪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犯罪学。

解释了之所以收买行为的不法评价较低,是因为这种伤害行为在未来发生的概率较低(不包括收买后出卖的情形),因此不需要过于严厉的刑罚。

其次,收买行为的犯罪实际损失 L_c 既包括被害人的私人损失,也包括整体性的社会损失。对被害人而言,拐卖行为和收买行为在不法构造上属于共同正犯^[3],导致了同一种不法结果,即剥夺了被害女性作为人的尊严、自由、个人隐私等,同时也导致其丧失原有的生计资本、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等资源禀赋。从社会损失来看,买卖人口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是分散性的,例如健康劳动力的损失,社会安全感下降而犯罪恐惧感上升,执法司法成本的增加等。因此,不妨用双方的犯罪收益作为评估总体犯罪损失 L_c 的指标:

L_c^1 (收买犯罪收益) = 被害人私人损失 + 社会损失

L_c^2 (拐卖犯罪收益) = L_c^1 + (实际交易价格 - 犯罪成本)

由于收买犯罪的作案成功率 Pc^1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拐卖犯罪的成功率 Pc^2 ,为简化分析,我们暂时假定二者成固定比例或相等。基于犯罪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拐卖者提出的交易价格必然大于其犯罪成本,即拐卖犯罪的收益大于收买犯罪的收益,理应在刑罚严厉性上有所区分。但同时也不难看出,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的犯罪收益差值仅仅是可计算的经济所得,在此意义上,收买罪与拐卖罪的刑罚间隔相差悬殊显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提高对收买罪法定刑的不法评价具有应然性。

最后,从惩罚概率 Pp 来看,当前的司法实践显示,以收买罪定罪处罚的案件量刑普遍偏低且缓刑适用率极高,相关学术研究也同样得出非实刑率极高而数罪并罚比例偏低的结论^[2]。惩罚概率 Pp 会影响被害人、公众乃至执法司法机构对伤害行为的轻重评估,根据返还法则和边际威慑效应,惩罚概率 Pp 的高低应与伤害行为的轻重成反比,与刑罚的严厉程度成反比^[4]。综上所述,在合谋犯罪的条件下或有利于犯罪的环境中(例如村庄有买卖人口的“传统”),收买犯罪发生率(Fc)较高,作案成功率(Pc)较稳定,造成的犯罪损失(Lc)较大,且当前的惩罚概率水平(Pp)较低。收买罪和拐卖罪的法定刑差异在部分评价指标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威慑论出发,刑罚间隔过大不利于犯罪损失与惩罚损失的平衡,应提高对收买罪的威慑支出从而加强边际威慑效果,使收买犯罪的罪责评价更接近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需求弹性视角下的刑罚效率问题

严格说来,罪责评价指数公式成立的前提是令犯罪的预期损失 EL_c 与惩罚的预期损失 EL_p 相等,但除非惩罚是等价的,二者不可能完全相等而是成一个固定或变化的比例,这就会对罪刑函数曲线的斜率 k 产生影响。因此,该公式虽然简洁清晰地描述了罪责评价的依据,但未能兼顾对斜率 k 的计算和考量,更为准确的公式应该是: $Lp = Fc \times Pc \times Lc \times k \div Pp$ 。之所以强调 k 的重要性,是因为在罪刑函数 $y = f(x)$ 中, k 代表的是惩罚对犯罪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刑罚的边际威慑效果,斜率越大,惩罚对罪行加重的反应就越敏感,边际威慑的效果越显著。但是,惩罚对犯罪的敏感性是难以观察的,所以我们不妨转换视角,分析犯罪对惩罚的反应的大致规律——引入“需求弹性”视角,通过解剖买卖人口犯罪的刑法评价和犯罪数据,讨论当前收买罪刑罚结构的“弹性”。

1. 犯罪经济学的弹性理论

“弹性”在微观经济学中度量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敏感性,在犯罪经济学中可用来衡量犯罪因素对惩罚因素的相对变化的反应程度或灵敏程度,其本质是刑罚配置的效率性。需求价格弹性(以下简称需求弹性)表示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设需求量为 Q ,价格为 P ,则需求弹性 Ed 表示为:

$$Ed = \frac{\Delta Q/Q}{\Delta P/P} = - \frac{(Q1 - Q0)/Q0}{(P1 - P0)/P0}$$

公式中, ΔQ 表示需求的变动, ΔP 表示价格的变动,按照惯例通常将 Ed 取绝对值表示为正数,当 $|Ed| > 1$ 时,需求富有弹性;当 $|Ed| < 1$ 时,需求缺乏弹性。基于理性人假设,犯罪人都是理性的,会对犯罪的收益和成本作出理性的反应。波斯纳把犯罪的成本结构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购买犯罪工具的资金支出,二是犯罪时间的机会成本,三是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此处仅讨论刑罚预期成本。按照需求第一定律,当预期惩罚(商品价格)上升时,相应的罪行数量(需求量)便会下降,换言之,提高惩罚价格可以通过影响犯罪预期成本来实现减少犯罪的目的。假设在犯罪市场中,犯罪数量为 Q ,刑罚价格为 P ,加重刑罚 P 将会提高犯罪的预期成本,可能导致犯罪数量 Q 的减少。将 P 和 Q 的反比关系表示为图 1(a),又根据需求弹性理论公式, Ed 是关于 P 和 Q 的函数, $\Delta P/\Delta Q$ 为常量。在图 1(a)中,将函数以点 $(Q1, P1)$ 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图中三个特殊点由上到下依次为: $|Ed| = +\infty$ 、 $|Ed| = 1$ 、 $|Ed| = 0$ 。如图 1(b)、图 1(c), $|Ed| > 1$ 和 $0 < |Ed| < 1$ 两段函数分别表示为刑罚富于弹性和缺乏弹性的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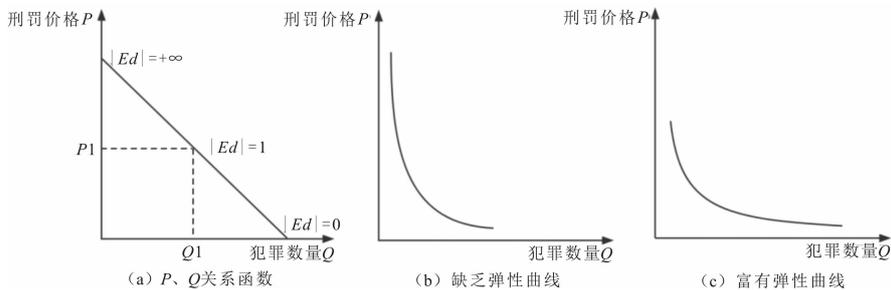


图1 刑罚价格与犯罪数量的函数关系

2. 收买罪的弹性现状分析

弹性 Ed 是关于 P 和 Q 的函数,对收买犯罪的 P 、 Q 变量进行分析,可以大致推测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对刑罚的反应情况。运用贝克尔的犯罪供给模型对 P 和 Q 进一步细化:假设 Q_j 表示犯罪数量, p_j 表示每桩犯罪的定罪可能性, f_j 表示每桩犯罪所受的惩罚, u_j 代表所有其他影响的混合变量,函数关系表示为 $Q_j = Q_j(p_j, f_j, u_j)$, p_j 和 f_j 都是可控变量。因此,为便于观察,可以将 P 分为两个具体因素:一是惩罚犯罪的严厉性(刑罚力度);二是犯罪人受到

惩罚的概率(定罪可能性)。

统计全国各省拐卖妇女犯罪的裁判文书数量,发现云南省拐卖妇女犯罪较为高发,共 332 篇约占总数的 9%。以“拐卖妇女”为关键词,设定检索条件为“刑事案件”“判决书”“云南省”,检索 2020—2021 年的裁判文书,得到结果 79 条,筛选后最终获得 47 个有效样本。对样本中拐卖犯罪人和收买犯罪人的判处罪名与刑罚加以统计,由于篇幅限制,仅展示部分样本的主要信息(见表 1)。

表 1 参与统计的部分裁判文书信息

样本编号	犯罪人	犯罪人数量	拐卖者判处罪名	拐卖者判处刑罚	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的关系	收买者判处罪名	收买者判处刑罚
T1	何某林等	3	拐卖妇女罪	5 年—7 年 6 个月	收买后出卖	拐卖妇女罪	7 年 6 个月
T2	盘某等	8	拐卖妇女罪、组织卖淫罪	15 年	收买后出卖并实施其他犯罪	拐卖妇女罪	5 年 6 个月
T3	陈某祥	1	拐卖妇女罪	7 年	仅拐卖	—	—
T4	龚某和等	3	拐卖妇女罪	2 年—5 年	仅拐卖	—	—
T5	李某所等	3	拐卖妇女罪	5 年—10 年	仅拐卖	另案处理	—
.....							
T47	王某等	6	拐卖妇女罪	2 年—3 年	犯罪人分别实施两个行为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第一步,分析收买犯罪的刑罚价格 P 。刑罚力度方面,我国刑法对买卖行为双向犯罪化。《刑法》第 240 条对拐卖妇女罪设置了三档法定刑,基本刑为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有加重情节最高可至死刑。第 241 条第 1 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仅设置一档法定刑并附带出罪条款,收买人在特定情形下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第 241 条 2、3、4、5 款的规定,以表 1 中的样本 T1、T2 为例,对于收买后再出卖以及收买后实施其他犯罪的情形,应按照拐卖罪予以一体性的刑法评价或者数罪并罚评价为重罪,收买罪不再独立评价。虽然不能仅根据二者的法定最高刑就片面地认定收买行为的轻罪评价,但不可否认,收买行为具有独立的法益侵害性,本不必仰赖后续犯罪的法益侵害性,与拐卖犯罪配置重刑严厉打击相比,刑事立法对拐卖犯罪与收买犯罪区别对待、对后者轻缓化处理的立场,是导致司法宽纵此类罪行的重要原因^[3]。

步检索“另案处理”的相关文书,并对收买者受到的刑事处置加以统计,发现收买犯罪在定罪可能性方面存在三个特点。第一,收买犯罪的定罪可能性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收买犯罪的批捕率下降而起诉率上升,批捕人数降幅超过 80%;批捕收买犯罪人数在全部刑事犯罪案件中的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起诉收买犯罪的上升幅度超过 110%。第二,收买犯罪黑数巨大,无罪率高。即使相对方以拐卖妇女罪定罪量刑,收买者或未被提及,或注明“另案处理”,但对样本进一步检索发现,相关人员实际未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比例高达 91%,而以收买罪单独定罪的案件比例极低,仅占样本总量的 6%,样本中仅有 3 例,另有研究表明,收买犯罪的定罪比例只有不到 3%^[3]。第三,数罪并罚比例低,量刑普遍偏低。样本中仅有 1 例数罪并罚,占样本总量的 2%,以收买罪定罪的实际判处刑罚均为 1 年及以下,缓刑适用率达到 100%。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1 年至今的刑事判决书共 2805 篇,涉及收买罪的仅有 425 篇,数罪并罚的判决书 148 篇,约

定罪可能性方面,在 47 份判决书的基础上进一

占总数的5%；以收买罪定罪处罚时量刑普遍偏低，大多数在1年及以下，较少达到3年的最高刑；缓刑适用率高，涉及文书310篇，占比约7成。这就造成了收买犯罪较低的机会成本水平，“1年有期徒刑且多适用缓刑”的平均刑罚价格，对收买者来说显然是一种犯罪成本低而预期收益高的交易。

第二步，分析犯罪数量 Q 值对刑罚价格 P 的反应。在云南省2020—2021年的47个犯罪样本中，判处刑罚的拐卖犯罪样本量由37个下降到10个，年均下降73%；收买犯罪包含在拐卖犯罪中，判处刑罚的收买犯罪样本量由3个下降为0，年均下降8%。在全国层面，2000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14458人降至1135人，年均下降幅度11.4%；起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由155人增至328人，年均增长幅度为2.5%。由 P 与 Q 的变化关系不难发现，与拐卖犯罪数量显著的下降幅度相比，收买犯罪数量变化幅度不够明显，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收买犯罪对刑罚的反应较为迟钝，即在最高3年有期徒刑的范围内，当前刑罚结构对收买犯罪的控制是缺乏弹性的，其函数曲线更接近于图1(b)。当前我国对买卖人口犯罪从重打击，在收买罪惩罚概率 p_j 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提升刑罚力度 f_j ，使收买犯罪对刑罚反应的整体态势逐渐向富于弹性转化，从而优化刑罚的效率和边际威慑。

(三) 博弈论视角下的犯罪黑数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博弈理论是抽象且存在弊端的，因为博弈论的优势在于简洁、概括地呈现互动关系与行为逻辑，而不在于准确描述复杂情况，导致其分析的对象可能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然而博弈论的理论价值终究是无法否认的，我们依然可以借助模型来理解收买犯罪人与执法机关的行为关系，从而衡量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探究犯罪黑数现象存在的原因。

仅从理论假设的逻辑出发，在博弈模型中，潜在的收买犯罪人与执法机关的博弈分为四种情况（见表2）。一是潜在犯罪人选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执法机关选择启动侦查取证与司法程序。犯罪人在案件侦办后落网，设其收益为-5，执法机关依法履职无额外收益，设其收益为0。二是潜在犯罪人选择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公安机关选择根据收集到的犯罪线索展开侦查。犯罪人没有完成预期犯罪行为故收益为0，公安机关投入大量司法成本，无论是否成功抓获拐卖者或者解救被害人，收买者的犯罪需求依然存在，其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失，设其收益为-5。三是潜在犯罪人选择实施犯罪，但由

于主客观原因执法机关未发觉犯罪并启动侦查，故犯罪人收益为5，执法机关节约了本应投入案件侦办的人力、时间等司法成本，收益为5。四是潜在犯罪人选择不犯罪，执法机关选择不启动司法程序，双方均收益为0。

表2 潜在收买犯罪人与执法机关博弈模型

		潜在犯罪人	
		实施收买犯罪	不实施收买犯罪
执法机关	启动司法程序	(-5, 0)	(0, -5)
	不启动司法程序	(5, 5)	(0, 0)

在不考虑其他环境因素的条件下，执法机关倾向于不侦办案件，潜在的收买犯罪人则倾向于实施收买行为。无论是犯罪人使用反侦查手段阻碍司法，还是执法机关基于追诉时效、对被害人情感的保护等法外原因而不予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当潜在犯罪人实施收买行为而执法机关不做干预时，双方的收益都达到帕累托最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拐卖罪在判决书数量上要远远高发于收买罪，同时也间接造成了收买犯罪预期惩罚成本较低以及犯罪黑数较大的事实。

二、对“买卖同刑”与“有限提高法定刑”争议的讨论

(一) 刑罚弹性评估

从弹性视角来看，在最高3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范围内，当前收买犯罪的函数曲线是缺乏弹性的，若要提升 Q 对 P 的反应敏感性，就必须提高收买犯罪的不法评价即“刑罚价格”，使刑罚结构更加合理。

1. “买卖同刑”提高刑罚弹性的预期效果

基于“买卖同刑”假设，对其弹性变化建构函数曲线。《刑法》对于拐卖妇女罪的处罚分为三档：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起刑点5年规定为F点；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包含死缓情形），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将10年规定为E点；死刑，规定为A点。在无期徒刑的假设中，按照刑罚适用的相关规定，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一般不会关押至死，在符合法定减刑条件的前提下，服刑2年后即可减为有期徒刑，故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服刑年数应为13年至27年不等，将其规定为D、B两点。在有期徒刑的假设中，一罪情形下有期徒刑最高刑为15年，规定为C点；数罪情形下数罪并罚后的有期徒刑最高刑为25年。根据服刑年限的具体情形，对“买卖同刑”后收买罪的刑罚进行赋值，刑罚价格 P 与犯罪数量 Q 的函数关系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收买罪 $P-Q$ 曲线的具体变化，在该刑罚结构下，C、D、E、F4个点的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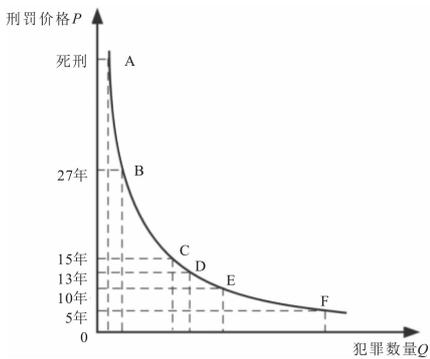


图2 “买卖同刑”弹性曲线

区间间隔较小,即15年及以下的刑罚区别刻度较小;但相较于较高点B和无穷大A来说,由C点到A点, P 的变化十分迅速,犯罪预期成本大幅度提高。拐卖罪多位于5—10年的量刑区间,在这一刑罚梯度内犯罪数量 Q 的变化在小范围内趋于明显,说明 Q 对于 P 的反应程度较敏感。因此在买卖同刑的条件下,收买罪的刑罚曲线应当是图1(c)所示的富于弹性模式。在当前“缺乏弹性”条件下,买卖同刑能够令收买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显著提升,在惩罚概率与其他变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必然将导致犯罪数量的减少。另外,在现实层面,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秉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买卖人口犯罪,持续纵深推进打拐专项行动,惩罚概率与重刑率在持续高压严惩态势下保持较高水平,犯罪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这说明重刑严打对于拐卖犯罪具有一定威慑力,即拐卖犯罪数量对于刑罚力度具有一定的敏感性。鉴于收买犯罪与拐卖犯罪共属同一不法构造且支配性更低,可以推测收买犯罪对不法评价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在“买卖同刑”这一刑罚结构下会更加富于弹性。

2. “有限提高法定刑”提高刑罚弹性的预期效果

对于收买罪的法定刑究竟应“有限提高”多大幅度,学术界形成了“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3]等不同观点,但本质都具有“适度提高”的共性。按照第三种假设再次对刑罚价格 P 赋值,可以得到如图3所示的两条弹性曲线,分别表示收买犯罪数量对“最高3年”和“最高10年”刑罚反应程度的函数。

在贝克尔模型“犯罪人是风险偏好者”的前提下,惩罚概率 p_j 比刑罚力度 f 对犯罪数量的影响力更显著,换言之,如果一种犯罪的破案率或打击率很高,无需严厉的刑罚就足以阻止犯罪。由刑罚价格 P 和犯罪数量 Q 的现状可知,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收买犯罪的惩罚概率 p_j 呈逐渐提升趋势,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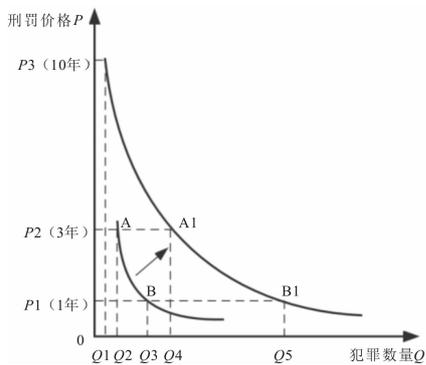


图3 “有限提高法定刑”弹性曲线

刑罚力度 f 适度提高且打击力度持续严厉的情况下,犯罪数量 Q 对刑事政策的弹性曲线会趋于平缓,向富有弹性的趋势发展(从左侧曲线至右侧曲线),同时,刑罚力度的提高将使得弹性曲线上的点向左移动(从 B_1 点移动到 A_1 点)。当法定最高刑由3年提高到10年, P 由 P_1 变动至 P_2 时,与 Q_3 到 Q_2 的区间变化相比, Q_5 到 Q_4 的减少幅度显然更加显著,说明收买犯罪的犯罪数量对“最高10年”的刑罚结构更为敏感,即“最高10年”曲线比“最高3年”曲线更富有弹性。

(二) 罪刑关系审视

经过弹性分析,“买卖同刑”“有限提高法定刑”两种假设在弹性层面均有利于改善刑罚结构,然而前者在罪刑关系角度存在明显缺陷。

1. “买卖同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边沁揭示了罪刑相适应的底层逻辑,即“让罪犯在原本只打算犯轻罪时不至于犯下重罪”,这一解释现在被称作边际威慑,也就是一种以轻罪取代重罪的激励。如果对贩毒和吸毒处以同样的刑罚,犯罪人就更可能通过参与贩毒来“以贩养吸”;同理,倘若对拐卖行为和收买行为处以同等刑罚,就是鼓励犯罪人“把犯罪进行到底”,将会有更多人加入买卖人口的犯罪链条,在实现自身犯罪目的的基础上获得额外的犯罪收益。其次,配置法定刑的标准应当以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为依据,就罪行的法益侵害性而言,拐卖行为显然对于被害人的人身权损害更明显,二者之间合理的法定刑差异应根据侵害法益的关联程度来确定。

2. 买卖同刑论的主要论据有待考量

“对向犯”说提出,刑法中共同对向犯的刑罚基本相当,如非法买卖枪支罪的买卖双方同罪同罚。值得反思的是,以“买卖枪支”或者动物植物类犯罪的配刑来对标买卖人口犯罪,由此得出“人不如物重要”的结论,本身就不符合罪责评价的尺度。“买

枪”“卖枪”两种行为对公共安全的侵害程度并无明显分别,拐卖妇女罪却涉及诱骗、非法拘禁等可能附加的其他伤害,以前者为例证“买卖妇女亦应同刑”并不可取,因为拐卖与收买两个罪名所蕴含的刑罚分量本就存在差异。同理,将拐卖罪、收买罪与系统内其他罪名的配刑对比,从而得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不及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罪名重的结论,这种思路是把动植物资源与人身权进行简单类比,用社会法益的价值直接对标个体法益的价值,显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3. “有限提高法定刑”更契合罪刑相适应的逻辑

不同类型罪名固然不宜简单类比,但收买罪的法定刑配置也不应与以保护同类型法益为目标的罪名刑罚幅度相差过大。按照通说观点,收买行为侵害的是“人身的不可买卖性”,之所以要提高收买罪法定刑,主要依据“人不能被交易”这一共识性准则,也就是人格尊严不被侵害的权利,本质属于人格权。与该法益类型相似的罪名有《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法定刑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与收买罪相同。然而,“不被当做肉体资源或性资源交易”的分量无论如何应重于侮辱罪、诽谤罪所保护的名誉,因为“被交易”的商品属性意味着作为“人”理应享有的尊严、自由与隐私的彻底丧失,甚至生命权、健康权也可能受到威胁,抽象的人格权根本无从谈起。捍卫“不被交易的权利”显然比保护名誉权更为紧迫,其法定刑也理应高于后者配置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适当提高收买罪法定刑并严格限制出罪,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强奸、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虐待等行为随着被害人被迫进入所谓的“婚姻家庭关系”而被覆盖、被裹挟和被“保护”起来,是法律对被害人保护力度和保护范围的提升。

(三)法外因素反思

1. 重视社会生活对收买犯罪及其法律评价的建构

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历史原因,收买者婚配生子的社会性需求是不容忽视的法外因素,单纯依靠重刑难以彻底摧毁犯罪之源。买卖人口犯罪市场多集中在偏远闭塞的乡村地区,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加之高价彩礼等现实弊病,男性婚姻问题难以解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为罪恶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缔结婚姻的强烈需求使犯罪人不惜以承担风险成本、支付刑罚价格为代价。通过样本分析还发现,收买者普遍受教育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部分犯罪人对“仅收买也是犯罪”的刑法规定认识不

清。买卖人口犯罪具有团伙化、隐蔽性、反侦查等特点,常有地方宗族势力统筹互助,被害人被拐后自救难度极高,收买罪不法评价的提高如果超越“适度”,无疑会降低收买者配合执法的积极性,增加外部解救难度。

另外,配偶需求、事实婚姻等法外因素在社会伦理层面受到一定认可,也会难以避免地影响立法与司法对收买行为的处理立场,导致收买犯罪对当前刑罚的反应缺乏弹性。一方面,这印证了李斯特“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著名论断,通过严厉的刑事政策威慑与抑制犯罪固然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犯罪背后的结构性成因,要通过改善经济发展、性别均衡、社会保障、道德观念等社会环境因素全面抑制收买市场;另一方面,立法、司法环节应对“事实婚姻”关系等干扰收买罪不法评价的法外因素加以考察,尽可能排除对罪刑关系配置的不当影响。

2. 罪责评价应与公众道德直觉相统一

除了法益侵害性,道德也是刑事立法应考虑的必要因素,因为法律会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引导社会舆论和道德。买卖人口犯罪严重侵犯人类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倘若收买罪的法定刑畸轻,与公众关于罪责评价的道德直觉相违背,势必会影响社会中一般人乃至执法机构的常识和价值判断,在观念上不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是一件严重的罪行,导致收买行为在某些地区更为猖獗,打击力度逐渐削弱,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另外,如果收买罪的刑法评价仍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被害人及其原生家庭受到的法益侵害与情感伤害难以得到补偿,也无益于改善收买犯罪黑数大量存在的现象,不利于公平正义社会风向的良性发展。同理,倘若收买罪的法定刑畸重,也会相应地塑造出扭曲极端、与朴素的道德直觉相违背的社会舆论和执法观念。通过刑事立法适度、有限地提高收买罪法定刑,避免刑罚配置畸轻或畸重,能够向社会公众传递一种积极、正义的立场,促进民众对这一规范的认同和忠诚,对潜在犯罪起到威慑作用。

三、成本收益视角下的收买犯罪防范

刑事立法需兼顾刑罚的成本与收益。刑罚威慑效果 = 刑罚严厉程度 × 破案率,打击力度和刑罚力度不完全置于同等地位,准确及时的处罚对犯罪活动的抑制作用优于纸面上的重刑。犯罪成本可以分为犯罪直接成本、犯罪机会成本和犯罪风险成本,结合弹性分析,从犯罪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收买犯罪的防范。

(一)增加犯罪风险成本:提高刑罚力度

犯罪风险成本是犯罪人为犯罪后果支付的成本,或从事犯罪活动所必须承担的风险代价,包括逮捕、定罪、刑罚等一系列司法程序带来的损失。提高刑罚力度,即完善相关刑事立法,适度提高收买罪的起刑点和最高法定刑,从而震慑和挤压“买方市场”。在刑罚力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惩罚概率对犯罪的抑制效用最大,提高惩罚概率的方法包括增加警力与技术性投入以提高破案率,规范司法程序,减少犯罪黑数,重视犯罪预防、治安联防和综合治理等。在通过刑事立法提高不法评价的同时,应同时促进民事立法的积极参与,对通过收买行为而缔结的婚姻关系、财产权、监护权、继承权等民事权利实行“一票否决”,彻底阻断收买犯罪“买妻生子持家”的利益链条。倘若民事立法有针对性地做出回应,从法律层面对收买行为取得的民事权利做出否定性评价,将对收买市场形成实际上的有力打击,尽可能降低负面的社会影响。例如,判定婚姻无效,撤销同居关系,分割财产时做出有利于被害人的保护性裁决,撤销收买人对子女的监护权,子女无需承担赡养义务,剥夺收买人对被收买人及子女的法定继承权等。

(二)增加犯罪直接成本:优化执法效率

犯罪直接成本是犯罪人在犯罪预备阶段或犯罪实施过程中直接用于犯罪的成本,包括准备作案工具、犯罪时伪装、犯罪后逃匿和销赃等。由于准备活动、犯罪工具和事后销赃对收买行为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所以收买犯罪的直接成本基本可以理解为实施犯罪的难度,而增加犯罪难度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执法力度。第一,建立和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持续开展重点专项行动,注重预防、坚决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第二,鉴于买卖人口犯罪深远的社会危害性,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大力引进计算机专业人才,推动网络技术与执法活动深度融合。建立妇女失踪反应机制,利用DNA、GPS、人脸识别等技术辅助执法,如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拐卖人口实时解救系统”;可以借鉴新冠疫情防控的“流调”方法,对失踪人员的具体行程、交通工具、同行人员等重要信息展开追踪调查,与“解救系统”相配合,创新数字技术与发动群众力量相结合。第三,建立侦破买卖人口犯罪的专项立功受奖机制,激发公安民警的工作热情。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执法机构的内外监督,加大纪检巡察力度,建立发现犯罪及时报告和惩戒制度,杜绝买卖人口案件侦办中针对收买犯

罪的渎职懈怠问题。

(三)增加犯罪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政策

犯罪人利用特定的时间和机会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因而放弃了使用这些时间或机会从事其他合法活动所带来的收益,这部分收益就是犯罪的机会成本。增加犯罪机会成本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层面,通过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促进欠发达地区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距,从根源上消解拐卖妇女犯罪“买方市场”。社会层面,一个健康的社会的流动性主要取决于教育等自致性因素,而非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因此要全面提高乡村地区受教育程度,弥补社会经济弱势导致的道德与法律意识淡薄。同时,针对性别比例失衡、婚姻观念落后、地方人情关系网阻碍司法等社会性问题,要加强政府决策部门与智库的供需对接、有效合作和良性互动,为打击收买犯罪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与前瞻性建议,创造更富凝聚力的社会环境。

四、结语

有言道,面对顽固强大的愚昧观念和渐成自然的陋习,应通过严厉的刑罚配置表明态度。但是,收买犯罪是与社会生活、婚姻家庭、道德伦理等法外因素紧密联结的社会现象,其法定刑的提高应遵循谨慎的“适度”原则,“买卖同刑”尽管在弹性角度有利于改善当前的刑罚结构,但存在罪刑不相适应的隐忧,不排除导致重刑依赖以及增加被害人解救难度的可能。简言之,治理买卖人口犯罪依然任重道远,基于对刑罚弹性、罪刑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以及法外因素的综合考量,适度提高收买罪法定刑,使收买犯罪摆脱轻罪标签并促进刑罚边际威慑效果优化,同时增加惩罚概率,通过提高犯罪预期成本减少潜在的收买犯罪人,将是消解拐卖犯罪与收买犯罪的治本之策。同时,加强社会对刑事立法、执法活动的监督,开发社会工作、民间志愿团体等社会力量的被害人救助功能,帮助被害人及时顺利地回归家庭和社会,形成打拐反拐的社会合力。

参考文献:

- [1]车浩.收买被拐妇女罪的刑罚需要提高吗?[EB/OL]. [2022-02-0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96902.
- [2]罗翔.论买卖人口犯罪的立法修正[J].政法论坛,2022,40(3):132-145.
- [3]劳东燕.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与不法本质:基于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立法论审视[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30(4):54-73.
- [4]桑本谦.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M].北

Legal Punishment for Purchasing Trafficked Women in China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Economics of Crime

ZHANG Shiyi

(Graduate School,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rime evaluation index, the elasticity theory and game theory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rime evaluation scale, penalty efficiency and the reason for the large number of black numbers in the crime of buying trafficked women under the current penalty structure.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economics crime category, it interprets the two main disputes on raising the legal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buying,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riminal treatment of the crime of buying trafficked women. In the range of maximum 3 years imprisonment, the current penalty structure is lack of flexibility to control the quantity of buying crimes, and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lower penalty price and punishment probability of buying crimes and the higher expected income of crime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high incidence of buying crimes and the imbalance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degree of illegal crimes. The legal punishment of buying crime should be in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so that buying crime can remove the misdemeanor label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marginal deterrence effect of penalty,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ing the probability of punishment and reducing the potential criminals of buying by raising the expected cost of crime will be the root of the solution to trafficking and buying crimes.

Key words: the crime of buying trafficked women; economics of crime; culpability assessment index; elastic theory

(上接第 44 页)

Research on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ath of Personal Biometric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Risk Regulation

GU Xiuwen

(School of Law,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hina)

Abstract: Biometr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le bringing technological benefits to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have also bred a series of potential application risk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gic face - changing video technology, which is essentially "deep forgery", has sounded an alarm bell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regulation of personal biometric information.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biometr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pecial legislative model and comprehensive legislative model are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subjects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Due to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basis and legislative background of the two legislative models, the focus of the legislative model is also different, and each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itu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in China, we can explore the path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o build personal biometric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risk regulation, establish the national obligation of biometric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risk regulation, introduce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to regulate the risk of biometric information infringement,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starting subject of biometric informatio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afeguard mechanism of personal biometric informatio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Key words: deep forgery; personal biometric information; legislative model; risk regulatio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化阻为疏: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看 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

宋晓霞

(南京审计大学 内部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深入探究和解析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公共危机的治理制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优势根基和现实短板,是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和优化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的重要前提。优化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不仅要强化制度优势转化治理效能的动力因素、力量源泉以及内外因素,也要从制度意识、制度执行力、善后工作机制等方面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建设。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善后机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0

中图分类号:R181;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53-06

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落实和运转离不开外在力量的领导和护航,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危机治理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强大保障力量。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执政党基于自身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为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各优势因素的政治系统输入提供强大支持力量,进而为制度优势向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转化提供稳定和持久的支持力和推动力。随着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和长期执政能力不断得到提升,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显著性优势必将进一步彰显和发挥出来。

一、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性与迫切性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我国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仍处于易发多发期,这是基本国情。然而,现实生活中面临公共危机的挑战时,依然存在救火式的应急管理,缺乏常效的协同应急的公共行动网络。重大自然灾害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严重,救灾难度大;突发急性传染病在全球不断出现,食品药品安全基础薄弱,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难度增大;生产安全事故总量仍然偏大,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

频发,环境污染事件多发,危及群众生命安全和威胁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突发事件复杂难控且非常规性不断增强,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加之信息传播速度快,网上网下呼应,加大了危机治理的难度。

2020年初延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冲击和考验了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这场持久的抗疫战既彰显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优势也凸显了其缺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1]。推进公共危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努力把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优势全面转化为现实的危机治理效能,再次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要又迫切的需求。

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的频繁爆发,公共危机治理目标与未知风险之间的鸿沟,决定了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迫切性。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危机时,一般而言,政府反应多半是迟滞的,尤其是面对未知风险的威胁这种迟滞尤为凸显。这种差距横亘在治理目标与未知风险之间像一条鸿沟一样,也阻碍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公共危机治理完善的

收稿日期:2022-10-18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019SJA036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027)

作者简介:宋晓霞(1980—),女,河南周口人,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

目标就是如何缩小这种迟滞差距,为此,亟需找出产生迟滞差距的原因与缩小差距的有效措施。消弭迟滞差距,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不是从文本中去寻找,而应透过公共危机治理实践的历史变化去探索,进而探求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二、公共危机的治理制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系

(一)公共危机的治理制度、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之间的紧密联系

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同样公共危机治理能力,亦是一个国家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作用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和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是一个国家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核心要素,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又相辅相成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是一个国家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理念及相应的体制机制安排。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国家和政府拥有的公共危机治理资源及对其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的能力,实则是国家和政府运用危机治理制度解决公共危机问题的能力。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其“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没有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制度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制度的优势难以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没有相适应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其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也只会是一个空架子,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成效最终需要通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来体现。

(二)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区别和建设重点任务

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具有根本性作用,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公共危机治理能力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又有显著区别,并不是公共危机的治理制度越完美、其治理体系越完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公共危机治理制度是一系列规则,一经形成且实施一段时间,便具有一定的“惯性”,成为其制度优化与变迁的“路径依赖”。显然,推动和实现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全面转化为现实的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才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议题。

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之间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差异不是体现在政府之间,而是体现为其应对各种不同严重程度的公共危机事件的效率。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看,明确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任务,应从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角度出发,应对

其内在转化各环节作出整体性、系统性优化,以实现化阻为疏,由此才能在不断完善结构和强化系统功能的基础上达到应有的目标,提高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效能。

三、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现实境况

(一)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优势根基

制度优势主要通过其价值优势和执行优势而展现,胡洪彬把中国制度的优势概括为基础性、运行性和保障性三层优势。这一方式也适用于分析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优势。基础性优势从理论性、历史性奠定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根源;运行性优势从文化性、社会性构建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内部动因和外部依托;保障性优势从守卫性、维护性发挥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动力主体和支持主体的强大保障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彰显中国制度优势提供了直接理论,同样也为发挥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奠定了其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2]党的这种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为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在理论和领导方面优势因素不断蕴蓄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和支持力量。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2022年4月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的《“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中明确把“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列为指导思想。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塑造了绝佳的外部环境。运行性优势从文化性、社会性构建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内部动因和外部依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提供了天然的养分,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为彰显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提供了直接的理念根基。无论是“天人合一”、民本观念,还是红船精神、延安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包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也成为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稳序运行的沃土。社会性优势因素是构成公共危机治理制度有序和有效运行的外部环境依托。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为此优势因素本身就内含人民对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支持力、信任力,社会性优势因素根植于广泛

的社会系统,有着天然的自发性,为公共危机治理制度运行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外在保障。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公共危机治理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国民安全、保障社会安宁,确保长治久安。面对公共危机治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应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公共危机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3]。党和国家在应对一次次重大公共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体制,树立了新的重要里程碑。这一体系的建立弥补了传统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缺陷,解决了只“管”不“治”、单一政府主体的条块分割的弊病。

(二)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现实短板

1. 从主体视角而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强大政治系统支持力量,但影响政令畅通的作风顽疾与制约公共危机治理效能发挥的各种壁垒有待进一步消除。首先,从主导力和推动力上看,影响政令畅通的作风顽疾问题是主要根源。其中不担当、乱作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问题等成为影响政令畅通的主要因素。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2021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4223起。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2021年共查处问题41005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1.3%。从查处级别看,2021年,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起,查处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565起,查处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7490起,查处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96161起,县处级及以下查处问题数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9.5%。^[4]这些问题不仅阻碍着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也极易消减领导力优势因素的发挥。其次,制约公共危机治理效能发挥的各种壁垒导致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发展现状与严峻复杂的形势还不相适应。

2. 从参与者视角而言,“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提升的外在保障,但推进民众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以及同人民群众实现紧密互动与协同配合的规范性渠道有待进一步科学构建。“公民的政治能力和参与作为民主含义的核心,影响到政治系统的合法性。”^[5]

社会动员、多方互动的群防群治机制是构建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体系的重要核心机制。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家庭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还能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构建政府协调治理体系是一项社会工程,政府作为应急管理的内核,有必要引导和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应急管理,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作应急管理体系。”^[6]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其他多元参与主体的协同互动也是推动制度多层优势因素有序性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多重支持力量。然而,这方面的短板主要表现在政府引导多元参与主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不足,行政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政府信息、权威和制度资源的不足,造成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多方协调的难度加大。

3. 从客体方面而言,“举国体制,科技创新大数据治理”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手段,但是充分发挥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全国整体性的组织优势与以大数据治理支撑的精准防控体系优势协同运作需要进一步完善与优化。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公共危机事件复杂难控,从不同的角度划分类别不同,主要分为:政治性危机事件、经济性危机事件、社会性危机事件、恐怖性危机事件、公共卫生性危机事件和自然性危机事件。从其特征而言,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公共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影响的双重性、紧急性和时效性、巨大的破坏性等特征。

公共危机的繁多种类与其特征,共同交织致使其爆发后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的整体生活和共同利益。在经济方面,公共危机的爆发不仅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阻碍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对一定时期内保障经济良好运行的稳定经济环境产生不利的影 响,同时也打乱国际收支和国际贸易的平衡。公共危机本身巨大的破坏性,不但为民众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失,同时也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的破坏,其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需政府及时拨出专项资金进行经济救助和补贴。在国家和政府方面,公共危机的爆发不仅冲击社会政治稳定,影响政府信誉,挑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同时也影响国际关系与外交战略。就公共危机影响的双重性而言,政府如果治理不当将直接威胁到社会政治的稳定,相反若治理危机有效就能使局面转危为安,化危机为动力使政府信誉不断提升。

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充分发挥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全国整体性的组织优势与以大数据治理支撑的精准防控体系优势协同运作也是推动制度多层优势因素有序性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力量。然而,政府在协同调控过程中,还存

在依法依规精细化治理能力不足的短板,以及急需完善大数据防控体系,治理防控体系纵向涉及不同层级、横向涉及众多部门,“数据孤岛”的问题依然存在,造成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防控措施的精淮力度减弱。

四、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路径优化

(一)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为转化治理效能提供全面支持与动力根基

党的统一领导是战胜一切风险和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定海神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实现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7]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巨大政治能量、社会能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非常强的组织动员能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大组织网络,能够确保把中央应对公共危机的决策部署迅速传达到基层,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们成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关键所在。

首先,领导制度体系: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组织体系在推进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核心环节。党的组织体系作为党政工作开展的轴心,处于治国理政、质量建党的重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8]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等共同构成的组织网络,可以整合各方力量资源,确保了公共危机措施迅速有效传达到各个部门,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各领域各环节,实现了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防控的联动治理。“党的组织体系”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具有引领整个体系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功能。针对影响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政令不畅的顽疾问题,应重点加强检查监督,将廉政工作要求融入干部培养、选拔、任用、交流全过程,将着力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治理不担当、乱作为等领导干部问题。在不断完善党的组织建设质量的过程中,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切实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进而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最大化提供坚实的主导力量。

其次,领导决策机制,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

系建设。决策机制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首要环节,建立与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系是决定公共危机治理工作成败的关键。决策是任何有目的活动发生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不同层次的决策有不同的影响。科学决策依靠科学理论指导,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然而“人的因素的多变性、社会现象的不可逆性、人类行为的不可实验性等造成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复杂性。”^[9]

完善危机管理理论体系,是避免公共危机治理决策主观片面的保障。人们在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判断时,往往存在实质性缺陷认识结果的理性知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不一致。这种认知偏差对决策过程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尤其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危机时人们更易如此。因此,为了缩小理性知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不一致的缺陷,避免公共危机治理决策制定的主观性、片面性,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关键。提高识别危机问题的准确性,是制定有效公共危机治理决策的基础。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为避免因误判而造成公共危机事件升级,首要问题即是在问题识别环节,只有找到问题的症结关键之处,提高危机问题确认的准确性,进而才能提出良方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因此准确掌握各类公共危机发生、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迅速探明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其进行有效认识是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此外,实现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以决策问责为核心的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机制是关键。对决策失误进行有效的责任追责,消除决策失误多发与决策问责缺乏并存的疏漏,防止出现重执行、轻决策的现象。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发挥治理效能提供力量源泉与最大底气

中国共产党一次次成功应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根源,在于人民群众是党无往而不胜的力量源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一切依靠人民,凝聚磅礴力量,才能打赢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人民战争。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政治学用“政治认同”表达民众内心深处对自己国家制度的拥护程度,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只有得到人民广泛的认同,才能获得充沛的生命力并能发挥其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能够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制度的认同度”^[10],这对推进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不断推进人民群众规范和有序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可以强化民众的政治信任,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体系运行社会支持力的最大化。

3. 坚持制度创新先行,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自主能动与外部力量

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在危机治理系统内部向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有效转化,同样须做到制度创新先行。一方面,实现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中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由此才能在契合当代中国公共危机治理系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为推动制度优势的科学生转化提供整体性保障。另一方面,推进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创新先行,还应树立系统性的纳新理念。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的需求始终围绕有利于产出有效的反危机措施提供服务,这就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既要公共危机制度优势的功能和运作形成系统性认识,也要善于从结构上把握各层次优势因素的内在逻辑关系,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和机制弊端,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由此才能为确保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的发挥夯实根基。

(二)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危机治理能力建设

1. 强化制度意识,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要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11]因此,制度权威的树立是落实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制度权威无法树立,必然会影响制度的落实与执行。为了推动制度有效转化成为治理效能,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尤其需要强化制度意识,尊重和敬畏公共危机制度。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制度意识是执行公共危机制度的意识,是对于公共危机制度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亦是在坚持中不断完善公共危机制度的意识。

任何一次成功的危机治理都不止于谋划蓝图,公共危机制度执行越有力,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就越强越有效。再完美的制度,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紧紧抓住人这一关键因素,不断强化执行制度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严格执行把制度落到实处。同时,加强公共危机制度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坚定其制度自信,只有把共同的目标任务转化为思想和行动自觉,才能增强执行力。领导干部更应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健全权威高效的公共危机制度执行机

制,加强对公共危机制度执行的监督,让公共危机制度管用见效。

2. 提升制度执行力,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

制度执行力是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关键性环节,也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关键。一般而言,公共危机制度的执行力通过预警机制和公共危机治理执行机构两个方面展现。首先,反应灵敏的预警机制是公共危机治理制度有效执行的前提。预防是解决公共危机事件的最好办法,反应灵敏的预警机制可以降低公共危机带来的危害,甚至消除危机的爆发。“信息预警机制是政府危机决策体系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支撑”^[12],有助于政府组织和公众能够发现公共危机爆发前的种种潜在的与外部的表现与特征,提前了解公共危机发展的状态,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策略,灵活选择与调整最佳方案有效避免公共危机爆发后执行部门陷入被动状态。对公共危机治理而言,做好预警工作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最优化,也是危机治理的最高境界。

适合国情的危机治理执行机构是公共危机治理制度有效执行的核心。制度的执行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性环节,而公共危机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取决于一个适合国情的危机治理执行机构。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具有急难险重、任务量大、点多面广的特点,常常需要进行多部门、跨层级、跨领域协调。从全国整体和全局出发,我国形成了具有强大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的中国特色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彰显了强大生命力和独特优势。党和国家坚持运用总体性、全层次、多形式的举国体制抗击疫情,举全国之力全力应对,形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3. 坚持优化善后工作机制,为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信息支持与重构保障

“谋初要百虑,善后乃万全。”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干扰社会的正常运行,打破民众心理平衡,若是公共危机事件善后恢复的方式、措施不当,容易引发新的危机,但善后也蕴藏着弥补损失和重新建设的契机。优化善后工作机制,以制度善意带来更多温暖。公共危机善后工作有助于促进政府危机学习行动优化及能力提升,同时,可以提升民众心理安全感,恢复民众对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信心。成功的善后工作可以将公共危机造成的损失从最高值降至最低,尽早、尽快将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恢复到事件发生之前的状态。

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完善的危机学习机制,提高适应能力,有利于加快补齐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短板弱项。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好比穿行在没有航标的大海之上,波涛汹涌、暗礁密布、险象环生,如果缺乏合适的学习机制和适应能力随时都会有翻船的危险。优化善后工作机制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中通过比较不同的选择最终找到未必最佳但令人满意的公共危机治理方案的过程。实践证明,通过不断地处理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在不断调整中逐步健全完善,“中央政府及有关部委‘发现和纠正现有缺陷、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应对新挑战、改进制度运作’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这也是我们政府抗疫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13]

总之,政府作为公共安全的责任者,必须制定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和措施,寻找公共危机制度优势转化为其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实现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快速有效地化解各种危机,保障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安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 求是,2020(4):10.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14.
- [3]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案例[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26.

- [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 2021年12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431起[EB/OL]. https://www.ccdi.gov.cn/toutiao/202201/t20220127_167553.html,2022-01-27.
- [5]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 徐湘林,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213.
- [6] 金太军,赵军锋. 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治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42.
- [7]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87.
- [8] 新华社.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党努力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J]. 党建,2018(7):5.
- [9] 周少来. 理论指导实践的复杂性、针对性与有效性[J]. 人民论坛,2021(21):30.
- [10] 张贤明,张力伟.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J]. 社会科学战线,2020(4):181.
- [11] 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10-9(002).
- [12] 晁亚男,毕强,辛立艳. 政府危机决策中信息预警机制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6):63.
- [13] 张美莲,郑薇. 政府如何从危机中学习:基本模式及形成机理[J]. 中国行政管理,2022(1):13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urning Obstruction into Unblocking: Viewing Modernizing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Capacity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SONG Xiaoxia

(School of Internal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Abstract: In - dept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regim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conversion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into efficient governance preponderance foundation and short board, is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improving China's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optimizing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capacity. To optimize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capacity, we should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dynamic factors, power source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convert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efficient governance, but als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capacity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consciousness, institutional execution and after - work mechanism, etc.

Key words: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capacity;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efficient governance; after - work mechanism

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李平芬¹, 隆安燕²

(1.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2. 广西巴马融合振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风险沟通现已成为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手段,新闻发言人是风险沟通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深度剖析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背后机理,对促进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Nvivo12软件为辅助,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出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新闻发言人特质直接影响民众对风险信息的接受意愿,民众内在状态在接受信息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情境因素起着调节作用。据此提出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策略,为政府提升风险沟通能力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扎根理论;新闻发言人;民众内在状态;民众接受信息意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1

中图分类号:D620;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59-07

一、引言

在全球风险社会大背景下,风险沟通对于应急管理的基础性功能日益显著,现已成为政府风险治理中的常态工作和处理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新闻发言人是政府风险治理的外在表现,民众对他/她们在风险沟通中的信息接受程度是影响政府处置突发事件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重大突发事件中,良好的风险沟通能够极大地削弱民众的风险感知^[1],降低民众的焦虑情绪对政府信任的损害,规避舆情风险,将社会稳定风险限定在合理范围。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是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的核心,他/她们借助电视、微博、微信、脸书、直播、抖音、B站、Vlog等媒体平台,构建双向沟通渠道^[2],与事件相关主体进行实时、深入的沟通,进而获得民众信任,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认可,最终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3]。如东航MU5735空难事件发生后,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和发

布的相关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民众焦虑、恐慌情绪,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可见,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重构了政府向民众传递突发事件信息的模式。

新闻发言人传递信息背后隐藏的机理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部分研究主要基于S-O-R理论模型来解释新闻发言人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从信息源的角度来考虑^[4]。本文提出新闻发言人通过展示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强势输出事件信息的方式刺激观众,同时依靠自身个体优势,吸引民众相信并遵守政府推出的应对决策,并通过图片、视频、采访当事人等方式将突发事件发生的过程、原因、影响程度等呈现给民众,使得民众在感到震惊、担忧之余,对政府新闻发言人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进而影响民众接受信息并付诸行动的意愿。

从微观视角探究新闻发言人的内在特质对广大民众接受风险信息并执行风险方案的作用机制,构

收稿日期:2022-10-08

基金项目:2022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边境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识别与治理机制研究”(22BXW002)

作者简介:李平芬(1975—),女,湖南株洲人,硕士,广西职业师范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理。

建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提出相应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策略,为政府提升风险沟通能力建设提供一定参考,对促进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时间比西方发达国家晚,经历了从稚嫩走向成熟、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关于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沟通者具备的能力素养、受众情绪、信息要素等方面。

新闻发言人具备的能力素养方面,现有研究均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能力素质。政府新闻发言人要明确“我是谁”“我为什么做”等,并能够在危机事件中高效控制自身角色,还应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5],同时搭配风险沟通时饱含情感、适度幽默的语言风格模式,会使得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增强。受众情绪方面,民众的内在状态包括个体的认知与情感情绪等因素,个体的知觉与记忆等受情绪影响较大,并且情绪还能左右个体对信息筛选和决策判断^[6]。新闻发言人处理危机时对民众情绪的认识和把握,都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信息要素方面,信息质量以及有用性感知影响民众的信息接受意愿。也可以通过增加相关信息的超文本链接、图片、视频、调查、导读等揭示事件背后的要义,以提高受众的接受意愿^[7]。民众对信息的接受意愿还受传播媒介和社会传播整体环境的影响,政治性为主的话语体系难以满足民众心理预期,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混淆受众视听,这些都影响了受众的认同和接受意愿。

综上,关于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研究有了一定研究基础,但对民众内在状态、情境因素等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机理关注还不足,多数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因此,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将进一步探索该问题。

三、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收集

(一) 研究方法

对于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与民众信息接受并行动的意愿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众内在状态对其意愿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变量范畴、测量工具和影响路径的理论假设。扎根理论是整合提炼各类信息,从而揭示现象间的深层关系,它是美国学者 Glaser 和 Strauss(1967)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他们是经典扎根理论流派,主要通过系统地收集资料、整合资料而衍生出理论,非常适合能力提升方面的质性研究。

(二) 数据收集

本研究从 2021 年 8 月开始实施近一年半,首先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式采集数据,并根据受访者接触不同媒体平台的频率做出微调,以获得更加真实的信息,征得同意后对相关信息录音整理。访谈对象涵盖了不同年龄段、性别、学历、职业。受访者中,男 28 人,女 34 人;其中学历方面,专科生 24 人,本科生 28 人,硕士及以上的 10 人;职业方面,全日制学生 15 人,教师 15 人,政府工作人员 7 人,企业员工 10 人,自由职业者 15 人;年龄从 20 至 60 各年龄段约 10 人。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您心中理想的新闻发言人是什么样的?”“新闻发言人发言时的哪些背景画面吸引你?”“您观看政府新闻发言人发言时有哪些感受?”“您为什么接受新闻发言人的建议?”等。接受深度访谈的共有 62 人次,每次访谈时间约为 45 分钟,这样充足的时间以便于受访者的思考和表述。

接下来找到两组有较高同质性的成员(各 7 人)组织了两场焦点团体座谈,时长约为 90 分钟,每个成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都发表了对特定问题的见解。访谈协调员在深度访谈和焦点座谈期间通过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潜在神态,更直观地理解民众观看新闻发言人在沟通时哪些特质会影响其信息接受意愿。焦点小组中,由访谈协调员主持和引导,小组成员充分讨论,相互启发,不断反驳和认同,进而揭示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内在机理。编码整理 52 份访谈记录后构建模型,对剩下的 10 份访谈记录和 2 组焦点团队访谈资料做理论饱和度检验。

四、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模型构建

(一) 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以 Nvivo12 软件为辅助整理了 52 位受访者的原始话语作为初始概念挖掘的资料,抛开原有经验,对原始资料持续地比较,通过标签化、概念化及范畴化这三个过程完成初始阶段编码工作,逐字逐句打标签,并保留出现了三次及以上频次的标签,整理出“提升视觉效果、增强第一印象”等 45 个初始概念和“外形、声音、人格魅力”等 25 个初始范畴。如表 1。

(二) 主轴式编码

将相似的范畴继续归类,不断对比、整合,进行第二轮主轴编码。最后得出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内在状态、情境因素和民众接受信息并采取行动意愿四个主范畴和有魅力、有温度、有素养、有能力、兴奋感、价值感等十个副范畴。如表 2。

表1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及初始范畴

初始范畴	原始语句示例(初始概念)
A1 外形魅力	穿着职业装,感觉很专业(a1 提升视觉效果);眼神刚毅坚定,初始印象很好(a2 增强第一印象)。
A2 声音魅力	普通话标准,语气随和,语调上扬,声音很好听(a3 提升听觉感受);说话过快,打官腔,我就想走(a4 延长停留时间)。
A3 人格魅力	他一说话就感觉特别真诚,感觉很正义、公平,好像知无不言的样子,在尊重我们对事件的知情权。说话幽默,时刻体现出睿智,又很谦虚(a5 提升整体魅力);耿爽、华春莹等那么多人喜欢,因为他们有独特的人格魅力(a6 精准风格定位)。
A4 情感抒发	他说面对危机时也很恐慌,跟我一样,他的真诚吸引和感染到我了(a7 真实情感表达)。
A5 共同记忆	他说起了我那个时代的事情,感觉我们是同一代人。我非常认同他说的,觉得做中国人真骄傲(a8 加强情感链接)。
A6 有人情味	他向记者坦白说不知道,好像没有听见“官话”“套话”,语气亲切,挺亲民的(a9 态度真实亲切);他不断激励人们、安抚大家的负面情绪,消除我们的紧张。是主动曝光的,不是被迫回应的,他最后说很高兴为大家服务,让我觉得很舒服(a10 亲人般的温度与关怀)。
A7 政治素养	熟悉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本部门的情况,不该说的不说(a11 提升政治意识);说的都是我想知道的,没有自说自话大谈“领导如何重视”,洋溢着爱国之情,态度鲜明诚恳,我越听越觉得作为中国人挺骄傲的(a12 坚定的政治立场)。
A8 专业素养	他准备充分,传达了准确的事实和具体的数据,说话简洁明了、逻辑性强、声音洪亮,对所阐述的问题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严密,令人信服(a13 提升新闻人素养);他说“求实锤”,好好笑,他说网络语言,幽默诙谐中消解了我心中的疑问(a14 定位准,重视公众诉求);“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句话我还记得,让我想笑(a15 提升媒体素质)。
A9 文化素养	吴谦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小小浪花”,感觉文化功底好深(a16 提升人文素养);好像记者问什么都知道,感觉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未来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a17 文化底蕴足)。
A10 心理素养	对记者的刁难式的提问处变不惊、从容不迫,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始终从容地应对,好像心中有数(a18 掌握节奏);给人一种冷静、自信、沉稳的工作风格,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准确的传达(a19 心理素质好)。
A11 表达能力	他与上次说的口径一样,咬字清晰,信息真实、正当。(a20 信息真实一致);很坦诚地交流,谈吐睿智幽默、有理有据,并且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等,真诚。他说的都是为了我们,我能听懂并愿意接受(a21 表达被理解并认同)。
A12 应变能力	记者“咄咄逼人”,他竟然化解了,圆满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a22 灵活谨慎);记得温州有个发言人发言时脸上不停地流汗,估计是紧张了,我感觉自己都紧张了(a23 注重经验积累);面对突发情况,他自我思考了几秒钟,说明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不是危机沟通的傀儡(a24 独立思考)。
A13 互动能力	他在解释问题时耐心、正面且有效(a25 提升互动态度和质量);他在微博上回答了我的问题,感觉他很重视我们提的问题,我希望他能快点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a26 提升互动的频率和速度);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和@人民视频竟然有抽奖,我参与了,虽然没中奖,但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近(a27 提升互动的有趣性)。
A14 引导能力	能归纳和判断出网民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说得主动且有分寸,正确地引导媒体,进而引导了社会情绪(a28 提升舆情引导能力)。
A15 迁移兴奋感	他身着职业装,脸上挂着职业微笑,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温文尔雅(a29 营造职业形象);我对发言人有好感,因而相信他所说的(a30 喜爱情感迁移);在他的微博下留言,有时候他会回答(a31 获得关注)。
A16 体验兴奋感	他描述疫情过后的美好生活,让我很想摆脱现在的状况,让我很憧憬未来领着我的孩子自由地区旅游(a32 传播愿景)。
A17 好奇兴奋感	事情发展到一定进程就向大伙汇报,感觉像连续剧一样,更想从他那里了解事态的发展(a33 产生好奇心理)。
A18 语言信任感	他在发言时有时候使用到专业术语和行业术语,我会觉得他很专业很权威,我相信他说的(a34 词语专业信赖);他说时语调语气自信平稳,就会莫名地信任他,觉得很真实,很权威(a35 语气自信稳重)。
A19 行为信任感	他也这么做,我相信他所做的(a36 用实际行动证明)。
A20 情感信任感	我滑到他的视频时,我愿意停下来看完(a37 产生情感依赖);在互动平台愿意分享,感觉是个老朋友(a38 超越身份信赖)。
A21 行动价值感	他把应对步骤介绍得很详细,并且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解决了我的不知所措(a39 行为有价值)。
A22 信息价值感	本来难以甄别信息真伪,感觉他说得有理有据,带来正面温暖信息,让人温暖镇定、安全,应该不会欺骗观众(a40 传递真实信息);他不厌其烦地做了步骤解析,说得很科学,帮助到了我(a41 信息价值感)。
A23 内部渲染	他的语言感染力和影响力太强了,说着说着,解开了我所有疑惑,我觉得我更爱的家国,不配合行动就对不起所有人;他的眼睛很真诚,让我相信他(a42 语言眼神渲染)。
A24 外部刺激	我感觉我周边的人都很喜欢他的发言,很信任他。我也没有异议了。我朋友说他很知性,未来老公标杆(a43 从众心理刺激)。我在短视频里看到了他,于是点了关注,经常观看(a44 反复刺激)。
A25 遵照执行的行动意愿	他说了事情的原委,我相信都是真的。我愿意戴口罩,不给他人添麻烦(a45 行为意愿)。

(三) 选择性编码

将核心范畴与其他支援类属联系起来进行选择式编码,确立关系,开发故事线,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分析图式。如表3。

本研究得到如下故事线:新闻发言人特质(有魅力、有温度、有素养、有能力)分别对民众内在状态(兴奋感、价值感、信任感)和接受信息意愿产生影响;民众内在状态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起中介作用;

情境因素起调节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理论框架。

(四) 理论饱和度检验

将未用的剩余数据进行再次编码,结果显示,在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四个主范畴(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内在状态、情境因素、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内部未形成新的范畴,也未发现新的构成因子。推定上述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

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模型中的范畴已经发展得比较丰富,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表2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主范畴与对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范畴
C1 风险沟通者特质	B1 有魅力	A1 外形魅力
		A2 声音魅力
	B2 有温度	A3 人格魅力
		A4 情感抒发
		A5 共同记忆
		A6 有人情味
	B3 有素养	A7 政治素养
		A8 专业素养
		A9 文化素养
		A10 心理素养
	B4 有能力	A11 表达能力
		A12 应变能力
		A13 互动能力
		A14 引导能力
C2 民众内在状态	B5 兴奋感	A15 迁移兴奋感
		A16 体验兴奋感
	B6 信任感	A17 好奇兴奋感
		A18 语言信任感
		A19 行为信任感
		A20 情感信任感
B7 价值感	A21 行动价值感	
	A22 信息价值感	
C3 情境因素	B8 物理情境	A23 内部渲染
	B9 环境情境	A24 外部刺激
C4 民众接受信息并采取行动的意愿	B10 民众接受信息意愿	A25 遵照执行的行动意愿

表3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图	关系机构内涵图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接受信息意愿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产生影响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内在状态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内在状态产生影响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内在状态→民众接受信息意愿	民众内在状态在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过程起到中介作用
情境因素 民众内在状态→民众接受信息意愿	情境因素在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五、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因素分析

本文经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编码并检验后发现:新闻发言人特质与民众内在状态通过不同路径均影响着民众接受信息的意愿。新闻发言人直接影响民众内在状态,同时,新闻发言人特质通过影响民众内在状态而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因此,民众内在状态在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政府风险方案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并且其过程还受情境因素的调节影响。

(一)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内在状态的影响分析

具有吸引力的外表容易被他人喜欢或使他人产

生正面情绪,如喜悦感、愉悦感等^[9]。有45名受访者认为新闻发言人有魅力特质让民众产生兴奋感。如“……他/她穿着正装,说话柔中带刚,很专业好有魅力,我觉得他/她说的每一个信息都真实可靠……”。有36名受访者认为新闻发言人有魅力特质让民众产生价值感和信任感。“……高颜值、声音抑扬顿挫又有磁性,他/她总是肯定民众行为对社会的意义,很懂得我们的心理,知道你害怕什么……”。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互动双方的外表/身体特征对他人的心理感知(舒服)有显著影响,会引起接收者的兴趣和积极的情绪,提高他人的信任和采纳程度^[10]。

有29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温度特质让民众产生兴奋感,如“……新闻发言人会民众感兴趣的信息辨别真伪,他/她讲的一些东西正是我疑惑的,就好像专门为我讲的一样,特别高兴……”。有40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温度特质影响民众的价值感和信任感,如“……他/她们邀请流行病学的权威专家答疑解惑……能急民之所急,很感动,他/她说的我都信……”。有研究表明,民众的信任度越高,越相信专业人士所分享的内容^[11]。

有33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素质特质影响民众的兴奋感,如“……最喜欢他/她的博学多才,话语中饱含着爱国的情怀,每次看到都很新奇和兴奋……”或“……发言人很淡定,说话又妙语连珠,他/她胸有成竹的样子让我安定下来了,我觉得也应该像他/她一样博学多才,产生去学习的冲动……”。有40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素养特质影响民众对内容的价值感和信任感,如“……发言人不会直接用语言攻击哪些没有做好的人,总会用一些幽默又不出格的言语来证明,有趣!”或“……我看到他/她心理素质真好,别人问个刁难的问题他/她没有慌,只是思考了两秒钟。他/她说‘求实锤’,他/她说网络语言,幽默诙谐中消解了我心中的疑问……他/她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我很信任他/她……”或“……记得曾经有个政府发言人有一句话: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真是好笑……”。已有研究表明,在备受争议的新闻事件中,官方发言人漏洞百出的解释投射出不被信任的修辞人格容易在受众中引起争议和愤怒。

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能力特质影响其兴奋感,如“……能说会道,引用的古文诗词、成语让人感觉他/她博学多才,怼外国记者那段深感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感觉挺激动的……”。有35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能力特质影响价值感和

信任感的产生,如“……我逐渐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慢慢地认可了所有他/她说的信息,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来,更相信、更熟悉的感觉……”。

可见,新闻发言人的特质(有魅力、有温度、有素养、有能力)会影响民众内在状态(兴奋感、价值感和信任感)。

(二)民众内在状态对风险感知信息接受意愿的影响分析

有46名受访者认为民众内在状态中的兴奋感影响信息接受意愿,如“……一看新闻发言人发言,就感觉事态向可控方向发展,觉得很兴奋……”。大量研究表明,背景设计对民众情绪有影响作用^[12]。新闻发言人风险沟通时的背景和严肃认真的样子促进民众的信任感产生。在风险沟通情境下,民众的兴奋感和价值感都影响着他们接受信息的意愿。感知价值理论表明,感知价值作为中间变量影响最终的信息采纳意愿,也就是民众感知价值越大越愿意接受。有32名受访者认为他们内在状态中的信任感影响对信息的接受意愿。如“……一旦相信一个人,我会相信他/她说的一切……”。研究表明信任感对公众的接受意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三)民众内在状态的中介作用分析

有44位受访者表明其内在状态的兴奋感影响信息接受意愿。“……喜欢他/她的长相,就想关注他/她到底说些什么,会把相关信息和要求告诉身边的朋友……”“……新闻发言人非常专业,对突发事件客观描述,能理解民众的心声,喜欢这种新闻发言人,之后就有想继续关注他/她来了解事情的发展进程……”“……特别喜欢看新闻发言人和外国记者互动,感觉特别激动,总想着他/她会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机警而幽默地回复他/她人的问题……”。

有35位受访者认为内在状态中的价值感影响信息接受意愿,如“……他/她着装很职业,妆容很得体,一看就是高端知识分子,因而觉得他/她说的也很专业,就会很相信……”“……新闻发言人有时候解释一件事的时候用那种专业术语,解释也清晰到位,我就觉得很权威,了解了以后感觉自己也成长了……”“……新闻发言人现场演示,这样我就能够明白到底该如何做……”“……要是发言人哼哼唧唧说了半天也说不明白,我会马上换台或滑走……”。

有35名受访者认为信任感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过程影响作用大。“……他/她看起来忠厚老实,眼神坚定温和,说话不是很浮夸的那种,给人很踏实的感觉,我也就不会去质疑其讲的内容……”“……很权威,很专业,解释得很详细很到位,我愿意相信他/她

……”或“……有时候新闻发言人发出一些他/她生活中的信息,让人感觉更亲近,慢慢地建立起信任感了,觉得他/她说的既权威又亲民……”。

本文构建的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作用的理论模型与环境心理学提出的S-O-R理论模型相符,即外部环境各方面的刺激会影响有机体/个体的内部状态,继而驱动该有机体/个体后续行为反应^[13]。而在本研究的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过程中,新闻发言人的各种特质会影响民众的内在状态,最终影响其接受信息的意愿。人们的情绪情感与思维活动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情绪情感不仅会影响接受主体思维活动的积极性,也影响接受主体思维活动的进程和方向^[14]。

由此,本研究认为,在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过程中,民众内在状态起中介作用。

(四)情境因素调节作用分析

有40个受访者认为在风险沟通中的物理情境影响他们接受信息的意愿。“……看新闻发言人特别真诚又极富感染力地说,让我觉得我不照做就对不起人民和党……”,可见,在兴奋感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过程中,物理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他/她事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渐渐地觉得这么做是对的,并马上付诸行动,这是中国人的义务和职责……”,可见,在价值感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过程中,物理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他/她语气很坚定,语言很朴素,眼神很真诚,好像真的是为了我们好,我觉得必须那么做才对……”,因此推断在信任感影响民众执行意愿的过程中,物理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表明,新闻发言人语重心长的说服方式以及对信息的重复表述,都可以让民众产生接受信息的意愿。

有42名受访者认为环境情境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看见他/她有点狡黠的眼神,诙谐的语言怒怼外国声音让我开心……”,可见,在兴奋感影响民众在行为意愿的过程,环境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新闻发言人背后的布置给人一种很权威的感觉,比起那种微信朋友圈转发的信息更让人愿意遵守……”,这体现了在价值感影响民众行为意愿的过程,环境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听周边的朋友讨论过他/她,我姐姐也喜欢他/她,说是偶像,于是我也关注了他/她的微博……”,由此表明在信任感影响民众行为意愿的过程中,环境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可以改变民众情绪并以此改变民众行为。来自社会影响中的

亲朋好友评价信息、专家点评等都与信息接受意愿有显著正向关系。在本研究情境中,新闻发言人通过背景的布置或播放事件的实时进展营造出严肃紧张的氛围,同时新闻发言人紧跟画面的描述、严肃的面部表情,都让民众仿佛置身于风险事件现场之中,在展示的画面中民众能清楚地看到事发现场的状况,或震惊或解惑。周边观看的家人朋友发出的惊叹或赞赏类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民众的从众心理,进而影响其接受信息的意愿。

可见,情境因素在民众内在状态对其风险感知信息接受意愿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六、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以 Nvivo12 软件为辅助,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出的新闻发言人特质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概念模型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有一定的启示。

(一) 理论启示

相较于以往信息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理论启示主要有如下三个:

1. 2016 年开始推行的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新闻发言人信息沟通的重要性,但沟通效果应该再从其他的信息接受主体入手进行解释^[15]。传统的信息接受模型未能充分把握沟通者特质和接受人意愿间的相关关系。从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模型解析出提升风险沟通效果可以从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内在状态和情境布置等方面综合考虑,这对传统信息接受模型起到了很好的补充效果,更好地解释了个体特质对接受意愿的影响。

2. 本研究重点关注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作用机理,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编码分析,提炼民众接受信息行为产生的动机与影响因素,重新探讨了新闻发言人特质与民众接受信息意愿之间的关系内涵,最终定义了新闻发言人特质等四个主范畴及有魅力特质等十个副范畴,为新闻发言人特质与民众接受信息意愿之间的关系内涵添加了新的内容和视角。

3. 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出的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机理模型,揭示了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风险感知信息接受意愿影响的内在作用路径,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内在状态以及民众内在状态对其风险感知信息接受意愿都有着直接影响;在民众内在状态影响其风险感知信息接受意愿过程中,民众内在状态起着中介作用,情境因素具有调节作用。机理模型丰富了接受信息意愿行为的研究。

(二) 实践启示

新闻发言人作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中的核心,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我国应该借鉴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一些风险沟通人员培训经验,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中都建设具有岗位胜任力的风险沟通工作人员队伍^[16],并且在风险沟通实践中应考虑:

1. 制定强化新闻发言人特质的策略。首先,各级政府部门在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时候要关注魅力、亲和力、能力和素养等方面的特质;其次,对现有新闻发言人加强亲民能力、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相关培训,使民众愿意全面、深入地了解信息的真伪,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信任并能愉悦地接受政府工作安排。

2. 制定提升民众内在状态的策略。首先,塑造好新闻发言人和政府部门的自身形象,提高沟通者的表达、应变、互动能力,通过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刺激民众的兴奋感;其次,与时俱进地通过不同平台向民众进行风险沟通,提升民众对行动和信息的价值感;最后,新闻发言人应真诚地与民众互动,通过双向沟通解除民众心中疑惑,让其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

3. 制定提升情境因素影响作用的策略。首先,新闻发言人应时刻关注言语和行为的感染力,营造出事态的紧迫感;其次,通过会场布置、事态视频展示等方式营造环境氛围,最大限度地刺激民众执行风险方案的意愿。

(三)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时间不长,构建的机理模型在未来研究中还需加大样本量及增长时间进一步检验,并加强对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内在状态和民众接受信息意愿概念测量的探讨和对该理论模型的检测,加深和完善本研究的成果。其次,绝大多数受访者均提到只是在新闻发言人单向沟通的情况下的信息接受意愿,只有部分年轻人与新闻发言人双向沟通情况下的接受意愿,但最后都愿意接受,该现象有待未来的研究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并在实践中优化不同级别政府部门的风险沟通方案,以及不同级别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策略。最后,受访者大都基于新冠疫情中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来进行回答,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后的研究中可在不同情境下拓宽对象考察。

参考文献:

[1] 方敏,张华. 危机干预如何修复政府信任:风险沟通与社区支持的调节作用[J]. 公共行政评论,2021,14(6):4-

- [2] 李琳.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言人[J]. 青年记者, 2020(26):57-58.
- [3] 唐红林. “邻避效应”问题根源及对策分析[J]. 人民论坛, 2020(30):64-65.
- [4] 刘凤军, 孟陆, 陈斯允, 等. 网红直播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 管理学报, 2020, 17(1):94-104.
- [5] 李沫. 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建构:以网络舆情下政府公信力建设为视角[J]. 求索, 2018(5):112-120.
- [6] FORGAS J P, GEORGE J M.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judgments and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1, 86(1): 3-34.
- [7] 李辉. 电信诈骗情境下受害人欺诈信息接受意愿及其分享行为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1, 65(7):90-102.
- [8] 牛凤燕.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0:215-218
- [9] Lee S M, Chen L Q. The impact of flow on online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2010, 50(4):1-10.
- [10] 黄思皓, 邓富民, 肖金岑. 网络直播平台观众的冲动购买决策研究:基于双路径影响视角[J]. 财经科学, 2021(5): 119-132.
- [11] KIM S, PARK H. Effects of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commerce(s-commerce) on consumers' trust and trust performa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3, 33(2): 318-332.
- [12] HA Y, LENNOM S J. Effects of site design on consumer emotions: Role of product involvement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10, 4(2): 80-96.
- [13] 全世文, 曾寅初, 黄波. 北京市居民对核电的认知与接受意愿:基于日本核泄漏事故背景下的调查[J]. 北京社会科学, 2012(5):55-60.
- [14] MEHRABIAN A, RUSSELL J A.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0.
- [15] 王松, 王金龙, 李芳. 价值共创视角下个性化推荐用户满意度的形成机理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0(23):68-71.
- [16] 赵尧. 同业竞争, 一个被忽视的强制披露的制度功能:以网络借贷市场的秩序生成为例[J]. 东方法学, 2019(4): 23-3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s Spokesperson on the Public's Willingness to Accept Information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LI Pingfen¹, LONG Anyan²

(1. Guangxi Voc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2. Guangxi Bama Fusion Revitalization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Abstract: Risk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govern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the news spokespers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effect of risk communicati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s spokesperson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receive informa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With the aid of Nvivo12 software,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news spokesperson characteristics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receive information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s spokesperson directly affect people's willingness to accept risk information. The internal state of people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provided with information, and the situational factors play a moderating role. Taking this into accou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 news spokesperson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commun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grounded theory; news spokesperson; the internal state of the public; public acceptance of risk perception information

医疗救护视野下的沂蒙精神探析

胡安徽,张业蕾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临沂 276000)

摘要:沂蒙精神在医疗救护领域主要体现在党和人民军队对人民群众的医疗救助和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医疗救护。党和人民军队千方百计帮助群众防控疫情和治病疗伤,强化了人民群众把党和军队视为人民命运最忠实的守护者和人民利益最坚实的捍卫者之观念,从而增进了人民群众与党和人民军队生死与共的情感,坚定了人民群众爱党爱军的政治信仰,赢得了人民大众想方设法、舍生忘死救护子弟兵伤病员的坚实行动,铸就了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核心和特质的沂蒙精神。

关键词:沂蒙精神;医疗救护;“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2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66-06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山东临沂考察时说:“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1]学界对沂蒙精神的研究相当丰富,但没有专门探讨沂蒙精神在医疗救护领域的成果。基于此,本文从医疗救护的角度探讨沂蒙精神,既有助于从新的视角认识沂蒙精神,又有利于进一步弘扬光大沂蒙精神。

一、沂蒙精神的内涵

1989年11月,新华社记者李锦提出了九间棚精神,即“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无私奉献”^[2],这是沂蒙精神的雏形。1989年12月,临沂地委宣传部长李祥栋将沂蒙精神定义为“团结奋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3]。1990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将李锦提出的九间棚精神改称沂蒙精神,并将其概括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4]。1997年,临沂市委将沂蒙精神总结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

奉献”^[2]。其中,爱党爱军是政治立场,开拓奋进是思想意识,艰苦创业是精神风貌,无私奉献是价值取向。这一观点在学界也得到了响应。^{[5][30][6]}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沂蒙精神形成主要来源于沂蒙人民逐渐形成的坚信党的领导、热爱人民军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政治信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顾全大局、勇于奉献、自我牺牲的价值观念。^[7]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8]围绕总书记重要讲话,临沂市委将沂蒙精神概括为“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9]学界对此也有研究,韩延明指出,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是党政军民生死与共、党群干群水乳交融。^[10]张学强将沂蒙精神概述为:“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11]李高东认为,沂蒙精神的内涵是:“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忠诚看齐、革命到底,紧跟共产党、热爱子弟兵、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2]2021年1月,沂蒙精神研究会的学者将沂蒙精神概括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开拓担当、无私奉献”。2022年5月,有关部门将沂蒙精神基本内涵表述为“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13],有学者将沂蒙精神

收稿日期:2022-11-12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医疗卫生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1&ZD036)

作者简介:胡安徽(1971—),男,河南唐河人,博士,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表述为“为民靠民、爱党爱军、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开拓担当、无私奉献”。^[2]这个表述角度多样、层次递进、寓意丰富、指向明晰,也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笔者看来,“为民靠民”回答的是“为了谁、依靠谁”,是我们党的价值取向;“爱党爱军”回答的是“相信谁、支持谁”,是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党和人民军队的“为民靠民”才有了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军”。“为民靠民”“爱党爱军”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和实践起点,后者是前者的应然和必然结果。由于党和人民军队的“为民靠民”和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军”,才产生了党、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生动体现了我们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鱼水深情,是沂蒙精神的核心和特质。正是由于党和人民军队的“为民靠民”和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军”,才形成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干群和军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才激发了党、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开拓担当、无私奉献”。

总而言之,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反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它虽产生和发展于沂蒙老区,但它并不仅仅属于沂蒙人民、山东人民,也属于全体中华儿女。

二、党和人民军队对群众百姓的医疗救助

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核心和特质的沂蒙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多种体现,其中在医疗救护领域尤其引人瞩目。沂蒙根据地地处穷乡僻壤,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医疗条件极为落后,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各种疾病和传染病不断发生、蔓延,时刻威胁着根据地百姓的生命健康。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达沂蒙后,逐步兴办了以部队医疗机构为主体的8所医院,人民政府也创办了若干所地方医院和药房,积极为当地群众治病疗伤并开展疫情防控。每有疾病和疫情发生,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派出医疗队、防疫队赶赴疫区防控和救治,全心全意维护人民健康,尽心尽力挽救群众生命。因此,“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在医疗救护领域首先表现为党和人民军队对群众百姓的医疗救助。这种救助主要分为防控疫情和救治病人。

沂蒙根据地的防疫工作主要由山东纵队、山东省军区卫生部主导,人民政府积极参与。临沂地区传染病较多,每当传染病流行之时,部队和地方医院

即调集医务工作者深入疫区为乡亲们防疫治病,还为他们预防接种和防疫注射,还发动百姓灭蚊蝇、灭虱子,积极预防传染病。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部队和政府还拨出专项经费,通过各种途径购买疫苗、药品,尽最大努力做好防疫工作。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山区,随军医务人员在部分村庄发现有不少丝虫病鞘膜积液、阴囊象皮肿患者,当即为他们治疗。1941年和1942年,针对鲁南疟疾高发,部队医务工作者在千方百计治疗的同时,发动军民开展卫生大扫除,消灭病源。同一时期,临沂莒南县大店一带天花流行,人民政府便把种痘作为预防天花的主要措施,拨出190多万北海币到敌占区购买疫苗,为儿童种痘达19万人之多^{[14]463}。1943年春,鲁中地区回归热大流行,军区卫生部长谷广善亲率医疗队赶赴疫区抢救,很快控制了疫情。据胶东军区卫生处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该军区医务人员治疗地方回归热患者16540人^[15]。1944年6月,临沭县蛟龙区一些村庄出现伤寒病,县委当即指示临沭县平民药房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和治疗,使患者全部痊愈;同时还对未患病的二三百人注射了疫苗;八九月间,蛟龙区一些村庄又发生霍乱,药房又组织医疗队抢救了500余名患者,并对5300多人注射了疫苗,有效地阻止了霍乱的蔓延^{[14]461}。1945年3月,沂南县岸堤一带脑膜炎流行,鲁中联办和鲁中军区派出医疗队携带药品“消灭灭定”前往救治,同时进行广泛的卫生教育,至月底已治愈140人。1946年7月,临沂市朱陈镇发生霍乱,当地人民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封锁疫区,组织医生分区抢救;鲁中军区医疗队、滨海医院亦派医护人员到朱陈抢救病员^{[14]186}。莒南、临沭、郯城等地发生流脑,人民政府立即组织医疗队赴疫区救治3000多人,治愈率达90%^{[14]463}。

人民政府和部队医务工作者迅速有效的医疗救助,使包括沂蒙根据地在内的山东多地发生的传染病很快得到了控制,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政府和部队的医疗救护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党和人民军队是他们的坚实靠山,是他们利益的忠实维护者,这就增进了群众与党和人民军队生死与共的情感,更加坚定了人民群众爱党爱军的立场和信念。

救治病人是党和人民军队心系群众、增进与人民心连心的另一重要举措。1948年4月,鲁南地委专门组织医疗队到重灾区防病治病,将患水肿病严重的人集中到区乡驻地,统一护理^[16]。为更好地服务群众,八路军设在沂蒙根据地的医院,以及人民政

府开办的医院,积极为当地百姓治病疗伤。政府兴办的临沭县平民药房采取的诸多措施深得民心:对一般民众的收费要比私人药房低廉,对无钱的贫苦农民则实行先看病吃药,以后有钱再还,实在无钱则减免。此举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前来求医看病的络绎不绝,日门诊量达百人左右^{[14]461}。临沭县滨南医院门诊部每天接待300余名百姓就诊,而且对多半病人免费治疗^{[4]460}。

在救治群众的医务工作者中,奥地利籍中共特别党员、八路军军医罗生特尤为突出,他对群众治病的请求有求必应、随叫随到,甚至不叫也到。略举数例:罗生特在参加一个庆祝大会时被村干部找去为一名产妇看病,他二话不说赶去病人家,使产妇脱离了危险,产妇家人称其救命菩萨;莒南县王家坊王金方之妻有病,卧床不起,邻居们以为她不行了,忙着安排后事,罗生特用三个月治疗终使患者痊愈,无论酷暑寒冬,只要有病人,罗生特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先给病人治疗,病人再多再乱他没嫌过,患者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17]。他对病人的真挚热忱,既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由衷爱戴,也树立了党和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光辉形象。罗生特精心为患者服务和高超的医术日益被根据地人民所熟知,所到之处,老百姓扶老携幼找他看病。为了让远道而来的病人早点看完病往回赶路,罗生特便提早起床、提早吃饭、提早看病,对路远者先看,直到将全部病人看完才吃午饭,有时午后两三点才能吃饭^{[18]75-76}。作为党员军医,罗生特为百姓治病疗伤,把党和军队的温暖送给父老乡亲,彰显了党和人民军队对人民群众疾苦的关注,故而深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当地百姓称赞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俺们闹翻身,还有外国八路给俺治病;共产党,八路军的恩情俺一辈子也忘不了^{[18]79}。群众的肺腑之言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另一种话语方式的真切表达。

医疗救助不仅增进了党和人民军队与群众的深厚感情,而且还是做好统战工作的有效方式。1939年1月,一一五师教导大队进驻沂费县崮口一带,本地一个无极道的民间组织,对部队冷眼旁观。由于当地百姓很多都是无极道成员,故而如何争取该组织的支持成为教导队面对的重要问题。教导队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和影响该组织,医疗救助就是其中的行动之一。有一次,村里一位老大娘得了重病,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滴水未进,部队卫生员闻讯后,主动搬到大娘家,住在床前,耐心伺候,打针喂药,直到把老大娘的病治好。老大娘说:“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闺女,比我亲生的还

亲!”此事虽小,在群众中的影响却很大,老百姓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我亲生的还亲”“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19],通俗的语言表达的是军民之间不断加深的情感和信任。教导队正是通过包括医疗救助在内的多种为民爱民行动,让无极道会众改变了对八路军的认识,增进了与八路军的感情,与部队形成了友好的统战局面,由原来的冷眼旁观转变为积极主动为部队供应粮食和枪支弹药,有力地支援了部队抗战。

总而言之,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群众防控疫情、治病疗伤,体现了我们党一心为民、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事业的执政理念,赢得了百姓对党和人民军队的衷心拥护与大力支持,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人民群众一心向党跟党走的良好局面,铸就了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核心和特质的沂蒙精神。

三、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医疗救护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资源不充裕、救护体系不完善,再加上战斗的激烈和战争的残酷,往往使人民军队的医疗救护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吃水不忘挖井人,“军爱民”赢来了“民拥军”。党和人民军队对百姓的医疗救助得到了人民群众舍生忘死对子弟兵的医疗救护,这既很大程度弥补了军队自身医疗救护的不足,又有力地保护了军队的战斗力。沂蒙根据地父老乡亲演绎的成百上千个感人的医疗救护故事,为我们多角度、深层次理解“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

1941年冬,临沂马牧池乡横河村聋哑妇女明德英救下了一位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员。当发现伤员急需喝水时,明德英毫不犹豫地挤出奶水挤进了战士的嘴里,又用盐水为他清洗伤口。1942年,明德英夫妇再次营救了一名叫庄新民的八路军伤员。由于长时间的疲累、饥寒和伤痛的折磨,庄新民奄奄一息,如果不及时补充营养和救治,很可能有生命危险。这时,明德英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挤出乳汁,一勺一勺喂到他嘴里。^[20]获救后的庄新民一直把明德英夫妇作为“沂蒙老爹老娘”,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以此报答明德英夫妇的救命之恩。^[21]这种报恩正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真实再现。事实上,在战争年代的沂蒙山区,用乳汁救伤员的并非明德英一人。据当年曾在沂蒙山区战斗过的李子超回忆,在那个十分困难的年代,哺乳期沂蒙妇女用乳汁抢救伤员,使许多重

伤病员挽回了生命，恢复了健康，重返了战场^{[5]183}。迟浩田上将当年在沂蒙根据地因负伤被一位老乡救护，一位年轻媳妇把乳汁挤进碗里再喂到他嘴里。^[22]乳汁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乳化钙、泌型免疫球蛋白等多种营养成分，古人早就将其作为上品药，南北朝医学著作《名医别录》记载，人乳汁“主补五脏，令人肥白悦泽”^[23]。《本草纲目》：“服人乳，大能益心气，补脑髓，止消渴，治风火证。”^[24]《本草蒙筌》认为，乳汁比地黄和当归的补血更好，“如灯添油，立见光亮”^[25]。由此可见乳汁特殊的医疗价值。乳汁不仅具有医疗价值，更是伟大母爱的象征。明德英等“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治伤员在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体现了沂蒙人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深厚情感和无限热爱。

1941年11月，被誉为“沂蒙母亲”的王换于用三天三夜抢救一名重伤员，终于使其脱离危险。为早日治好伤员烫伤，王换于找猎户打了一只獾，又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烧成灰制成獾油给伤员搽敷；听说“老鼠油”是治烧伤的特效药，她就千方百计去找。在尝试土方的同时，王换于还到山上采草药医治伤员。在王换于全家40多天的精心护理下，伤员终于恢复了健康，重返了前线。^{[5]186}老鼠油具有保湿和止痛效果，但制作和使用比较麻烦：要用刚出生未睁眼、未长毛的老鼠数个，香油适量，将老鼠放入香油瓶内浸泡，埋入地下3年，才能制成，而且要每天至少两次将老鼠油涂抹于烫伤或烧伤部位^[26]。在那个日军横行的艰难岁月，治疗八路军伤员时刻就有被杀头的可能，然而，为了治好伤员烫伤，王换于和家人不怕烦琐、不畏危险，千辛万苦，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这需要党和人民子弟兵极其深厚的感情才能做到。王换于和家人千辛万苦救治伤员的事迹蕴含的是人民群众爱党爱军的真挚情怀。

“红嫂”祖秀莲救护伤员的故事更是感人肺腑。1941年冬，八路军战士郭伍士身受重伤：牙被打碎好几颗，肚子被刺穿，肠子露在外面。如此严重的伤情即便在医疗技术发达、条件先进的当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和风险，对没有任何医疗技术和条件的祖秀莲一家而言，救护的难度可想而知。为躲开日军搜捕，祖秀莲的三个侄子把伤员抬出去隐蔽，等搜捕过后再抬回来。没有药物，祖家只好用热水泡上仅有的一点盐巴给伤员清洗伤口，然后包扎。为增加伤员营养，提高抗病能力，祖秀莲把自家鸡杀了熬汤。由于缺医少药，郭伍士的伤口还是感染化脓，发着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伤口里还长了蛆，他又一次到了死亡的边缘。经过20多天的精心护理，

郭伍士的伤情一天比一天好转。当祖秀莲听说八路军后方医院到了山后中峪村一带，便翻山越岭连夜把郭伍士送到八路军后方医院。

1939年夏天，临沂大崮山下大石屋村群众王在瑞家收治了一位被日军子弹从左腰贯穿而负伤的八路军排长胡承业。由于日寇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山区缺医少药，胡承业的伤口严重恶化，腰部肿得很粗，伤口溃烂，直流血水，化了脓，生了蛆，散发着难闻的恶臭味。王在瑞一家不嫌脏臭，及时为伤员换洗衣裳、擦洗伤口，尽量避免感染。为了医治胡承业的伤口，王在瑞跑十几里山路去抓草药。听说南瓜瓢能消炎，他就找来南瓜制成药，由于胡承业的衣服被血污粘住，揭不下来，王在瑞就用热毛巾一次次敷伤口，花了一顿饭的工夫才把衣服揭下来，敷上南瓜瓢。在王家半年多的精心护理下，胡承业伤愈归队^{[5]187}。为了救护一个伤员，王在瑞全家总动员，“多管齐下”去救护：既买药治病又增补营养，既要维护生命安全又要照顾生活起居，既有男主人王在瑞的不辞辛劳又有女主人王大嫂的艰难付出，既有白天的躲藏又有夜晚的照料，这样的艰辛和困苦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半年多的时间。王在瑞一家如果没有对党和人民军队的赤诚热爱和衷心拥护，要花费这么长时间、付出这么多辛劳，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正反映了沂蒙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1941年秋，孟良崮柴庄的彭大娘和韩大娘家收治了一名患了伤寒的八路军干部刘继先。由于环境险恶、缺医少药，病人病情日渐严重，有时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刘继先知道这是伤寒病传染最厉害的时刻，就着急地让两位老人离开，两位老人却说：“傻孩子，你是谁？我们又是谁？你不是常说，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吗？”当刘继先给大娘解释说伤寒病会传染时，两位大娘说：“危险？俺才不怕哪，只要能够把你救出来，大娘就是搭上老命也心甘情愿。”此后，两位老人又到处打听验方，亲自上山挖药。在她们精心护理下，病人病情逐渐好转。^[28]伤寒作为烈性传染病，人们谈之色变、避之不及，然而两位大娘却丝毫不担心自己被传染，而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救护，哪怕是搭上性命也要把八路军伤员的病治好。人民群众为救护子弟兵连失去自己的生命都不怕，这是何等的厚爱和深情。

沂蒙人民对子弟兵的医疗救护有着说不完的感人故事。迟浩田将军曾用文字抒发对沂蒙人民的深情：“八百里沂蒙八百里情，每一回寻觅总是心潮难平……山崖旁，温暖的大手把我扶上担架；农舍里，慈爱的目光伴我迎来一个个黎明；好乡亲，一勺一勺

喂我汤水,好乡亲哪,一遍一遍把我伤口洗净;独轮车载我走过山水几道,沂蒙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5]¹⁸⁴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将军对沂蒙人民的无限感激之情。迟浩田曾多次回沂蒙山寻找当年用乳汁和小米粥把他救活的两位大嫂。一位满头银发的大娘对将军讲:“大兄弟哟,像俺们这般年纪的人,谁都做过这样的事。那是应该的呀!你还寻个啥呢!”^[29]质朴的语言反映的是骨肉深情。1940年,南墙峪战斗过后,村游击小组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位同志被子弹从后腰打进去从肚子上穿出来。为了消毒止血,村民张恒乐的母亲满山遍野寻来败毒草、艾蒿熏伤口,又用干牛粪烧成灰敷在伤口上。伤员在张恒乐家住了半个多月,直到把伤养好。^[30]

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老区,不知道有多少子弟兵的伤病员,躺在沂蒙父老的热炕上治病养伤;不知道有多少像明德英、王换于、祖秀莲、彭大娘、韩大娘和王在瑞及其家人的沂蒙乡亲,视军人如亲人,克服千难万险,想尽千方百计,为伤病员抓药治病、护理疗伤。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无数负伤养病的革命战士在沂蒙人民的掩护下,一次次躲过各种危难和险局转危为安。蒙阴县坦埠镇海龙万村40多户人家1940至1945年间毫无怨言地收治八路军鲁中十一团战地医院的伤病员,无偿为伤病员提供食宿和掩护;5年间村民们和医院一起收治了1万多名伤病员,被称为没有病房的后方医院。^[14]³⁷⁶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沂蒙根据地有42466名妇女参加救护八路军伤病员,所救护者有19776人。^[14]⁴⁶³而从抗战全面爆发到解放战争胜利,沂蒙人民救护伤员达5.9万人^[31]。这5.9万人背后都是一个催人泪下、感天动地的医疗救护故事,它们既真实地展示了沂蒙人民追随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舍其所有、倾其所能,无私地为革命胜利贡献力量的精神,又生动地诠释了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深刻内涵。

四、结语

沂蒙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的代表和缩影,它留下了无数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水乳交融谱写而成的感人事迹,沂蒙精神正是这些事迹的提炼和浓缩。沂蒙根据地留存的医疗救护材料,为我们更好地阐释和理解沂蒙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党政军对人民群众的医疗救助和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医疗救护交相辉映,正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之真实写照。沂蒙精神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是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根本前提,是我们党和军队获得不竭动力的源泉所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2]刘少奇曾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33]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通过包括医疗救助在内的各种为民服务活动,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命运生死与共、利益的休戚相关,他们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看到了希望,从共产党的言行中找到了答案,把共产党当成大救星、主心骨和掌舵人,从而形成了坚定的爱党爱军的政治信仰,并将这种发自内心的爱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拥军支前、参军参战、医疗救护,义无反顾地支持党和人民军队。多年战斗在山东根据地的罗荣桓元帅曾说,沂蒙山是我们党和军队开展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沂蒙人民是我们的靠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沂蒙山区的人民。^[31]人民视军队如靠山、军队视人民如靠山,彰显的正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心向共产党,红心映朝阳,映朝阳,炉中火,放红光,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重返前方。”^[34]这是用音乐的语言表现“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救护的事实充分证明,“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不仅精准地概括了沂蒙精神的本质特征,而且有力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内涵。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 人民日报,2013-11-29(01).
- [2]周忠高,陈伟. 沂蒙精神的科学内涵与传承发扬研究[J]. 理论学刊,2021(6):23.
- [3]杨安霞. 战争年代《大众日报》对沂蒙精神的建构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20.
- [4]梁自洁,李祥栋,张联瑜. 论沂蒙精神[J]. 山东社会科学,1991(增刊):21.
- [5]丁风云,黄宏. 沂蒙精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6]徐东升,汲广运. 沂蒙精神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126.
- [7]丁风云. 沂蒙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M].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2.
- [8]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 社,2021:43.
- [9]赵秋丽,李志臣,李春仲.“沂蒙精神”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N].光明日报,2017-11-07(05).
- [10]韩延明.百年红色精神谱系之六:沂蒙精神[J].党史博采(上),2021(6):7.
- [11]张学强.沂蒙精神内涵新探[J].临沂大学学报,2018(2):1.
- [12]李高东.沂蒙精神内涵新解读[J].临沂大学学报,2019(2):1.
- [13]白玉刚.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J].学习时报,2022(1).
- [14]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沂蒙革命根据地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5]《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编辑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5:209.
- [16]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根据地历史资料汇编(第18卷)[M].内部资料,2016:259.
- [17]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莒南县委员会.罗生特在中国[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132-134.
- [18]黄瑶,张惠新.一个大写的人:罗生特在中国[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75-79.
- [19]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根据地历史资料汇编(第3卷)[M].内部资料,2016:152.
- [20]李洪彦,李克彬.沂蒙革命故事选编[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160.
- [21]唐士文,中共临沂市委.沂蒙红嫂颂[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4.
- [22]靖一民.沂蒙女性与红色文化[N].大众日报,2011-05-17(A09).
- [23]陶弘景撰,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辑校本[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60.
- [24]李时珍.本草纲目(人部)卷52[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2335.
- [25]陈嘉谟.明代本草名著校注 本草蒙筌[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8:403.
- [26]周振忠.老鼠油治烫伤30例[J].陕西中医杂志,1994(3):127.
- [27]王德厚.沂蒙红嫂祖秀莲[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6:41-45.
- [28]临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忆沂蒙(上)[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555-556.
- [29]李朝亮.永远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N].解放军报,2017-08-16(02).
- [30]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根据地历史资料汇编(第4卷)[M].内部资料,2016:176.
- [31]林学启.从沂蒙精神看百年大党的成功密码[N].光明日报,2021-03-17(08).
- [3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 [33]王凤青.刘少奇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N].光明日报,2022-03-02(11).
- [34]程凯,阎肃.愿亲人早日养好伤[J].人民音乐,1976(2):29.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n Analysis of Yimeng Spirit from the Medical Aid

HU Anhui, ZHANG Yelei

(School of Marxism,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Yimeng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car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s and the People's Army's medical car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s medical care for the army. The CPC and the People's army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help the people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epidemic and treat the disease, which has strengthened the concept that the people regard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s Army as the most loyal guardians of the people's destiny and the most solid defenders of the people's interests, thereby enhancing the people's feelings of sharing life and death with the CPC and the People's Army, and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belief of the people's respect for the Party and the Army, then winning the solid action of the people's masses to try every means to save the sick and wounded warriors. Finally Yimeng spirit is forged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integrating water and milk, sharing life and death".

Key words: Yimeng spirit; medical aid; "integrating water and milk, sharing life and death"

新中国初期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历史作用

崔 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01)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卫生工作,逐步建立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医疗预防保健网,并推行赤脚医生及合作医疗制度,被誉为“三大法宝”,取得斐然的健康成效。“三大法宝”形成经历了自费医疗、合作医疗及赤脚医生三个阶段,在改善人民健康福祉、优化城乡卫生资源配置及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为改革开放时期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3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72-06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1]旧中国积贫积弱,广大人民面黄肌瘦、体质虚弱,各族人民长期承受着疾病和贫穷的苦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作为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依靠农民智慧创造出被誉为“三大法宝”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及合作医疗制度。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取得显著的健康成就,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2]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成功经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3]⁹⁴目前,尽管对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研究已汗牛充栋^①,但对包括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在内的整体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研究成果甚少,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本文依据发展特征和内在逻辑将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客观总结其历史作用及影响,以期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

一、自费医疗阶段:1949—1955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疫情严重,城乡居民身

体健康受到严峻威胁。霍乱是民国前期发病次数最高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据不完全统计,1912—1936年的24年间,仅4年没有流行记录;结核病流行严重,位居各类疾病死因之首,死亡率在十万分之二百左右,高出西方国家两倍;疟疾患者高达几千万人,血吸虫病和钩虫病患者有数百万人,黑热病和麻风病患者在数十万人以上,鼠疫在高发地区如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始终没有肃清过;我国人口的死亡率是30‰左右,婴儿死亡率是200‰左右,有些地方甚至高达500‰左右,孕产妇死亡率是15‰左右,平均寿命是35岁,和世界各国比较,几乎是最短的。^[4]此外,全国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均,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仅拥有少量的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药品供应非常不足,绝大多数化学药品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据1950年统计,辽宁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20个,床位8955张,其中医院病床7246张,每千人口医院病床0.39张。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全省区共有西医师3242个,其中,城市2197人,占67.8%,农村1045人,占32.2%。江苏省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147

收稿日期:2022-10-25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医疗卫生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1&ZD036)

作者简介:崔钧(1987—),男,河南南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在读博士,从事中国当代医疗社会史研究。

所,其中城市 110 所,农村 37 所;公立卫生事业单位技术人员 3649 人,其中城市 2920 人,农村 729 人。广东省有公立医院 112 个,病床 5854 张,医师 399 人,护士 669 人,助产士 183 人。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医院及医务人员分布在城市地区。^{[5]65-67}

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健康事业,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6]于 1950 年、1952 年和 1953 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分析卫生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逐步确立卫生工作指导方针。^[7]其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工农兵”,因而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及机构成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为此 1950 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县设卫生院、区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组织形式。^[8]1951 年,卫生部颁布《农村卫生基层组织工作具体实施办法(草案)》,将保障人民大众基本健康作为目标,系统体现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以及依靠群众广泛参与的政策理念。卫生部之后颁布《关于加强基层卫生组织领导的指示》和《关于加强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文件,均明确提出基层卫生工作的任务及要求。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层医疗卫生组织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全国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已普遍整顿或新建了县卫生院,共计 2123 所,床位扩大到 3.7 万张,县以下的区卫生所也增加到 7961 个。^[9]由此,逐步形成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中心,农村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合组而成的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农村卫生所是最基层的卫生机构,是为农民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第一线。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诊所绝大部分由个体医生开办,国家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开展业务培训与考核,允许并鼓励他们保持传统的行医习惯。1952 年,卫生部发布《关于县以下卫生基层组织的组织系统、编制及任务的规定》,农村原有的个体中西医诊所被组建为联合诊所,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为集体所有制性质。这种组织形式相较于个体企业,有利于积累资金,保证国家卫生法令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培养人才。^[10]由于有这些优越性,联合诊所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基层卫生组织的主要形式。此时,农村居民看病就医基本上还要依赖自费,相较于旧中国并没有质的改变。然而,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农村医疗方面需要合作的理念开始萌芽。

1955 年 5 月 1 日,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在联合

诊所的基础上成立联合保健站,这是全国第一个农村医疗保健站,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每个农民每年交 5 角钱的费用,在看病就医时免收一定的费用,并以记工分及发现金的方式解决当地乡村医生的待遇问题。^[11]随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推动下,这种保健站的经验在其他地方得以推广。简而言之,这种做法就是合作社将部分公益金作为医疗补助,加之社员缴纳“保健费”,进而对在本社保健站看病就医的社员给予一定程度的价格优惠,目的在于提升农村病患群体的购买力,加强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这种组织方式,正是若干年后在全国范围推广和普及的合作医疗制度的雏形。

二、自费与合作医疗并存阶段:1956—1965 年

1956 年,我国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户数已达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12]实现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伟大飞跃。农业合作化大大推动了合作医疗的进程,农民自发地把种地耕作的互助合作扩展至医疗融资方面。这是一种具有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即从集体公益金中提留一部分作为医疗基金,建立保健站,农民只需缴纳少量的费用即可获得诊疗,呈现势如破竹的发展态势,全国农村办保健站 2 万多个。^{[3]54}由此可见,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广大农民智慧的结晶,其建立和推广并不是历史的偶然,既有农民集体生产的经济因素,也有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制度因素。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全国农村掀起创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大量农业合作社被合并整合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而合作医疗成了人民公社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全国范围得以快速推行。1959 年 11 月,卫生部在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并于 12 月向中共中央提交会议报告,肯定了合作医疗的保健制度,并提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实行这种制度。^[13]这是“合作医疗”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自此,合作医疗制度的存在被官方授予了合法性。全国农业生产大队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60 年达到 32%,^[14]1962 年增至 50%。^[15]

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过火过激做法,也给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蒙上阴影。在“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带动下,大锅饭现象盛行,农民看病不花钱,很多地方的保健站因经费不足而陷入困境。1961 年后,随着中央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调整,农村卫生工作也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转向。

到1964年,农村地区只有不足三成的社队实行合作医疗。^[16]这一时期,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也经历了大规模调整。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改变得过急过快,在薪酬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一定程度上挫伤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适当地把卫生所、保健站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征调给公社卫生院,导致医疗资源布局过于集中、农民群众就医不便等问题;卫生机构办得过多,床位增长过快,脱离了当时的财力和卫生资源的实际。对此,卫生部专门制定调整农村卫生组织的方案,对公社卫生机构开始进行调整,也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基层组织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问题,实现小型、分散,合理布局,改变由国家 and 公社包得过多的做法。^{[5]813}根据要求,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以医生集体举办为主要形式,少数确有条件的公社、生产大队也可举办,县以下国家举办的区卫生所、医院等转为集体办,并允许医生个人开业。

三、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全面推行阶段:1966—1978年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以工业化主体任务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使得卫生工作的重点随之转移到城市,加之卫生部门主观经验的欠缺,导致城乡卫生资源分布日益失衡,严重制约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7]。这个指示成为当代农村卫生史的重要转折点,大量来自城市医院的巡回医疗队被派往农村,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快速得到普及,覆盖全国超过八成的生产队。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关怀与指导下,卫生部9月上报《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党中央以中发[65]580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大城市医院迅速发动人员组建巡回医疗队,1965年末全国已有15万城市医务人员下乡为农民服务。^[18]农村巡回医疗队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农村医务人员开展诊疗,以及救治身患疑难杂症的农民居民。此外,在巡回医疗中,医疗队还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常识、破除封建迷信、改善水井设施、加强粪便管理等工作。在这场运动持续的近十年间,全国城市医务人员先后有超过一百万人次深入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并有超过十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19]420}党中央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

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文汇报》关于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自此,赤脚医生开始成为对于农村医生的正式称呼,并快速出现在全国各地。赤脚医生们大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贫下中农子女,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经过短暂的医疗培训后来到广阔农村。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平日里参加农业生产,农闲时背起药箱,活跃在田间地头,为村民提供最基本的诊疗保健服务,可谓“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七十年代末期,赤脚医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全国人数达500多万,其中赤脚医生180万,卫生员350万,还有接生员70多万,^[20]超过卫生系统原有卫生技术人员(220万)一倍多。

赤脚医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实施合作医疗制度,^[21]而这一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同样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普及。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报道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农民创办合作医疗的经验。^[22]正是在这种讨论的推动和感染下,这时期全国广大农村范围内掀起兴办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队的比重超过90%,覆盖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23]115}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在当地的合作医疗站看病,只需要负担少量诊疗费,可谓一人生病大家帮忙,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此外,国家有计划地对药品价格实行管控,并低价供应给农村,使农村药品价格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赤脚医生中西医结合,自种、自采中草药,也降低公社、生产队的医药费支出。

至此,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预防保健网得以全面建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并为大多数农民提供了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从而为改善我国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状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成效及其历史作用

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并举的卫生制度,史无前例地将公共卫生及医疗体系延伸至全国农村的任何角落,农民大众的身体状况得到空前改善。同时,爱国卫生运动走向常态化,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随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合法席位,我国农村卫生体系建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第三世

界国家解决初级卫生保健问题提供成功的样板案例。今天看来,虽然这些举措并非完美无瑕,存在一定的设计缺陷,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各地也出现过强制命令、一刀切等不合理做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并为八亿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疾病诊疗和预防保健服务。

(一)人民健康状况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健康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农村居民更低,比同期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落后数十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35岁逐步提高到1957年57岁、1981年67.88岁,^[24]远远高于1980—1985年世界平均59.5岁的水平,^[25]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当时我国经济水平的排名。^[26]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23]115—116}此外,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疫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鼠疫频发的地区也先后停止发生。天花在全国除少数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已近绝迹。伴随着取缔娼妓运动的开展,梅毒、淋病等性病也得到了控制。^[27]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如斑疹伤寒、回归热、血吸虫、黑热病、钩虫病等,也都有显著的下降。可以说,几千年来困扰平民百姓的看病就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得到前所未有的增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二)医疗资源配置“重城市轻农村”的情形得到根本扭转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关切农民健康状况,将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作为全国卫生工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村医疗机构与队伍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县、乡(公社)、村(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绝大多数都已建立,一些地方开始实施合作医疗制度。1965年毛泽东发出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全国各地迅速把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放到农村,医疗资源城乡分布失衡的局面得到有效改观。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几十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

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19]420}赤脚医生总人数由1970年121余万人上升到1975年155余万人,^{[3]81}平均每个大队超过2人。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病床也有明显增幅。这时期,农村医务人员和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基本上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看病就医的日常需求。

(三)走出一条大国穷国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独特道路

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起医疗卫生机构,其中公社卫生院主要依赖社队财务的支持,大队卫生室则几乎完全依靠集体经济的扶持,其中房屋和器械由大队投资,人员经费和运行经费由生产队拨付。亦农亦医的赤脚医生按大队干部的标准获得工分及报酬,农民看病就医的费用从生产队的公益金中支取,医药费一般按成本收取现金。可以说,这是一种与我国中低收入国家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卫生投入,但却实现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健康水平。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高效益、低成本、广覆盖。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先例”^[28]。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会议以“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为主题,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经验被写入《阿拉木图宣言》,中国当时的卫生保健体制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29]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2011》,1960年之后中国的寿命延长明显快于其他国家。^[30]我国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独特经验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梅尔达马科斯,受中国农村卫生制度的启发,在礼萨尔省塔乃山区也办起了合作医疗,还培训了10多名赤脚医生,并邀请中国的赤脚医生到当地传授经验与做法。墨西哥、印度政府也尝试引入赤脚医生制度,培养乡村医生。

(四)为改革开放时期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明确以人民为主体、以健康为根本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强调人民在物质生产和精神自由等方面的获得感,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独立的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把攸关人民健康福祉的卫生防疫工作看作重大的政治任务,面对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把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和基层,建立专业卫生机构,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减少和防止各种疾疫的发生。

坚守公益性与公平性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创建了较为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消除了我国历史上存在的两极分化的痼疾。改变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工作思路,真正做到把重点放到农村,建立起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把诊疗及预防服务延伸至全国农村地区的任何角落。可以说,这是一条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卫生发展道路,广大农民无需支付高昂费用就可享受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进而迅速改善了健康状况。

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面积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开展预防为主 of 公共卫生服务模式,面向广大人群提供预防接种服务,短期内控制了全国范围内的传染病暴发与流行。如在应对天花这一传染力强大、病死率很高的传染病时,政务院发布种痘指示,各地训练大量不脱产的种痘员,首先在全国各地推行普遍种痘一次,以后再按年龄实行定期种痘,这样绝大多数的人对天花具有了免疫力与抵抗力,天花也就被消灭了。长期实践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面积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预防为主 of 公共卫生服务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最有效、最经济的工作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医疗卫生资源贫乏,面对的主要卫生问题是预防控制急性传染病及地方病。在这种背景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短期内初步构建起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村卫生保健网,使得全国疾病防治工作在短短几年内就呈现出向好的态势。60年代中后期,大量城市的医疗资源下沉至农村,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覆盖超过八成的生产队,为8亿农民提供基本的疾病诊疗和预防保健服务,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1970年代末,历史上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地方病及寄生虫病被控制或基本控制,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指标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等不仅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较大幅度改善,而且还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印度、印尼等国家。可以说,这些健康成就是旧中国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卫生模式与当时的农村集体经济相适应,充分体现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基本上改变了农村无医无药或者缺医少药的状况,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并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使我国成为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为日后开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此外,这一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开展也为改革开放时期推进和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注释:

- ①相关研究成果如:夏杏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5);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姚力.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论述[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2);曹普.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J].中共党史资料,2006(3);刘影.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缘由及其启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王胜.1949—1978年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历史考察:以冀中深泽县为中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等等。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1981-07-01(1).
- [3]钱信忠.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
- [4]张学文.新中国的卫生事业[M].北京:三联书店,1953:3-4.
- [5]王书城.中国卫生事业发展[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6.
- [6]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J].党的文献,2003(5):15.
-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72.
- [8]陈海峰.中国卫生保健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96.
- [9]黄永昌.中国卫生国情[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4:190.
- [10]《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6.
- [11]曹普.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J].中共党史资料,2006(3):134-144.
-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212.
- [13]张怡民.中国卫生五十年历程[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99:999.
- [14]周寿祺.探寻农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发展轨迹[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2(6):19-20.
- [15]姚力.当代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史论[M].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21:71.

- [16] 曹普. 1949—1989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与评析[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6(5):41-45.
- [17]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87.
- [18] 张自宽.“六二六指示”相关历史情况的回顾与评价[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6(9):9-12.
- [19] 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 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M]. 内部刊物,2001.
- [20] 张开宁,温益群,梁革.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5.
- [21] 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60-63.
- [22] 夏杏珍.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5):110-118,128.
- [23] 王京清. 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70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24]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当代中国的人口[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47.

- [25] 刘隆健. 世界人口预期寿命和死亡率发展趋势[J]. 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1989(2):123-124.
- [26] 李玲,江宇. 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J]. 现代哲学,2015(5):39-43,106.
- [27] 李洪河. 往者可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1.
- [28] 李长明,汪早立,王敬媛. 建国60年我国农村卫生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09(10):1-5.
- [29] 王绍光,何焕荣,乐园. 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J]. 中国社会科学,2005(6):101-120.
- [3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es 2011”[EB/OL]. World Bank,27September,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e-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ormation Process and Historical Function of Rural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 System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CUI Jun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health services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rural medical servi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ross the country. Known as the “three magic weapons”, the network of medical prevention and health care covering county and rural areas, barefoot doctors and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system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health results. The formation of the “three magic weapon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elf-funded medical treatment, cooperative medical treatment and barefoot doctors. They play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s in improving people’s health and well-being,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ealth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provides useful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Key words: the network of medical prevention and health care covering county and rural areas; barefoot doctors;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system

抗战史视野下的《云南医刊》

陈妍晶

(云南省图书馆 历史文献部,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云南医刊》是服务于抗战的专业性医学刊物, 刊载的主要是有关“战事医疗”“传染病防治”“卫生教育和宣传”的文章, 对及时有效抢救受伤将士、预防战争毒气危害、提高民众认识和预防各类传染病的能力, 以及民众掌握基本的卫生方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健康水平、为抗战输送身体强健的合格兵员有重要价值。《云南医刊》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抗战贡献力量。

关键词:抗战史;《云南医刊》;战事医疗;传染病防治;卫生教育和宣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78-06

《云南医刊》是边陲云南于抗战时期所创办的一份专业性医学刊物, 涵盖丰富的医学信息, 与抗战密切相关, 对后世研究抗战史和医学史尤其是抗战医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学界虽对抗战时期云南创办的刊物已有不少研究, 但对《云南医刊》却鲜有关注, 从抗战史的视野对该刊物的探究更是凤毛麟角。^[1]基于此, 拙文即从抗战史的视角对《云南医刊》的价值和作用略做探讨, 以期增进对《云南医刊》的认识, 丰富抗战史、医学史和医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一、《云南医刊》简介

1937年, 国民政府在意识到抗日战争不能很快结束的情况下, 被迫接受准备长期抗战的事实, 对战时策略进行重新调整, 决定迁都重庆。伴随着滇越铁路的运输保障, 既而滇缅公路开通, 又有驼峰航线的拓展, 促使云南抗战保障地位大幅提升, 成了抗战大后方, 承担起战略物资运输的使命。同时, 省会昆明涌入许多省外的机关、学校、工厂、商行、银行、难民。随着人口激增, 当地防病、治病药物需求也随之增加, 医疗设施设备、城市卫生状况、传染病防治等面临沉重的压力。当地的医务工作者关注到政府、

社会、军队对医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1938年, 由多名昆明当地知名医师和“云南省医师公会”的数位成员共同创办了医学学术团体——云南医刊社。他们创办该团体的初衷是为适应抗战对医药卫生的急需, 从而团结一群学习新医学且致力于普及大众医药和救护知识的医务工作者, 进行军民战伤救护或日常疾患施治。为实现这一目的, 该社于1938年5月31日出版了双月刊《云南医刊》, 1940年8月30日第二卷第三期出版发行后停刊, 共计两卷九期, 刊载文章97篇。

《云南医刊》社长秦光弘, 国立同济大学医科毕业, 曾任云南大学医学专修科主任教授, 在昆明市护国路234号门诊执业, 主治妇科, 1939年初省立昆华医院建成后, 被民政厅委派为院长, 任职至1945年; 该刊主编许端庆, 国立同济大学医科毕业, 在福照街20号开设门诊, 曾任昆明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并兼任内科主任; 发行者沈种琴, 上海南洋医专毕业, 曾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医师公会”主要负责人, 在昆明市五华坊8号执业门诊, 主要从事传染病防治。从以上所述刊物负责人履历简介不难看出他们在学术领域的深厚造诣, 且一直工作于医务第一

收稿日期:2022-11-10

基金项目:2021年度贵州省哲社重点项目“抗战时期内迁贵州医学类高校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1GZZD01)

作者简介:陈妍晶(1974—), 女, 云南昆明人, 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古籍文献、近代出版物整理与研究。

线,其学术背景和社会服务参与度有力地确保了《云南医刊》的理论深度和社会影响力。

二、《云南医刊》所载主要内容

《云南医刊》刊载内容颇为丰富。从医学门类角度而言,主要涉及外科、内科、五官科、儿科、妇科、方药、医德、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从撰写目的而言,主要涉及战事医疗、传染病防治、卫生教育和宣传等。由于《云南医刊》创办目的与抗战关系密切,是为抗战提供医学服务,因此,本文从抗战史的角度即以撰写目的为主展开论述。

(一)战事医疗

战事医疗特指和战争相关的应对伤病的医务活动。该刊刊载战事医疗类文章 16 篇,大概占全部文章的 16%,其中具体介绍“战地急救”“军用毒气”“战伤处置”的文章有 12 篇,占“战事医疗”类文章总数的 75%,不难看出抗战时期日军军用毒气的广泛使用和危害,以及《云南医刊》对战地急救的高度重视。现略举数例:日军投放毒气严重威胁着军民生命安全。“军用毒气”这一系列文章的及时发布,积极普及军用毒气的相关专业知识,向民众介绍了日军可能投掷的毒气种类,如绿十字类军用毒气,包括氯气、光气、双光气、氯苦剂等;黄十字类毒气,包括芥子气、鲁易氏毒、的客、溴化罗斯特等;蓝十字类军用毒气,包括第一克拉克 Clark I、第二克拉克 Clark II 和亚丹氏氧等;以及中毒的症状和危害、毒气的侦察方法,如物理侦察法(包括声音、天候、性状)、生理侦察法(如用小动物与毒气地带接触、小动物的皮肤与毒气接触)、化学侦察法(包括试纸变色法、旗帜变色法和其他化学侦察法)。尤为重要的是,文章明确提出了预防及治疗毒气伤害的办法,具体到遭遇蓝十字类军用毒气危害,第一时间将受害者搬运入新鲜空气内;如若上呼吸道出现病症,可以用极为稀薄的氯气,或水面加入薄荷水作水蒸气吸入疗法。或用卤精 Ammoniak 5.0 以脱 Aether 15.0 酒精 Alkohol 40.0 哥罗仿 Chloroform 40.0 混合后,小心给受害者吸气用;如果毒物已经随饮食进入肠胃,可用吐剂、泻剂、骨炭沫等内服^[2]。这类专业且富有操作性的文章,有效提高了公众对毒气的认知,对军民有效防御毒气伤害具有切实可行的功效。“战地急救”是战场抢救伤员以及后方救治平民的迫切及首要任务,这一系列文章主要介绍了前方战士受伤的类型如烧伤、冻伤、触电伤、中暑、溺水、脑贫血、脑充血、休克、窒息、流血等,以及如何抢救受伤战士,如高举患肢、指压血管、加压屈曲等基础医

疗方法^[3]。

“战伤处置”是及时且具体处理受伤将士伤损的应急手段。这一系列文章主要是邓尊六翻译 Alexancler Stieda 的著作。邓尊六医师,云南江川人,广州中山医学院毕业,1937 年返昆,先在马市口开设诊所,后建疗养院,同时期也在云南军医学校、云南陆军医院从事教学及临床工作,曾当选云南省医师公会会长。其译作《武器与创伤》述及了容易造成创伤的武器,如单刀、刺刀及类似的光滑武器、枪托及其他钝武器、枪弹及机关枪弹等不爆炸的弹丸、开花弹和榴霰弹等爆炸弹,并从解剖学角度讲述了枪伤的三个带,即初创道带、直接外伤性坏死带、运动带及其受损状况。不仅如此,该文还介绍了造成相关创伤的形状、破坏程度,说明了近距离击中身体的弹丸伤口在法医学鉴定中如何分辨,以及炮弹创伤常由弹片带入异物而痊愈能力受阻^[4]。

邓尊六还翻译了 Alexancler Stieda 所著《战伤之初步处置》,文章指出,锐创最初只需用防腐或无菌的绷带处置,禁止不必要的触摸;每一种防腐剂均不能用于创伤治疗,因为防腐剂强烈的浓度对于健康组织的生命力有强烈的损害,同时容易破坏传染的好处;可以完全不使用防腐剂,单用物理方法处置就能痊愈,如碘、双氧水、碘酒加双氧水、银及锰之混合制剂等消毒即可^[5]。可见,此译文详尽介绍了初步处置锐创的急救操作方法。

还要提及的是,为进一步增进对炸伤的了解和治疗,《云南医刊》还刊登了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外科医师陈德智所撰写之《广州市被轰炸十五个月中处置炸伤的经验》,就“鉴别伤口的情况和断定创伤的种类”“枪伤和炸伤的病理变化”“不爆炸枪弹创伤的认识”“爆炸性枪弹创伤的认识”“诊断”“症状”“伤痛”“伤口的治疗”“手术的适应”“急救法”^[6]等问题做了专业阐述。文章总结了多种武器和弹药造成的创伤及其施救处置方法,继而总结了广州遭遇日军轰炸时具体施救的经验,这对昆明当地战伤处置具有极其宝贵的指导价值。上述文章所载方法既专业又简单易行,方便实践,可操作性极强,有利于有效抢救前线抗战将士生命,对预防、应对战场毒气伤害具有重要意义。抗日战争的战场是残酷的,军队有大量的伤亡,迫切需要及时救治,《云南医刊》适时刊载关于“战地急救”“战伤处置”和应对毒气的具体方法和实施细则,无疑是适应了战时的迫切需要,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二) 传染病防治

传染病不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更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流行和爆发也是导致社会动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边地云南自古代至民国均为传染病高发区,霍乱、赤痢、鼠疫、伤寒、疟疾、水痘、天花、麻疹、白喉、流感、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性病等传染病在该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暴发流行^[7],其中疟疾、霍乱和鼠疫是严重威胁云南百姓生命安全的烈性传染病。

1935年,民国政府卫生署官员姚永正等考察了元江、普洱、思茅等地后在报告中称:“在云南南部的思茅县城,在1925年还是一个有10万多人口的城市,但是到1935年因连年流行疟疾,已减少到2万多人,很多房子都是空的,荒芜不堪,城内杂草中藏有老虎。”^[8]当时惨烈的状况如文献记载:“桐棺如织,闹市成埋,户绝炊烟,人缠死气。”^[9]霍乱和鼠疫的危害情况并不逊于疟疾,学者对此已有说明^[10],兹不赘述。

在如此严峻情况下,《云南医刊》的编纂者认识到传染病的危害,尤其是战争时期传染病的危害,故而刻意加大了对传染病的防治和宣传力度。正如沈种岑所言:“刀兵之后必有瘟疫,这是我国的一句古话,证诸事实,诚非虚语。现在抗战业经一年,死亡人数当然不少,并闻前方已有传染病之发现,而各国亦有捐赠疫苗之提议,我国卫生当局应从速组织防疫队往前线检查病源实施消毒及治疗,对后方民众应灌输卫生常识。就衣食住行略述一二。”^[11]

沈氏此语不仅叙及了及时防治传染病的紧迫性,而且提出了防治传染病的方法。沈种岑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去践行,他在《云南医刊》连续发表《论本地常见的传染病》共4篇文章:其中刊载于第一卷第一期的文章阐述了1938年昆明市麻疹流行,感染者多达数千人,在儿童中间流行的麻疹病传染方式即直接传染,发病年龄和主要对象即以五个月至十岁的小儿为主,尤其是详细叙述了麻疹的症状:前驱期出现三十九度至四十度高热,伴有咳嗽、喷嚏、下痢等黏膜炎性症状,体温稍有下降,持续三四天,再次进入发疹期,被传染十四天后体温再次上升,皮肤上长出针头大到豌豆大红斑,从脸部到头颈、躯干、四肢,常见密集生长于面部,发疹通常二至四天,从鲜红发展到赤红,患儿全身症状显著,出现意识障碍,或有痉孥,尿量少,大便多下痢,持续三五天,最后进入恢复期,热度自然下降;预防的方法有隔离法、注射恢复期血清预防法、注射人胎越几斯

抽出物法、注射家鼠血清法等^[12]。这为患者和医务工作者通过病症识别麻疹不同发病阶段提供了科学参酌,帮助他们准确识别病程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法。

1939年云南发生的霍乱涉及26个市、县,发病4700余例,3487人死亡,省会昆明有431人发病,207人死亡,全省疫情直到十一月以后始渐平息^[13]。在霍乱大规模流行前一年(1938),沈种岑即对此病高度关注,他首先阐明了该病发生的原因、病状,提出相应的预防法,首要推行公众预防法,即交通以施行简易法为主,其次是关注水源清洁,禁止在河流、井边洗涤衣物和一切污物用具,强制国民注射预防针剂,在必要时断绝交通。其次是注重个人防护法,即不饮用未经煮沸的水,不食用生冷食物,不暴饮暴食,及时治疗有胃肠疾病的患者。倡导凡可疑或未及加盖的食物和隔夜食物不再食用。每天饮用稀盐酸开水数次,做法是在经过煮沸后的水中滴入稀盐酸数滴,每天饮数次,特别强调“每日所用稀盐酸的量不超过10c.c以上。注射疫苗,也有相当效果,此外不接近患者,少到公共场所,可减少传染机会”^[14]。从上述引文分析看,作者追溯病因,阐述病症,继而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方案,体现出他精湛的医学技术,也彰显了他对传染病预防和治疗的高度警醒。不仅如此,沈种岑又在第一卷第二期、第三期分别介绍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伤寒的病因、症状、预防方法等;他还在第一卷第五期撰写了《从汉奸下药及霍乱流行说起》一文,简述了预防汉奸投毒引起霍乱的方法,即在农村公共水井盖井房装配抽水机。这和上文所述的麻疹、霍乱等一起,构成了当时应对云南尤其是昆明传染病的防治体系。

张而瓊《昆明疟疾病况略言——疟疾简略报告之一》涉及昆明疟疾概况调查、疟蚊之传染病率、治疟药及疟疾治疗等内容,具体包括:(1)自1938年秋至1939年夏末,共获得疟蚊4种;(2)疟子郊外多于市区,其多少视水源性质而定;(3)病人居所附近,多见有疟蚊滋生处;(4)本市病人染病率为11%,恶性疟疾占25%,间日疟疾占75%,是为中性流行区;(5)气象因素对于疟疾似乎无直接关系,但可影响疟蚊繁殖^[15]。张而瓊通过翔实地调查,获取了真实资料和可靠数据,记录了昆明疟疾及其相关情况,为向民众普及疟疾基础知识和预防疟疾做出了贡献。

破伤风是一种危害较强的传染性疾病,如何应对至关重要。《外伤性破伤风治疗之检讨》指出,破伤风缺乏有效治疗期,患者大部分由疲劳、窒息以及

肺部并发症而死于2—6日之内；破伤风合理治疗的原则有：治疗反射性痉挛、免疫法、中和循环系统内之游离毒素、液体平衡之维持、铲除传染根据地、护理；一般方法是先制止痉挛，可用 Formalin 作免疫；最主要的是外科治疗，如除去传染根据地、增强氧气，次用抗毒素中和血中游离毒素，但要在破伤风刚发生的数日之内使用，过此则无大效；此外还要注意护理和补充营养水分等^[16]。这对读者认识和防治破伤风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李宗懿《用胎盘抽出剂预防麻疹》、朱传德《小儿科中常见之传染病的预防》则对治疗小儿麻疹的方法如血清预防法、注射人胎抽出物法和注射家鼠血清法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等临床表现进一步做了介绍。许端庆《谈谈花柳病》、平林《梅毒与结婚》、魏述徵《砂眼症》、杨尚恒《世人所称之瘴气究竟是何病症》、先民《第三期骨梅毒之剂剂与诊断》等均是对传染病及其防治的专门论述。还有一些文章专门推荐治疗传染病的药物，如《介绍良药“收化尼那米”》特别说明了用于治疗流行脊髓脑膜炎、产后热、猩红热、淋症、扁桃体炎，以及一切“化血链点球菌”所致传染病的西药 Sulphanilamide 即“收化尼那米”。^[17]

《云南医刊》还有一个特点——专题登载治疗传染病特效药的广告：在第一卷第一期发布“奇效淋症丸”，其主治各种淋病；在第二卷第一期发布“药特灵”，用以治疗肠道传染病痢疾；第二卷第二期发布“新消梅素”，该药物主治梅毒和因梅毒引起的病变、回归热、疟疾、猩红热等。广告中也直接刊布擅长治疗该传染病的诊所与医生。第二卷第一期广告介绍医师郑霞举，他主治当时常见的传染性疾病花柳科；第二卷第二期刊登英辉诊所医学博士陈东森的主治科目亦有花柳科。此外，《云南医刊》还以短讯的形式提醒民众高度重视传染病，如《本市发现白喉及猩红热》记载了昆明市入春后，气候持续干燥，相继发现多起危险传染病如白喉、猩红热等，感染者多数为孩童，其症状类似口峡炎，治疗方案是倡导患者早期注射血清，并且需要实行严格的隔离及消毒。文章还呼吁说：“甚望卫生当局及早注意，务使其勿成为大流行，因二症之死亡率均甚高也！”^[18]

从《云南医刊》刊载的广告看，该刊关注的传染病就类型而言，有如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的预防，也不乏疟疾、麻疹、砂眼等常见传染病的施治，同时覆盖了如花柳病、梅毒等慢性传染病的诊疗，涉及危害程

度不同的多类传染病；就其阐述防治传染病的文本形式而言，既有专论文章，又有广告和短讯，灵活多样。这显示了《云南医刊》对传染病防治的高度重视。

（三）卫生教育和宣传

广泛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公众卫生习惯对国民健康至关重要，促进保障国民健康与抗战兵员的身体素质、战斗力息息相关，为适应人口流动、医药卫生事业的变动和调整，为抗战提供医务、卫生保障，卫生教育和宣传势必成为《云南医刊》关注的又一个重点内容。此类文章共56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总量的58%。其中，严需章翻译了曾任奥地利卫生部长、维也纳大学教授兼维也纳市卫生局长的坦得楼教授（Prof. Dr. J. Tandler）所著《中国之公共卫生及医学教育》，内容包括公共卫生教育落后的状况及原因、应对措施等。在应对公共卫生教育落后的措施中，主要有建立全国性的公共卫生组织、培养所需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建立必要的物资设备三个方面，其中公共卫生人才的学历原则上必须是医师，要达到此目标，“唯一之方法为依靠人才造就之可能上将来之供给”，意即由国家培养大批医学专门人才。如何培养人才？“每省于每医校设置若干免费学额”，免费生所需费用应有中央政府或省府或两方，或加入校方共三方协助完全供给。在医学类学校的教学上，分医学生、助产士、女护士、卫生及治疗助理员等不同类型，施以不同的教育年限和授课科目^[19]。显而易见，该文对中国公共卫生教育规划颇为系统，从经费保障到教育年限再到科目设置应有尽有，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云南医刊》登载该译文，从国外学者的视角关注中国公共卫生教育，表现出该刊在卫生教育方面的宽广视野。

除刊登国外学者著述外，《云南医刊》还介绍了国内卫生教育和宣传的规划与经验。《抗战时期的学校卫生》一文在总结增进健康的指导方法后指出：国家的未来和强盛建立在对下一代国民的教育及其成长中。对于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而言，教育者应当想方设法充实儿童生命的滋长力，而不能让儿童再增加疾病的痛苦，因为要经历当前的抗战，并维持国家永久存在的希望和重任是落在这些未来的主人翁肩上，在长期抗战建国的过程中，“要求抗战再接再厉，建国愈趋稳固，儿童身心健全是先决条件，因此学校卫生在抗战期间是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20]。很明显，作者从抗战建国的高度向各界宣传了重视学校卫生教育和青少年身体健康的重

要性。《治疗疾病的原则》在明确内科医师治疗病人必须注意的要点后,详细罗列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方法:一、预防治法:首先是防止病原的发生(包括不饮未沸之水、不吃生冷腐烂瓜果、设置纱窗蚊帐、割除扁桃腺、拔去腐牙、隔离、消毒、食物营养、注意清洁、空气新鲜、睡眠充足等);其次是个体保护(包括养成日常卫生习惯、自我免疫和被动免疫、服金鸡纳霜以防疟疾、消毒手术)。二、药物治法:首先是治标,主要措施有提高抵抗力以减轻病状免却疾病、对症治疗(包括止痛发汗、利尿泄泻、催眠安睡)、改正病理变态(如用夹板改正骨折)、特别疗法(如新鲜空气治肺癆、输血治血亏病等)、体力恢复(如多多休息、饮食调和、施行卫生);其次是治本,即使用特效药物,包括血清治疗、中毒疗法、化学疗法、腺汁疗法、食物疗法等。该文还特别指出:目前治疗问题最紧要者为提高民众的健康和改良生活的状况。注意的工作是“防病”,即对疾病加以预防。希望同胞们不要在病后去就医,而要在未病前预防^[21]。很明显,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和文字阐述了讲究个人卫生的具体做法,目的自然是希望通过宣传医药卫生知识达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目标。

为加强卫生教育和宣传,《云南医刊》专题刊登了时任广州市卫生局防疫课课长严需章所撰《消毒法》,从消毒的概念到消毒法的类别、从理学消毒法到化学消毒法,均有细致介绍,如理学消毒法包括煮沸法、蒸汽法、干热法、焚烧法和日光法,化学消毒法包括升汞、石碳酸、拉苏尔、漂白粉、石灰、福马林、硫磺、过锰酸钾、过氧化氢、硼酸、碘酒、汞色质、酒精等的用途、注意事项和配法^[22]。这对民众如何通过消毒提高个人卫生水平、预防疾病显然有很大的帮助。此外,沈种琴《长期抗战与卫生》重点阐述了对后方民众宣传衣食住行卫生常识以防止传染病的方法,如衣服应“勤加洗濯,随时整理”,饮食要“调理得宜”,住房要“勤加洒扫”,运动要“用作步行,非有紧急事务或特殊情形,均不应以他物代步”^[11]。这些方法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因此,极富应用价值。

还要提及的是,《云南医刊》专门开设“医药问答”栏目以促进卫生教育和宣传,其目的正如“医药问答启事”所言:为指示大众以正确之医药卫生观念并促进病家之知识以求新医之普及,并不欲介绍或宣传医药为病家辟一治疗之捷径,甚至因此使病者本身蒙受药物误投之危害,故以编后者之方针惟就病家最普遍之问题为问题,而做一简短详细之解答,以供大众之参阅^[23]。《云南医刊》通过“医药问

答”栏目和问答方式,对一些常见病的特征和治疗方法做了介绍,如“答昆明筱园君”,用“问”的方式叙述了遗精的症状,以“答”的方式给出了治疗遗精的原因和方法,即重症之性神经衰弱,可服用或注射全身补剂,如蛋黄素、砒素、土的宁等,注射磷质、钙质之针水,内服神经镇静剂,如嗅素、Lupulin等,避免和节制房事,用冷水摩擦下身,忌避一切带刺激性之饮食,如酒、咖啡、可可等,多食滋补及富于维生素之饮食,如牛乳、鸡蛋、蔬菜水果等;又如“答个旧鉴光君”,通过“问”的形式,说明嗜酒的表现和症状,用“答”的方式说明嗜酒的危害,如高血压、中风等,治疗方法是:(1)戒酒;(2)注意摄生法,即少食肉类,忌避一切刺激品,如咖啡、烟茶等,多食菜蔬、果实,常行矿泉浴,饮用矿泉水或饮镭锭瓶水更佳,致常用之药剂,以碘剂为主,如碘化钾、碘化钙,并须常用之^[24]。这种问答式交流的特点是目的明确、短小精悍,有助于激发读者的兴趣,对卫生教育和宣传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结语

抗战史视野下的《云南医刊》以服务抗战为己任,以特殊的方式为抗战贡献力量。“战事医疗”类文章对抢救前线受伤将士和预防毒气的危害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指导,这有助于抗战军队战斗力的保存和提升;“传染病防治”类文章不仅能够帮助民众提高认识和预防各类传染病的能力,而且有利于提高民众的身体素质;“卫生教育和宣传”类文章对民众掌握基本的卫生方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健康状况有积极意义。这两类文章表面上是帮助民众提高身体素质,实际上则是为抗战前线输送身体强壮的合格兵员提供帮助。

总之,抗战时期诞生的《云南医刊》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它以支援抗战为职责、以国家命运为重任,正如刊物编者所言:“本刊诞生于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前途的命运,我们是不计的,但前途的责任,无疑是一天一天的加重。”^[25]

由此,我们不得不说:《云南医刊》对抗战有着独特的贡献,在抗战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和特殊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胡安徽.《云南医刊》与抗战时期云南医疗卫生建设[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2):88-95.
- [2]范少泉.军用毒气(续)[J].云南医刊,1938,1(1):40-

- 45;1938,1(2):49-53;1938,1(3):36-38;1938,1(4):38-39;1939,2(2):53-55.
- [3] 范少全. 战地急救(续)[J]. 云南医刊,1938,1(2):46-48;1(3):49;1(4):33-37;1940,2(2):49-52.
- [4] ALEXANDER STIEDA, 著, 邓尊六, 译. 战伤之初步处置: 战地外科讲之一[J]. 云南医刊,1938,1(2):11-17.
- [5] ALEXANDER STIEDA, 著, 邓尊六, 译. 战伤之初步处置: 战地外科讲之二[J]. 云南医刊,1938,1(3):14-19.
- [6] 陈德智. 广州市被轰炸十五个月中处置炸伤的经验[J]. 云南医刊,1939,1(6):7-15.
- [7] 佚名. 云南省昆明市管理传染病办法[J]. 云南省政府公报,1944(24):4.
- [8] 郑祖佑, 张再兴, 杨恒林, 等. 云南疟疾特征与防治[M]. 昆明: 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
- [9] 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志·卫生志[Z].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284.
- [10] 宋玉梅. 论民国时期云南省的传染病流行与防治[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2008:7-10.
- [11] 沈种芬. 长期抗战与卫生[J]. 云南医刊,1938,1(3):6.
- [12] 沈种芬. 论本地常见的传染病[J]. 云南医刊,1938,1(1):22-23.
- [13] 云南省卫生厅. 云南卫生通志[Z].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1999:258.
- [14] 沈种芬. 论本地常见的传染病(续)[J]. 云南医刊,1938,1(4):27-28.
- [15] 张而瓊. 昆明疟疾状况略言: 疟疾简略报告之一[J]. 云南医刊,1940,2(3):8-15.
- [16] 朱兴仁. 外伤性破伤风治疗之检讨[J]. 云南医刊,1940,2(2):22-27.
- [17] 姚寻源. 介绍良药“收化尼那米”[J]. 云南医刊,1938,1(4):42.
- [18] 编者. 本市发现白喉及猩红热[J]. 云南医刊,1939,1(6):46.
- [19] 坦得楼(J. Tandler), 著, 严需章, 译. 中国之公共卫生及医学教育[J]. 云南医刊,1939,1(5):1-7.
- [20] 花新人. 抗战时期的学校卫生[J]. 云南医刊,1940,2(3):48.
- [21] 花新人. 治疗疾病的原则[J]. 云南医刊,1939,2(1):25-27.
- [22] 严需章. 消毒法[J]. 云南医刊,1938,1(2):25-30.
- [23] 许端庆. 医药问答启事[J]. 云南医刊,1939,1(2):6,48.
- [24] 编者. 医药问答[J]. 云南医刊,1938,1(4):40-41.
- [25] 编者. 医药问答[J]. 云南医刊,1938,1(1):4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Yunnan Journal of Medicin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EN Yanjing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Yunan Provincial Library, Kunming, Yunnan 650031, China)

Abstract: The *Yunnan Journal of Medicine* is a professional journal serv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t mainly published articles on “war medicin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These articles are of great values for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rescue of the wounded soldiers, the prevention of poison gas hazards in war,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awareness and the ability to prevent various infectious diseases, as well as the public’s ability to master basic hygiene methods, develop good hygiene habits, improve their health, and send qualified soldiers with strong health for the war. This journal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war in a unique way.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Yunnan Journal of Medicine*; medical care in war;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红星》报与中央苏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

李 媛,钟继润

(赣南医学院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史与健康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红星》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最早的机关报,发挥了信息传递、思想引领、行为指导、舆论监督等职能,不仅从部队卫生、医院工作、卫生学校建设等方面,关注、报道红军卫生工作,而且开辟专栏开展卫生科普,为改善部队医疗卫生状况、提升官兵卫生意识、培养红军卫生习惯、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红星》报;中央苏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5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84-06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是中央苏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办。1935年8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川陕甘地区后终止出刊。从创刊到终刊,《红星》报共出版129期,^[1]前期主编由张如心、李弼廷先后担任,1933年8月后,邓小平任主编,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陆定一继任主编。《红星》报发行量达17300多份,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是中央苏区三大报纸之一。^[2]《红星》报创刊号头版头条的《见面话》指出:“他要是一面大镜子”,“他要是一架大无线电台”,“他要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他要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他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会”,“他要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要是一个裁判员。”^[3]

这即明确了《红星》报的办报宗旨,也揭示了《红星》报的主要功能。《红星》报为铅印4开报纸,毛边纸印刷,不定期出刊。该报开辟了社论、短评、要闻、前线通讯、党的生活、支部通讯、铁锤、自我批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列宁室、问题征答、猜谜等20多个栏目,版面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文章短小精悍,报风通俗易懂,适应了红军将士

的文化水平,深受红军官兵的喜爱。

医疗卫生工作是中央苏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的报刊服务于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红星》报充分发挥信息传递、思想引领、舆论监督、行为指导等职能,全方位关注、报道苏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情况。就文章数量而言,《红星》报刊载与卫生工作相关文章共计109篇;就文章分布时间看,1933年8月前,卫生相关工作只是零星刊发,在邓小平担任主编后,《红星》报有关卫生工作的文章大幅增加且常态化,成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载体,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部队卫生工作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纳入《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指出红军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医疗卫生工作是军队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古田会议后,红军部队卫生工作得到极大改善,作为中革军委机关报的《红星》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宣传、监督、反馈、指导作用,方面军直属队总支委卫生部支部也从工作推不动的落后支部一跃成为模

收稿日期:2022-12-0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0BDJ074)

作者简介:李媛(1986—),女,江西抚州人,赣南医学院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史与健康中国战略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苏区卫生。

范支部^[4]。

(一) 部队卫生情况

《红星》报是反映红军部队卫生情况的“一面大镜子”，好的差的都有体现。该报以《模范的红五团》为题，报道了董振堂代表总司令总政委检阅红一军团五团在“行军卫生”“驻军卫生”等10个方面的成绩，认为红五团是模范兵团，号召全体红军战士“要学习他，要赶上他！并且要努力超过他！”^[5]同时严厉通报批评红十二团第五连卫生工作的各方面问题：“卫生方面，到一地方打扫卫生不要派差事，大家自动来，成了一种习惯。行军中有个别吃冷水的。对病人管理，医治不太注意。如最近有一个战斗员发病，四餐未吃，连长指导员不督促卫生员医治，让卫生员自己送他去卫生队。”^[6]

该报对部队卫生情况的通报，一方面为部队卫生工作树立了学习参照的标杆，另一方面也为部队转变卫生思想、改进卫生工作态度、方式、方法起到了促进作用。《落后的赶上前去！》就批评了红九军团十四师没有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对病员缺乏关爱，一些病员掉队了却没有人管，而且卫生工作很糟糕，“部队驻地的清洁，未引起注意，乱屙屎尿尿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战斗员的清洁没有注意”，“不少战斗员发长未剪，甲长未除，衣服非常齷齪，脚因未常洗，而现在即有部分冰裂了的，生疥疮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生病的烂疤子的始终很严重”^[7]。上了《红星》报的“黑板”后，该师立马开始整顿，转变工作态度和作风，三个月后，成果显著，不仅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积极招呼病员，煮稀饭烧开水，卫生队也更加主动开展工作，经常到连队检查卫生，上卫生教育课，其中四十二团还组织了卫生突击队，除检查卫生外，还帮卫生状况特别差的连队打扫房子^[8]。

(二) 红军卫生运动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卫生运动首先是在红军部队中兴起的。1928年初，朱德率领湘南起义部队攻下湖南郴州后，举行了人民军队创建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卫生清洁运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详细规定了部队的洗澡、洗脚、理发、打扫庭院和清理厕所等卫生问题。^[9]

1931年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动全苏区卫生运动后，红军部队积极响应，迅速行动，特别是1932年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召开全军第三次卫生会议并通过了《卫生决议案》，就部队普通卫生（包括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医院卫生）、防疫办法（包括个人防护、团体防疫、防疫设施、消毒方法），以及卫生宣传和卫生评比等，提出

了具体指导意见和方法，强调“各级红军卫生机关接到决议案后，立即执行并需随时将执行情形呈报中革军委总军医处以便考核”^[10]。从此，红军卫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红星》报为此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及时反映红军卫生运动的实况，督促和推动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

1933年12月19日，《红星》报刊发了彭龙伯撰写的红一方面军直属队的长篇通讯《把卫生运动的车轮推向前进》。该文充分肯定了方面军直属队在开展卫生运动宣传、清洁运动和预防赤痢、疟疾、溃疡、疥疮等4种疾病斗争中取得的成绩；1933年10月8日，该报在“前线卫生通信”栏目中又报道了红军在福建泰宁开展清洁运动的情况。泰宁城在国民党蹂躏下传染病流行，民众无力医治，街道污秽恶浊，令人欲呕。红军进入泰宁城后提出并实施城市清洁运动周计划，成立了清洁运动委员，部队官兵“兴高采烈地舞动着扫把、铲锄、粪箕，挑着石灰，分布在街道上工作着，在融融的笑声中工作着，在红军铁拳下，霎时间，将国民党军阀践踏后的废墟，变成了焕然一新的街面”^[11]。对于卫生工作做得好的连队，该报予以大力表扬。1934年9月25日，《红星》报就报道了干部对卫生工作很注意，经常督促卫生员开展工作，卫生员在督促之下，积极工作，无论行军还是宿营，不论迟早都能打扫清洁、挖厕所，都能注意饮食；报道同时呼吁“同志们！学习这些连队经验加紧卫生运动，为消灭夏秋间疾病增多的现象而斗争！”^[12]

二、红军医院工作

中央苏区的主要医疗救治机构是红色医院，包括苏维埃政府系统医院和红军部队医院。中央苏区红军医院的数量，随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伤病员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到1934年10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有直属后方医院10所、预备医院10所、兵站医院6所、残废院2所和疗养院1所。^[13]

(一) 医院工作总体情况

为充分了解、掌握各红军医院医疗工作情况，中革军委总卫生部通过组织参观团或突击队开展巡视检查，并将结果及时登载在《红星》报上。

1933年8月13日至9月2日，红军第一、二、三、五后方医院、第二预备医院、残废医院响应总卫生部号召，组织医院参观团交叉参观学习。《红星》报从四个方面详细通报了“参观”所见所闻情况：一是卫生，包括各院卫生、卫生教育、内务等情况；二是政治文化，按医院政治部规定，各院开展教育工作、室内娱乐等活动；三是治疗，各院医生诊断病人、巡

视病房、休养员及消毒等情况；四是给养，各院休养员用餐情况等。^[14]从内容上看，文章主要通报了各院工作的优点，缺点和不足谈及较少。而1934年1月，中革军委巡视团对各医院的巡视则不同，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各医院的问题。如在伤病员给养方面，“第三第四后方医院，二、五、六预备医院的工作是很坏的，特别是四后方医院最差，每天吃两餐糙米”。第一后方医院第三所“负责人没有计划，如雇人担谷1担走20里给钱800文，磬谷1担给钱200文，刨芋头一些给钱300文，而且时常买贵菜，有时菜少了不够吃”。第六预备医院第二所，一共才200余人，却限定5天内节省了50多元用来买席子，这种“强迫式的节省”使得几天菜内油盐都没有，以致休养人员都有意见。第二后方医院合作社有股金700多元，但是采办的货物没有与改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油、盐、米、豆等储备很少，常常要到外面去买，而商人又操纵物价，提高价格，吃亏不少。在医生医术方面，各院对“提高医术”没有太多的注意，因为医术欠缺，出现了各种医疗事故。“第四后方医院发生消毒不严，几个月后还有生蛆的。第三后方医院也是消毒不严。至于福建的四都医院更糟，有几月后伤口反攻（复），开刀发现还有纱布的。”此外，巡视团还发现福建省军区医院政治委员张弟对二分院政委王永华打死逃兵一事置若罔闻，甚至包庇王永华、熊春记、王元春及二分院长陈江等人的贪污行为。巡视团要求福建省军区政治部对此尽快处置，并还提醒各医院政治机关警惕医院里的反革命分子，以防他们破坏苏维埃红军来配合白军的进攻。^[15]

与军委巡视团的通报口吻相似，《闽赣军区政治部突击医院政治工作》《军委突击队在各方面的活动》披露了各医院众多负面信息。闽赣军区卫生部所辖的第三所医院自与军区分开移驻后方后，为掌握医院情况，军区政治部特选拔、培训文化娱乐训练班的活泼分子，让他们密切接触伤病员，获取第一手资料。结果发现医院中不注意卫生，完全放弃政治工作，部分工作人员军阀习气、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严重。^[16]军委突击队突击东北线医院，发现第三预备医院工作人员积极但缺乏计划，突击西北线医院发现，疗养院和第七后方医院存在着严重问题，如疗养院院长赵佛招工作不负责任、生活腐化、挪用公款做生意。上梁不正下梁歪，该院管理科长、一所指导员、一所所长等人贪污，而且缺乏阶级友爱，该院工作人员吃白米，休养员吃糙米，甚至打骂休养员。^[17]与巡视团只是调查、反映情况不同，军委突击

队还具有一定的惩处权力，发现疗养院的问题后，就在该院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和反贪污的斗争，撤了院长赵佛招的职，把贪污分子送上了军事法庭。

《红星》报对中央苏区红军医院的真实报道，使医院工作充分暴露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力地推动了红军医院的建设与发展。

（二）医院及医务人员的节省运动

国民党在对中央苏区实行残酷军事“围剿”的同时，还进行严厉的经济封锁，企图用“困死”“饿死”手段扑灭苏维埃革命，导致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军民生活异常艰难。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苏区军民一手抓生产，一手促节约，在全苏区掀起了节省运动的热潮。1932年2月，中央苏区节省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军委总卫生部多次在《红星》报发出开展节省运动、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充实战争经费的号召，并先后刊登了《卫生学校医务人员的节省工作》《卫生部门的节省运动》《在节省经济战线上医务人员的挑战》《一个响亮的回答》等文章，及时反映红军各医疗单位、卫生学校、医护人员、伤病员响应号召、购买公债、捐款捐物等情况。

为响应购买经济公债的号召，红五后方医院的休养员和工作人员相互订立竞赛条约；福建省军区后方一分院看护员共购买了169元，材料厂工作人员共购买了67元，阙得香同志甚至把自己一半的抚恤金拿出来购买公债。对于伤病战士拿出抚恤金来购买公债，《红星》报不推崇，劝诫：“伤病战士们不要拿抚恤金或节省伙食钱来购买公债，因为这样是会减少物质的补养，延长健康的恢复。不能够很快地恢复健康，就不能很快地到前线上杀敌，这样对革命损失更大呵！”^[18]

1934年5月10日，《红星》报刊登了《卫生部门的节省运动》一文，列举了第一后方医院、第一残废院、第二残废院、第七预备医院相关人员的节省情况，节省方式有主动要求减少菜钱米钱的、自给自足种菜植棉养猪的、不领单衣的、退还公谷票的、打草鞋慰劳前方部队的、主动要求减少津贴的等。中央苏区聘用的医生是名副其实的高薪群体，在节省运动中他们异常慷慨。第一后方医院医务科长蔡汶，医生李子萍、刘笃波、杨燮和、陈显华、彭道彬等均将自己4个月的津贴捐出来，其中蔡汶多达240元大洋，其他人100—120元大洋不等。^[19]第六后方医院医务科长杨笃卿、一所医生杨芬、医助陈烈、二所医生马连才、三所医生徐彩云、四所医生李增福等节省5个月的津贴捐助革命，杨笃卿更是捐出高达250元大洋，^[20]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三) 医院的贪腐、渎职现象

贪污浪费是廉洁节约的对立面,中央苏区在倡导“节省一文钱”的同时,也坚决打击惩处“浪费一文钱”的行为。《红星》报开辟了“铁锤”栏目,无情揭露红军卫生系统中的贪污腐败、渎职怠工分子。1932年3月23日,《红星》报刊登了《思患预防的滋补派》一文,文风幽默却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一些地方负责人克扣医院伤病战士的滋补品和药品,以供自己享用的荒唐行径。1933年9月24日,军委总卫生部在《红星》报上点名原三后方医院院长钟碧楚、原三预备医院院长周承会、一后方医院第一所所长张新、前四预备医院一所副所长王祖坤、管理排长张善林、事务员雷发和以及附属医院管理排长艾口寿等“七个坏蛋”,他们或官僚主义作风,或军阀残余习气严重,或吞没公款生活腐化,均撤职查办。^[21]1933年10月22日,《红星》报刊发了一则军委总卫生部的消息:后方医院某所政委黄幽坤吞没死亡同志遗物、公款私用,后方医院的管理排长罗德胜报假账、开小灶,总卫生部事务员周阳贪污等事实,这些人均送军事裁判部审判,给予制裁。^[22]两个月后,红七军团后方医院院长张一脚、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杰,因工作态度怠慢,对伤病员缺乏阶级友爱精神,误发药品、浪费材料,所辖医院粪尿遍地污秽不堪,尽管之前已经给予警告,但是仍不改进,被撤职查处,并送军事裁判所审判。^[23]1934年6月10日,《红星》报又报道福建省军区医院皮肤疗养所的经济委员陈志光,在省互济会有贪污20多元的前科,担任经济委员后,米数收多报少,付少报多,虚亏米100余斤,此外他还私自允许12个病员回家,并侵吞他们的伙食12元多。^[24]

(四) 医院的先进典型

《红星》报大量报道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中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领示范,鼓舞斗志,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1934年1月14日,《红星》报报道了两位模范医生:附属医院第二所医生王斌,工作积极负责,细心医治伤病员,经常巡查病房,解答伤病员的询问,给予伤病员精神上的安慰;第五后方医院医务科长杜志贤,领导6个医助司药报名医科函授班,自己拿出12元大洋作讲义费,同时为拥护全苏大会的召开,花了8元多买了一只羊加上5元钱来慰劳大会代表。^[25]1月28日,该报报道了红军医院政治部在反对浪费、改善物质条件的号召下,自给自足搞生产,大量种植青菜,“八十人植菜三万头”的模范事迹。1934年6月30日,该报刊发了由陈义厚撰写

的《模范红色医务人员的新创造》一文,详细介绍了红军卫生学校教员李治潜心钻研,制造了许多苏区紧缺药品器材,如外科手术用的肠线、牛痘浆、樟脑食盐水溶液等,并由卫生材料厂批量生产。陈义厚还呼吁,在医疗上创造新的药品材料、新的治疗方法,从草药中找出大批有效药品来,“是万分需要的”,希望所有红色卫生人员努力研究,用中草药代替西药,保障医药供给。^[26]这些文章的刊发,在部队和地方引起极大反响,钻研之风随之传扬。苏维埃国家医院傅连璋发明了新的方法治愈出血性黄疸,用雷佛奴尔水治愈了脓包性疥疮患者;第五后方医院的杜志贤用中草药制成了“小布丸”和“茶岭膏”,受到伤病员的欢迎,在部队传为佳话。

在《红星》报的典型宣传报道中,除了上述模范医生、模范菜园、模范红色医务人员外,还有模范卫生员、卫生工作的模范连队等,为苏区卫生工作营造了浓厚的氛围,起到了积极的引领示范作用。

三、红军卫生(军医)学校工作

红军军医学校1931年11月筹建,1933年5月更名为红军卫生学校。红军卫生(军医)学校的创办,标志着人民医学教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红星》报高度关注红军卫生(军医)学校的发展,及时报道了学校开课、发展等情况。1932年2月26日,该报刊发了红军军医学校正式开课的消息,详细介绍了军医学校创办是“为培植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以改造红军的军医卫生工作”,先由各军选送报考者,然后进行体格检查,再进行政治和医学考试,“正取20名备取6名”,开课以后每天医学课6小时,政治和军事1小时等,并告诫学员们要“努力学习,以期毕业后达到改进红军卫生,治疗英勇战士的目的”^[27]。1933年9月24日,该报以《扩大后之卫生学校》为题,报道了学校为应对“红军的扩大与战斗任务的加强”“力谋扩大和加紧训练”:一是办学规模扩大,学员人数日益增多,达600名。除了已经毕业的且已分配到前后方各卫生机关的第一、二期军医科46名,第一期调剂班20人,看护及卫生员班百余名外,11月份又可毕业第三期军医科、第一期保健科约百名,红校工人师少共师第三师送去的卫生员200多名,第二期调剂班50名,“大可补充红军各部的缺额”。二是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学校图书馆、细菌室、化学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实习室等已有雏形,并有附属医院,为学生临床实习之用。^[28]

与此同时,《红星》报还不时刊登学校招生信息。如《红军卫生学校医科函授班招生简章》《红军

卫生学校第六期军医科招生简章》《卫生学校函授班启事》等。这些宣传吸引了有知识的战士进入卫生学校,为红军部队和苏区培养了大批优秀医疗卫生人才,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红军卫生科普工作

《红星》报开设了“卫生常识”“卫生讲话”等栏目,大量刊登卫生防病基本常识,开展卫生科普,帮助广大红军指战员革陋习、树新风,增强身体素质,减少疾病发生。该报宣传卫生常识主要有3方面的内容。

一是与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的卫生常识。《红星》报先后刊登了《患者同志吃东西要小心》《实行戒吸纸烟运动》《劝戒纸烟》《生水饮用注意及办法》《反对吃生水的具体办法》等文章。以1933年9月17日刊登的一篇倡导健康饮水的文章为例,文章首先肯定了水的重要性,然后话锋一转,说“各种有害的生物——病原细菌——也集结生长在水里”“饮水用的不注意,能引起很多的疾病”,比如肚子痛、生蛔虫绦虫病、发生打摆子、生霍乱吐泻病等。因此,为了健康,每个战士“饮水用水一定要用河水,最好是井水或泉水”,“洗碗水要用开水,桶内要放水匙,洗碗筷时每人盛一匙,洗过的水,不要再倒进桶内。”“漱口须用冷开水”,“无论何种冷水不可以吃,行军须背带水壶(可用竹子做),行军前的菜,须放淡些,以免走路口渴。”“稀饭内不要冲冷水,不要吃水酒!”^[29]贺诚在1934年4月22日《红星》报上发文再次强调饮水问题,起因是红军在长途行军时口渴喝生水,结果大量人员腹痛下痢,甚至死亡。于是贺诚特意撰文,从行军前的准备、行军中的注意事项、行军时间的选择等方面,详细列举了避免长途行军中喝生水的具体办法。^[30]

二是与季节气候相关的疾病防治。如《冻疮之预防法》《热天之卫生》《皸裂手足防止法》《怎样防止秋天的疾病》等文章,主要出自陈义厚之手。冻疮发生在冬季,如何预防呢?首先是注意保暖,“尽可能穿袜或用包脚布,减少受冷气刺激”;还要勤运动,“可以助长血液运行”。如果手脚冻麻木了怎么办?切记不可骤用火烤,要用雪或用冷水摩擦手足,至发红发热为止;对于已经冻了发生红肿的地方,要小心护理,或找医生上药处理。^[31]皸裂多半是由手足皮肤过于干燥引起的。如何预防呢?文章要求用热水洗足,使血液流通,擦干之后抹一层油,再用布包起来,穿上袜子;不能用火烤脚,加剧干燥;要勤运动,促进血液流通;如果皸裂了,或擦上猪油、茶油、花生油或找医生上药处理。^[32]冻疮和皸裂都容

易反复发作,所以以上两文均指出以前患过的同志要特别注意。

赤痢、霍乱、伤寒症等疾病多发于秋天,这些疾病可以通过讲究卫生、强壮体魄加以预防。怎么做呢?《怎样防止秋天的疾病》一文指出:“一、不要吃生水,和未经开水洗净的水果。二、不要在街上乱买不清洁的东西吃。三、不要吃未曾煮熟和苍蝇吸吃过的东西。四、不要吃病人吃剩的东西。五、不要与病人接近,病者须立刻隔离。六、不要用未经消毒的病者的东西,病者的衣服被褥、碗筷,要用开水煮过。七、不要同病人共一个毛(茅)厕屎,需另造毛(茅)厕。八、不要在有传染病厉害的村庄住宿。”^[33]各种疾病造成红军严重减员,秋冬季又是流行病、传染病高发季节,只有做好预防工作,才能防患于未然,“治未病”比“治已病”的成本要低得多。

三是与部队多发病有关的卫生知识。《红星》报刊载了如《消灭赤痢的办法》《烂疮子之预防法》《打摆子(疟疾)预防法》等文章,懂预防、讲卫生之风由此在部队盛行,部队常见病随之减少。

贺诚在《卫生常识:消灭赤痢的办法》一文中,首先告知指战员“痢疾是由饮食物传染而来”,指出消灭痢疾就要从饮食卫生上下手,然后列举了10条消灭痢疾的办法,如不吃生水、不吃不干净的食物水果、不吃辣椒,要隔离治疗患者等。^[34]与此行文方式相似,陈义厚《烂疮子之预防法》《打摆子(疟疾)预防法》也是先介绍了烂疮子、打摆子(疟疾)的成病原因,然后列举具体的预防办法,最后告知如何进行治疗与处置。

此外,《红星》报还对行军卫生、防空防毒等知识进行了宣传普及。该报中的卫生科普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符合指战员们的阅读习惯和能力,接地气,顺民意,而且这些文章多由贺诚、陈义厚等中央苏区名医撰写,这既保证了卫生科普文章的权威性,又在指战员心目中产生了更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红星》报的报道涉及医疗卫生工作的多个方面,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中央苏区红军卫生工作的全貌:红军医疗卫生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部队各项卫生制度越来越健全,卫生管理工作越来越规范,红军指战员的卫生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断得到重塑。不仅推进了苏区卫生状况的变革,促进了苏区民众卫生观念的转变,而且推动了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红星[M].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
- [2] 王伟红. 红军长征中的《红星》报[J]. 中国档案, 2013: 11.
- [3] 编者. 见面话[N]. 红星, 1931-12-11.
- [4] 钦. 方面军直属队的模范支部与落后支部[N]. 红星, 1933-11-26.
- [5] 董振堂. 模范的红五团[N]. 红星, 1933-09-03.
- [6] 军团政治部. 红十二团模范第五连最近工作的检查[N]. 红星, 1934-08-05.
- [7] 佚名. 落后的赶上前去! [N]. 红星, 1934-01-07.
- [8] 十四师政治部通信. 十四师巩固部队工作的近况[N]. 红星, 1934-04-08.
- [9] 刘善玖, 钟继润, 李媛.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史[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21: 238.
- [10] 刘善玖, 钟继润. 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7: 184.
- [11] 彭真. 红军领导泰宁城的清洁运动[N]. 红星, 1933-10-08.
- [12] 周敏吾. 卫生工作上的几个模范连队[N]. 红星, 1934-09-25.
- [13] 高恩显.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1: 35.
- [14] 含辉. 医院参观团的片段记述[N]. 红星, 1933-10-08.
- [15] 佚名. 医院中的琐记[N]. 红星, 1934-01-14.
- [16] 泽鸿. 闽赣军区政治部突击医院政治工作[N]. 红星, 1933-11-19.
- [17] 黄应龙. 军委突击队在各方面的活动[N]. 红星, 1934-02-25.
- [18] 记者. 响应红星的号召[N]. 红星, 1933-09-03.
- [19] 红军第一后方医院卫生研究分会. 在节省经济战线上医务人员的挑战[N]. 红星, 1934-05-15.
- [20] 工农红军第六后方医院卫生研究会. 一个响亮的回答[N]. 红星, 1934-05-15.
- [21] 佚名. 一批坏家伙撤职查办[N]. 红星, 1933-09-24.
- [22] 总卫生部. 医院里面的贪污分子[N]. 红星, 1933-10-22.
- [23] 总卫生部. 两个苏维埃红军的害虫送军事裁判所去[N]. 红星, 1933-12-23.
- [24] 林必彰. 福建省军区医院的贪污分子[N]. 红星, 1934-06-10.
- [25] 张廷玉, 唐凤章. 模范医生[N]. 红星, 1934-01-14.
- [26] 陈义厚. 模范红色医务人员的新创造[N]. 红星, 1934-06-30.
- [27] 佚名. 红军军医学校已正式开课[N]. 红星, 1932-02-26.
- [28] 佚名. 扩大后之卫生学校[N]. 红星, 1933-09-24.
- [29] 佚名. 卫生讲话[N]. 红星, 1933-09-17.
- [30] 贺诚. 卫生常识: 反对吃生水的具体办法[N]. 红星, 1934-04-22.
- [31] 陈义厚. 卫生常识: 冻疮之预防法[N]. 红星, 1933-10-29.
- [32] 陈义厚. 卫生常识: 皸裂手足防止法[N]. 红星, 1933-12-03.
- [33] 佚名. 卫生讲话: 怎样防止秋天的疾病? [N]. 红星, 1933-09-24.
- [34] 贺诚. 卫生常识: 消灭赤痢的办法[N]. 红星, 1934-08-2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the Newspaper *Red Star* and the Medical Care Work of the Red Arm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LI Yuan, ZHONG Jiru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entral Soviet Medical History and Healthy China strategy, Gannan Medic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earliest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mmission, *Red Star*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edical work of the Red Army. It played the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deological guidance, behavior guidance and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ect. It not only followed and reported the medical work of the Red Army in the fields of military health, hospital 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chool, but also developed special columns to carry out the popularization of health science. *Red Star*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roving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of the army, enhancing the health awareness of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cultivating the health habits of the Red Army and maintaining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Red Army.

Key words: *Red Star*;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Red Army; medical care work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

韩兴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法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根本遵循。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教学,对讲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理论,增强大学生法治意识,提高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培养大学生创新性、批判性思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融入应该从教学现状出发、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分析高校思政课法治教学的现状,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思考和探索,便于大学生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指导下的法治观。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6

中图分类号:D920.0-4;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90-05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1]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学校教育。”^[2]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意义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需要。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讲道理让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道路逻辑和文化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视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遵循,弄通、弄懂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途径。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

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探索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从理论到教案、从教案到课堂的转换,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进入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让党的理论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增强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培养法治素养的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全民的法治素养是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法治素养作为现代化公民所必备的素养,更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一代大学生所应有的基本素质,这必然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大学思政理论课教育之中。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增强学生政治意识,增强法治中国话语体系的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出了法治的政治本质,具有鲜明的政治逻辑和政治立场。一个国家的法治体系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道路逻辑和文化逻辑,是一个国家共同体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22-11-13

作者简介:韩兴华(1980—),男,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对一个国家法治道路的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对这个国家前进道路的政治认同。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的需要。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政治和法治的辩证逻辑,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政理命题。^[3]批判性思维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现问题,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直面问题,积极解决。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代替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掌握批判话语的主动权。法治思维正是一种直面矛盾解决矛盾的理性思维。法治是社会矛盾解决的主要机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建立法治社会就是要学会用法治的方法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要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二 高校思政课中法治思政教育的现状

在高校思政课中承担法治教育的课程为“思想道德与法治”。法治课注重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和法治的规则意识,自觉地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

(一)难以讲“深”,内容多与课时安排的矛盾

课文内容极度浓缩,课本尝试将整个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内容浓缩在一章里。在这一章里既包括整个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包括支撑法治体系的各个分部分体系,同时在各个分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概念。这些概念以及其所组成的概念体系十分繁杂,即便是在法学专业学生教学中也需要详细的讲解,学生才能理解,而在课本安排中,这些体系和概念仅仅用几句话解释或者不解释。这对非法专业的学生来说,理解难度很大。

首先,涉及概念繁多。课本限于篇幅的限制对概念不解释或一笔带过。比如说部门法名称,课本就没有详细的解释。学生一般很容易区分民法、刑法和宪法,但对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等这些部门法概念大多数学生就不甚了解了。体现法治精神的法律原则课本也没有解释,如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效率原则仅仅展示了名称。课本中常出现的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等易混淆概念,课本不但没有解释更没有区分,这就造成了学生概念上的缺失和模糊。

其次,涉及理论体系繁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十一个坚持”涉及的都是全面依法治国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大问题,包罗全面依法治国布局的各个体系。这些体系与体系之间本身就是有机统一的,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中。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很容易缺乏体系性,对体系理解不深刻以及对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关联度把握不准确。比如法的运行体系就十分的宏大,他囊括了法律从制定到被公民遵守和信仰的整个过程。再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包括组成体系本身的各个部分体系,既包括法治推进的步骤又包括法治建设的整体布局。这些概念和体系课本中用的篇幅并不多,但是里边的知识点繁多。比如“法治监督体系”解释仅仅用了三四百字,但是其涉及的概念却多达15个。

在目前的课时安排上“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课本科三个学分,专科两个学分。各个学校的学时大约在48到64学时之间,排在法治章节学习上的时间大约在4—6个标准学时。在这么短的学时中讲清楚如此繁多的概念和体系实属不易,这就造成了教师在讲解该章节时常有取舍。法治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取舍会人为地割裂有机统一体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二)难以讲“活”,教学过程中实践与理论安排的纠结

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包含法治体系建设的各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本中涉及法治的章节只有一章,四节内容。第一节“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与运行”,涉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法治中法律运行的基本规律。第二节“坚持依法治国”,涉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总体概括以及建设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根本遵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则、立场和实现途径。第三节“维护宪法权威”,突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重视宪法依宪治国的理念,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宪法学理论创新。第四节“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课文在这一节中才开始讲培养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民社会中运行的载体,是每个公民培养法治素养必修科目,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从这些章节内容的布局来看,课本编写者尝试从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上阐明习近平法治思想,教师在有限的课时教学中难免出现以下三种倾向。

一是在教学上重理论,轻实践。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将其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

分去讲解,忽略了“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的特殊性。虽然其与概论课一样都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体意识,但是法治课更加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规则意识和行为引导,需要具体的案例去阐释规则的理念和行为的规范。

二是在教学上重实践,轻理论。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虽然重视实践,但是却忽略了实践背后的价值体系和制度逻辑。教师在课堂上讲授了大量的案例,试图让学生对法治和法律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比如有些教师重点讲了学生感兴趣的正当防卫、无因管理等一些在社会上引发讨论的案件。这些案件背后蕴含的法治运行机制是很复杂的,法律科班出身的法官、律师尚不能完全地掌握其运行的逻辑。单靠课堂上对案件的复述虽然能一时激发起学生的兴趣,但是学生很难掌握背后复杂的法治运行逻辑,学生得到的法律信息是碎片化的,不能有效地支撑起、建立起法治思维,法治课成了故事汇。

还有一些教师只讲解本章自己认为的“重点”,比如重点讲解法治思维部分,其他部分可以忽略,尤其是涉及法律专业概念的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个法治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系统性,各个部分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相辅相成。除此之外,习近平法治思想还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等重要的思政教学要点。

(三)难以讲“透”,理解深度与理论要求的差距

一是教学中对教材的理解不够,难以做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理念和实践的统一。自从“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合二为一之后,对法律知识的培养已经从属于对法治素养的培养。把握法律基础与法治素养的关系、法治理念与法治实践的关系是关键。“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法治部分侧重于通过价值理念的塑造和认同以及规则的引导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这一部分在思政体系中的任务与概论课不同,具有独立的价值,不能将这一部分讲成概论课。

“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课虽不主要让学生具体地了解法律条文,但是要求学生通过对法治思维的理解,去掌握法治生活中的原则,从而培养起法治素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其中法治思维是连接法治理念与法治实践的关键。十八大首次在党的报告里提出“法治思维”概念,之后这一概念被广泛言说、研究并运用在各个领域,法治思维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法治理论和实践的关键环节。人们通过法治思维审视社会法治现象和引导自己的行为模式,培养规则意识。

法治思维作为理论与实践的连接器,他的养成要靠理论更要靠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体系归根结底要以法律规则的形式呈现在公民面前,对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应用正是法治素养的表现,而法律规则的理解是需要法治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实践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需要精选大量的案例和进行法律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的目的,不是追求每个具体案例背后的法律条文,而是要寻求具体案例中的法治精神、法治逻辑和法治原则。法治思维及其内涵可以当作道德去理解,也是一种知行合一的东西。比如说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等内容完全可以作为评判事件是非曲直的标准。

二是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学术话语体系的阐释。一些同志在讲解法治部分的时候,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运行分隔开。在举例子的过程中,不能使用中国特色的法律术语,学术话语。很多的例子和话语的引用带有明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色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宣传,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脱离了特定思想观念,规则表达是没有价值基础的,违背了思政课的教學目的。一些同志不能恰当地把握具体的中西方法治理念的区别,在课堂上混用,将一些不兼容的西方法治理念强行嫁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上,显得概念上前后矛盾,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难以让学生真正地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三、教学理念上突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方法

(一)突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特色性的讲解

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法治的概念体系日益明晰,通过推动大众化的革命文艺,以“民族”“人民”“阶级”“劳动”等为关键词,运用仪式化运作、生活化叙事、情感化表达、英雄化导向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新的法治话语传播,激发了民众参与革命的热情。^[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移植了许多法治理念,进行了长时间的法治建设,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但是一些理念的底层逻辑和立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并不都兼容。我国法治领域基本上是“西学东渐”,以引进西方法治话语为主。尤其是伴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深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成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领域中影响最大亦最为深刻的理论,甚至一度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主导力量^[5]。在一些法治观念引导下抽象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并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冠以“普世

价值”的标签,以所谓的法治拒绝政治来消解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其独特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逻辑,维护的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制度运行体系。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的立场和逻辑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也是中国法治道路区别于西方法治道路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领域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强,必须把握原则、坚守底线,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我们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作为法学学科话语体系“应当既具有科学精神、理论品格,也具有政治情怀、实践价值。既不能简单地用政治话语取代学术话语,用政治性遮蔽其法律性;也不能刻意地用学术话语置换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则不仅蕴含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和法理逻辑,同时也在对政治话语的回应与阐释中彰显着其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6]。作为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扩充自己的理论储备,在政治的高度上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二)突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方法论的讲解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要让学生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方法,增强科学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复杂现象,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法治问题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坚持中国的实践,全面地思考依法治国的课题。如习近平总书记辩证地论述了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法治中有政治,背后有政治理论、政治逻辑,法治道路底下有政治立场。关于党大和法大的争论,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关于法治建设中党的领导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郑重的阐明:“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在此过程中,理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和错误的观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导向的辩证思维。学习这些思维能力和思

维方法本身就是提高学生的法治思维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素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让学生能够活学活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认同、对法治方向的认同、对国家发展逻辑的认同。

四、教学内容上要展现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性

(一)思政课讲“深”要注重知识的系统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2021版教材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关键内容。宏大的理论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像其他学科一样注重思政课知识的系统性。首先,要注重概念,从理清概念开始。再复杂的理论体系都是由概念体系组成的,概念就像砖头一样通过有机的组合构建起了理论体系,同时它们也是知识逻辑性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讲清楚这些基础的知识,知识是如何来源于实践的,以及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系统性。其次,要全面地讲解这些知识,避免知识碎片化。中国特色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各种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能通过花里胡哨的方式片面地让学生掌握,知识碎片化是对一个理论体系最好的瓦解方式。弄懂这些概念对于理解法治体系至关重要,概念中蕴含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正是我们构建法治思维的一块块基石。

教师不是演员,讲课也不只是表演,在这一点上思政课和其他知识性科目是完全一致的。教师需要系统的教,学生需要系统的学、努力的学,没有别的捷径。在教学手段上,积极探索智慧教学工具的引入与应用方式,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手段弥补课时不够的问题。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红利,教师将相关的阅读材料和视频放到线上,学生在课前阅读观看,课堂上讲解和讨论,可以节省大量的课堂时间,解决课堂讲解时间不足的问题。

(二)思政课讲“透”要注重知识的逻辑性

讲“透”就是要把理论和实践的逻辑相结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发展目标相结合。讲思政课不仅要完整地讲授系统的知识,还要注重理论内部的逻辑关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熟的知识体系不仅仅有自己的概念,还在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证成,理论要有逻辑性、自洽性,还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证明了人类的历史总按照特定的逻辑发展。人们只有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原理,认识规律,遵守规律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创造。

习近平法治思想包含的逻辑不仅仅分布在一门课程当中,而是来源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的历史逻辑。所以,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是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本身,更要学习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百年奋斗实践,理解其中的道路逻辑、历史逻辑和发展逻辑,自觉地践行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遵守中国特色的法治的体系规则。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大思政课的配合。在具体教学上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利用所学习的系统性知识分析知识点背后的逻辑。

(三)思政课讲“活”要注重知识的实践性

活学活用是理论发展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在意识形态共同体中,只有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成员利用符合意识形态利益要求的理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能够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可靠稳定的意识形态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要求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法治课的特点在于在一定理念指导下的实践。法律规则是构成体系的一块块基石,法治思维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应用。法治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描述,缺乏法治的实践很难让学生培养成法治思维。

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教师在学生的讨论和实践中引导学生正确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要直面社会上的热点问题、重点问题,不回避。在课程开设中注重课程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开辟教学第二课堂,利用选修课、社团活动、校外法律实践基地实践教学等形式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相应的课程服务,扩展学生的法律知识,丰富学生的法律实践。同时在第二课堂中提高课程的扩展性和鲜活性,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资料以增加学生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 [1]王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J].公民与法(综合版),2021(10):3-7.
- [2]王晨.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 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奋斗[J].中国法学,2022(4):5-10.
- [3]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J].政法论坛,2022(3):3-26.
- [4]梁珊,秦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以革命戏剧为考察对象[J].党的文献,2020(6):88-94,108.
- [5]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J].法学研究,2012(3):3-23.
- [6]苗连营.中国“宪法实施”的话语体系与演变脉络[J].中国法学,2021(3):70-89.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nto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HAN Xinghua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rule of law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s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of the path to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nto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hedding light 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strengthening college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the rule of law,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rule of law,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By means of analyzing the teaching status quo of the rule of law, the present study of the integr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should start from the teaching status quo and the students' practical needs, making exploration from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teaching content, helping college students to conduct their views of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ntegration;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历史主动精神视阈下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论析

王怡灵, 吴学兵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把握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经验基础上, 呈现出的历史自信自觉、历史创造、历史担当等精神品质, 彰显为自信自强的奋发精神、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 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奋斗精神; 弘扬历史主动精神, 有助于激发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意志、练就奋斗本领。高校须重视历史主动精神的教育, 通过思政课教育教学、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深化社会实践等路径弘扬历史主动精神, 帮助大学生树立奋斗进取的信念, 营造自觉奋斗进取的氛围, 促进他们锤炼奋斗进取的本领, 从而提升对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历史主动精神; 大学生; 奋斗精神; 培育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7

中图分类号:G641; 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095-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大青年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1]71}同时也着重强调:“在全社会弘扬奋斗精神, 培育时代新风貌。”^{[1]44}这些论断为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重要遵循, 指明了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目标和方向。由于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了解和掌握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经验中所呈现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品格, 凸显为高度的历史自觉、坚定的历史自信、强烈的历史担当、主动的历史创造等精神品质, 其内在包含着奋斗精神的理论意蕴和价值诉求。因此, 以历史主动精神涵养新时代大学生的奋斗精神理论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行性。

一、历史主动精神中内蕴深刻的奋斗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把握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经验基础上, 所呈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2]“主动的历史创造”^[3]“强烈的历史担

当”^[2]等精神品质, 经由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上升为伟大民族精神, 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奋斗精神。

(一) 坚定的历史自信体现了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

其一, 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 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中国利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跃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同时, 社会长期保存和谐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在新时期, 经过长期努力, 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 取得了许多以前难以想象的成就。这既是自信的表现, 也是自强的表征。其二, 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渐化解自卑心态。一百多年前, 我们盲目地将西方的一些思想和文化套用在自己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 而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 其社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 物质主义膨胀, 并且充满了对外扩张的暴力倾

收稿日期: 2022-1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的重要论述研究”(19XKS018)

作者简介: 王怡灵(2000—), 女, 福建仙游人,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吴学兵(1970—), 男, 安徽枞阳人, 博士,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向,这对于我国的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国改变了发展思想和道路,以实际国情为基础,拓展了发展途径,生成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世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更多可能,这是自信的深厚基础和自强的深沉底蕴,让中国人民焕发出更坚定的历史自信。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作为历史自信精神的鲜明底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百余年奋斗征程中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保障,生动体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当中具有的精神风貌,让中国人民能够以更加意气风发的奋进状态走在新征程的前列。

(二)主动的历史创造彰显了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

第一,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体现为在实践中破旧立新。中国共产党善于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敌军在武器和人数上的强大优势,我们党丝毫不畏惧,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又经过激烈的三大战役解放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新中国。我们党破旧立新,令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第二,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表现为在实践中以弱胜强。主动的历史创造精神在中国百年奋斗史上书写了无数以弱胜强的历史奇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善于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创造改写战局的条件。以弱胜强作为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要形势,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史。^[5]例如,抗美援朝战争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敌军不仅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上碾压我们,更是想通过这场战争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但是我们党并不迷信于客观条件的优势,而是做到各个击破,最终以弱胜强,取得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继续带领人民在科学技术领域艰难开拓:杂交水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解决了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让中国航天成功进入深空探测新领域等等。在新征程中,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作为历史创造精神的应有之义,依旧体现为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破旧立新、以弱胜强,从而主动创造和推动历史。

(三)强烈的历史担当昭示了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

其一,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展现为崇高的责任意识。中国共产党使命在心、责任在肩,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的政党。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舍生忘死,带领人民成功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新中国

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并自主研制了“两弹一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科学制定各个政策方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这些都是对充满崇高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其二,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凸显为强烈的斗争精神。这既是时刻明确自己的使命,更是为了完成和传承使命而努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昂扬奋进、一往无前的精神面貌。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党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从不畏惧、决不言败,以强烈的斗争精神领导全国人民风雨无阻、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6]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责任在心、敢于斗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不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步步迈进。

要言之,从整体视域理解历史主动精神中奋斗精神的基本内涵,用与时俱进的目光看待奋斗精神的当代价值与启示,是我们正确理解与深刻把握这一精神的关键所在。

二、历史主动精神培育大学生奋斗精神的价值观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7]大学生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最具有活力的代表,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基因。在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奋斗精神是不断砥砺前行的坚实精神基础。对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加以培养,可以引导其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以立志民族复兴的伟业。

(一)弘扬自信自强的奋发精神,激发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历史自信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成就而产生的自信自强的奋发精神是激发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教育资源。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不仅是历史主动精神里最深厚的精神底蕴,同时也是历史自信涵养大学生底气最突出的主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关乎民族命运,是理想信念的生动表达,是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政治灵魂。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中,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是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

源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想信念是一盏点亮前进之灯,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向一条光明的道路,艰苦奋斗,永不言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尽管建设中国的道路上充盈了重重迷雾的困难,理想信念就像是这迷雾当中的光芒,照亮困难的真实模样,帮助革命者寻找解决的办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理想信念如同指明灯,使建设者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变得清醒,在建设时代的过程当中不偏离正确轨道,最终赢得胜利。^[8]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巨变中,迫切需要用坚定的历史自信加强对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筑牢大学生对历史主动精神的认同,“使大学生深刻感悟前辈们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更好地理解前辈们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9]。

(二)倡导拓进取的创造精神,促进大学生锤炼坚强意志

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中,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是促进大学生锤炼坚强意志的宝贵精神资源。历史只会眷顾奋进者,而不会等待畏难者。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延绵不绝,从一开始的贫穷弱小到逐渐走向富强繁荣;从一开始只能任人欺凌压迫到发展主动的历史创造精神,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开拓进取的精神基础给了我们党精神力量,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锤炼坚强意志,我们党才会主动争取积极向上,不断淬炼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新时代,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不可逆转的伟大精神力量。中国人民目睹伟大巨变,将自己在历史中所积累的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充分爆发出来,正在书写着新的华章。“脱贫攻坚”、“蛟龙”入海、港珠澳大桥开通等引以为傲的成就直抵人心,为增强中国人的骨气提供有力支撑,为创造出更伟大的中国奇迹夯实强大精神世界。因此,开拓进取是中国成功的精神基础,为新时代大学生锤炼坚强意志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学生也将以此为基础增强骨气,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并将这份骨气深深扎根在血液中,在任何时刻凭借一身铮铮铁骨为社会主义事业前赴后继。

(三)发扬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推动大学生练就奋斗本领

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中,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是激励大学生在新征程保持昂扬斗志的强大精神力量,更是推动大学生练就奋斗本领的伟大力量源

泉。在历史的任何时期,我们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人民利益面前从来不敢有半点马虎和丝毫懈怠,永葆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奋斗精神,坚持不懈地带领全国人民以实干开辟新天地、用奋斗创造新辉煌。在新时代,党和国家要继续踔厉奋发谋复兴,就需要年轻力量赓续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这对加强大学生的奋斗本领显得尤为迫切。“将崇高的责任意识和强烈的斗争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筑牢大学生对历史担当精神的认同”,^[10]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深植爱党为党的责任和情怀,更要学会从前人奋斗中承接梦想、汲取对奋斗精神的深层感悟,在主动担当的社会实践中增强奋斗本领。“从前辈身上汲取奋斗智慧,脚踏实地地增长自身的奋斗本领”^[11]。在大学生增进担当精神的同时,涵养豪迈坚韧的志气,使其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添砖加瓦,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高地。

三、历史主动精神培育大学生奋斗精神的现实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大学生具有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12]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高度重视弘扬历史主动精神,要结合时代特征、当代国情和大学生成长需求等维度,将历史主动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全过程,覆盖校园文化活动、渗入社会实践各方面,创造性转化为涵养大学生奋斗精神的教育资源,拓宽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培育路径,让奋斗精神焕发时代生命力。

(一)将历史主动精神融入思政课堂,帮助大学生树立奋斗进取的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13]高校要切实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关键作用,将历史主动精神融入课堂,深化对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认知,激发大学生的奋斗信念。

其一,思政课要以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规律和理论逻辑为切入点,使大学生从理论层面上对奋斗精神真信真懂,再结合革命先烈的具体事例,形成由“单纯说理”向“结合实际”的转变,树立大学生的奋斗信念。例如,教师通过思政课堂向大学生传授革命前辈们百折不挠的革命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天动地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改革开放后创新实践的团结奋斗精神,促使大学生汲取历史的智慧

和力量,从而清楚新时代奋斗的必要性和奋斗的可能性;教师也应该合理充分整合身边的资源,在给大学生讲道理的过程当中充分考虑学生的不同特点,结合实践并利用多元方法使大学生愿意奋斗,学会奋斗,树立大学生的奋斗信念,培育大学生自信自强的意志品格。其二,思政课教师须创新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提升对大学生奋斗精神教育成效。思政课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对奋斗精神进行深入的理解,并且结合变化的时代条件,认识其不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线上线下多样化讲授方式增强教育的亲和力、针对性,使学生勇于奋斗,形成由“单向灌输”到“比较说理”的转变。例如,教师在讲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引导大学生明晰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与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关联;教师也可以因地制宜、深挖本土党史、国史资源,增强大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大学生从思想理论教育中更好地体悟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其三,高校教师应当通过课堂教学将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经过讲授、分析,采取课题研究、课堂讨论等大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强化引导,形成由“单向灌输”到“双向交流”的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使大学生真正地参与到课堂当中来,主动学习,并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培育大学生迎难而上增强担当之勇。

(二)将历史主动精神渗入校园文化活动,营造大学生自觉奋斗进取的氛围

将校园文化与奋斗精神相互融合,让大学生在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活动中点燃奋斗热情。

其一,以社团活动为载体。高校依托大学生的社团,举办以“历史主动精神”为主题的系列活动,让大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养成正确的历史观和奋斗观。例如,举办演讲比赛或辩论赛,营造“红色氛围”,让大学生在一篇又一篇演讲稿中感受和了解中国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时代当中勇往直前、不断奋斗的,在一场又一场激烈的辩论赛中领悟和体味革命先烈踔厉奋发的顽强意志;举办相关学术讲座,让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带领大学生全面追溯伟大党史,或者将当地的优秀人物或已经毕业的优秀校友邀请到学校当中,开展相关的讲座,让他们从自身的经历和实践出发,向还处在学校当中的大学生讲述他们是如何以奋斗为精神基础取得成功的。以此夯实大学生奋斗精神的学理支撑,让大学生从讲座当中充分地认识到奋斗精神的重要性,感受到中华民族之所以会取得现在的伟大成就是与昂扬的奋斗热情分不开的,认识到如今取得的成就是多么伟大,从

而使大学生在未来社会中以自信自强的意志品格冲锋在前,在困难面前扛得起责任,在矛盾面前站得稳立场。其二,以校园新媒体为载体。现如今,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面对这种情况,高校应该建立网站和交流板块,为发扬奋斗精神提供新的平台,使大学生奋斗精神的教育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网站要能够真正吸引到大学生群体的目光,使他们在日常的上网过程当中就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每年的开学季和毕业季都是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高校应该抓住机会,考虑到大学生的需求和年龄特点,将时下时尚元素融合,通过多种数字技术手段进行奋斗精神教育的宣传。例如,学校可以对一些主动申请到祖国需要人才的地方去帮助发展的优秀大学生进行宣传,使这些优秀的学生发挥榜样的力量,带动在校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学校也可以充分利用一些传统的媒体手段,比如说广播站,在课间的时候广播一些优秀人物事迹和我国的传统文化,帮助大学生增长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获得教育,让大学生走出“舒适区”,克服“本领恐慌”,激发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其三,以科研文化项目为载体。高校应为培育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人才提供平台,例如,成立创新创业教研室、创新学院等,为大学生创新创造提供专门指导;还可以举办校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这需要通过大学生团队协作来完成一系列诸如前期调研、具体实施、中期审核、阶段总结直至最后完成项目,以科研文化项目为载体培育大学生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是高校一项有益的探索。

(三)将历史主动精神注入社会实践,促进大学生锤炼奋斗进取的本领

其一,在专业实践中锻炼奋斗精神。专业实践指的就是大学生所参加的那些与专业有关的课程,比如理科生的实验、艺术生的毕业设计等等。大学生应该抓住机会,充分地利用这些专业实践,使自己拥有更多奋斗的本领,所以大学生应该重视实践,并且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勇于钻研,不轻易言弃,使自己能够沉着冷静地解决问题,勇敢地面对失败,正视困难又要坚定自信,既要借势乘势又要自强不息,不断弘扬自信自强的精神。其二,在就业创业实践中磨炼奋斗精神。现如今,大学生对于祖国的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大学生不仅仅要在内心永葆奋斗激情,更应该将这种精神转化到具体的实践当中。要将精神化为实践,就应该积极地参加就业创业实践,发挥自身的优势,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其三,在劳动实践中历练奋斗精神。大学生能够接触

到的实践是有限的,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将实践活动聚集到校园之内,比如清洁、植树、整理图书馆等等。与此同时,高校还可以组织“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让大学生实践中访谈革命战士、辅导留守儿童功课等等,这些具体的实践可以帮助大学生将内心深处的劳动意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既能切实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又能提升自身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习近平.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 求是,2022(1):4-15.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

[4] 骆郁廷,孔祥鑫.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认同[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2(1):26-34.

[5] 骆郁廷,付玉璋.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三重内

涵[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9):80-89.

[6] 查晖芳. 百年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奋斗精神的时代价值[J]. 决策探索,2021(12):21-22.

[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2-05-11.

[8] 许颖. 百年奋斗历程构筑青年理想信念的逻辑及其启示[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40):30-33.

[9] 孟凡琦,杨金铭. 新时代奋斗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4).

[10] 陆颖龙. 在新时代培养大学生奋斗精神的价值与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2021(23):62-64.

[11] 尹佳琪,李巧巧. 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路径探析[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6).

[12]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 人民日报,2018-09-11.

[13] 田丽,赵婀娜,黄超,等. 大思政课,总书记心中的一件大事[N]. 人民日报,2022-05-22(01).

(责任编辑 许峻)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pirit of Strugg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WANG Yiling, WU Xuebing

(School of Marxism,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historical confidence and self-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creation,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at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demonstr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rrect grasp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struggle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t manifests as the spirit of self-strengthening, pioneering and creative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take action, which vividly demonstrates the great spirit of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rrying forward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is helpful to inspire college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to foster their strong will and to train their ability to struggle.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By carrying forward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arrying out campus cultural activities, deepening social practice and other way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help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the belief of striving and enterprising,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conscious striving and enterprising, promote them to exercise the ability of striving and enterpris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striv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cultivate their ambition, backbone, confidence, lead them to aspire to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a consistent way.

Key words: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college students; the spirit of struggle; path of cultivation

论儒家传统修身理论的个体生命观

张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儒家传统修身理论重视个体生命的存在及自我道德教化的养成。通过“人禽之辨”确立人之生命存在的高贵性;“天命之谓性”的生命神圣观向我们传递出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并对生命负责的思想;“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体现出一种追求生命理想与生命价值的取向;“格物致知”“自省”“慎思”“慎独”的修身功夫体现出儒家文化注重自我生命的内在修养和完善,并作为成就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儒家;修身理论;个体;生命观;生命价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8

中图分类号:B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100-05

儒家修身理论不仅是伦理学说,更是生命学说,其个体生命观认为生命至高无上且神圣不可侵犯,但生命生来又不完整,需要通过修身功夫来实现内在道德教化的养成与人格理想的完善。儒家思想认为,修身在于“为己”和“自得”,修身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修己之身,提升自我道德素养与人格境界,修身的过程也是自我生命完善的过程,修身的最终目的在于超越自我,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受时代的影响,儒家修身理论的个体生命观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其强烈的生命意识以及尊重生命、注重通过道德教化修养内心、勇于追求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思想理念仍值得当今生命意识匮乏的人们去学习和借鉴。

一、人禽之辨与人的生命存在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的生命存在。对于这个命题的思考,儒家先哲通过“人禽之辨”来确立人之生命存在的高贵性。他们认为人的生命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性生命是因为人性之所在。“生之谓性”即天生的素养就叫本性,但这些天生的素养皆是我们所说人之自然属性,如若人仅有自然属性,则与野蛮愚昧的禽兽毫无差别,又怎能称之为“人”呢。“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思想中一个关乎生命的哲学命题。

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对该论题有过讨论。孔子从人伦的角度提出了人和动物的差别所在,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首开人禽之辨的先河,进一步提出了人的生命区别于动物生命的根本所在即是人具有人性,人之生命具有动物生命所不存在的仁义道德,人的生命是向善的。

《论语·微子》中的一句名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171}说的是我们既然不能同飞鸟野兽同道相处,若再不与人打交道,那我们还同什么打交道呢?孔子这句话道出了要珍惜同类,我们人类不同于鸟兽,是因为我们不仅仅具有生物性的生命,更具有文化性的生命,所以孔子坚持“辟人”“不辟世”,永不放弃行道。天下太平,我们就用不着去改造世界,反而是天下不太平之时,我们要一起努力,行道义去改变世界,这样才能使人类的文化生命生生不息。孔子的思想为后来的人禽之辨奠定了基础。《论语·为政》中记载:“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57}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在我们所说的孝就是要赡养父母,但是家里的狗和马也有人供养。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敬意,就跟我们饲养的狗、马没有任何区别。对父母实施孝道,我们一般

收稿日期:2022-08-15

作者简介:张培(1980—),女,河南许昌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人认为只要做到赡养父母就够了,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孔子的回答非常犀利,他认为如果把赡养父母等同于孝道,那么这种做法就等同于饲养家中的狗和马,毫无亲情所在,只是图于表面。我们对父母的孝道,不仅仅是一日三餐的满足,更要有精神性的、内在的慰藉,要心存感激、敬畏之情,用这种感恩之心去温暖、感化父母,这样他们的内心才能被感化,这种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所在也是人的生命存在之根本。

孟子通过“人禽之辨”进一步解释了人的生命存在是因为人的生命具有道德性,即人之生命性善。孟子首先提出“类”的概念,他认为世界上有不同的“类”,比如人和动物生命是属于不同“类”的。在同一种类的生命中有许多相同特征,圣人与普通平民就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人类与动物不同类的生命之间,人类生命具有动物生命的自然属性和许多相同之处,即“人之所以易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1]270},这是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的思想基础上对儒家个体生命观的概括与总结。孟子重点突出了人类和动物生命不同之处,即肯定了人类生命的价值所在,“乃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者,人能知义,禽兽不能知义也。因此心之所知而存之,则异于禽兽”^{[2]54}。孟子通过人禽之辨,对人的生命存在与本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人之生命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的生命具有伦理道德,故为天下之贵。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到人如果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那么人就不成为人,人的生命就无异于禽兽。“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1]242},做人要有做人的道理,如果只是吃饱穿暖,而不接受教育,不知道德礼仪,那就和禽兽差不多了。人的生命与禽兽共性很多,差异仅仅“几希”,如果人之生命缺少了这些道义,人就容易沦为禽兽,人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孟子通过“人禽之辨”的论证,分析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所在,这也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个体生命在经过人文教化之后,便出现了后来的家庭伦理关系,即: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荀子更注重从礼的角度来区分人和禽兽生命的差别所在。荀子提出人的生命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人的生命具有其动物的自然性,而是因为人有其思考分辨的能力。荀子通过“人禽之辨”分析了人的生命贵于禽兽生命的根本所在,那就是道义的存在。“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3]194}水火有气却没有生命,草木

有生命却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却没有道义,人有气、有生命、有知觉且有道义,所以人的生命存在是高贵的。人的力气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是牛和马却是被人使用的工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是有道义的存在,道义使人按等级名分分成了不同的群体。人之生命存在的高贵之处就在于人的生命是有人伦道德的,人有人文性、精神性,而禽兽不具备,这是人类和动物生命的区别所在。

儒家提出的“人禽之辨”,不是从自然生命去认识人和禽兽的区别,而是从人伦教化、道德性善上去做一区别,这实际上也是人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体现,这是先秦儒家关于生命观的起点。孔子的至理名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足以证明了儒家先哲重视生命、尊重生命的思想。

二、天命之为性的生命神圣观

“天命之谓性”中的“天”可以理解“自然界”或“自然”,英文翻译为“nature”或“natural”,它强调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存在,具有先天本源性。“天”被视为万事万物之根源,是一种超越物质和精神性的存在,天赋予宇宙万物以生命和意义的存在。《中庸》中把“天道”描述为博、厚、高、明、悠,说明了天的神圣与博大精深、具有化育宇宙万物之功效。“命”字作为名词有生命、命运的意思,作为动词则被理解为命令、赋予等意义。在“天命之谓性”中,“命”字具有赋予、给予之意,上天赋予我们自然的生命,我们更应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命”作为承接“天”和“性”的桥梁,具有上显于天,下化成性的作用。“性”字可以理解为“人性”“本性”或“天性”,《中庸》中把“性”字作为修身立教之本,先秦思想家把“性”字与“生”字联系在一起,探讨生命发展的内在力量及本源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把“生”与“心”相结合,产生了“性”字。孟子认为,“性是上天赋予我们的,荀子认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3]515}。“性是自然界给予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存在性,我们要遵从自然界赋予人的德行,这种“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中蕴含着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神圣观。

“性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5]14},体现着博大宽广的宇宙生命观,它包含了生命的本源性、生命的普遍性以及生命的目的性特征^{[6]24-31}。儒家的天命观源于西周,周人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更是人类信仰的最高代表,我们要遵从“天命”,但是又认为这种遵从要以自然万物的发展状况为依据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and 改变。西周人把“天”视为道德价值的根源,生命由“天”所赐,

我们要尊敬和敬畏上天赋予的生命,以神圣之心对待自己的生命,并为之负责。孔子在《论语》中说到了君子有三畏,其中之一就是“畏天命”,这里的“畏”不是主张人们要臣服于自然宿命,而是要让人对“天命”之规律有所认识,并能深刻理解天赋生命的神圣性,以至于人们可以更好地对待和珍惜自己的生命。“洋洋乎,发育万物,骏极于天”中的“天”具有化育万物生命之功效。上天赋予万物以生命,天命神圣,那么上天赋予的生命自然也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天地之间万物生灵,遵循天地之道而成性,只有人的生命是最为可贵的存在。儒家“天命之谓性”思想中体现着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神圣观。

三、人格理想与人的生命价值

“人格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和秉气之性,它呈现的是个人自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7]46-51}。“内圣外王”是儒家追求的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包含成己与立人两个层面。通过道德教化,内化自我,成就自我道德的完善,并在自我道德完善基础上实现教化天下的最高人格理想。儒家人格理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发展与完善生命、成就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个体生命观。

(一)“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内涵

儒家文化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所谓“内圣”指的是自身具备较高道德修养之人;它强调个体的修身,属于个体行为。“外王”是指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与抱负之人,它侧重个体外王事功,成己成物,由个体心性修养推及社会,属于社会行为。其中“内圣”是实现“外王”的前提,“外王”则以“内圣”的修养程度为根据。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先哲认为要实现这样一种至高人格,修身是本,修己才能达人。“内圣”就是要修养德行,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这种核心观念蕴含的仁爱、忠义、礼和、睿智和诚信等道德品质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要追求的理想人格特质。“仁爱”思想对促进生命个体、生命与他人、生命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仁”本身就具有关爱生命之意,包括爱家人、爱朋友、爱社会、爱自然,这种仁爱之心是一种以自然万事万物和谐友爱为目标的精神境界的实现,它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理想状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哲将“义”看的比自身生命还贵重,他们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72},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为人更重情义,孔子认为关键时刻甚至可以舍生取义。“义”字体现在对待他人公平正直,

对待国家能够做到“天下为先”,培养社会成员的道义感与责任感。“礼”是礼节、规则或规范,“礼”不仅适用于个人、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需要礼仪、规范的约束。“智”即智慧,古之智重在强调生命个体是否博学、慎思、审问、笃行等方面。当今社会,“智”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除了生命个体知识的获得之外,更在于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创造性,个体生命能否为社会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也就是个体精神生命的实现。“信”就是诚信、信任。

如果说生命个体的身心修养所要达到“内圣”之目的,那么“外王”之人格理想则内涵教化天下之意,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最终是为了促进生命之间的和谐、健康、全面发展,在完善自我生命的同时承担起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最终实现生命的自我价值。

(二)“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社会化指向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

实践是人格修养和人格理想实现的重要途径。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到:“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知识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和社会的教育,就不会带来教育的好处,会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种过程。”^{[8]3}个体生命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正确认识主观世界并逐步培养自我的人格情感、人格意志等特质。为了实现这种具有仁义道德的理想人格,儒家哲人满怀高度的责任感,竭尽一生实践活动投入这种生命价值理念中去。他们在提升自我生命的同时,将个体生命融入社会中,在不断完善人格理想的过程中实现生命的价值。赵汀阳先生所说的“只有当物进入事中时才具有意义和价值”^{[9]84-85}。也就是说自我人格理想只有作用于社会,进入意义世界,才会产生价值。儒家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人格理想之最终目标是指向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个体生命主体性得以发挥,个体生命在实践中发挥创新与创造过程实现生命的自我价值。

1. 理想人格使个体生命的主体价值得以全面发展

传统儒家文化中对个体人格的培育非常重视,其提倡的“君子”和“圣人”人格不仅要具备“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品格,还应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这种理想的人格不仅从内心深处唤起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掌握,而且唤起了个体生命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君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以万世太平为己任,在实现人格理想过程中自我主体性得以彰显,生命特质得以提升、生命价值得以体现。儒家这种优秀的人格特质使个体生命得以健康、全面发展,并对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价

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人格是生命的内在特质,也是一个人的灵魂所在,它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正是对生命和生活怀有无限憧憬,才使我们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学习借鉴儒家人格理想的精髓,有助于人们抵制不良思想的侵害,帮助个体生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2. 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人格理想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72},孔子认为君子与小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君子看重道义,小人看重利益。儒家崇尚重义轻利的“君子人格”,在义利关系上,君子应以义为重,见利思义,必要时可以舍生取义。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他认为道义应高于个体生命,为了道义,君子要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诈于人”^[2],甚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当国家与社会处于危难之时,君子要舍弃自我生命来保全国家或社会的利益不受损失。儒家这种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人格理想有助于人们培养重义轻利、勇于奉献的人格精神,树立自觉抵制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错误道德观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 安贫乐道的生命理想

安贫乐道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又一主要特征,它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勇于奉献、实现价值的生命理想。君子不但要有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特征,还应具有乐观自信的心态,无论外界环境如何、物质生活如何简陋,都不会影响自己的远大抱负,努力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称赞自己的学生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385},意思是说颜回品格高尚,即使物质贫乏,只有一簞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也丝毫不影响他快乐求学的心态,颜回这种身处逆境,却仍锲而不舍的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勇于去实现生命价值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安贫乐道是一种积极乐观生活态度的体现,更是一种内在的高尚生命情操的展现。处在社会变革中的新时代的大学生,容易受外界不良思想的影响,极度崇尚物质生活带来的快感,但个人精神世界却极度空虚,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思考甚少,生活没有目标,得过且过,极易受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影响而失去远大的生命理想。

四、修身功夫与人的生命实现

儒家文化重视道德教化的养成,其修身功夫是实现生命完善与生命价值的重要途径。“存其心、养其性”,儒家认为自然赋予我们生命,生命是不完善的,需要通过修身来实现自我改造,达到生命的完

善与发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先哲胸怀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他们认为修身不仅仅是“内圣”,修己之身,实现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而是在“内圣”基础上实现“外王”的政治目的^{[10]53-58},即我们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价值。本质上讲,儒家修身功夫很好地诠释了生命如何实现的过程。

(一)修身功夫

修身功夫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先哲非常重视修身之道。修身是修人之身,它的对象是人的生命。生命是自然赋予,它生来是不完善的,需要通过后天的修道,来弥补生命中的缺陷和不足,使之更加完善。如何做到修身,《礼记·大学》中说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5}我们要修养自己的品性,就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就要先证实自己的诚意;要证实自己的诚意,就要做到丰富自己的知识;丰富知识就要深入研究事物的原理。因此,我们从格物致知、正心、成物几个方面进一步分析。

1. 格物致知

“格”有推究之意,“致”则有达到、求得之意。“格物致知”可以解释为探究事物本源,从中获得智慧,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事求是”,但内涵更加丰富。它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是“八目”的基本功夫,它的目的在于正心、诚意、齐家、治国,最终达到平天下之最高境界。《大学》中涉及“格物致知”的描述很少,直到汉唐、宋明时期对其进行了诠释。一代大儒朱熹进一步扩展了“格物致知”的内容,提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4]24}这里的“物”有三层含义,第一是自然之物,即接近大自然,修身养性,领会生命之真。第二即我们所说的事物,儒家提倡的修道离不开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第三即我们所说的读书,在读书中求知,丰盈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的、社会的,更是对精神世界的探索。而要实现“致知”,就要发挥我们个体生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 诚意正心

“诚意正心”是《大学》“八条目”中的内容。“诚意”可以理解为具有诚实的意念;“正心”就是端正我们的心思,祛除影响心灵的各种不利因素,保持内心的安静。《大学》中将“诚意”解释为“不自欺”,我们要做到诚意而不自欺,重要的是要“慎独”,独处时不仅自己的行为要端正,内心也要端正。人心在意念的指引下会产生各种欲望,有善有

恶,有好有坏,我们需要格物来净化自己的心灵,端正我们的意念。《中庸》中讲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1]34},只有至诚者才能尽到人的本性,一切人都能做到尽其本性的话,就能对他人、他物实施善心、仁民爱民,感化万事万物。人类以其智慧和能力让大自然中的各种生命得到生存的机会,这样就实现了人类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成功。“正心”的前提是“诚意”,“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4]7},人心容易受到各种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我们首先要做到诚其意,才能不乱而正,“正心”需要自身具备高深的修养和内涵,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时刻以高智商来应对各种不良和复杂的外部环境,焕发出优秀的人格魅力。

3. 修身成物

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应该把修身作为人生之本。为什么要修身,《礼记·大学》中孔子的弟子曾参说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4]29},我们评价一个人要客观公正,不能感情用事,喜爱一个人却也能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也能了解他的优点,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而对他人产生偏见。因为人人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而对他人存有偏见,所以我们就要修身,从他人角度看待问题,消除不公和偏见,全面客观对待人和事。“成物”接近我们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本,成物是目的,只有修好身,才能做好事。修身是成物的前提,身不正,意不诚,就不能客观公正做人、做事,成物之目的就很难达到。

(二)修身过程即生命实现的过程

儒家经典著作《中庸》中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9},其中“修道之谓教”回答的就是生命如何实现的问题。“教”字在这里承接“性”和“道”,即是按照事物本身之“道”,对其进行充实、发展、完善,使之接近天赋之性。“道有品节,修而全之,是之谓教”^{[5]19}，“修”的对象是自我生命和他人生命,对于自我生命来讲,通过自我修身来弥补和完善生命中的不足;对于他人生命来说,就是通过外在的教育这一方式来帮助他人生命具备正确的生命知识、培养他人正确的生命意识、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那么,生命是如何实现的,生命之说是《中庸》这部经典著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整部著作围绕生命而论,教化人们如何达到生命实现。

《中庸》中讲到三种生命实现的路径或方法,“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1]33}从生命内在的诚心去了解外在事物的过

程;通过后天教育去涵养生命之诚心,明白事理;真诚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才能涵养诚心。个体生命的实现是一个内外力兼修的过程,无论对于生命自身的发展或是从教育实践层面来说,我们不仅要关注人性的开发,更要关注后天的教育,通过教育弥补生命的不足,发挥生命的创造力,实现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儒学自根至干至叶都是为了研究人,人是它的最终、最高和最直接的目的。它试图发现人的日常行为中的真理,并用它的发现来增进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权益、发展人的潜能、实现人的本质”^{[11]51}。儒家修身理论的个体生命观主张“成己”“成物”,认为个体生命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成己”是指成就生命之本,实现自我生命的完整性,彰显上天赋予我们的人性。而修身之道是成就自我、实现生命的重要途径。在修身过程中,使生命具备“尽性”“明诚”“成仁”等特性,促进自我生命的发展、完善和升华,最终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儒家修身理论的个体生命观重视生命的存在,敬畏生命,对于培养人们的生命意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有助于人们克服生命中的散乱、浮躁现象,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出现的道德滑坡与精神缺失等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2][清]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M].沈文倬,译.北京:中华书局,2017.
- [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4]王国轩,译注.中庸大学[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5][宋]卫湜.中庸集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
- [6]李卯,张传燧.“天命之谓性”:《中庸》的生命思想及其教育哲学意蕴[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1):24-31.
- [7]郑娟,丁成际.儒家君子人格要义及当代价值研究[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8):46-51.
- [8]吴式颖.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9]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J].哲学研究,2009(8):84-85.
- [10]杜振吉,郭鲁兵.儒家的修身思想及其方法论书[J].中国伦理思想,2008(1):53-58.
- [11]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许峻)

(下转第 109 页)

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的文化自信构建研究

吉冰冰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基础部,河南 新乡 451191)

摘要: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自信内涵,结合河南丰厚的中华文化自信底蕴,分析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构建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半结构访谈法对河南五所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中文化自信构建现状进行调查,剖析河南高校英语教师的文化教学和文化自信观,以及大学生的中国文化外语表达能力、文化认知能力、文化自信缺乏的深层原因,并依据调查结果探究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文化自信的构建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自信;河南高校;英语课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19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105-05

一、引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1]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构想,不仅包括经济交流,也涉及文化交流,是我国主动应对全世界形势的多样变化、积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而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2]能够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关系,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与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或个人对自身优秀文化的一种肯定、信任与坚定,肯定其内涵,信任其价值,坚定其生命力。“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也让国人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河南具有丰厚的中华文化自信底蕴。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少林武术文化、佛教文化、思想文化、汉字文化、姓氏文化、瓷器文化等都具有明确的文化符号

和河南品牌。“天下功夫出少林”,生动展示出少林武术在中国武术中的崇高地位。河南佛教文化底蕴深厚,位于洛阳、俗称“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乃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在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提及思想文化,诸子百家中河南人占绝大多数,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南。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原大地见证了汉字的产生和所有重要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一部中原汉字史。新时代以来,河南非常重视文化宣传,通过各种丰富且生动的形式介绍河南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2021年河南电视台的春晚节目《唐宫夜宴》和元宵节奇妙夜频上热搜,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老少皆宜,喜闻乐见。14位从千年唐朝走来的女乐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们的俏皮可爱,也感受到了唐朝盛世的雍容气度,更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悠久绚烂的文化。这样的河南本土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与丰富,体现了中原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中原文化的底蕴丰厚,具有文化自信的根基。在此基础上研究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的文化自信构建,具备较高的适切性,既能促进“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文化走出去,又能增强河南高校大

收稿日期:2022-10-0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一般课题“基于河南省红色文化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2021YB0510)

作者简介:吉冰冰(1986—),女,河南荥阳人,河南检察职业学院基础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与高等教育研究。

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

二、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文化自信构建现状的调查研究

(一) 研究设计

1. 研究目的

调查和了解大学英语教师在英语课程中的文化育人观、学生的文化自信现状、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中国文化认知等问题。明确学生真实的文化自信感想和感受,了解他们的文化自信现状,包括树立文化自信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河南省内选取河南 5 所高校的 50 名大学英语教师和 750 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展开个人访谈和调查问卷。为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随机选取了在不同系别和不同年级讲授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师,以及不同系别、不同专业、不同班级上课的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

3.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分析法

以“高校英语教学”和“文化自信”为关键词,通过图书馆和互联网搜集相关文献研究资料,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化自信的相关文献资料的获取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清晰思路。

第二,问卷调查法

对河南 5 所高校的 50 名大学英语教师和 750 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展开研究,共发放 750 份调查问卷(包括 250 份问卷一:大学生中国文化英文表达的难度调查,250 份问卷二:大学生对河南本土文化的英文翻译测试,250 份问卷三:对河南高校大学生进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调查),收回 725 份,有效问卷 725 份,有效率为 96%。

第三,半结构访谈法

针对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的文化自信构建相关问题,对 50 名英语教师和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半结构访谈,并记录访谈的相关内容。访谈方式分为个体访谈(针对 50 名大学英语教师)和小组访谈(针对部分学生)。访谈的目的是为了验证问卷调查的结果。

(二) 调查结果分析

1. 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英语课程中所占比例的角度,对大学教师英语教学与文化自信观进行访谈分析

通过对河南省内五所高校英语教师和部分大学生的直接访谈,来总结和分析大学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自信观。首先,语言本身和知识点的讲解是绝大多数英语教师重视的基础教学内容,在

此基础上,教师普遍认为还应培养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绝大多数英语教师同样认为河南高校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有待进一步加强,而从学生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希望自己的英语教师能从多种维度,有意识、有方法、认真地去重视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而目前的英语教学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包括英语教师课堂中补充的相关教学内容和教材中每篇课文中涉及的文化自信内容。因此,西方文化知识在英语课堂教学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很难在英语学习中获取中国文化内容和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学生并不重视传统文化,更不会以批判式思维积极探索中西文化的不同。

2.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河南文化知识的英语表达角度,对大学生中国文化表达的困难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该问卷着重从六个难度等级调查河南高校大学生使用英语表达我国传统文化、河南本土文化的情况。(见表 1)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总结出,对中国传统节日习俗和历代王朝的英文表述,较易的选择比例分别为 73.3% 和 62.5%,说明大多数青年学生在平时的英语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中,有传统节日和历代王朝方面的涉猎;对中国传统八大菜系的英文表述,选择表达困难的学生占 55.9%,说明青年学生对我国饮食文化的表达并不顺利,平时在日常生活中也较少接触到;对中医和古代医药的英文介绍,不会表达的学生占 65.9%,足以说明多数大学生对中医和医药领域的知识并不熟悉,更无从谈起其英文表达了。综上可以总结出,河南高校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输出的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弱,其“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和文化自信程度受到英语水平的制约。

表 1 大学生中国文化英文表达的难度调查

内容 难度	容易	较易	较难	困难	很难	不会 表达
传统节日习俗	10%	73.3%	3.8%	4.7%	3%	1.2%
中国历代王朝	6.2%	62.5%	2.2%	15.8%	5.6%	3.7%
传统八大菜系	4.8%	7%	12.5%	55.9%	8.3%	10.5%
古代医药中医	1.3%	1.8%	3%	12.5%	15.1%	65.9%
历史文化名人	2.4%	2.2%	62.3%	15.8%	8.6%	4.7%
中国建筑风格	1%	8.7%	11%	12.6%	20.5%	64.2%
河南名胜古迹	11.3%	16.2%	51.6%	13%	8.5%	2.6%
少林武术文化	6.2%	13.5%	23.6%	35.2%	16.6%	1.1%
中华姓氏文化	7.2%	6.3%	10.1%	25.3%	52.9%	10.6%

3. 从河南本土文化英文表达能力的角度,对大学生的中国文化认知能力和文化自信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调查设置为填空题,对大学生进行汉译英翻译测试,具体内容包括代表着河南文化符号的

10 个词汇。(见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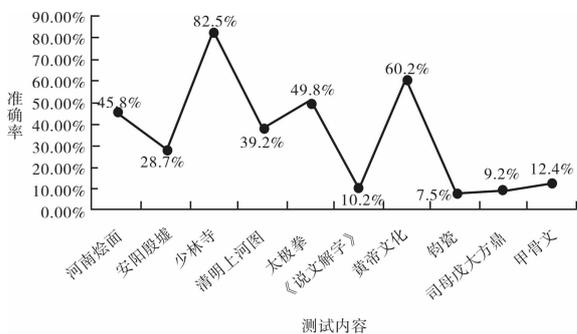


表 2 大学生对河南本土文化的英文翻译测试

从表 2 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河南大学生耳熟能详的少林寺、黄帝文化的英文翻译准确率较高,分别达到了 82.5% 和 60.2%,其次分别是太极拳、河南烩面和清明上河图,准确率各是 49.8%、45.8% 和 39.2%。而同样代表着中原文化中厚重历史的安阳殷墟、甲骨文、司母戊大方鼎、钧瓷,大多数不能用准确的英文进行文化输出。由此可见,河南高校大学生对河南本土文化的英文表达能力较差,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能力和文化自信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河南高校的很多青年学生并不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有部分学生多多少少寻在文化底蕴不够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不够的问题。

4. 从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发展重要性的角度,对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问卷三是判断题,重点通过对河南高校 750 名大学生的问答结果,调查总

结河南高校大学生目前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方面的具体心态和真实想法。根据调查结果所示,绝大多数(94.2%)学生坚信: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意义深远,非常重要。另外,78.2%的受访学生相信校园环境和社会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很大;89.5%的学生认为中国人具备一定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深远;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中,相信英语学习能够促进文化自信构建的占 63.6%;73.5%的学生认为中国文化优于外国文化;70.4%的学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超过西方国家文化;觉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学生占 82.8%;也有部分大学生坦诚:相比较于文化的内容和价值本身,自己更加关注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这部分学生占 37.7%的比例。可见,河南高校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可度相对很高,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树立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5. 从以上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的角度,对大学

生文化自信缺乏的原因进行总结分析

根据以上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总结出高校大学生文化自信缺乏的几大原因:不能充分掌握和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相对欠缺;面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时没有强烈的敏感性;长久以来习惯于被动吸收文化知识,不能够主动进行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且不具备熟练的输出能力。我国的英语教学长久以来偏向于外国文化的讲解,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入。在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碰撞以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时,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观开始混乱,文化精神层面开始变得浮躁。因而,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势在必行,以英语为媒介进行中国文化的输入和输出对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至关重要。

三、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文化自信的构建路径

(一)培养学生对中西文化的敏感性和批判式思维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几乎涵盖了四大文明古国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众多,环境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与不同,文化交流同时存在着碰撞与冲突。在英语教学中,教师除了讲解课文涉及的语言点和语法外,可以补充与文章内容相关的西方文化背景信息,让学生主动体会中西方语言表达习惯和思维模式的不同,通过对比式学习培养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例如在讲述春节的翻译练习时,可以向学生讲述春节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传说故事,让学生了解中国春节和西方圣诞节的不同、中西方传统节日在命名和习俗上的差异;在讲解《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三册第三单元的 security 时,借助“安全”这一主题展开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对比学习,可以引导学生讨论美国为什么从一个自由之国变成“锁之国”,引导学生思考“911”恐怖袭击、校园枪击案、允许购买枪支问题上中西方的不同态度以及古代中国是如何通过长城、护城河抵御外敌、当代中国又如何保护人民远离新冠病毒而让全中国人民收获满满的安全感,让学生充分意识到西方国家不是完美的,西方文化决不能全盘接受和模仿,从而鼓励学生学会批判式思维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观。

(二)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3]近年来,河南非常注

重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力宣传。肩负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河南省高等院校,对大学生文化自信观的培养也非常重视。高校英语教师更应充分抓住大学英语这门课程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特殊性,培养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比如,教师可以开展一节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讲授和讨论课。前半节课使用英语介绍了中国传统节日与习俗,后半节课引导学生进行主题讨论,一是谈论自己家乡过这些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二是思考并探讨中西方传统节日的不同。在讨论中西方传统节日的不同时,教师可以从节日命名、庆祝方式、节日主题等不同的角度,包括 Sports(运动)、Weather(天气)、Music(音乐)、Health(健康)、Society(社会)、Culture(文化)、Dreams and Ambitions(梦想与抱负)、Business(生意)、Disaster(灾难)、Globalization(全球化),善于抓住细微处深入挖掘,从而以小见大,上升到文化或价值观教育层次,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学会批判式思维,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三)融入中国文化元素至大学英语考试评价体系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

“在当前习近平倡导的文化自信和亟需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背景下,国家教委也可以在四、六级考试、考研、英语专业过级考试、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提高文化考察内容的比例,激发大学生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考试的主观能动性作用。”^[4]事实上,四、六级考试自设立以来,为了适应中国英语教育的要求已经经历了数次改革,目的是逐步顺应并实现中国英语教育的目标。在2013年的改革后,四、六级考试迎来了一个新的亮点,就是翻译的内容以中国文化和国情为主题,分值也提升到15%的占比。除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可以在平时的测试和期末考试中以翻译、阅读理解、写作题目的形式增加文房四宝、四大名著、长城、兵马俑等经典文化以及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等内容,不仅能够测试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还实现了青年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四)拓宽学生的国际文化视野,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培养英语复合人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家化水平,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因此,为了推动我国教育乃至国家的整体发展,培养复

合型、综合类外语人才意义重大。河南地处中原,两千多年前从洛阳出发,东汉的丝绸源源不断运往中亚、欧洲;两千多年后借助郑欧班列,河南发挥自身地缘优势,再次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活跃因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河南高校理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国家培养高端的英语复合型人才。河南高校英语教师在课堂中应该拓宽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引导学生多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从而学会用多元化的视角更加理解、肯定和欣赏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帮助大学生坚定并增强文化自信。

(五)利用第二课堂,构建传播中国文化的双语平台,培养学生文化自信观

英语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既要考虑课程的工具性,又要兼顾课程的人文性,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人文精神和文化素养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5]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延伸和补充,也是大学英语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构建文化自信,不仅要发挥第一课堂的积极作用,还要充分融入大学英语第二课堂。一方面,充分利用校园社团及固定课外活动“英语协会”和“英语角”,设计出既能提高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又能加强文化自信教育的多种实践形式。另一方面,把英语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创建英语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为学生设置文化自信教育宣传活动。比如,引导学生关注微信公众号 China Daily、CGTN 拓展课外阅读,在学习英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中国文化知识,培养爱国意识;利用英语社团创办外语或双语平台,融入中国自信主题;举办多样化英语活动,测试并提升青年学生文化认知能力,比如用单词赛、知识竞赛或辩论赛来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重视和传承,增强文化自信;设置选修课程时,可以开设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或本土文化相关的英语课程,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素养。

四、结论

文化自信在河南高校英语教学中的构建,有效拓宽了对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道路。一方面,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结合河南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河南高校文化自信现状的调查研究,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较高。文化自信观的培养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在循序渐进中达成,因此它与大学英语的融汇也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持之以恒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能够逐步帮助大学生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的中坚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优化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参考文献:

- [1] 林扬欢. 中国特色时政术语的外宣英译: 从“一带一路”的译法谈起[J].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16(2): 78-83.
- [2] 张秋婷. 浅析“一带一路”倡议下传播中华文化的意义及挑战[J]. 戏剧之家, 2021(6): 197-198.
- [3] 田珂. 中原民间手工艺品走向国内外市场路径的思考[J]. 创新科技, 2015(3): 63-66.

- [4] 陈争峰, 郑佩, 刘楠. “一带一路”倡议下陕西高校英语中文化自信的构建与研究[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2): 125-132.
- [5] 鲍婕. 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英语教育中“母语文化”的引入: 问题与方法[J]. 海外英语, 2020(5): 68-71.

(责任编辑 许峻)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English Courses in Henan Universities

JI Bingbing

(Faculty of Basic Courses, He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Prosecutors, Xinzheng,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B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ich Chinese cultural confidence in Henan, we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n English courses in Hen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adopted literature analysis, questionnair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uild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n English courses in f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enan, analyzed the cultural teaching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English teachers in Hen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deep-seated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foreign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cultur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nvestigated the construction paths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English courses in Hen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Key words: BRI; cultural confidence; Henan university; English course

(上接第 104 页)

On the Individual Life View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Theory

ZHANG Pei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 lif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elf-moral education. The nobleness of human existence i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and bird; the divine view of life based on destiny conveys to us the idea of respecting life, revering life and being responsible for life; promoting the the personality of 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reflects the orientation of pursuing life ideal and life value; the practice of self-cultivation embodies the Confucian culture's emphasis on the inner cultivation and perfection of one's own life,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lif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theory of cultivating one's morality; individual; outlook on life; value of life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高校大学生国家 安全教育的实践探索

胡 钰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郑州市部分高校为例,对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状况进行了调研,当前高校安全教育存在着“资源匮乏”“途径单一”“运动式宣传”“缺乏顶层设计”等问题。从系统化角度分析,结合大学生学习特点与信息时代传播特点,提出打造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平台,丰富国家安全教育内容,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创新专业课程内容,丰富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资源和教育途径。

关键词:国家安全教育;总体国家安全观;高校;大学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2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110-05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的意义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及国家安全的概念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深入,国家安全越来越成为各国关心的重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2014)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构建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个安全内容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布局,强调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020年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包含了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核安全、网络安全、深海安全、资源安全、极地安全、太空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等16个安全领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2004)提出“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法》(2015)认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1];李大光在《国家安全教育通识课》(2021)中认为“国家安全包括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外部安全是“国家没有外部(自然界和社会)的威胁与侵害的客观状态”,是“一国之外的其他社会对本国造成的威胁与侵害”,内部安全是指“国家没有内部的混乱与疾患”。但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并不是截然分开和互相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链接、相互转化的,外部威胁比如战争、疫情、自然灾害等会影响国内安全状态,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国内民众的焦虑状态,影响政治、经济、军事安全。^[2]

(二)高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必要性

大学是大学生生活和精神独立的开始,是大学

收稿日期:2022-09-02

基金项目:2021年度郑州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高校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路径研究”(zks202104);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新时代公共课、专业课与思政课协同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2021SJGLX292);2021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后脱贫时代教育扶贫机制研究”(2021YB0304)

作者简介:胡钰(1977—),女,河南永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和教学管理与创新。

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大学期间的教育,对其未来发展和行为具有重大影响,是帮助大学生构建健全人格,成长为合格公民的重要保证。因此,大学教育不仅包括专业学习,更应该做好道德和精神培养,树立大学生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热爱祖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和意识,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知识和素养,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内容。

随着网络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技术水平提高,大学生获取信息和沟通交流的空间以及活动空间在不断扩展,社会交往的频度增加,社交空间扩大,对目前出现的一些信息诈骗、网络诈骗等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已经引发了一些安全问题。

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复杂多变,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是大学生对国家安全存在着种种模糊的认识,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比较片面,安全意识薄弱,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素养,因此,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安全不是模糊遥远的概念,而是明确具体的、细微的,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国家安全不仅关乎国家的兴亡,而且还关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维护国家安全,既能保护国家利益,也能保护个体利益,而一旦国家安全受损,每个个体就可能付出巨大代价。

教育部(2018)《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使广大学生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教育部(2020)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了“系统推进国家安全教育进课程、进教材、进校园,全面增强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二、目前高校开展国家安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现有文献来看,部分高校和教师已经从思政教育的角度对大学生开展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抑

或借助“形式政策”等通识课来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教学,还没有学者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内容、参与主体、教育的地点、时机以及借助怎样的方式来实施”进行系统的思考和论述,缺乏对高校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 with 实施策略研究。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笔者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对河南省2所高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74份,其中有效问卷174份。从统计情况来看,大学程度的样本数为98.85%;这与落实国家安全和防范的主要群体为高知群体相符。调研题目一共有8个题目,采用了单选和多项选择形式,内容涉及了国家安全的内容及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归纳出当前大学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知、国家安全相关教育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1.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知停留在“知道”层次

调研问卷中列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11种安全”,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有86%的受访者选择出了全部答案。有95.25%的受访者选择了“政治和军事安全”,“核安全”和“社会安全”是选择人数最少的,但也达到86%之上。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和军事安全与个人息息相关,但是对于其他几个安全比如科技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了解比较少,认为与自己的生活距离比较远,关注度比较低。

2.缺乏国家安全教育资源

在“您认为在培养国家安全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中,74.14%的受访者认为“缺乏专业、系统的相关配套资源”,64.94%的受访者认为“相关读物、教材和学习资源少”。

目前只有李大光(2021年9月)出版了《国家安全教育通识课》,但也只是读本,没有配套的讲义、课件和案例,可以作为实施国家安全的参考资料。缺乏系统、科学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资源是高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最大的短板。

3.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缺乏顶层设计和实施保障

一是国家安全教育是全新的内容,高校目前还没有进行顶层设计,更缺乏相应的实施保障;二是高校缺乏专门从事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和进行教育的专业化师资队伍,现行进行授课的教师主要由保卫处、学工辅导员等兼职人员,缺乏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把控;三是授课内容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国家政治、军事等安全领域方面”,把国家安全教育等同于

国防教育、军事教育、网络安全教育等,缺乏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度理解与认知,没有达到系统、专业的认知水平;四是教学形式依然是传统“填鸭式”教学,缺乏互动和吸引力。

4. 国家安全观教育是突击的运动式宣传,而不是经常性教育

每年4月15日是国家安全日,高校一般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但是除却这一天,很少有教育宣传活动,更没有变成经常性教育活动。

(二)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分析

传统的国家安全在高校的落地是“国防教育和军事教育”,一般在新生入学随着军训一起进行和完成,没有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也没有内容可以实施,因此缺乏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以及国家安全内容的丰富,尤其是国际社会的动荡以及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对大学生实施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提到高校日常教育的日程。

三、高校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实践探索

教育部(2020)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提出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目标“重点围绕理解中华民族命运与国家关系,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精神实施,理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树立国家安全底线思维,将国家安全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强化责任担当”;实施途径“依托校内相关教学科研机构,开设国家安全教育公共基础课”;高校党委负责本校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配备和经费投入”等必要保障;并且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公共基础课”,明确规定不能少于“1学分”。

高校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系统推进国家安全教育进课程,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高校作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主体,要解决国家安全教育“做什么”“谁来做”“在哪里做”“为谁做”以及“如何做”的问题。

(一) 高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要以教育部实施纲要为顶层设计的蓝本,明确解决“做什么”问题

1. 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校课程设置和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之中

修改人才培养方案,教育部指导纲要里明确规

定“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少于1学分”,按照目前我校学分与课时转换关系,折合成16个学时。16个学时可以拿出4个学时做“总体国家安全观”基础内容的讲解,4个学时“专业与国家安全”内容,4个学时结合国际国内时事进行“国际形势与国家安全”专题教育,4个学时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实践活动”。

2. 构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

从目前研究现状及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是极其匮乏的。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教育部对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实施纲要为蓝本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构建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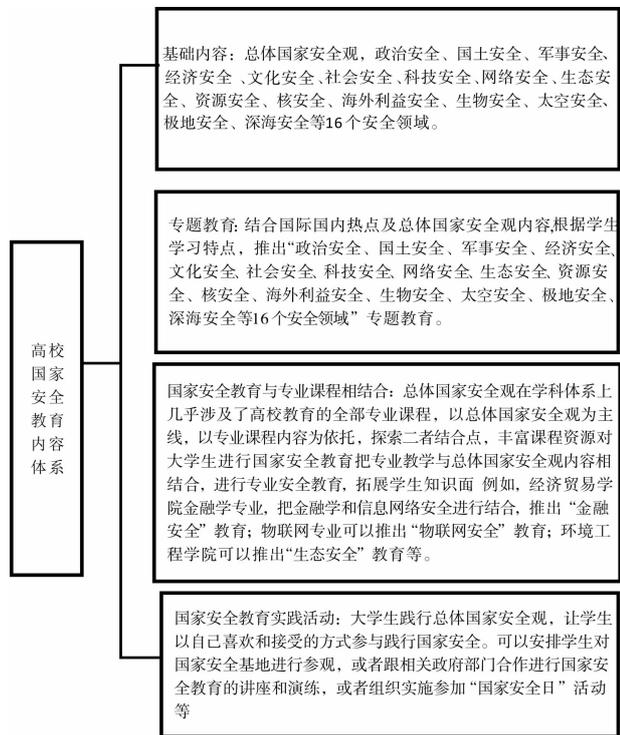


图1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规划

(二) 明确高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参与主体和地点, 解决“谁来做”和“在哪里做”的问题

1. 成立“国家安全教育教研室”或者依托“国家安全研究所”等科研机构

高校如何实施国家安全教育, 要以教育部指导纲要为指导, 结合高校的具体情况采取实施方案。我校目前已经成立国家安全研究所, 可以研究所为依托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架构和实施单位。

教育部指导纲要要求“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公共基础课”, 高校可在“公共基础学院”中增加“国家安全教育”教研室(图2), 或者依托现有的科研机构(图3), 专门负责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的规划、教材的编写、课程设计与开发以及国家安全教育进

课堂工作的实施;同时要求“高校党委负责本校国家安全教育组织实施,在教师配备、经费投入等给予必要保障”,因此作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主体的教研单位,同时也可以获得实施经费和空间,确保安全教育能够顺利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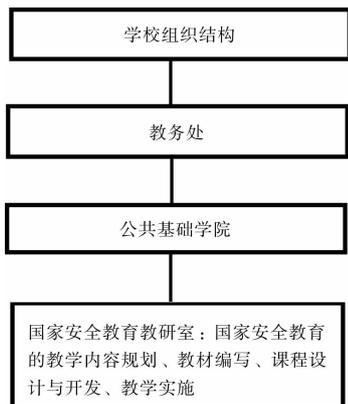


图2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框架设计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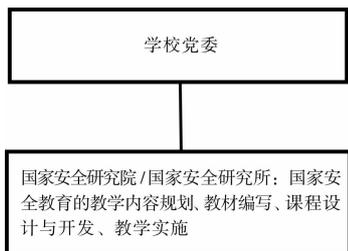


图3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框架设计示意图

2. 拓展高校国家教育实践基地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实施不一定局限于教室和学校内部,可以结合专题教育拓展校外实践基地,充分发挥国家安全各个领域的机构、行业、场馆、设施等作用,让学生走出校门去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培养他们不仅具有“国家安全意识”,同时也具有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大学生。

(三)研究在校大学生学习生活习惯和特点,设计他们喜欢的内容和呈现方式,解决“为谁做”的问题

在校大学生年龄大都在17—23岁,既有青春朝气,愿意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新方法,愿意尝试,喜欢参与,愿意创新,不怕失败,但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和反传统思想,对很多采用传统方式表现的知识和内容有一种排斥心理,是个矛盾统一体;比如同样是一本书,他宁愿采用手机阅读,也不愿意去图书馆借本书读,因为前者代表“新潮”,后者代表“老套”。

手机已经成为他们的可穿戴设备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随机调研数据“在校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已经达到7—9小时”,更有甚者能达到1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既然高校安全教育的对象是“反叛创新的手机一族”,我们的教育教学方式就要根据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习惯进行创设。教育内容可以保持,教学方式和要进行创新和变革。因此国家安全教育的多途径化、呈现形式多样化、采用方式多元化、教育内容兴趣化、教学方式新颖化等会吸引大学生的关注和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取得较好的安全教育效果。

(四)构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平台,解决“如何做”的问题

构建高校安全教育平台,搭建以教学资源为主体、国际国内安全动态、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为辅助、以学生参与互动为黏性、以安全基地建设为拓展的“在线教育平台”,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让大学生“喜欢学”“乐参与”“愿传播”。平台设“登录窗口”,所有在校大学生信息直接导入,学生登录后即可享用教学资源,也可以参与各种安全教育互动活动,实现安全教育的日常化、数字化和便捷化。(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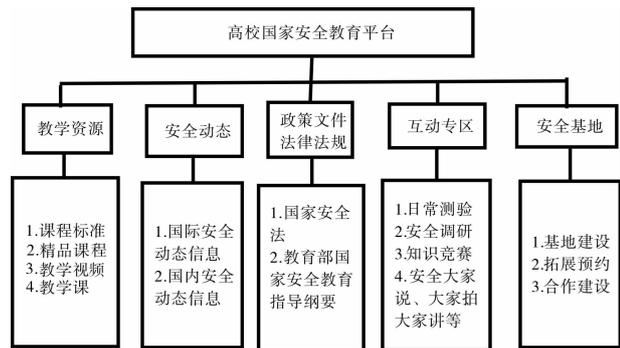


图4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平台架构示意图

四、积极探索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常态化、信息化、多样化和动态化方式

(一)推动大学生安全教育常态化

继续营造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氛围,调动大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安全教育重在经常,比如充分利用课堂思政,结合形式政策课程和安全教育类课程,把安全教育与课程学习结合起来,把安全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安全教育有内容,专业教育有思想,刑事政策有意义,实现安全教育常态化。

(二)积极采用信息化方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20)中提出“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度”,为高等教育的

实施指明了信息化方向。高校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一直都有,不过大都以传统的军事教育呈现出来,结合新生入校军训进行。在信息化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国际国内资讯已经实现了实时推送到目标人群,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相对于今天的信息社会已经落伍了;而且传统安全教育是以被动式内容讲解为主,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安全教育方式远远不能满足2000年以后出生的大学生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是被各种电子设备和信息围绕着,对信息化方式存在天然的熟悉。因此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信息化、电子化、终端化式是实现安全教育常态化和长效化的主要方式,关键问题是“数字化哪些内容、数字化的创作和传播方式以及服务和管理方式”,这些都需要时间进行检验和探索。“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平台”是解决安全教育信息化、平台化、数字化的一种探索方式,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机构、高校参与进来,共同为我国的安全教育贡献力量。

采用信息化方式需要系统的设计与架构,而不仅仅是教育或者传播方式的信息化和电子化。一是需要大学生安全教育平台设计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二是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信息化与数字化,三是教育教学内容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四是教学方式和工具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五是教师观念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愿意采用信息化设备和数字化思维方式进行专业思考和解决问题。

(三)大学生安全教育多样化和动态化方式

让在校大学生接受安全教育,让他们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是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初衷。传统的单一的“军事教育”和“形式政策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与大学生素养发展的需要了,采用平台化、信息化、基地化、实践化达到国家安全教育方式的多样化;结合时事发展与国家安全发展历史,采用专题教育、安全教育典型案例、安全教育知识竞赛、专题演讲、专题制作等形式实现安全教育的多样化和动态化结合,共同实现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涉及面比较广,内容比较多,任务比较新,可借鉴的内容和模式不多,各个高校在探索的道路上起点和步伐也不尽一致,希望多交流多沟通,共同把大学生安全教育做好,实现大学生安全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 [1]刘跃进.关于国家安全学若干问题的思考:写在《国家安全学基础》问世之际[C]//为国家安全立言: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文集(1995—2004).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 [2]李大光.国家安全教育通识课[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1.

(责任编辑 许峻)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HU Yu

(School of Economics & Trad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aking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Zhengzhou as exampl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t present,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with university safety education, including a lack of resources,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campaignlike publicity and a lack of top-level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zation, combined with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like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nd the enthusiasm of participants, building a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mprov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nnovating the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enriching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 students

混合配体构筑的 MOFs 化合物的制备与结构表征

李玉玲, 刘滢洁, 苏梦宇, 蔡 奥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采用混合配体模式将 1,4-双[(1H-咪唑-1-基)甲基]苯、1,3,5-三(1H-咪唑-1-基)苯作为主要配体,2,6-萘二羧酸、4,4'-联苯二羧酸作为辅助配体,在溶剂热条件下成功制备出两种结构新颖的晶态金属有机框架(MOFs)化合物 ZZUT-13(Z13)和 ZZUT-14(Z14)。采用单晶衍射分析、X-射线粉末衍射分析(PXRD)和热重分析(TGA)等手段对两种配合物的结构及性能进行了表征和探究。结果表明,Z13和Z14两种化合物都具有较高的框架稳定性和热稳定性。

关键词:混合配体;MOFs 化合物;制备;稳定性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21

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115-06

金属-有机框架(MOFs)化合物是一种具备功能性的金属离子或离子簇与多元化的有机配体通过化学键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多孔配位聚合物,在离子交换、选择性催化、气体存储与吸附、传感和电极材料^[1-7]等领域有广泛应用,然而制备 MOFs 的过程往往受到温度、pH 值和溶剂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不稳定。因此,构筑结构和性能稳定的 MOFs 化合物具有研究意义。本文选择 1,4-双[(1H-咪唑-1-基)甲基]苯、1,3,5-三(1H-咪唑-1-基)苯作为主要配体,2,6-萘二羧酸、4,4'-联苯二羧酸作为辅助配体,分别与 Co(II)和 Cd(II)的硝酸盐在水热法和溶剂热法反应条件下,成功制备出两种结构新颖的晶态 MOFs 化合物 ZZUT-13(Z13)和 ZZUT-14(Z14)。采用单晶衍射分析、X-射线粉末衍射分析(PXRD)、红外光谱分析(IR)、热重分析(TGA)等表征手段对两种配合物的结构及性能进行表征和探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主配体 A:1,4-双[(1H-咪唑-1-基)甲基]苯;辅助配体 B:2,6-萘二羧酸;主配体 C:1,3,5-三(1H-咪唑-1-基)苯;辅助配体 D:4,4'-联苯二羧酸;N,N-二甲基甲酰胺(DMF);六水硝酸钴;六水硝酸镉;乙二醇。均为分析纯。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CP224C 电子天平:奥豪斯仪器常州有限公司;DHG-9070A 程序控温烘箱:太仓精宏仪器设备有限公司;SOPTOP 体视显微镜:宁波舜宇仪器有限公司;DHG-9000 系列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Bruker D8 ADVANCE X 射线衍射仪:美国 Bruker 公司;SDT Q600 同步热分析仪:梅特勒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配合物 Z13 的制备

将 7.2 mg 的 1,4-双[(1H-咪唑-1-基)甲基]苯和 6.5 mg 的 2,6-萘二羧酸的混合配体加入 5 mL N,N-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有机溶剂中,溶解后加入 29.1 mg 的 $\text{Co}(\text{NO}_3)_2 \cdot 6\text{H}_2\text{O}$,再加入 1 mL 蒸馏水,室温下搅拌 5 min 使其溶解。将装有该混合溶液的小瓶子密封,放入程序控温烘箱中,600

收稿日期:2022-10-16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2B150021);2021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就业创业教育指导类)(2021SJGLX1035);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20180115)

作者简介:李玉玲(1979—),女,河南信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 MOFs 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min 升高温度至 90 °C, 升温速率为 10 °C/h, 保温 4320 min。600 min 后冷却至室温, 降温速率为 10 °C/h, 得到紫色块状晶体 Z13。

1.3.2 配合物 Z14 的制备

将 27.6 mg 的 1,3,5-三(1H-咪唑-1-基)苯、24.2 mg 的 4,4'-联苯二羧酸和 61.7 mg 的 $\text{Cd}(\text{NO}_3)_2 \cdot 4\text{H}_2\text{O}$ 的混合样品加入到 1 mL 乙二醇和 7 mL 蒸馏水的混合溶剂中, 室温下搅拌 10 min 使其溶解。将装有该混合溶液的小瓶子转移至 16 mL 的反应釜中密封, 放入程序控温烘箱中, 600 min 升高温度至 160 °C, 升温速率为 10 °C/h, 保温 4320 min。600 min 后冷却至室温, 降温速率为 10 °C/h, 得到无色块状晶体 Z14。

本文所合成的 Z13 和 Z14 按照一定比例的配体量、有机试剂、蒸馏水和金属盐的量, 重复多组实验, 以备后期晶体的结构表征和性能测试的研究。

1.3.3 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晶体测试实验

等待程序控温烘箱的温度恢复至室温, 将装有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小瓶子从程序控温箱中取出, 观察小瓶子中是否有晶体生成。将形状规整且透明的晶体放至体视显微镜下观察, 挑选出质量较好的配合物 Z13 和 Z14 晶体, 要求晶体大小合适, 形状规则且透明, 用单晶衍射仪进行单晶结构分析, 解析晶体结构。

两个配合物的单晶测试条件为: 在 293K 温度下, 使用 Bruker D8 ADVANCE 单晶衍射仪, 经石墨单色化的 $\text{Mo-K}\alpha$ 射线 ($\lambda = 0.71073 \text{ \AA}$) 作为衍射源收集衍射点。原始数据使用 SAINT 程序还原, 采用 SADABS 程序进行经验吸收校正。晶体结构用 SHELXS-2014 软件采用直接法解出, 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用 Fourier 合成法定出所有非氢原子的坐标, 对全部非氢原子坐标及各向异性温度因子采用全矩阵最小二乘法修正至收敛。所有非溶剂氢原子均通过理论加氢法得到。配合物 Z13 和 Z14 中所有配位水上的氢直接从差值傅里叶图上找到。将晶体测试所得 cif 数据导入绘图软件 Diamond, 在 Diamond 中生成金属配位环境图(0D)、一维(1D)链状结构图、二维(2D)平面结构图和三维(3D)框架结构堆积图。

1.3.4 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框架稳定性测试实验条件

配合物 Z13 和 Z14 采用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PXRD) 进行框架稳定性测试实验^[8], 该实验是室温下在 Shimadzu XRD-6000 旋转阳极 X 射线衍射仪上, 用 Cu-K 射线 ($\lambda = 1.5418 \text{ \AA}$) 作为 X-射线

衍射源测定的。将实验所得数据导入 origin 软件绘制出 Z13 和 Z14 的 XRD 谱图, 然后与晶体测试数据导出的标准 XRD 谱图进行比对。

1.3.5 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热稳定性测试实验条件

配合物 Z13 和配合物 Z14 采用热重分析仪 (TGA) 进行热稳定性测试实验^[9], 在 Mettler-Torledo (TGA/DSC1) 热重分析仪上进行, 氮气气氛, 升温速率为 10 °C/min。将实验所得数据导入 origin 软件绘制出 Z13 和 Z14 的 TGA 图。

2 结果与讨论

2.1 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晶体学数据

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晶体分析数据见表 1。配合物 Z13 晶胞键长 $a = 11.112(3)$, $b = 6.5360(19)$, $c = 16.658(5)$, 键角 $\alpha = 90^\circ$, $\beta = 106.420(9)$, $\gamma = 90^\circ$, 属于 Pn 空间群。配合物 Z14 晶胞键长 $a = 11.465(2)$, $b = 18.322(4)$, $c = 27.567(5)$, 键角 $\alpha = \beta = \gamma = 90^\circ$ 为立方晶系, 属于 $Ibca$ 空间群。经测配合物 Z13 和 Z14 部分键长和键角, 可知配合物 Z13 中 Co 周围的 Co-N 键长范围在 2.018(15) ~ 2.046(14), Co-O 键角范围在 57.9(5) ~ 161.0(5), 均在正常范围内; 配合物 Z14 中 Cd 周围的 Cd-N 键长范围在 2.250(12) ~ 2.551(13), Cd-O 键角范围在 53.6(4) ~ 175.8(3), 均在正常范围内。

表 1 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晶体分析数据

	Z13	Z14
Formula	$\text{C}_{26}\text{H}_{20}\text{CoN}_4\text{O}_4$	$\text{C}_{44}\text{H}_{24}\text{CdN}_6\text{O}_6$
Formula weight	511	844
T (K)	296	293
Crystal system	monoclinic	orthorhombic
Space group	Pn	$Ibca$
a (Å)	11.112(3)	11.465(2)
b (Å)	6.5360(19)	18.322(4)
c (Å)	16.658(5)	27.567(5)
α (°)	90	90
β (°)	106.420(9)	90
γ (°)	90	90
V (Å ³)	1160.6(6)	5791(2)
Z	2	8
D_{calc} (g cm ⁻³)	1.463	1.525
F (000)	526	2688
θ for data collection (°)	1.974 - 27.604	1.48 - 25.68
Reflections collected	7981	2663
Goodness-of-fit on F^2	0.956	1.083
$R1^a$, [$I > 2\sigma(I)$]	0.079	0.1031
$wR2^b$, [$I > 2\sigma(I)$]	0.1842	0.2187

$$^a R_1 = \sum |F_o| - |F_c| / \sum |F_o|$$

$$^b wR_2 = \sqrt{\sum w(|F_o|^2 - |F_c|^2)^2 / \sum w(F_o)^2} / \sqrt{2}, \text{ where } w = 1 / [\sigma^2(F_o^2) + (aP)^2 + bP], P = (F_o^2 + 2F_c^2) / 3$$

2.2 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结构分析

配体 A 与金属 Co(II) 离子的配位模式如图 1

(a)所示;配体 B 与金属 Co(II)离子的配位模式如图 1(b)所示;配体 C 与金属 Cd(II)离子的配位模式如图 1(c)所示;配体 D 与金属 Cd(II)离子的配位模式如图 1(d)所示。

晶体结构分析结果表明,配合物 Z13 的晶体单胞中存在一种 Co(II)离子,其金属配位环境图如图 2 所示。单胞中的 Co(II)离子采取的是六配位八面体构型。Co(II)离子分别与来自主配体 1,4 - 双[(1H-咪唑-1-基)甲基]苯分子中的两个咪唑 N 原子(N4,N5)和辅助配体 2,6 - 萘二羧酸的四个羧基 O 原子(O1,O2,O3,O4)配位,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八面体构型。Co1 - O3 的键长为 2.095(12) Å, Co1 - N4 的键长为 2.018(15) Å, Co1 - N5 的键长为 2.046(14) 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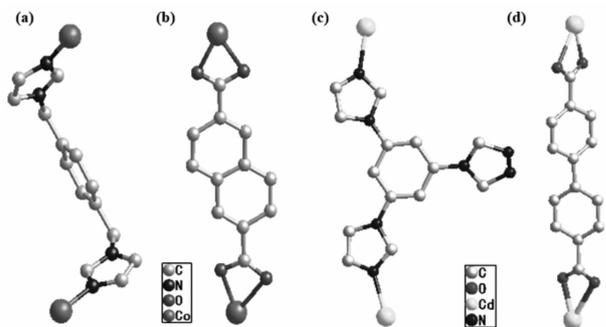


图 1 4 种配体呈现的配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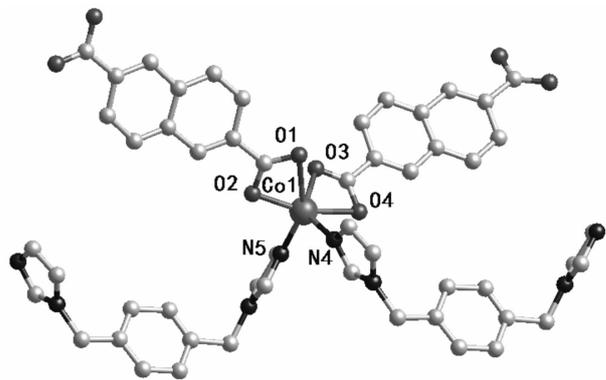


图 2 配合物 Z13 的金属配位环境图

通过辅助配体 2,6 - 萘二羧酸上羧基氧原子的桥联,配合物 Z13 被连接形成一个一维 M 型链状直链。每一个金属 Co(II)离子在主配体 1,4 - 双[(1H-咪唑-1-基)甲基]苯咪唑中 N 原子的连接下形成一个二维(2D)链状结构,整体构成配合物 Z13 在 a 轴方向的二维(2D)平面图,如图 3 所示。

通过辅助配体 2,6 - 萘二羧酸上羧基 O 原子的桥联,配合物 Z13 被连接形成一个两层的封闭环状结构。每一个金属 Co(II)离子在主配体 1,4 - 双[(1H-咪唑-1-基)甲基]苯咪唑中 N 原子的连接下形成一个二维(2D)平面结构,整体构成配合物

Z13 在 c 轴方向的二维(2D)平面图,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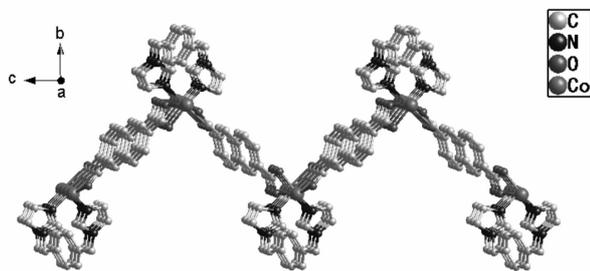


图 3 配合物 Z13 的二维(2D)平面图(a 轴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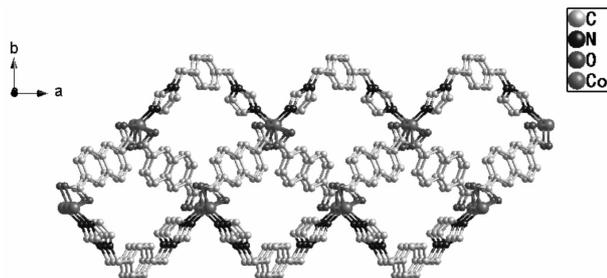


图 4 配合物 Z13 的二维(2D)平面图(c 轴方向)

如图 5 所示,配合物 Z13 在温度为 296 K 的条件下进行组装,得到金属配位环境图(a),由此形成一维(1D)链状结构图(b)、二维(2D)平面结构图(c)和(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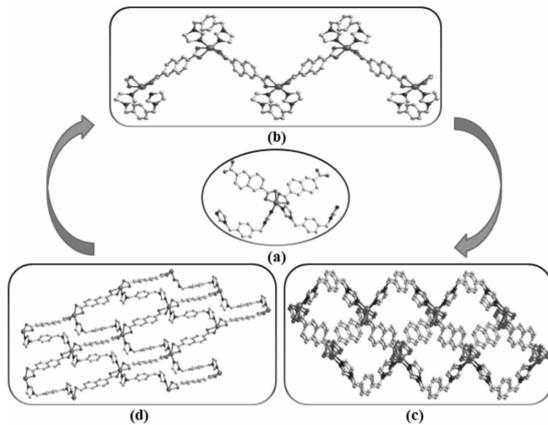


图 5 配合物 Z13 在 296 K 组装,并由 0D(a)形成 1D 链(b)、2D 平面(c)和(d)

晶体结构分析结果表明,配合物 Z14 存在一种晶体学独立的 Cd(II)离子,其金属配位环境图如图 6 所示。单胞中的 Cd(II)离子采取的是六配位八面体构型。单胞中的每一个 Cd(II)离子分别与来自主配体 1,3,5 - 三(1H-咪唑-1-基)苯分子中的两个咪唑 N 原子(N1, N1A)和两个辅助配体 4,4' - 联苯二甲酸的四个羧基 O 原子(O1,O2,O1A,O2A)配位,形成一个扭曲的八面体构型。Co1 - O3A 的键长为 2.095(12) Å, Cd1 - N1 的键长为 2.245(8) Å, Cd1 - O1 的键长为 2.250(10) Å, Cd1 - O2 的键长为 2.550(13) 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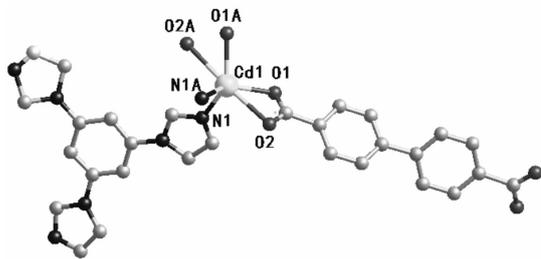


图6 配合物 Z14 的金属配位环境图

通过辅助配体 4,4'-联苯二甲酸上羧基 O 原子的桥联,配合物 Z14 被连接成一个一维(1D)链状结构。配合物 Z14 在 a 轴方向的二维(2D)平面图,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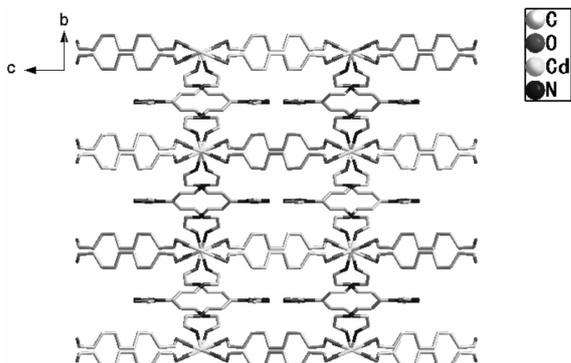


图7 配合物 Z14 的二维(2D)平面图(a 轴方向)

相邻的金属 Cd(II) 离子在主配体 1,3,5-三(1H-咪唑-1-基)苯咪唑中 N 原子和辅助配体 4,4'-联苯二甲酸羧基中 O 原子的连接下形成 b 轴方向的三维(3D)框架结构堆积图,如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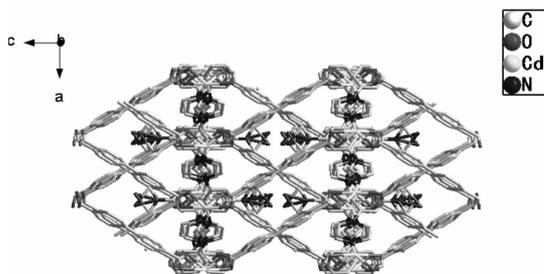


图8 配合物 Z14 的三维(3D)框架结构堆积图(b 轴方向)

相邻的金属 Cd(II) 离子在主配体 1,3,5-三(1H-咪唑-1-基)苯咪唑中 N 原子和辅助配体 4,4'-联苯二甲酸羧基中 O 原子的连接下形成 c 轴方向的三维(3D)框架结构堆积图,如图 9 所示。

配合物 Z14 在温度为 293 K 的条件下进行组装,得到金属配位环境图(a),由此形成一维(1D)链状结构图(b)、二维(2D)平面结构图(c)和三维(3D)空间框架结构堆积图(d),如图 10 所示。

2.3 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 XRD 结果分析

将制备的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样品采用粉末衍射分析(XRD)的方法进行样品的纯度分析,分析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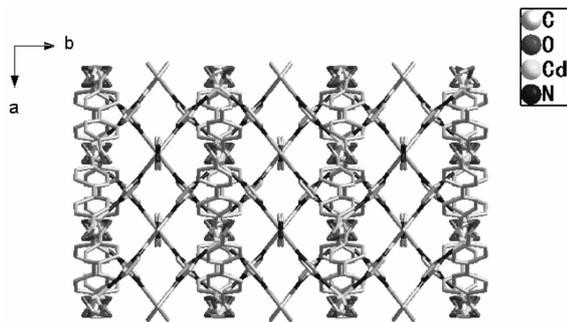


图9 配合物 Z14 的三维(3D)框架结构堆积图(c 轴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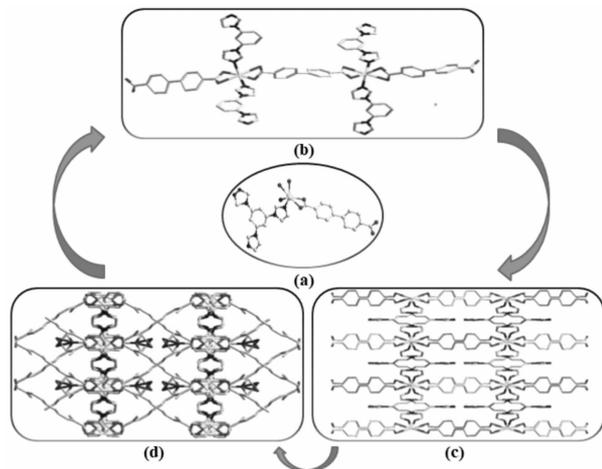


图10 配合物 Z14 在 293 K 组装,并由 0D(a) 形成 1D 链(b)、2D 平面(c)和 3D 堆积图(d)

果与标准图谱比对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分析结果发现,实验测试峰型与由单晶结构数据(通过晶体解析得到的 CIF 文件)所模拟的衍射图峰型(2θ)吻合,说明合成的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样品是纯相。值得注意的是,配合物 Z13 和 Z14 虽然具有较高的结晶性并保持骨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低角度位置出现了一个新的小峰,这可能是由于吸附小分子后造成骨架发生了微小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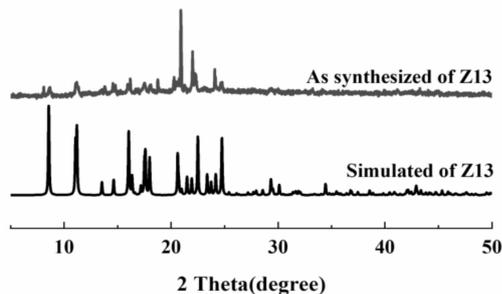


图11 配合物 Z13 的 XRD 图

2.4 配合物 Z13 和 Z14 的 TGA 结果分析

金属-有机框架(MOFs)化合物的热稳定性常用热重分析(TGA)的方法来研究。对配合物 Z13 进行热重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13 所示。由图 13 可知,配合物 Z13 框架结构可以大致稳定到 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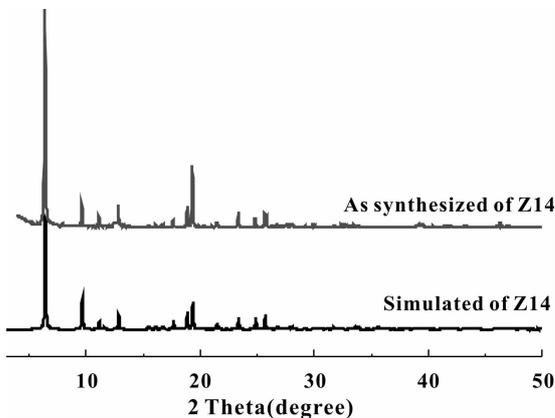


图 12 配合物 Z14 的 XRD 图

当温度超过 390℃ 时晶体骨架开始坍塌, 由于在标准大气压下, 纯水的沸点相较于有机溶剂 N,N-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沸点低, 所以出现的第一个拐点处是孔道内结晶水先挥发; 当温度在 433℃ 左右, 出现第二个拐点, 即孔道内的有机溶剂 N,N-二甲基甲酰胺(DMF)开始挥发; 随着温度逐渐升高, 晶体的重量开始下降, 到最后的 800℃ 左右基本可以认定溶剂已经挥发完毕, 剩下的产物即为主配体 1,4-双[(1H-咪唑-1-基)甲基]苯、辅助配体 2,6-萘二羧酸和金属混合物, 晶体完全坍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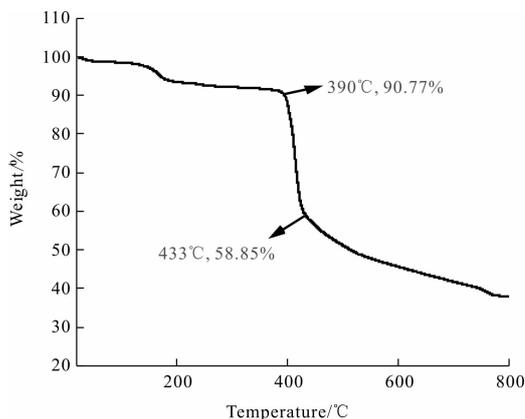


图 13 配合物 Z13 的 TGA 图

对配合物 Z14 进行第一次热重分析, 分析结果如图 14 所示。由图 14 可知, 配合物 Z14 框架结构可以大致稳定到 370℃。当温度超过 370℃ 时晶体骨架开始坍塌, 在标准大气压下, 纯水沸点比有机溶剂乙二醇低, 所以出现的第一个拐点处是孔道内结晶水先挥发; 当温度在 404℃ 左右, 出现第二个拐点, 即孔道内的有机溶剂乙二醇开始挥发; 随着温度逐渐升高, 晶体的重量开始下降, 到最后的 800℃ 左右基本可以认定溶剂已经挥发完毕, 剩下的产物即为主配体 1,3,5-三(1H-咪唑-1-基)苯、辅助配体 4,4'-联苯二羧酸和金属混合物, 晶体完全坍塌。

第二次实验将晶体放至丙酮(acetone)、四氢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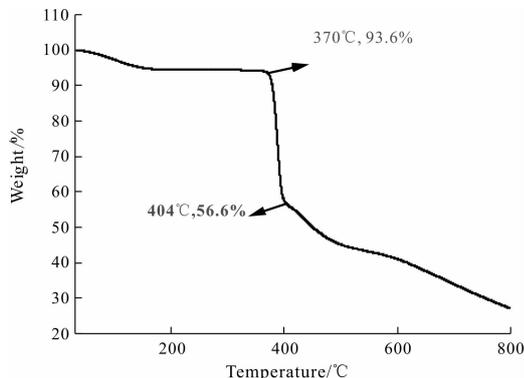


图 14 配合物 Z14 的 TGA 图

喃(THF)和甲醇(MeOH)三种不同的溶剂中进行热重分析, 分析结果如图 15 所示。由图 15 可以明显看出配合物 Z14 框架结构可以大致稳定到 380℃。当温度超过 380℃ 时晶体骨架开始坍塌, 在四氢呋喃(THF)溶剂中晶体坍塌速率相较于其他两种溶剂下的速率慢一些。出现的第一个拐点处是孔道内结晶水先挥发; 当温度在 400℃ 左右, 出现第二个拐点, 即孔道内的有机溶剂乙二醇开始挥发; 随着温度逐渐升高, 晶体的重量开始下降, 到最后的 800℃ 左右溶剂基本已经挥发完毕, 剩下的产物即为主配体 1,4-双[(1H-咪唑-1-基)甲基]苯、辅助配体 2,6-萘二羧酸和 Co(II) 金属混合物, 晶体完全坍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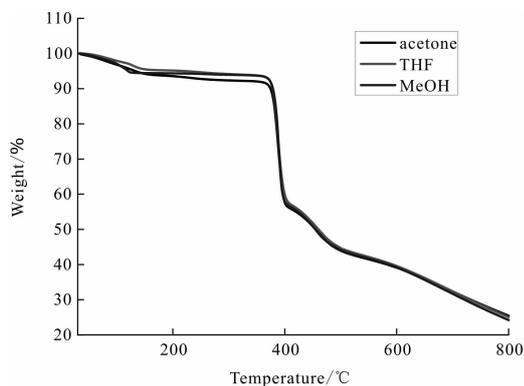


图 15 配合物 Z14 在不同溶剂中的 TGA 图

第三次热重分析进行三种对比实验, 分别采用的是配合物 Z14 和甲醇(MeOH)进行交换和交换后的 80℃ 活化、配合物 Z14 和甲醇(MeOH)进行交换和交换后的 150℃ 的直接活化、配合物 Z14 和甲醇(MeOH)进行交换后 210℃ 的活化, 均得到和前面两次热重分析相似的实验结果, 如图 16 所示。

3 结论

本文以晶体学理论为指导, 从 MOFs 化合物的新颖结构和功能性出发, 选择过渡金属离子(Co(II)离子、Cd(II)离子), 采用接近中性的咪唑类化合物 1,4-双[(1H-咪唑-1-基)甲基]苯和 1,3,5-三(1H-咪唑-1-基)苯作为主配体, 羧酸类化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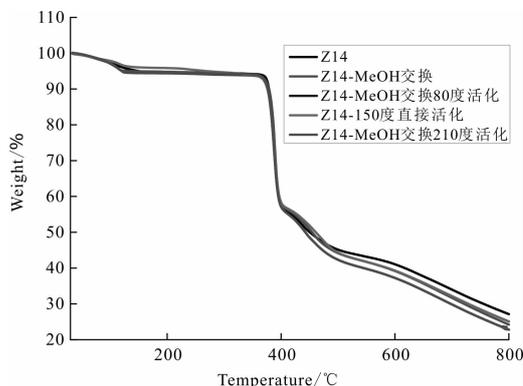


图 16 配合物 Z14 在不同条件下的 TGA 图

物 4,4'-联苯二羧酸和 2,6-萘二羧酸作为辅配体,在水热法和溶剂热法的条件下合成两种结构新颖的 MOFs 化合物,并对两种 MOFs 化合物的结构进行了单晶衍射测试、X 射线衍射分析、红外光谱分析、热重分析等。研究发现,配合物 Z13 具有 2D 平面堆积结构,Z14 具有 3D 框架结构;两个化合物的 XRD 实验测试峰型与由单晶结构数据模拟衍射图峰型(2 θ)吻合,说明合成的配合物 Z13 和 Z14 样品是纯相;TGA 性能分析表明配合物 Z13 和 Z14 都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为制备高稳定性的 MOFs 材料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SUN H, YU X L, MA X Y, et al. MnO_x - CeO₂ Catalyst derived from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s for toluene oxidation[J]. Catalysis Today, 2020, 355(2): 580 - 586.

[2] LIU Z W, ZHANG K, XIA Q B, et al. Predicting adsorption and separati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Xe/Kr in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s via a precursor - based neural network model [J].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2021, 243 (14): 1 - 11.

[3] MA X L, WANG W L, SUN C G, et al. Adsorption performance and kinetic study of hierarchical porous Fe - based MOFs for toluene removal[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 793(3): 148622.

[4] LI Y L, ZHENG L P, NIE H, et al. Synthesis, structure, sorption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one dual functional Zn(II)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J]. Journal of Molecular Structure, 2020, 1204:127427 - 127434.

[5] LI Y L, ZHAO Y, SUN W Y. Two Zn and Cd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with mixed ligands: synthesis, structure, sorption and luminescent properties[J]. Chinese Journal of Inorganic Chemistry, 2020, 36(6):1176 - 1184.

[6] 李玉玲,范景珊,王迎欣,等. 功能性 MOFs 材料对水体中抗生素的高效吸附研究进展[J]. 中州大学学报, 2021,38(6):112 - 116.

[7] 庞欢. MOFs 及 MOFs 复合材料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45(1):1 - 12.

[8] 李玉玲. 基于 1-咪唑基和联苯多羧酸混合配体的金属 - 有机框架化合物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2017.

[9] 赵丹. 含螯合多胺配体金属配合物催化转化二氧化碳和探针性能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201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Preparatio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MOFs Compounds Constructed with Mixed Ligands

LI Yuling, LIU Yingjie, SU Mengyu, CAI Ao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ed the model of mixed ligands, 1,4-bis[(1*h*-imidazole-1-yl)methyl]benzene, 1,3,5-tri(1*h*-imidazole-1-yl)benzene as the main ligands, 2,6-naphthalene dicarboxylic acid, 4,4'-biphenyl dicarboxylic acid as the auxiliary ligands, successfully prepared two kinds of novel structure and amorphous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 (MOFs) ZZUT-13 (Z13) and ZZUT-14 (Z14)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olvent thermal.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wo kinds of complexes had been characterized and explored by single crystal diffraction analysis, X-ray powder diffraction (PXRD) and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TGA) and other mea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Z13 and Z14 are the framework of stability and high thermal stability.

Key words: mixed ligand; MOFs compounds; preparation; stability study

不同电泳方式对 SRAP 分子标记的 辛夷遗传多样性分析的影响

王 岚¹, 张 宏², 李靖靖¹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南召县辛夷产业办公室, 河南 南召 474650)

摘要:探讨不同电泳方式对 SRAP 分子标记的辛夷遗传多样性分析的影响,以 8 个河南辛夷种系为材料,从 64 个 SRAP 分子标记引物组合筛选出 5 个引物进行 PCR 扩增,手工电泳与毛细管电泳分别对产物进行多态性和遗传多样性分析。手工电泳与毛细管电泳分别检测出总条带数 71 条和 77 条,多态性条带数 56 条和 71 条;在多态性检出率方面,毛细管电泳(92.21%)高于手工电泳(78.88%),毛细管电泳具有更优的条带分辨率和灵敏度。手工电泳和毛细管电泳计算的辛夷遗传相似系数分别为 0.52~0.87 和 0.63~0.91。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两种电泳方式在相似系数为 0.76 处,均可将辛夷种系分为 3 类群,它们之间遗传基础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与样品的地理位置无直接关系。

关键词:辛夷;SRAP;遗传多样性;毛细管电泳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22

中图分类号:Q9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6-0121-04

辛夷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来源于木兰科植物的花蕾^[1],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临床入药历史,原产地主要分布于河南、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多为栽培,种类复杂。95%以上的河南产辛夷为望春玉兰,其花蕾产量和质量居全国首位,著称为“河南辛夷”^[2]。科学准确地鉴定辛夷品种及种质资源材料的遗传特性,对辛夷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遗传资源评价、种子质量鉴定和道地性品牌权益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毛细管电泳(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CE)是以高压电场为驱动力,以毛细管为分离通道,依据样品中各组分间淌度和分配行为的差异而实现分离的一类液相分离技术^[3],是电泳家族的新成员。本研究运用 SRAP 分子标记引物对河南辛夷种系进行 PCR 扩增,比较手工电泳和毛细管电泳之间的差异,为河南辛夷的遗传多样性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采取河南省南召县辛夷树种盛花期的花蕾,共 8 个品种(按顺序依次分别为 1~8 号),由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辛夷产业办公室张宏提供(见表 1),采摘后由自封袋封装, -70℃ 冰箱冻存。

表 1 河南辛夷编号及品种名称

编号	品种	采集地	采集部位
1	大毛桃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2	串鱼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3	猴巴掌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4	串鱼-猴巴掌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5	辛夷王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6	驴奶头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7	紫玉兰	皇后乡天桥村	花蕾
8	红玉兰	皇后乡天桥村	花蕾

收稿日期:2022-10-20

基金项目: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项目(2019GGJS272)

作者简介:王岚(1982—),女,河南郑州人,博士在读,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植物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研究。

1.2 实验方法

1.2.1 DNA 提取及检测

应用植物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北京天根, DP305)提取花蕾基因组 DNA,微量分光光度计(美国 NanoDrop 2000C)测定 DNA 的 OD 值及 $A_{260/280}$ 值, -70°C 冰箱冻存备测。

1.2.2 SRAP-PCR 分析

参考 2001 年由 Li 和 Quiros^[4] 创建的 SRAP 方法,运用 6 个正、反向引物组合为 64 个引物组合,优化体系后,筛选出 5 对条带清晰、多态性好、重复性好的引物,引物序列见表 2。PCR 扩增采用 $25\ \mu\text{L}$ 反应体系,其中 $2.5\ \mu\text{L}$ $10\times$ PCR buffer(含 MgCl_2), $1\ \mu\text{L}$ $2.5\ \text{mmol/L}$ dNTPs,正反向引物各 $1\ \mu\text{L}$,模板 DNA $30\ \text{ng}$,Taq DNA 聚合酶 $0.2\ \mu\text{L}$,余双蒸水补齐。扩增程序即 94°C 预变性 $3\ \text{min}$; 94°C 变性 $1\ \text{min}$, 35°C 退火 $1\ \text{min}$, 72°C 延伸 $1\ \text{min}$,5 个循环; 94°C 变性 $1\ \text{min}$, 50°C 退火 $1\ \text{min}$, 72°C 延伸 $5\ \text{min}$,35 个循环; 4°C 保存。扩增产物 -20°C 保存。

表 2 5 对 SRAP 引物组合序列(5' - 3')及 PCR 扩增结果

引物组合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me2/em14	TGAGTCCAAACCGGAGC	GACTGGGTACGAATTACG
me5/em10	TGAGTCCAAACCGGAAG	GACTGGGTACGAATTCAG
me6/em4	TGAGTCCAAACCGGTAA	GACTGGGTACGAATTTGA
me6/em12	TGAGTCCAAACCGGTAA	GACTGGGTACGAATTATG
me12/em2	TTCAGGGTGGCCGGATG	GACTGGGTACGAATTTGC

1.2.3 电泳分离

1.2.3.1 手工电泳分离

采用含有核酸染料的 1.8% 琼脂糖凝胶分离 SRAP 片段,将凝胶及内槽放入电泳槽中,添加 $0.5\times$ TBE 电泳缓冲液盖过胶板,加样后 $110\ \text{V}$ 电压电泳 $40\ \text{min}$ 左右。Tanon1600(上海天能)凝胶图像处理系统对凝胶进行拍照。

1.2.3.2 毛细管电泳分离

选用合适的 DNA screening 卡夹,Alignment Marker 选择 $15\ \text{bp}/3\ \text{Kb}$,以及 DNA Size Marker $50\ \text{bp}\sim$

$800\ \text{bp}$,为判断大片段扩增产物的准确性,同时加入一个参考 Sizer Marker $30\ \text{bp}\sim 1500\ \text{bp}$ 。按照操作流程,装载缓冲液槽,顺序加样,并确保所有 $0.2\ \text{mL}$ PCR 管内的样本体积不低于 $15\ \mu\text{L}$,无样品的孔加入 $20\ \mu\text{L}$ Dilution buffer 以保护毛细管。将预制好浓度的嵌入染料溴化乙锭加入卡夹,运行仪器获得电泳结果。

1.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1.2.4.1 手工电泳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 5 对引物电泳的结果,在图谱上统计有差别且容易被识别的条带,能够清晰、可重复出现的计为“1”,相同位置上没有出现的则记为“0”,从而生成原始数据矩阵,将数据录入 Excel 表格。

1.2.4.2 毛细管电泳数据处理与分析

根据 PCR 扩增产物的 CE 结果,使用峰检出功能,输入所有可能条带的参数,QI Axcel 软件自动生成包含每个样本的条带大小、浓度、相对丰度,摩尔浓度等详细信息的 PDF 和 Excel 表格,调整阈值、最小峰间距,计算条带数目、大小和多态性比例,其中每个样品都含有的条带在容差 3% 以内记为相同条带。根据有带和无带情况,利用 QI Axcel 软件自动转换为“1”和“0”数据矩阵。

运用遗传统计学软件(NTSYS pc 2.02i 版本)对上述两组数据分别处理,计算各样品间遗传相似系数,运用 UPGMA 法进行聚类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因组 DNA 的检测

经分光光度计测定,所有样品的 DNA $A_{260/280}$ 值在 $1.7\sim 1.9$ 之间,材料的基因组 DNA 质量和浓度都较高,满足本研究的要求。

2.2 SRAP 多态性分析

根据 SRAP 引物对 8 种河南辛夷扩增产物的手工电泳和 CE 结果,分别制作引物 me6/em4 的分离图谱(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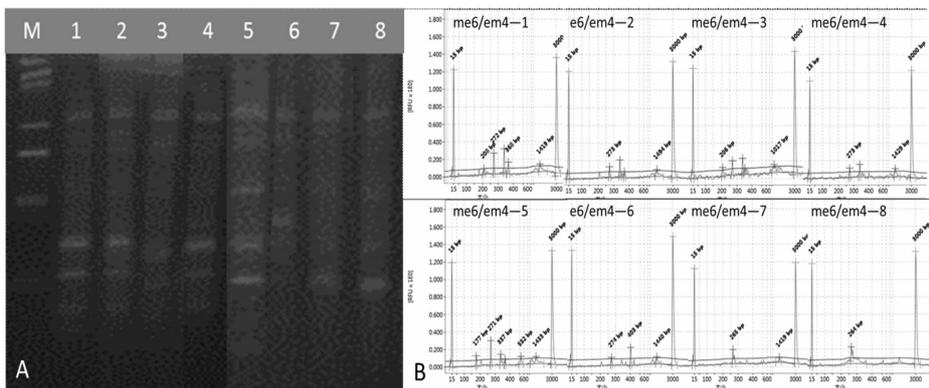


图 1 SRAP 引物 me6/em4 对 8 种河南辛夷的电泳结果(A)手工电泳(B)毛细管电泳

根据 5 对 SRAP 引物扩增产物电泳条带及大小,进行 SRAP 多态性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 CE 较手工电泳总条带数多检测出 6 个,多态性条带多检出 15 个,且 CE 多态性占比明显高于手工电

泳;检出条带大小 CE 与手工电泳分别是(74 ~ 1654)bp 和(100 ~ 2000)bp 之间,CE 的分辨率和灵敏度高于手工电泳。

表 3 5 对 SRAP 引物对 8 种河南辛夷 PCR 扩增结果的多态性条带

电泳方法 引物	手工电泳			毛细管电泳		
	总条带数	多态性条带数	多态性占比	总条带数	多态性条带数	多态性占比
me2/em14	11	9	81.82%	11	9	81.82%
me5/em10	14	12	85.71%	16	16	100.0%
me6/em4	16	10	62.50%	18	17	94.44%
me6/em12	17	14	82.35%	18	17	94.44%
me12/em2	13	11	84.62%	14	12	85.71%
合计	71	56	-	77	71	-
平均	14.2	11.2	78.88%	15.4	14.2	92.21%

2.3 河南辛夷遗传相似性及聚类分析

8 个辛夷样品的遗传相似系数手工电泳和 CE 分别为 0.52 ~ 0.87 和 0.63 ~ 0.91,详见图 2。其中样品 6 驴奶头与其余 7 个样品间遗传相似系数最小,表示它们之间遗传基础差异较大,亲缘关系较远。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两种电泳方式在相似系数

为 0.76 处,均可将 8 个河南辛夷种(系)分为 3 类群:类群 I 为小店乡马庄村驴奶头;类群 II 包括皇后乡天桥村紫玉兰和红玉兰;其余位于小店乡马庄村的 1 ~ 5 号样品为类群 III。8 个河南辛夷种(系)间遗传基础存在一定的差异,且与样品的地理位置无直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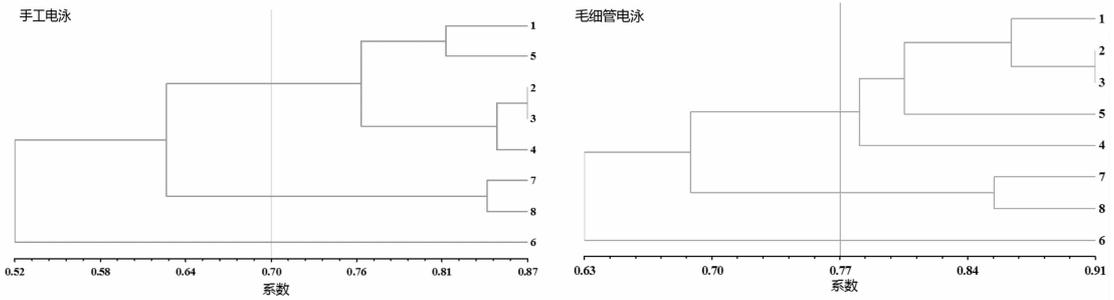


图 2 两种电泳方法对 8 种河南辛夷 5 对 SRAP 标记引物的 UPGMA 聚类图

3 讨论与结论

辛夷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之一,其性温、味辛,具有祛风散寒、开穴通窍之功能,在临床上用于治疗风寒感冒、鼻炎、肺炎、疮毒、牙痛等症^[5]。辛夷富含芳香类物质,挥发油含量高达 3% ~ 4%,主要成分为松油二环烯、桉精油等,是轻化和食品行业重要的添加剂。我国是辛夷的原产地,其植株主要分布于河南、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多为栽培,少有野生,药用原植物较多,种类复杂。河南省南召县位于伏牛山东段南麓,长江流域汉水上游,是我省山区林业重点县之一。南召县栽培辛夷的历史悠久,《本草纲目》上对南召辛夷曾有详细记载,把南召辛夷列为“本经上品”;2001 年 3 月,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经济林协会将南召县作为首批命名全国唯一的“中国辛夷之乡”。河南辛夷资源的主要树种包括:望春玉兰、玉兰、紫玉兰、二乔玉兰、腋花玉兰等,其中以望春玉兰所占比例最大,约占总株数的 95% 以

上,花蕾产量和质量在全国居于首位。

利用 DNA 分子标记能科学准确的鉴定植物品种及种质资源材料的遗传特性,对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和评价,种质鉴定和道地性品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6]。SRAP 分子标记法具有稳定、产率高和易分离等特点,目前国内外已广泛应用于各类农作物、中药材等的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领域^[7]。本研究参照 Li 等^[4]的 SRAP 标记方法,对河南省南召县的 8 个辛夷品种进行了标记,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适当的修改,其 PCR 扩增产物采用手工电泳和 CE 方式,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为河南辛夷的遗传多样性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结果显示,CE 分离图谱较手工电泳更清晰明确。CE 在总条带数和多态性条带数均高于手工电泳,可检出河南辛夷普通电泳过程中肉眼不可见的扩增条带,且条带差别小的也能清楚显示,其分辨率和灵敏度明显高于手工电泳。在遗传相似性和聚

类分析结果表明辛夷种系间遗传基础存在一定的差异,且与取样的地理位置无直接关系。这与郭乐等^[8]用 ISSR 分析报道的遗传关系与它们的地理来源并无严格的一致性关系基本一致。同时表明两种电泳方式均能较好的用于辛夷种系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但 CE 较手工电泳来说,不仅免去制胶、拍照、读带的步骤,还能利用配套软件,实现条带筛选和分析自动化;所需样本量少,一次可以获取多组样品结果,还能避免研究者接触有毒性的染料。在条件许可下,CE 在效率和精准度方面更有利于辛夷品系基因图谱的构建及现代化育种。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 169-170.
- [2] 倪锋轩,吴玉洲,张江涛. 河南辛夷丰产栽培技术[J]. 中国园艺文摘, 2011, 27(5): 193-194.
- [3] GHOSAL S. Band broadening theories in capillary electro-

- phoresis[J]. *Methods Mol Biol*, 2019, 1906: 143-166.
- [4] LI G, QUIROS C F. Sequence-related amplified polymorphism (SRAP), a new marker system based on a simple PCR reaction: its application to mapping and gene tagging in Brassica[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01, 103(2): 455-461.
- [5] 罗会畏. 辛夷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D]. 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2013.
- [6] 周琳,段玉,文博,等. SNP 分子标记及其在木本植物遗传育种的应用[J]. *亚热带植物科学*, 2018, 47(2): 187-193.
- [7] WANG L, XIAO A H, MA L Y,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magnolia wufengensis (magnoliaceae) cultivars using phenotypic traits, SSR and SRAP markers: insights into breeding and conservation[J]. *Genet Mol Res*, 2017, 16(1): gmr16019473.
- [8] 郭乐,康永祥,邢振杰,等. 望春玉兰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ISSR 分析[J]. *植物研究*, 2014, 34(4): 465-47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ffects of Different Electrophoresis Methods on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Magnoliae Flos with SRAP Molecular Markers

WANG Lan¹, ZHANG Hong², LI Jingjing¹

(1.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Nanzhao County Xinyi Industrial Office, Nanzhao 474650, 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lectrophoresis methods on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Magnoliae Flos (MF) with SRAP molecular markers, eight kinds of MF were used as material, 5 selected from 64 SRAP molecular marker primer combinations were used for PCR amplification. The products were isolated with manual electrophoresis (ME) and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CE) separately for polymorphism and genetic diversity analysis. ME and CE detected 71 bands and 77 total bands individually, 56 bands and 71 polymorphic bands. In terms of polymorphism detection rate, CE (92.21%)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ME (78.88%) method; And CE has better strip resolution and sensitivity; The genetic similarity coefficients of MF calculated by ME and CE are 0.52~0.87 and 0.63~0.91 respectively, but the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both method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of MF with a similarity coefficient in 0.76. There are some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but they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samples.

Key words: magnoliae flos; SRAP; genetic diversit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先张 CRTSIII 型轨道板张拉台座设计

刘秀元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2600)

摘要: CRTS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目前使用固定张拉台座法预制、工厂化生产。双向双层先张预应力,要求轨道板在张拉时纵、横向整体张拉,纵横向同步放张,所以要求张拉台座具有很大的强度和刚度,满足轨道板整体张拉要求。本设计研究轨道板固定张拉台座。预应力钢筋端部设置锚固板,既减小预应力建立起来的长度,又可长久保持预应力值不损失,提高轨道板耐久性;预应力钢筋定尺下料,专用张拉千斤顶单根初张拉,然后整体终张拉,整体同步放张。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加预埋 H 型钢张拉台座,具有强度高、刚度大、变形小的优点,完全能满足轨道板生产需要。

关键词: 双向先张;张拉台座;CRTSIII 型轨道板;预应力钢筋混凝土;H 型钢张拉锚固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6.023

中图分类号: U213.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2)06-0125-04

1 引言

目前国内新建时速 350km,无砟道床均以 CRTS III 型轨道板(以下简称轨道板)为主,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综合性能更优的高速铁路无砟轨道结构系统。标准板为 P5600 型 $5600 \times 2500 \times 200\text{mm}^{[1]}$,本文以生产量最多的标准板为例,设计计算轨道板张拉台座。

2 张拉台座结构概况

轨道板采用双向双层先张法预应力,轨道板预应力钢筋横向为单层,共 24 根,每根长 2435mm,纵向为双层,共 $2 \times 8 = 16$ 根,每根长 5520mm,单根预应力钢筋张拉力为 80kN。设计要求每个张拉台座放置 $2 \times 4 = 8$ 块模具^[2]。每块板横向张拉力 $24 \times 80 = 1920\text{kN}$,纵向 $16 \times 80 = 1280\text{kN}$,根据 2×4 矩阵式布置模具,台座的横向张拉力 $2 \times 1920 = 3840\text{kN}$,台座纵向张拉力 $4 \times 1280 = 5120\text{kN}$ 。

张拉台座采用 C30 混凝土,弹性模量 $E_c = 3.00 \times 10^4\text{MPa}$,容重 25kN/m^3 。底部设计预应力钢绞线;纵梁预应力束采用 8×11 根 7Φ5 钢绞线,横梁预应

力束采用 8×13 根 7Φ5 钢绞线。台座内预埋 H 型钢,作为轨道板张拉锚定位置立柱,承担轨道板张拉时的力矩,并把力矩传递给钢筋混凝土^[3],在 H 型钢立柱顶端焊接矩形钢箱梁,锚顶轨道板张拉杆件。

3 设计模型

3.1 预应力钢筋布置

预应力钢束分为纵向、横向两部分,根据力矩平衡,外力对地基梁中性轴的力矩等于预应中性轴的力矩^[4],则纵梁预应力: $1280 \times 1630 = F_{\text{纵}} \cdot 550$,式中 $F_{\text{纵}} = 3794\text{kN}$ 取其力的一半给予预应力钢绞线 7Φ5 钢绞线,则所需根数 $n = (1897 \times 103) / (1395 \times 140) = 9.7$ 根,故在纵梁上选取 11 根 7Φ5 钢绞线,其控制应力为 $f = (1897 \times 103) / (11 \times 140) = 1231\text{MPa}$,位于距离地基梁底部的 20cm 的位置上。

同理可求得:横梁梁上选取 13 根 7Φ5 钢绞线,其控制应力为 $f = (2235 \times 103) / (13 \times 140) = 1228\text{MPa}$,位于距离地基梁底部的 40cm 的位置上。为了避免地基梁在张拉预应力时产生过大的拉应力^[5],在距离地基梁底部 60cm 和 80cm 处,纵梁和

收稿日期:2022-09-26

基金项目:中国铁路总公司重大课题“高速铁路无砟轨道关键技术深化研究”(2014G001-B)

作者简介:刘秀元(1978—),男,山西繁峙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高速铁路、地铁设计施工科研工作及 BIM 技术研发。

横梁都增设一束上面所求出的预应力筋。

3.2 无自重作用和弹性支撑约束

在无自重作用和弹性支撑约束下^[6],对基础进行数值模拟,取每个荷载作用下的位移、弯矩和应力,在横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横向位移发生在第二根横梁上,它与下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1.41mm。在横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弯矩发生在第一根横梁上,它与下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635kN·m。设计计算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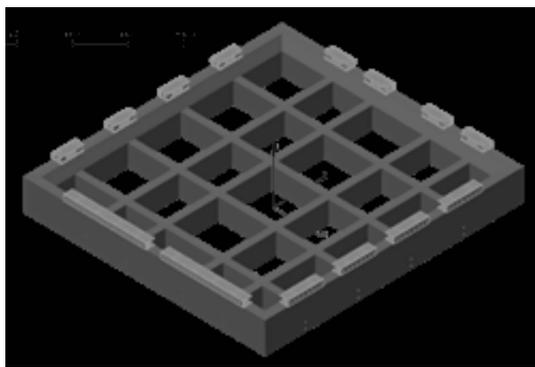


图1 张拉台座设计模型

4 结果分析

4.1 在横、纵单向预应力作用最大应力

在横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上,它与第四根横梁的交汇处,其值为2.9MPa;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横梁上,它与上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8.6MPa。在横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纵向位移发生在第二根纵梁上,它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1.59mm。在纵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弯矩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上,它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741kN·m。

在纵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生在第四根横梁上,它与第四根纵梁的交汇处,其值为2.1MPa;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横梁上,它与上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7.5MPa。

4.2 在全部预应力作用最大应力

在全部预应力作用下,最大纵向位移发生在第二根纵梁上,它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1.32mm;最大横向位移发生在第二根横梁上,它与下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1.01mm。

在全部预应力作用下^[7],纵梁上的最大弯矩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上,它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701kN·m;横梁上的最大弯矩最大弯矩发生在第一根横梁上,它与下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623kN·m。在全部预应力作用下,地基梁上全部为压应力,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上,它与第四根横梁的交汇处,其值为8.5MPa。在全部预应力+横向外荷载

作用下,最大横向位移发生在上部圈梁的第二个悬臂端上,其值为2.46mm。

4.3 在全部预应力+横向外荷载作用最大应力

在全部预应力+横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弯矩发生在下部位置的悬臂端为962kN·m。在全部预应力+横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生在下部位置的悬臂端为3.6MPa,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12.8MPa。在全部预应力+纵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横向位移发生在右部圈梁的第二个悬臂端上,其值为2.58mm。

4.4 在全部预应力+纵向外荷载作用最大应力

在全部预应力+纵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弯矩发生在右部位置的悬臂端为1149kN·m。在全部预应力+纵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生在左右部位置的悬臂端为3.1MPa,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13.4MPa。

4.5 在全部预应力+全部外荷载作用下

在全部预应力+全部外荷载作用下^[8],悬臂端的弯矩与之前两个工况没有变化,只是在圈梁的四个角的位置处弯矩增加了,最大值为1149kN·m。在全部预应力+全部外荷载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生在左右部位置的悬臂端为3.12MPa,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13.8MPa。

4.6 计算结果汇总

依据以上数据计算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计算结果汇总表

工况	位移 mm	弯矩	拉力 MPa	压力 MPa
横向预应力	1.41	635	2.9	8.6
纵向预应力	1.59	741	2.1	7.5
全部预应力	1.32	701	未出现	8.5
全部预应力+横向荷载	2.46	962	3.6	12.8
全部预应力+纵向荷载	2.58	1149	3.1	13.4
全部预应力+全部荷载	2.85	1149	3.1	13.8

5 局部受力分析计算

悬臂端验算,III型板张拉基础结构中悬臂端可以简化为一个悬臂梁。

右部:截面 $h = 120\text{cm}$, $b = 150\text{cm}$, 悬臂长 $l = 108\text{cm}$, 受到1280kN剪力产生弯矩 M 作用,

$$M = 1280\text{kN} \times 108\text{cm} = 138240\text{kN} \cdot \text{cm},$$

$$W_x = (1/6)bh^2 = (1/6) \times 150 \times 120^2 = 3.6 \times 10^5 \text{cm}^3,$$

$$\sigma = M/W_x = 3.84\text{MPa} > [\sigma] = 1.78\text{MPa},$$

故需要配筋来满足抗拉要求。

左部:截面 $h = 97\text{cm}$, $b = 150\text{cm}$, 悬臂长 $l = 108\text{cm}$, 受到 $8 \times 80\text{kN}$ 剪力产生的弯矩 M 作用,

$$M = 8 \times 80\text{kN} \times 108\text{cm} = 69120\text{kN} \cdot \text{cm},$$

$$W_x = (1/6)bh^2 = (1/6) \times 150 \times 97^2 = 2.35 \times 10^5\text{cm}^3,$$

$$\sigma = M/W_x = 2.94\text{MPa} > [\sigma] = 1.78\text{MPa},$$

故需要配筋来满足抗拉要求。

6 地基梁验算

6.1 地基梁简化模型

张拉台座基础结构中纵向地基梁可以简化为一个简支梁,在 midas 中建立模型^[9],左右作用 1280kN 的集中力,在距离梁底部 20cm 和 60cm 的地方布置预应力筋。模型计算得纵梁上部为 9.2MPa 的压应力,下部为 0.9MPa 的压应力。III 型板张拉基础结构中横向地基梁可以简化为一个简支梁,在 midas 中建立模型,左右作用 960kN 的集中力,在距离梁底部 40cm 和 80cm 的地方布置预应力筋。模型计算得横梁上部为 9.5MPa 的压应力,下部为 0.1MPa 的拉应力。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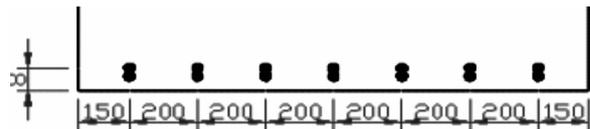


图2 地基梁简化模型

6.2 配筋设计材料参数

C30 混凝土, $\Phi 28\text{HRB335}$ 钢筋;混凝土容许压应力 $[\sigma_w] = 10\text{MPa}$, 钢筋容许拉应力 $[\sigma_g] = 180\text{MPa}$, 钢筋的弹性模量与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比值 n 取 10。取抗拉钢筋重心处距离底部 $\alpha = 8\text{cm}$, $h_0 = h - 8 = 112\text{cm}$ 。

6.3 配筋设计

先假定内力偶臂 $Z = 0.9$, $h_0 = 100.8\text{cm}$, $A_g = M/([\sigma_g]Z) = 138240/(18 \times 100.8) = 76.19\text{cm}^2$, $\Phi 28$ 钢筋面积为 $A_0 = 6.175\text{cm}^2$, 所需钢筋根数 $n = A_g/\Delta = 12.34$, 选取 14 根 $\Phi 28$ 钢筋; $A_g = 86.45\text{cm}^2$, $\mu = A_g/(bh_0) = 86.45/(150 \times 112) = 0.00514 > \mu_{\min} = 0.15\%$

$$n\mu = 10 \times 0.00514 = 0.0514$$

$$\alpha = \sqrt{(0.0514)^2 + 2 \times 0.0514} - 0.0514 = 0.2733$$

$$A_g = M/([\sigma_g](1 - \alpha/3)h_0) = 138240/(18 \times 112 \times (1 - 0.2733/3)) = 75.44\text{cm}^2$$

按此 A_g 值在计算 α ,

$$\mu = A_g/(bh_0) = 75.44/(150 \times 112) = 0.00449$$

$$n\mu = 10 \times 0.00449 = 0.0449$$

$$\alpha = \sqrt{(0.0449)^2 + 2 \times 0.0449} - 0.0449 = 0.2581$$

此 α 与之前算出的 0.2733 较接近,故选用的钢

筋合适。将此 14 钢筋,每两根绑成一束,每束的间距为 20cm。此时混凝土中的压应力:

$$\sigma_w = 2M/(\alpha(1 - \alpha/3)bh_0^2) = (2 \times 138240)/(0.2733 \times (1 - 0.2733/3) \times 150 \times 112^2) = 5.92\text{MPa} < [\sigma_w] = 10\text{MPa}$$

受压区高度为: $\chi = \alpha h_0 = 0.2733 \times 112 = 30.61\text{cm}$

受拉钢筋拉应力为:

$$\sigma_g = M/(A_g(h_0 - \chi/3)) = 138240/(86.45 \times (112 - 30.61/3)) = 157.08\text{MPa} < [\sigma_g] = 180\text{MPa}$$

基础所能承受的弯矩:

$$[M_g] = A_g[\sigma_g](1 - \alpha/3)h_0 = 86.45 \times 18 \times (1 - 0.2733/3) \times 112 = 158406\text{kN} \cdot \text{cm}$$

$$[M_w] = (1/2)\alpha(1 - \alpha/3)[\sigma_w]bh_0^2 = 0.5 \times 0.2733 \times (1 - 0.2733/3) \times 1 \times 150 \times 112^2 = 233697\text{kN} \cdot \text{cm}$$

故此钢筋应力控制是低筋设计,能承受最大弯矩为 1584.06kN·m。

7 H 型钢抗剪能力验算

采用 Q345qD 的 H 型钢,根据 H 型钢截面尺寸 $400 \times 400 \times 13 \times 21$ 得出截面几何特性值为, $I_x = 65361.58\text{cm}^4$, $S_x = 1800.06\text{cm}^3$, $A = 214.54\text{cm}^2$ 。Q345qD 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为: $[\tau] = 12\text{kN}/\text{cm}^2$ 。现在取两根截面 $400 \times 400 \times 13 \times 21\text{H}$ 型钢,其中每根型钢承受 $F = 640\text{kN}$,则

$$\tau = F_s S_x / (I_x b) = (640 \times 1800.06) / (65361.58 \times 2.1) = 8.39\text{kN}/\text{cm}^2 < 12\text{kN}/\text{cm}^2$$
。由于 $\tau < [\tau]$,故 H 型钢抗剪强度满足要求。

8 地基承载力验算

台座基础部分自重:单个张拉台座混凝土需要约 265m^3 ,密度取 $2400\text{kg}/\text{m}^3$,则混凝土重量为 $265 \times 2400 = 636000\text{kg} = 636\text{t}$;基础内钢筋重量 29.88t;台座基础钢结构重量 32.716t;布料机自重约 12t;单个台座内板的重量:P5600 型轨道板每块需要 2.97m^3 混凝土,密度取 $2400\text{kg}/\text{m}^3$,所需混凝土重量 $2.97 \times 2400 = 7128\text{kg}$,板内钢筋重量根据设计图纸可知为 316.45kg,则可知每块 5600 型轨道板重量约为 $7128 + 316.45 = 7444.45\text{kg}$ 。一个台座内设置八块板,总重约 $7444.45 \times 8 = 59555.6\text{kg} = 59.56\text{t}$;P5600 型轨道板模具重量约为 8t,一个张拉台座内模具总重 $8 \times 8 = 64\text{t}$;H 型轨道一侧重量 2.883t,双侧为 5.766t;每个张拉横梁约为 3.1t,四个张拉横梁总重量 12.4t;布料机料斗 3m^3 混凝土重量 7.8t;移动横梁轨道重量 0.15t;蒸养管道及空气管道重量 1t;故将以上重量加起来为地基所受竖向荷载 861.272t。

地基承载力计算工况:竖向载荷由台座基础全部底面承受^[10]。台座基础全部底面面积(占地面积)为312.93m²。则地基所承受的应力为 $861.272 \times 10 / 312.93 = 27.523\text{kPa}$ 。地基承载力安全系数: $120 / 27.523 = 4.36 > 2$,此计算工况下,地基承载力满足要求且具有足够的余度。由于模具及轨道板重量是通过台座地面直接作用到地基上的,接近实际工况,故地基承载力是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

9 结论

分双向先张 CRTSIII 型轨道板,张拉台座没有统一结构形式,有全钢结构,有钢筋混凝土结构,还有混凝土挖孔桩结构等,都有不同程度损坏,有的甚至没有生产完成,张拉台座已经报废。结合各轨道板生产场的台座结构形式,本设计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中埋设 H 型钢结构作为张拉梁台座,是目前一种比较合理的方案,根据目前在郑徐客专、京沈客专和昌赣客专使用结果,这种台座的刚度强度均能满足双向张拉要求,结构变形很小,都在小于毫米范围内,并且结构设计合理,安全性高,体积小,占地小,混凝土用量也小,完全满足先 CRTSIII 型轨道板生产需要。

参考文献:

- [1]铁科院. CRTS 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设计图[N]. 北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2013.
- [2]刘秀元. 先张 CRTS III 型轨道板张拉技术研究[J]. 铁道建筑技术,2016(9):103-106.
- [3]张晓东,翟浩君. CRTS 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 BIM 模型研究[J]. 铁道标准设计,2021,65(9):29-34.
- [4]吴培明. 混凝土结构[M]. 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
- [5]宋荣芳,刘秀元. 津秦客运专线 CRTS II 无砟轨道先导段施工技术[J]. 铁道标准设计,2013(7):37-41
- [6]冀光民,吕文超,宋剑. 道岔板铺设精密测量技术[J]. 铁道标准设计,2010(1):86-89.
- [7]刘晋艳,刘秀元. 先张 CRTS III 型轨道板模具制造技术研究[J]. 铁道建筑技术,2017(2):109-113.
- [8]刘秀元. 先张 CRTSIII 型轨道板蒸养技术研究[J]. 铁道建筑技术,2016(9):88-90.
- [9]王新民,李浩宇. CRTS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自密实混凝土灌注模板技术创新研究[J]. 铁道建筑技术,2016(9):96-99.
- [10]刘秀元,宋荣芳. 津秦客运专线 CRTS II 型预埋套管式道岔板铺设技术[J]. 铁道标准设计,2013(5):35-40.

(责任编辑 吕志远)

Design of the Stretching Bed Technology of Pre-tensioned CRTS III Slab

LIU Xiuyuan

(China Railway Fifth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T Double directional pre-tensioned CRTS III slab is a new type of ballastless track on high speed railway with our ow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t present, plate precast production of pre-tensioned CRTS III slab is used of fixed tensioning pedestal, and realizes factory production. Double deck Prestressed of pre-tensioned requires the track plate to be stretched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as a whole, and to be stretched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simultaneously, so the tension bench is required to have great strength and stiffness to meet the overall tensioning requirements of the track plat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sign of pre-tensioned CRTS III slab stretching bed. The installation of anchor plate in rebar ends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length of the prestressed steel, but also keep the prestressed value for a long time and improve the durability of the track plate. With a standard length, Prestressed steel reinforces the ability to sustain early prestressing tension for every single steel bar, then bears integral stretching, and ends with integral Synchronous unloading. With the advantages of high strength, high stiffness, small deformation, prestressed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pre buried steel H stretching bed, and can fully meet the production needs of of pre-tensioned CRTS III slab.

Key words: bidirectional first tension; stretching bed; pre-tensioned CRTS III slab; prestressed reinforced concrete; H type steel tensile anchorage

《中州大学学报》2022 年总目次

·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

- 发现普列特尼约夫
——作为《现代人》杂志主编的教育家身份 耿海英(1-1)
- 感觉的寓言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叙事分析 王艺涵(1-8)
- “在家”与“在场”的生态书写
——论刘慈欣《三体》中的女性形象 韩玉洁(1-13)
- 语境与纲领
——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的《现代人》研究 耿海英(2-12)
- 卞之琳诗本事与释评三题 萧梦麟(2-21)
- 试论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创作特色
——以《人民文学》和网络新媒体平台非虚构文学作品为主要考察对象 成艳军(2-27)
- “褶皱般”的栏目
——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的《现代人》研究(续) 耿海英(3-1)
- 作为世界的隐喻的文学
——墨白和博尔赫斯对比研究 杨文臣(3-10)
- 在梦境里自由飞翔
——读墨白散文集《鸟与梦飞行》 高俊林(3-16)
- 兵法与小说叙事的关系(对话) 墨白,孙青瑜(3-20)
- 俄国 1820 年代关于普希金的论争
——《现代人》的“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溯源 耿海英(4-1)
- 斯拉夫派与土壤派的文学论争
——以阿克萨科夫兄弟为视角 陆尧(4-7)
- “百花园”与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 刘宏志(4-14)
- 文本自身的反驳
——果戈理的妖魔元素对“现实主义”神话的解构 耿海英(5-1)
- 作为文献纪实文学体裁的“超文学” 张变革(5-10)
- 论电影《美人鱼》中的环境审美观念与生态思考 岳芬(5-17)
- 上海《晨报》上的刘呐鸥、穆时英集外文 杨新宇(6-1)
- 《光荣院》的文本、版本与文学传播 李勇军(6-7)
- 陌生化认知·乡愁乌托邦·审美现代性
——论科幻小说的美学意蕴 吴亮银(6-11)
- 诗歌绘本隐喻空间的构建及语言特点 胡若牧(6-17)

· 新时代新思想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周春辉(2-1)
- 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逻辑 钱昌照,刘宇岚(2-6)

· 新时代新气象:文化与创意 ·

- 中原学与《道德经》 李庚香(1-19)
- 中原学与新宋学 李庚香(3-87)
- “互联网+”下的闽南餐饮 IP 视觉形象研究 邵世鑫,李文涛,程原(3-91)
- 符号学视角下的传统乡村景观“乡愁”意境表达探析 万陆洋(3-96)
- 中原学与河洛学 李庚香(5-89)

· 经济与管理 ·

- 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内大循环的视角 黄 潇,王海霞(1-29)
- 销售转型视角下食品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分析
——以“好想你”并购“百草味”为例 窦 伟,李 珂(1-36)
- 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财务评价与蛛网重构 李梦旭(1-42)
- 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郝艳燕(1-50)
- 协同融合视阈下河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供给研究
——2006—2019年基于协调度模型的经验分析 赵 健(2-32)
- 电商发展的农村减贫效应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叶 娟,顾一鸣(2-39)
- 基于百度指数分析的信阳大别山红色研学产品提升研究 刘桂兰,张兰兰,唐 梦(3-24)
- 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量视角 程文改,赵进东,郑 言(3-31)
- 用户资产的程序化价值变现逻辑旨归 林宗平,杨 静,李建锋(3-37)
-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及时空演化
——基于河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韩占兵(4-19)
- 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
——基于产业结构中介效应的视角 夏 宏,朱 涛(4-27)
-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
——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与空间外溢 杨春雨,杨瑞琪(4-35)
- 应急财政政策:历史演进、治理逻辑与调试趋向 王彦平,陶慧芳(4-42)
- 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研究:以国家海洋博物馆为例 王庆生,李 欣(5-21)
-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 李国谨(5-29)
- 新时代背景下对权力运行审计监督:内容、目标及路径 阎建合(5-35)
-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 石,李 媛(6-23)
- 论我国城市养老服务的发展趋势与路径选择 祁雪瑞(6-28)
- 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路径研究 杨 健(6-34)

· 法学研究 ·

- 意志与意识: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刑事责任论 刘德法,白雅楠(1-54)
- 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路径 章 琦(1-62)
- 论超大型数字平台双轮垄断的法律规制 姚保松,常 慧(2-44)
- 从人格权辨析角度探究企业数据的权利归属 马牧青(2-50)
- 论恶意贬损声誉型刷单行为的刑法定性与规制 王诗华(3-43)
- 《大清律例》中亲属相犯以凡人论问题研究 王柄鑫(3-49)
- 经济新业态的法律规制
——以饭圈失范现象为例 田依蒂(4-72)
- 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
——基于数据产权立法的策略 邱国侠,范美云(4-79)
- 论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构建 李东风(5-41)
- 网络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内在逻辑 谢京凯,孙 韡(5-46)
-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公益诉讼路径研究 顾秀文(6-40)
- 我国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之法定刑问题
——基于犯罪经济学的反思 张诗怡(6-45)

· 社会与历史 ·

抗战时期国统区警察薪酬待遇问题研究

——以四川省会警察局为中心 曹发军(1-67)

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研究 周术槐,石婧逸(1-72)

孙健初西北地质考察研究 张传卿,王永强(1-78)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论逻辑的伟大源泉

..... 范 峥,马林靖,张 欣,时漫扬,李 莉(1-86)

河南革命文物的时空分布与价值意蕴探析 赵金华,亓淑贤,吴朋飞(2-57)

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路径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谭备战,马小月(2-63)

行稳致远的中欧关系 柴生高(2-67)

革命文艺的下乡:以鲁艺工作团为中心的考察 梁璐牵(2-72)

优秀文献古籍传承与文化自信 陈 峥,蔡乾涛(3-54)

乡村振兴视域下地方戏曲的发展路径探索

——基于安徽农村黄梅戏调查 王凤娟(3-59)

宁夏革命标语形成的历史维度、内容特征与有效利用 张玉梅(4-47)

从《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招幌设计 杨 远,李 迪(4-52)

药品下乡:最初的努力与成效(1953—1964) 李 剑(5-51)

对决天花:种痘事业的兴起与天花的根除 贾吉庆(5-57)

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教育探析 张业蕾(5-62)

医疗救护视野下的沂蒙精神探析 胡安徽,张业蕾(6-66)

新中国初期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历史作用 崔 钧(6-72)

抗战史视野下的《云南医刊》 陈妍晶(6-78)

《红星》报与中央苏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 李 媛,钟继润(6-84)

· 传媒与艺术 ·

高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 罗文华(1-91)

融媒体语境下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科学治理 杨清华(1-97)

叙事性传播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与分析 戴 旻,刘欣悦(2-77)

抗战时期《大公报》正、副刊迥异的言论倾向与身份符码 许 晶(2-82)

图书新品种开发传统视角的不足与价值共创视角的引入 梁 超(3-75)

成“物”与去“物”:受众本体存在的价值之问 陈文泰,孙仲伯(3-82)

全媒体新闻报道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与实践 冯 美,庞端阳(4-57)

文化自觉、活化表达与记忆重构: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创新三维

——以“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例 常 淳(4-62)

浅析英国《卫报》和德国之声对难民事件报道之风格

——以艾伦·科迪之死为例 胡博文(4-67)

云时代的中国国际传播:场景、话语与关系 武会园(5-79)

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建设研究

——基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实践研究 韩燕飞(5-85)

化阻为疏: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看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 宋晓霞(6-53)

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李平芬,隆安燕(6-59)

· 语言文化与翻译 ·

诗歌译解:跨越翻译叙事的审美距离

——基于刘华文《翻译诗学》的考察 张宏雨(1-102)

语言特区理论视域下诗歌文体对新闻标题语言的影响 张 力,张剑英,仵兆琪(1-109)

河南沁阳方言的人称代词和复数标记“个” 张明明(1-114)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鲍勃·迪伦的歌词象似性解读	成汹涌,丁运梦(3-64)
中央文献英译的译者立场	杜帅(3-70)
中动结构的特征解读及句法分析	郭霞(5-67)
从“翻译行为”到“译者行为”	赵国月,高晓仙(5-74)

· 新时代新担当:教育与教学 ·

高校礼仪教育视角下立德树人路径探索	程燕(1-119)
高校声乐课堂中的情感交互探究	郭楠楠(1-124)
“逆全球化”思潮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王苏琪(2-89)
高校“课程思政”开发利用河南红色资源的路径探究	祝琳(2-94)
应用型本科高校《量子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究	李海东,周书焕,王远,姜国峰(2-98)
认知行为理论视角下外语课程思政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樊永仙(2-103)
新时代提升教师能力、促进教师发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策略	李欣(3-101)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要聚焦新矛盾论思维	谭笑风(3-106)
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	南亚娜(3-111)
地方应用型本科新工科建设策略研究	赵冰,郭改文,黄继海(4-86)
河南省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为例	石丽(4-92)
矛盾分析法在中国十二音作品中的体现与运用 ——以罗忠镕《涉江采芙蓉》为例	胡舒翔(4-98)
《立体构成》课程线上线下教学互补模式及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实践	禹典(4-103)
听障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比较研究	王琦,马子莹(5-95)
“教育内卷”背景下的大数据技能社会人才培养评价模式的研究	张东林,崔蕾(5-101)
河南省高校三位一体组团式援疆模式研究	王丽敏(5-106)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	韩兴华(6-90)
历史主动精神视阈下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论析	王怡灵,吴学兵(6-95)
论儒家传统修身理论的个体生命观	张培(6-100)
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的文化自信构建研究	吉冰冰(6-105)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与实践探索	胡钰(6-110)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

变频调速冗余控制在塔机中的应用	王继东,王玉清,魏铁壮(2-108)
变截面节段拼装连续梁长线法预制工艺	刘秀元(2-112)
脱氢枞酸结构改性的研究进展	姜巧娟,赵雅雯,刘从军(2-119)
正交优化藜麦饼干的工艺配方研究	秦小转,陈欣(2-125)
改进边缘算法的智能识别播撒机器人	李红丽,沈相龙,王通,周松豪(3-116)
淫羊藿黄酮对大鼠血清内源睾酮水平的影响	宋彦显,闵玉涛,彭聪,马庆一(3-120)
低温甲醇洗装置中塔的布置及管口方位设计	孙方莉(3-124)
活性粉末混凝土(RPC)节段预制梁制造技术	刘秀元(4-107)
类矩形盾构隧道管片施工受力性能数值模拟分析	张欢欢,汪菁(4-112)
基于响应曲面法优化碳酸二甲酯精馏工艺的模拟与分析	郑丽萍,刘杏,刘梦瑶,张峻炜(4-119)
间歇式双污泥工艺处理农村污水的应用	宋博宇,卞晓峰,华洁平,黄健平(4-124)
基于探注协同控制的深部松软破碎围岩支护技术研究	王进尚,刘成才,王玉玲,李润泽(5-110)
低周往复荷载下混杂纤维混凝土梁柱结构试验及理论研究	钟晨,温学涛,胡元超,朱旭峰(5-114)
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研究	王勇,李层,韩益,郑丽萍(5-119)
不同预处理方法对鸭肉品质的影响	冯冲,姚虹,陈思嘉,李泓晔,耿雪,朱川灏(5-124)
混合配体构筑的 MOFs 化合物的制备与结构表征	李玉玲,刘滢洁,苏梦宇,蔡奥(6-115)
不同电泳方式对 SRAP 分子标记的辛夷遗传多样性分析的影响	王岚,张宏,李靖靖(6-121)
先张 CRTSIII 型轨道板张拉台座设计	刘秀元(6-125)